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重庆市一级期刊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2024/4

统一战线学研究

二〇二四年第四期（总第四十六期第八卷）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本刊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2023年10月修订）反映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敬请作者在投稿前仔细阅读、对照处理，以使稿件经制度化流程得到更高效率的办理。

一、常设专题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

二、选稿标准

秉持“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办刊理念，提倡宽视角、学理化、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研究统一战线。倾向选用从宏观和中观层次研究统一战线的稿件，坚持“以题审文、按质取文”。

三、具体要求

（一）导向。稿件须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用学术讲政治。注意防范具体表述、引用注释或参考文献、图表中的话语歧义与隐形意识形态风险。我刊在审编校全程中对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稿件实行“一票否决”。

（二）选题。立足宽广时空视野，及时回应党和国家战略关注，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角度新颖、力求前沿，坚持大统战视角，立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统一战线议题作出使读者有较大启发的研究，避免“就统战谈统战”。

（三）立论。立论基础坚实，问题提出部分应包含研究背景陈述、文献述评、创新点阐述等内容。要有精到的文献综述，开门见山地指出所研究问题、理论价值和政策依据、现实意义。重视援引前沿成果（含正文论述），且实际引用了大量的期刊前沿文献。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30条，其中引用近3年期刊论文不少于10条，同时注意回溯三年以上的代表性论文。

（四）论证。论证中注意材料支撑，使用丰富、可信、有说服力的论据，避免泛泛而谈。题目、摘要、关键词、图表应做到规范、简洁、清晰。

（五）文字。提倡简洁、清晰、准确、顺畅、朴素的文风。表述符合语法规则，主谓宾结构清晰，无病句，无文字差错，无逻辑错误。请逐一仔细核对原文，如发现问题较多、学术态度不端正的，特别是如在编校中发现文字硬伤、低级文字错漏情形，即使已经审理录用的稿件也将作退稿处理。

（六）注释与参考文献。注释使用尾注体例。引用各类文献时务必核实原文，确保准确性。参考文献体例详见《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https://mp.weixin.qq.com/s/kv8cyCnRcp7QbkyXlJeX0g>。

（七）篇幅。不少于12 000字，论述深入的优秀论文篇幅可达1 5000~20 000字左右。

（八）学术诚信。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文字重合率一般不高于15%。作者在投稿前应明确作者顺序（依据作者的实际贡献），投稿后不接受对作者署名及顺序、基金项目等基础信息的更改。

（九）审稿周期。审稿周期为一个月。来稿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本刊返修意见或有关回复的，作者可自行撤稿。审稿流程：一审→二审（含专家外审）→三审。

（十）其他约定。对契合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的稿件，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

（十一）投稿方式。采取邮箱投稿，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

（十二）联系方式。电话：（023）62874725；微信公众号：[tyzxyj](https://mp.weixin.qq.com/s/tyzxyj)；开放获取：<https://cqsy.net.cn/?Tongyi/Zhanxian/>。

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详版请见本刊微信公众号相关推送：<https://mp.weixin.qq.com/s/RXpUuqE7ivLXv5qv54MYEQ>。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4年第4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

编委：王浩 王英津 王浩宇 田飞龙
吕鹏 刘福军 齐鹏飞 李俊
李捷 杨恕 肖存良 汪仕凯
汪曙申 宋俭 张建 张献生
陈纪 陈兵 陈奕平 陈家刚
相德宝 袁征 钱再见 徐理响
郭永虎 黄天柱 蒋锐
韩云波 薛庆超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长：夏晓华

主编：王鸿

执行主编：林华山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4年第4期（总第46期）

双月刊 2017年创刊 第8卷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专题

统一战线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 01 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 陈明明 杨东光
- 13 统战思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 / 张献生
- 22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文明学旨趣及生成进路：以大一统为中心的讨论 / 俞佳奇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专题

习近平总书记涉台“五个共同”重要论述研究

- 36 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略考量、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 / 朱松岭
- 47 习近平总书记涉台“五个共同”重要论述的内在关系和实践指向
/ 赵南宁 康秀云
- 58 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建构 / 许丹荔 蒲瑶

- ◎ CSSCI (2023—2024) 扩展版来源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专题

反分裂反干涉反制裁研究

- 70 司法对“台独”行为的认定与制裁 / 张 龔 邵丞玉
- 82 反“独”促统的涉台涉外法律斗争：动态、制度与前景 / 田飞龙
- 98 2016年以来中央政府反“台独”政策的进展、挑战及影响
/ 张 建 常帅兵
- 117 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内容、认知与影响
——以2024年台湾地区选举为背景 / 李 恒 周生龙
- 136 美国国会立法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特点与动向 / 杜哲元
- 149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样态、危害与治理
/ 邓观鹏 顾友仁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全球超级选举年与世界政党政治新动向研究

- 165 “特朗普归来”：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 / 周嘉希

封二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封三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4 No.4(Sum No.46) Vol.8

- 01 From Class Alliance to Patriot Alliance: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t United Front Theory
Chen Mingming&Yang Dongguang
- 13 United Front Thinking:the Political Wisdo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Zhang Xiansheng
- 22 The Civilizational Purport and Formation Approach of the United Fro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the Great Unification Yu Jiaqi
- 36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aiwan Issue which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Main Contents and the Fundamentality Zhu Songling
- 47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f 'Five Commons' Related to
Taiwan Zhao Nanning&Kang Xiuyun
- 58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s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Discours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Xu Danli&Pu Yao
- 70 Judicial Identification and Sanctions on 'Taiwan Separatism'
Zhang Yan&Shao Chengyu
- 82 Taiwan-related and Foreign-related Legal Struggle Against 'Separatism' and Promoting Unification: Dynamics,
System and Prospect Tian Feilong
- 98 The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Impac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Anti-'Taiwan Separatism'Policy Since 2016
Zhang Jian&Chang Shuaibing
- 117 The Content, Cogni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Research on Taiwan-Related Issues of American Mainstream Think
Tanks-In the Context of the 2024 Taiwan Election Li Heng&Zhou Shenglong
- 136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 U.S. Congressional Legislation Interfering in China 's Tibet Affairs
Du Zheyuan
- 149 Historical Nihilism Nihilty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Pattern,Harm and Governance
Deng Guanpeng&Gu Youren
- 165 'Trump Returns': Campaign Strategies,Party Political Trends and Impacts on China
Zhou Jiayi



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陈明明 杨东光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阶级联盟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重要策略，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逻辑起点。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的演进，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轨迹。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形式尽管发生变化，但基于人心和力量的政治联盟即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没有改变。随着中国社会进步，统一战线面临更多时代之问，需要不断确立新理念、直面新结构、研究新问题、介入新领域、学会新方法、认识新世界，通过持续优化社会利益结构与资源配置，不断团结壮大爱国者力量并激发社会活力，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持续推进。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体现在四个方面：理论话语从阶级话语调整为社会结构话语，统战对象从中间阶级扩展至全体人民，统战方式从动员政治资源创新为全方位调动社会政治资源，统战功能从推进社会革命转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统一战线；阶级联盟；爱国者联盟；社会矛盾；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2024）04-0001-12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4.001

作者简介： 陈明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专家委员会主任；杨东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青年研究员。

引用格式： 陈明明，杨东光. 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 1-12.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成功之道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推动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策略与战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历史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成为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重要法宝。

一、社会革命与阶级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学说上。社会经济形态的内在过程既孕育着阶级矛盾，也集中表现为阶级矛盾。阶级冲突产生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这是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法则。以经济社会结构改造为核心的社会革命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在生产关系尚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阶级冲突的规模和烈度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只有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制度结构与价值系统的稳定性才被打破，它通常以深刻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来预示重大“历史时刻”的到来。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居于被支配地位的社会阶级对统治阶级发起全面挑战，试图变革现存经济秩序和上层建筑。革命能否成功取决于多种主客观条件，如决战前阶级意识的动员、阶级组织化的程度，决战中国际国内结构的制约、应对这种结构制约所采取的阶级行动的策略战略等。其中，正确处理阶级关系的阶级联盟（如争取中间阶级）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新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结构是在革命中通过不断发展阶级联盟，促使阶级力量的对比朝向有利于社会变革目标转化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从阶级斗争到社会革命，从社会革命中建立和发展阶级联盟，以阶级联盟推进和完成社会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中，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形成两大联盟，分别是工农联盟，以及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比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的联盟，这是建立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治基础。工农联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统一战线理论的内核。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欧洲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内容，但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大量农民，以地主和农民为核心的封建生产关系并没有消亡。马克思认为，农民和无产阶级都是受到资本剥削的阶级，“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资本迄今为止用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是资本用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借口”^{[2] 526}。无产阶级和农民均受到资本统治，本质上都是无产者，因此，作为无产者的工人阶级和半无产者的农民阶级都是革命力量。工人阶级要加速推进社会革命的进程，不能不联合农民的力量，不能不和农民联合起来组成工农联盟。“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3]

在资产阶级因占据经济与政治系统的支配地位并全面掌握社会权力资源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仅

靠自身的力量不足以改变阶级间力量对比, 仅有工农联合也不足以建立起压倒性的政治优势, 无产阶级还须发展同其他具备革命潜力的阶级的合作, 构建更广泛的联盟。事实上, 在资本主义逻辑的作用下, 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大资产阶级手中, 小资产阶级与小生产者日益落入社会的底层, 客观上与大资产阶级产生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有了共同的阶级敌人 (即大资产阶级), 因而同样具有迫切改变现状的社会革命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注意到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的失败, 促使马克思思考是否需要壮大阶级联盟。他的最终结论是: “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生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 反对资本统治以前, 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 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 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2] 455} 换言之, 被抛入两极化的社会结构中的农民、流浪汉、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边缘阶级, 没有他们的加盟, 工人阶级难以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反过来说, 这些边缘阶级如果想摆脱在两极化结构中的不利地位, 就必须承认工人阶级作为“先锋队”的领导, 加入到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中, 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参与者和同盟军。

马克思认为, 在某种历史时期内, 如一国存在着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同大资产阶级结盟的情况下, 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甚至可以而且必须包括具有民主性要求的资产阶级, “民主的”或“立宪的”资产阶级之所以加入这个以改造或颠覆整个现存秩序为使命的阶级联盟, 是因为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大资产阶级同样是他们的敌人。虽然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不能缺席, 但主导这个革命进程和方向的是阶级联盟中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动摇性, 始终对此保持警惕。“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 不放弃对之“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2] 434}。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牢牢掌握阶级联盟的领导权。在这里,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联盟理论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和战略的思想: 坚持阶级联盟的阶级领导权以及阶级联盟的阶级广泛性。只有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一定条件下的资产阶级等纳入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 整合革命阶级的政治力量, 汇聚各革命阶级的政治共识, 促进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革命运动的变化, 才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和资产阶级统治。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联盟理论。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不发达的东方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封建生产关系深厚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 农民问题较之工业的欧洲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列宁认为, 农民在工人阶级的带领和教育下可以成为坚强的革命力量。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盟“可以成为‘真诚的联合’, 真诚的联盟, 因为雇佣工人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没有根本相悖的地方”^[4]。基于相似的经济地位和共同利益, 工人阶级与农民组建起了阶级联盟。无论是作为无产者的雇佣工人, 还是作为半无产者的小块土地农民 (小农), 他们都能从社会革命中获益。例如, 农民在社会革命中可以“(a) 免除向大地主占有者交纳地租或一半收成……; (b) 免除抵押债务; (c) 免除大土地占有者的多种形式的压迫以及对大土地占有者的依附 (林地及其使用等等); (d) 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立刻帮助他们经营农务”等^{[5] 225}。支持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 是最符合农民利益的选择。

列宁一方面主张联合与解放农民，另一方面又强调引导与教育农民，对农民进行具体的阶级划分，把农民划分为农业无产阶级、小块土地农民、小农、中农、大农等，采取不同策略对待这些农民。这种差异化政策源于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阶级分析基础上对农民阶级立场的判定，以及对农民落后性的认识。农民的不同阶层在革命中的革命性有着明显差异，如农业无产阶级、小块土地农民与小农是坚决的革命者，中农更多持有“私有者的世界观和情绪”，大农则是“直接而坚决地反对革命无产阶级”^{[5] 227-228}。这种落后性使农民在面对资本的诱惑时，容易表现出妥协性与动摇性，甚至具备强烈革命性的小农也可能难逃资本诱惑。尤其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小农容易动摇自身的阶级立场并与资本妥协，容易走向自由贸易并主张自由使用私有权^{[5] 225}。列宁由此深化了对农民问题与工农联盟理论的分析，更加强调无产阶级在工农联盟中的领导权。

列宁同样看到了小资产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私有者、小业主，拥有少量资本。在资本主义市场中，他们的生活与经济条件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他们的“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以至遭到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5] 143}。这种两面性在不同革命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把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大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面对封建势力，所以双方能够而且必须联合起来结成阶级联盟。随着革命从民主主义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曾经积极参与社会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会表现出保守倾向，这又决定双方的联盟具有某种不稳定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中，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自由派资产者不得不立足实际，或主动或被动地站到革命一方，成为具备一定革命性的中间阶级。但是他们并非有着坚定的革命立场，而是在革命形势高涨时期被迫卷入到革命大军中，经常摇摆于革命与妥协之间，这就增加了工农联盟与小资产阶级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总之，在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中，由于阶级间力量对比的差距，无产阶级仅凭借自身力量难以改造封建地主与资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的支配结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根据具体阶级矛盾，分别团结动员农民阶级以及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间阶级，通过建立阶级联盟的方式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统一战线就是为了推进社会革命所建立起来的阶级联盟的行动，是解决阶级矛盾并推进社会革命的重要战略。在社会革命过程中，由于阶级联盟的性质、结构及其内在张力，为了维持阶级联盟在社会革命中的基本作用，以及克服阶级联盟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就成为统一战线理论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建立和巩固阶级联盟、推进社会革命的关键所在。

二、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

统一战线理论源自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运动，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统一战线理论也必然存在中国化的问题。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的逻辑是：中国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的指导下，立足于中国落后农业国的实际状况，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前工业国家建立以列宁主义为组织原则的先锋

队政党; 先锋队政党把群众力量组织动员起来, 改造阶级关系与权力结构, 重建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在此过程中, 并非所有阶级都能自发或自觉地进入到先锋队政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 这就要求党必须根据中国社会阶级状况, 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6], 把处于革命运动之外或边缘地带的中间阶级力量团结起来, 以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 最终通过建立阶级联盟实现国家与社会转型。这是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的现实命题。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十分复杂,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7];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具体化为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8]。中国面临多重复杂的社会矛盾, 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需要动员、团结各类中间阶级以解决主要矛盾。统一战线的功能就是把这些中间阶级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盟友, 共同推进社会革命。国民革命时期,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阶级敌人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北洋军阀及其封建势力。位于无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主要中间阶级是资产阶级, 共同的阶级敌人决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能够联合起来。国民革命虽然结束了北洋军阀统治, 但是并没有真正实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国民党“变成了传统的绅士阶级和新型的资产阶级所拥护的组织, 而这些人又受大军人的操纵。蒋介石的政权基本上还是军绅政权, 同时加上一些资产阶级领袖的支持”^[9]。中国社会呈现出以两极化阶级结构对抗为核心、多元阶级力量共存的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下的新的中间阶级或依附豪绅买办阶级, 或同情工农大众, 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 需要寻求和争取这些中间阶级力量的支持和配合, 否则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政治目标。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民族矛盾超越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与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官僚、大地主的国民党进行合作, 联合社会中的多元阶级力量, 共同对抗帝国主义侵略, 形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开创了统一战线新局面。抗日战争胜利后, 阶级矛盾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共产党发展统一战线, 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城乡中间阶级力量, 成功打倒处于阶级对立面的国民党及其社会势力, 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中间阶级为盟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表明, 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灵活调整斗争策略, 团结动员中间阶级力量, 推进了社会革命进程,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以阶级分析为理论方法、以中间阶级为联合对象, 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与运用, 也是基于中国实际社会矛盾与阶级状况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如果说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的起点, 那么改革开放时期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水平的全面提升。随着中国社会矛盾与阶级状况变化, 统一战线的任务、内容与对象等也随之发生调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在八大做出的这一判断,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成为全党的共识, 促成了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在“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10]、“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是中国政治发展要求的主流话语中, 统一战线理论的阶级分析底色依然存在, 阶级联盟的逻辑仍有启示意义, 但在方法上越来越重视阶级状况在当代中国的新变化, 越来越重视用新的社会分层结构的眼光去观察、划分和处理社会利益主体的分殊和诉求。这主要表现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社会结构走向多元，统一战线理论从传统的以阶级划分为主的分析路径，转变为以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为依托、以新的阶层身份划分为核心的思维方式。这种观察视野的调整，为统一战线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的转变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从现实来看，改革开放后的统一战线事业发展和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调整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期，为了解决地缘政治条件下的国家安全与发展问题，中国利用国家力量开启了工业化进程，通过急剧的、大规模的现代化原始资源积累的方式，在高强度政治动员下汲取和配置资源，促进了各类资源向有利于推动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领域集中。但以国家为主导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不能满足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这在客观上引出了资源流动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型问题。改革开放作为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其核心在于“放权让利”。国家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实行政策引导和分类控制，最终促进了各类资源的自由流动，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国社会的迅速繁荣。中国的社会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物质基础从匮乏走向相对丰裕，利益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国家治理从单纯的政治管控走向政治、行政、经济和法律等的综合治理。这一切预示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成长，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迁是其主要表现之一。统一战线从历史上以阶级分析为核心、以争取中间阶级为目标的阶级联盟，转变为以阶层身份结构分析为基础，以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等为经纬的爱国者联盟，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不再局限于以阶级为标准来判断和评估社会力量的发展与革命潜力，而是致力于充分调动社会中的各利益群体力量，合众力、集众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凡是能够促进资源自由流动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爱国者，都是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与爱国者联盟的有机组成部分。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的转变，“使一切热爱祖国的个人、团体、政党、组织，不受社会制度、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限制，都可以、都能够加入到统一战线中来”^[11]，爱国主义与现代化建设成为判定统战对象的重要标准。“过去，统战工作的重点是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改造这个阶级的人们，这个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11] 348}这时，统战工作的重点是动员各阶级阶层和各种社会力量发展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换言之，新时期统战工作的核心内容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现代化潜力，通过全面团结动员爱国者力量，促进资本、土地、劳动力、商品等生产要素与资源的充分涌流，建设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制度化、体系化、规模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化改革既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多元分化的社会角色，也为资源流动与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支撑。市场经济把社会低层结构里的各种障碍打开，促进资源深入流动到不同层级、不同规模的社会结构中，实现各种经济因素自由而平等的交换，最大程度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中国共产党通过为各种社会力量与爱国者提供资源流动的制度、平台与机制，有效激发并保障了他们的发展潜力与经济社会诉求；通过开发统一战线的制度效能，有效地把政治权力深入到社会并与社会力量建立起了紧密联系。

除了通过放权让利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的现代化潜力，党和国家还致力于照顾这些社会力量与同盟者的利益，同时通过增强社会制度供给，回应这些社会力量与同盟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政治上的安排、组织上的发展、生活上的保障等，使他们在政治参与、民主监督、社会治理、个体发展等方面的权利得到保障。党和国家还通过完善一系列法律法规与政治社会制度，以理性化与制度化的方式照顾同盟者的利益。比如，通过完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加强协商民主的

方式扩大有序政治参与, 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加强保障个体的合法权益, 通过完善市场体制机制促进各类资源的自由流动等。在新时期, 爱国者联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的共识, 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方针与行动纲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共同建设包容性政治结构与社会系统, 实现中国社会的大团结大发展。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提出的战略任务, 以及为实施战略任务而提出的政策和工作方针, 其根本驱动是因应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 契合国情与世情的特点,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则是这一结果的重要体现。在革命时期, 为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间阶级及其利益代表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动员的对象。在建设时期, 为完成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领域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思想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党派关系领域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改革开放后, 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和现代化、市场化带来的新的社会分层结构, 把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和爱国者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引导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 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统一战线在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和方式有所不同, 但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的本质没有变, 大团结、大联合的精神没有变, 对“同心圆”“公约数”的追求没有变。这不仅在各国现代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中是绝无仅有的, 而且在马克思主义谱系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就前者而言, 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世界中如此重视求同存异、团结合作, 具有鲜明的中国政治文明特点, 这和那种视党争政争为常态以至于不惜撕裂社会的政治类型形成鲜明对照, 显示出以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化政治理论实践的巨大优势。就后者而言, 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社会革命理论的指引下, 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矛盾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出发, 致力于民族和人民的和谐团结、国家和社会的繁荣进步, 适时推动统一战线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的演进, 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中国化的重要体现, 昭示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明前景。

三、与时俱进壮大爱国者联盟: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时代化

统一战线理论的时代化植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观察。从国内层面看,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2]。经过 40 余年的改革开放, 首先是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发生显著变化, 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得到根本性改观; 其次是社会需求已经超出原先物质文化的层次和范畴, 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发展的新特点; 再次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化使原先的阶级阶层出现显著分化, 其中, 以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为划分标准的若干新兴社会阶层(如新资本阶层、新知识阶层和新劳力阶层)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尤其值得关注。新社会阶层的需求是新时代社会需求中最活跃、最敏感、最具有影响力的需求, 反过来又会对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产生重大影响, 不断满足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并团结之, 成为壮大爱国者联盟的重要内容。

从国外层面看, 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求同国际不

平等政治经济秩序与大国霸权体系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中国作为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已经成为世界格局演变的主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扩张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但也遇到了西方霸权体系对中国和平崛起构造的各种障碍和威胁，外部发展环境承受着巨大压力。中国在国际上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不断团结动员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不断巩固壮大爱国者联盟，以共同应对外部发展阻力。

需要指出的是，外部环境的挑战终究是通过内部因素传导并以内部张力表现出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显著，但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也面临许多新矛盾。其中，资源在流动过程中产生了特定的路径依赖，社会资源向特定领域与群体集聚，形成了稳定的资源集聚形态与利益群体，利益结构趋于固化。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资源掌控和分享水平上开始产生较大差异，对社会公平与团结稳定产生较大影响。这些问题要求中国必须不断开拓资源流动空间与社会发展空间，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世界生产结构的制约，内部发展需求与世界产业格局之间必然产生结构性张力。机遇和挑战联袂而至，这要求统一战线要有时代和变革意识，持续优化社会阶层结构与资源配置水平，不断团结壮大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力量，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13] 调动各种资源，团结壮大海内外力量，统筹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重大主题。

新时代统一战线延续了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优势。如上所述，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最大历史经验是，用列宁主义的组织和方式，实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农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阶级联盟在先锋队政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改革开放时期统一战线的最大历史经验是，党和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放权让利的方式，促进社会资源自由流动，满足社会力量利益诉求，进而不断团结壮大这些爱国的社会力量。新时代统一战线有机综合了这两大历史时期的统战经验，既强调在党的领导下调动组织力量与政治资源开展统战工作，也强调不断促进资源流动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水平，在全面满足社会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增强社会向心力与凝聚力。新时代统一战线的这些特点表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时代化的精髓是与时俱进——综合各类历史经验，根据时代变化的要求，针对新社会问题与新社会矛盾，不断采取新的统战措施以动员社会力量并壮大爱国者联盟。它的更深远的意义是，包括统一战线理论在内的所有理论，都要转变为推动历史发展变革的现实力量，都需要扎根国情实际以及适应时代发展，在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面对新时代之问和新时代之需，统一战线理论时代化的基本要求呈现多样内容：

第一，统一战线要确立新理念。新理念是指，不仅要把统一战线当作过去革命年代卓有成效的政治战略和政策来继承发展，更要把统一战线作为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机制来落实完善，努力使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转化为实现美好生活的治理效能^[14]。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搞统一战线，从来不是为了好看、为了好听，而是因为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15] 这种“大用观”来自一种价值、一种信念，这就是我们这个百年大党肩负的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这要求在观念上厘清认识: 统一战线不是一种短期的政治策略, 而是一种长期的系统的结构优化战略; 统一战线不是一种功利主义、精英主义的治术, 而是一种兼具人民中心主义和天下主义情怀的治道。

第二, 统一战线要直面新结构。新结构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巨变的社会结构的反映, 这种新的社会利益结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在统一战线的语境中, 演展和表现为新型政党结构、民族结构、价值信仰结构、社会阶层结构、海内外同胞结构。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工作要拓展统战领域与统战内容 (包括对象与范围), 即从对少数代表性人士与重点领域的统战, 转变为对多数人全方位的统战; 统战工作要重视这五大结构的内部运行机制、特点和彼此间关系, 充分团结开发五大结构涵容的社会力量, 把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嵌入其中, 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成为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

第三, 统一战线要研究新问题。新问题有的是从老问题的逻辑演变过来的, 有的是随经济社会关系变化产生的。如新时期工农联盟发展巩固的问题、非公经济自主发展的问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有机结合的问题、缩小地区差异和地区内部城乡差异的问题、民间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利益表达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问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问题、民主党派政治参与和有效履职的问题、协商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关系的问题、社会选择多样性和社会共识一致性相统一的问题、新时期大统战工作格局构建的问题, 如此等等。新问题构成了统一战线革新的压力, 也构成了统一战线发展的动力。

第四, 统一战线要介入新领域。新领域主要是指与传统的、现实的领域相对的新兴虚拟领域, 如互联网、新媒体、微信、短视频等社交网络应用等。网络是反映社情民意、表达观点和民主监督的重要渠道。毋庸讳言, 网络人士在网络全球化环境中更容易受各种思潮的影响, 他们能量巨大, 在网上发表各种政治见解和利益诉求, 并且善于制造热点、设置网络议题、引起网络围观, 甚至是引发网络舆情。“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 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6] 主动进入信息技术新领域, 适应互联网发展新要求, 制定科学有效的网络统战工作策略, 加强网络意识形态政治引领, 是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重大考验, 也是统一战线工作“迭代升级”的重要契机。

第五, 统一战线要学会新方法。在这里, 新方法是指对信息传播技术的治理和利用, 包括利用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工作手段, 分析网络思想动态信息, 营造网络良性生态。信息传播方式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 新媒体技术已经渗透社会的方方面面, 传统的扁平化、单维度的统战管理工作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要求。新媒体时代的统战工作模式必然是一种动态的、多渠道的、交互式的新型工作模式, 这和过去权威官方网站加简单复制传播信息的旧模式是不同的。因此, 传统的统战工作模式需要用新技术手段进行优化, 尽快建立起一种能够打破时间空间壁垒, 更加开放多元、横向与纵向更加紧密的立体化工作模式, 推动统战工作形成更加合理的运行机制。

第六, 统一战线要认识新世界。这是一个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 既蕴涵机遇, 又充满挑战, 既处在深刻变化中, 又贯穿着不变的社会法则。一系列技术创新及其交叉融合引发的新产业、新业态、新生产方式、新管理方式, 带动世界新旧动能转换。与此同时,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巨变之中, 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同舟共济存有如此强烈的需求。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充分运用统一战线的理念和智慧，致力于促进人类社会团结、增加世界人民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统一战线面向世界的历史责任。新时代统一战线要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情怀和眼光，努力做好中国事情、讲好中国故事，促使国际舆论、海外人心和海外知华友华力量等增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同。

四、总结：统一战线理论演进的四个向度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体现在四个向度上，即话语、对象、方式和功能。具体而言，统战话语从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阶级话语，转变为以阶层身份分析为核心的结构性话语；统战对象从关注中间阶级与代表性人士，转变为关注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与全体人民；统战方式从动员政治资源，转变为全方位调动政治社会资源开展统战工作；统战功能从推动社会革命，转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及国家治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转变只是就理论的关注重点和工作重心而言，不是对过去的简单取代，更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基于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要求对过去的变革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

（一）理论话语的调整：从阶级话语到社会结构话语

阶级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话语，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进行社会分析的根本方法。马克思认为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阶级与维护落后生产力的保守阶级之间，存在着既具备一定革命性也具备一定妥协性、依附性的中间阶级。这些中间阶级是统一战线的关注对象。如何争取中间阶级、壮大革命力量，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核心内容。随着中国具体实际与社会矛盾变化，阶级话语逐渐转向以身份阶层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话语。在中国的基本制度框架中，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社会多元分层结构背景下，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基本结构形态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一党领导和执政、多党合作和参政的新型政党结构；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实体范畴和整体意识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以法律保障的信仰自由和以宗教中国化为指导方针的价值信仰结构；以工农两大阶级为基础的和以多元开放的利益结构为特征的社会阶层结构；以拥护社会主义或爱国主义为边界的参与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海内外同胞关系结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运用组织和意识形态，动员社会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等，使五大结构围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轴向心用力。通过整合社会力量、优化社会利益结构并汇聚政治共识，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与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稳定发展，这就是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现实创新意义。

（二）统战对象的扩展：从中间阶级到全体人民

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中间阶级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对象。中间阶级包括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部分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为了开展社会革命所需要团结联合的对象。在中国，统一战线经历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等发展阶段，统战对象和范围也分别发生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党外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为代表的中间阶级，主要是其中的代表性人士与有影响力人士成为统一战线的主要工作对象。改革开放后，统一战线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凡是赞成祖国统一的人，

不管属于哪个阶级、政党和集团, 无论其政治主张、思想信仰如何, 都是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争取的对象^{[11] 353}。以爱国者为基础形成了两个范围的联盟, 分别是由大陆全体劳动者、爱国者组成的, 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联盟, 以及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 以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联盟^{[11] 353}。统一战线工作范围与对象的大大扩展, 一方面反映了以中间阶级为工作对象的阶级性内容的消减, 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以社会主义爱国者为工作对象的人民性内容的增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提出, 推动着统战对象从中间阶级中的代表性人士扩展为社会主义爱国者中的代表性人士, 再扩展为社会中的一般性人士, 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被纳入统战工作范围。从中间阶级到社会主义爱国者, 从代表性人士到一般性人士, 从部分人民到多数人民以至全体人民, 这正是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表征与发展趋势。

（三）统战方式的创新：从传统的政治资源动员到全方位调动社会政治资源

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针对中间阶级及其代表性人士, 中国共产党通过“照顾同盟者利益”的方针政策, 建立起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 以及通过政治人物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点对点、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实现对中间阶级的团结与联合。改革开放以来, 统一战线的范围随着社会多元化与社会利益结构复杂性的增强而持续扩展, 传统的政治资源动员方式面临许多局限, 因此需要不断创新出更具适应性、针对性和统合力的统战方式, 例如吸纳式统战、网格化统战、区域化统战、网络化统战、数字化统战等。它们构成全方位调动社会资源以促进统战方式创新的有益探索。

吸纳式统战是基础性的统战方式, 主要通过制度建设与配置政治资源开展统战工作, 具体包括法律性吸纳（体制外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注册）、政治性吸纳（代表性人士被发展为党派成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组织性吸纳（通过社会团体、协会等中间政治结构团结广大社会力量）。网格化统战建立在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 以社会基层力量为支撑, 实现了制度资源与社会资源的有机结合, 解决了传统基层统战工作纵向到不了底、横向到不了边的问题, 建构起了新时代基层统战的格局, 实现了基层统战信息及时有序更新^[17]。区域化统战是指在特定区域内根据统战对象类型、特点等, 综合调动政治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等有针对性地开展统战工作的方式^[18]。网络化统战把现代网络资源全面纳入统战方式中, 是以网络为载体、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统战工作方式, 除了传统的代表性人士以外, 网络意见人士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等也纳入网络统战的视野^[19]。数字化统战也是新时代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方式。数字统战使得传统的封闭式工作机制转变为开放融合式工作机制, 使得传统的单向度、垂直式工作方法转变为分布式、链接式工作方法^[20]。全方位调动各类社会政治资源, 使党和国家同社会力量建立起紧密的制度化与常态化联系, 大大增强了统战工作的效能。

（四）统战功能的变化：从推进社会革命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

新中国成立前, 中国共产党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 团结中间阶级力量、建立阶级联盟, 整合断裂化的社会结构、碎片化的社会格局, 从而在改变阶级间实力对比的情况下推进了革命进程。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中国共产党继续团结党外民主人士与知识分子等, 通过三大改造的方式全面变革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完成了经济社会结构的重组。这一时期, 统一战线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党和国家推进社会革命、变革阶级关系与重建社会秩序。改革开放后, 统一战线承担起动员社会力量以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把多元利益结构整合团结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框架和政治过程中, 进一步提高社会的一体化水平。

新时代统一战线是团结全体人民的统一战线，是实现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统一战线。在国内，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社会力量被全面组织动员起来，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海外，华人华侨是向世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使中国式现代化得到其他国家理解和支持的重要渠道。他们在国内也广泛参与了中国的发展建设，在诸如投资兴办实业、助推脱贫攻坚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统一战线在功能上从推进社会革命转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统一战线的生命力在于能够灵活运用各类方式，激发涵盖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全社会力量的发展潜力与活力，不断促进经济社会资源的充分流动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高举大团结大联合的旗帜，全面动员社会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最大功能。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N]. 人民日报，2021-11-17（8）.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511.
- [4] 列宁选集：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0.
- [5] 列宁选集：第 4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
- [7]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1.
- [8]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3.
- [9] 陈志让. 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6.
- [10]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3.
- [11]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华文出版社，2017：350.
- [1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18 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 [1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77.
- [14] 陈明明. 现代国家建设视域下统一战线的三重面相：策略、战略与治道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6）：5-14.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32.
- [16]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
- [17] 肖存良. 让基层统战运转起来——以上海市奉贤区网格化统战为例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6）：13-20.
- [18] 闻丽.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区域统战的功能与方式创新——以上海市杨浦区为例 [J].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4）：46-49.
- [19] 黄天柱.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实践创新路径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6）：49-54.
- [20] 谢静. 数字统战前瞻：新媒体环境下政治联盟形态变化与新型建构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3）：1-8.

责任编辑：林华山



统战思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

张献生

（中共中央统战部，北京 100800）

摘要：统战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形成的思维定式，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战略，在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统战思维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的方式，最广泛地凝聚人心、共识、智慧和力量，处理错综复杂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努力实现善治和良政。团结思维、共识思维、协商思维、底线思维、共赢思维，构成了统战思维的基本内涵。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团结与斗争、原则性与灵活性、固守圆心与凝聚共识的关系，则是统战思维的内在要求和实践运用。统战思维对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最广泛地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统一战线；统战思维；团结思维；共识思维；协商思维；底线思维；共赢思维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2024）04-0013-09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在长期实践运用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思维定式，这就是统战思维。统战思维在党领导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战略，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深入研究和运用统战思维，对于坚持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4.002

作者简介：张献生，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秘书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

引用格式：张献生. 统战思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3-21.

中国共产党领导，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作用，最广泛地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对统战思维的实践运用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战略，从党的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后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统一战线就摆在中国共产党工作全局的重要位置，并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全过程。1939 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正式提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统战思维成为党领导和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思维方式。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强调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2]经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了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举国上下、一致抗日的政治局面。经过团结抗战，中国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强调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3] 1256}，并批评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错误观点，明确“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3] 1268-1269}。这些重要政策主张广泛团结各方面社会成员，形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复杂的斗争和许多困难，毛泽东明确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他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要求“合理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他强调，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进行教育和改造；团结少数民族^[4]。这些政策主张促进消除有些地区“左”的倾向导致的阶级、阶层及民族之间紧张关系，达到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的目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统战思维更是运用得炉火纯青。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没有简单仿照俄国十月革命后剥夺资产阶级的方法，而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有偿而不是无偿，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5]毛泽东两次邀请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勉励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趋势，主动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把自己从一个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以和平赎买、从宽照顾为核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经济上维护他们的利益，政治上对几十万原私营工商业者实行“量才使用，适当照顾”。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积极作用，要求成员拥护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协助国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带动工商界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党成功实行和平赎买政策，胜利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6]。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运用统战思维推进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指出：“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困难和阻力，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不断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任何困难都挡不住我们的前进，任何阻力都将被我们打破。”^[7]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1979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设“火锅宴”，宴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工商界代表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提出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指出“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打开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禁区，被誉为“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推进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范化、制度化”，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8]。进入21世纪后，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江泽民明确要求“继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加强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团结，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和各界爱国力量的团结，加强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团结，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都凝聚起来，把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发挥出来”，并强调“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9]。

为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明确提出：“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是政治和社会领域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关系，是统一战线需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保持和促进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和谐，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事关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0]为此，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正确认识和处理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推动和实现全社会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正确认识和处

理大陆同胞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关系，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统战思维使全社会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共同为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而奋斗。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运用统战思维，擘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1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统一战线”作为“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并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十个方面的基本经验之一。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2]。团结奋斗成为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鲜明主题和强大动力，统战思维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彰显更大价值。

二、统战思维的基本内涵

中国共产党对统战思维的长期实践运用，既充分证明统战思维在统筹谋划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深入了解和认识其基本内涵提供了维度、路径和依据。统战思维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团结思维

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团结是统一战线与生俱来的基因，在实现中国政治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3]。毛泽东指出：“如果在全中国，我们的党员有四百五十万，也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而现在我们占的比例是百分之零点几。如果我们有四百五十万党员，在一百个人里，也只有一个共产党员。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任务是团结九十九个非党人士。”^[14]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广泛团结是冲破艰难险阻、不断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团结思维的本质，就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它关系人心向背、改变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团结思维的内在要求，就是围绕党的目标任务和工作大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更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的，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革命和建设队伍，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持。团结思维的要旨，就是坚持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依靠，把团结人民群众作为各项工作的立足点、出发点和着力点，赋予每项工作以团结的意义，使团结和依靠人民成为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政治优势。

（二）共识思维

统一战线的团结联合、巩固发展和作用发挥，均建立在凝聚思想政治共识的基础上。人心齐，泰山移。共识就是人心和一心。没有共识，就没有共同目标和一致方向，就不能同心协力，统一战

线就是一盘散沙。共识思维的本质，就是着眼实现共同目标，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相关的重大问题上凝聚、形成、增进一致性，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形成无坚不摧的强大合力。共识思维的内在要求，就是坚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既不追求完全一致，也不人为扩大分歧，而是尊重差异、适当存异、必要消异；既能求大同存小异，又能在特殊情况下求大同存大异，防止片面追求一致而造成思想僵化，避免人为扩大差异而导致分歧分裂。共识思维的要旨，就是在学习掌握科学理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思想政治共识在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引导，善于向党外人士阐明、解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党外人士心悦诚服地接受和贯彻党的政治主张。

（三）协商思维

统一战线团结联合的对象，是社会各方面党外代表人士，他们有地位、有学识、有影响、有个性。中国共产党与他们在合作共事中形成思想政治共识，实现党的领导，为共同目标团结奋斗，不能强迫命令，不能压制服从，而要充分尊重党外人士，善于同党外人士商量问题，寓领导于协商之中，在协商中凝聚共识、科学决策，协调关系、消除隔阂，从而做到同心同向同行。协商思维的本质，就是坚持发扬民主，充分尊重、平等待人，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不自以为是、强加于人，而是在畅所欲言、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达成一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15]协商民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思维的要旨，就是协以求同、商以成事，广开言路、博采众谋，动员大家一起来想、一起来干，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找到破解难题的对策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使党的政策和决策得到完善优化，国家和社会治理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

（四）底线思维

统一战线实现最广泛的团结，必须进行最大限度的包容。没有包容就没有团结，包容的程度有多大，团结的范围就有多宽。但是，这个包容是有界限的，突破和超越了界限，就会失去共识，导致分裂。这个界限，就是最基本的思想政治共识，就是不可违背的政治原则，也就是团结和联合的底线。特别是在团结和联合的过程中，可能还会遇到各种曲折、风险和挑战，更加需要树立底线思维、积极应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16]底线思维的本质，就是在广泛团结和包容中，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既要站稳政治立场，坚持基本原则，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从坏处准备，趋利避害、化解风险，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变风险为契机。底线思维的内在要求，就是立定脚根、坚定不移，遇事不慌、临危不乱，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决不拿原则作交易，图小利而失大节，顾眼前而丢根本；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充分一些，把预案做得周

密一些，积极寻求规避风险、化解矛盾的路径和方法。底线思维的要旨，就是准确把握底线是什么、在哪里，既要充分包容，又要坚定立场；既做坏的情况准备，又向好的结果努力，使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

（五）共赢思维

利益是发展的内在动力。人们的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统一战线既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团结联合社会各方面成员共同奋斗，实现共同目标，构成了共同利益；维护和实现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的群体和个体利益，构成了自身利益。统一战线不是为了一党一派的私利，而是为了维护、实现和发展包括所有统一战线成员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并在为实现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奋斗中，实现各成员的自身利益。因此，统一战线的团结和联合，不是零和博弈，也不是负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是合作共事、互利共赢。这既是统一战线的利益观和价值观，也是统一战线的方法论和合作论。共赢思维的本质，是天下为公，人民至上，集体乃大。它尊重个人利益，维护和实现个人利益，但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只有在团结合作实现共同目标的奋斗过程中，才能照顾、维护和实现个人利益。毛泽东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17] 共赢思维的内在要求，就是坚持团结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为实现共同目标团结奋斗，同时积极协调和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在维护、实现和发展共同利益中，维护、实现和发展统一战线成员的各自利益，实现整体利益、共同利益与群体利益、具体利益的统一。共赢思维的要旨，就是立足全局，统筹兼顾，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三、统战思维的实际运用

统战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实质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的方式，最广泛地凝聚人心、共识、智慧和力量，处理错综复杂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努力实现善治和良政。统一战线的方式，就是着眼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积极协调各方面关系，实现最广泛的团结和联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形成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强大合力。因此，新时代运用统战思维，着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目标任务服务，最基本的就是深入探索和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政治关系，把团结奋斗的功能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一）正确把握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是运用统战思维的基础

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多样性是客观存在，主要是构成统一战线的不同阶层、政党、民族和社会各领域人士，以及他们具有的不同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利益诉求、生活方式等。一致性是内在要求，就是要把各方面统一战线成员团结联合起来，必须在奋斗目标、前进方向、政治原则上寻求一致性。只讲多样性、不讲一致性，统一战线就是“一盘散沙”，不能同心协力；只讲一致性、不讲多样性，统一战线就会变成“清一色”，失去应有作用。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是统一战线最基本最普遍的关系，也是团结和联合首先要研究解决的问题。统战思维就是建立在对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认识 and 把握上，不懂得、不善于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就不能切实形成和科学运用统战思维，就不能在多样性基础上凝聚和扩大一致性。

把握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关键是善于求同存异。所谓求同，就是增强一致性；所谓存异，就是包容多样性。在实际工作中，首先要着力求同，增强一致性，不断巩固和扩大团结的思想政治基础。共识、人心、力量都来源于一致性，只有不断凝聚、增强和扩大一致性，才能形成共同奋斗的强大力量。一致性要增强，但“清一色”不能搞。所谓“清一色”，就是革命、建设和改革队伍中，只要工农群众，不要其他阶级和阶层人士；在国家政权中，只要中共党员，不要党外人士。这种“清一色”是十分有害的，其结果就是把党搞成孤家寡人，孤军奋战。同时要适当存异，着力扩大包容性，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建设和改革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种包容涵盖对不同阶级和群体的包容，对不同思想政治观点的包容，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包容，既要求大同存小异，又要求大同存大异，从而形成最广泛的团结。但是，包容要有政治底线，如果逾越了这个底线，就会动摇团结奋斗的基础，特别是对违背政治原则的错误东西，不仅不能包容，而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批评和斗争，决不能让其以多样性名义下大行其道而危害根本。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

（二）正确把握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是运用统战思维的关键

团结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两个基本范畴，又团结又斗争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统一战线的基本规律。所谓团结联合，就是与社会各方面成员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建立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就是在统一战线内部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如果不坚持团结联合，党就缺乏共同奋斗的强大力量，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就不能发展；如果在团结联合的同时不进行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就会失去党的领导权和主导性。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受制于主客观条件，没有处理好团结与斗争的关系。这成为大革命运动和土地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统一战线是为党的事业发展凝聚人心和力量的，团结是统一战线永恒的主题，是统战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一战线的团结建立在政治共识的基础上，斗争（批评）是抵制和消除危害政治共识因素的基本方式，是实现和保障团结的内在要求。这就决定了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不能离开团结进行斗争（批评），更不能形成对立和对抗；斗争是实现团结的手段，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团结。由此可见，统战思维就是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升华出来的正确处理团结与斗争关系的辩证思维，如果不懂得这对辩证关系，就不能理解把握统战思维的精髓。

把握团结与斗争的关系，关键是要善于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18]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针对国民党既抗日又反共的态度，毛泽东鲜明提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 745}。这种政策主张一方面反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错误，另一方面反对“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错误，使中国共产党的两只手都强硬起来，变成有经验的党。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既维护了共同抗日的大局，又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发展壮大革命力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对如何处理团结与斗争的关系进行新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将其概括为“团结—批评（斗争）—团结”的公式。这成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公式。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形势、任务和环境的复杂性，特别要充分认识斗争的特点，提高斗争的本领。因此，运用统战思维，就是要把团结与斗争统一起来，既要善于团结，春风化雨，又要善于斗争，张弛有

度，使党与党外人士的团结、各族人民的团结、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坚如磐石、牢不可破。

（三）正确处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是运用统战思维的要旨

政治原则是政治基础的内在要求，体现统一战线的性质、方向和内在要求，是统一战线成员必须恪守的基本行为准则。如果广泛联合不讲原则，对不合理的过分要求一概承认，对错误的东西不能坚决抵制，团结联合就会变成貌合与苟合，就不能巩固和长久。灵活性是在不违背政治方向、政治目标、政治原则的基础上，适应形势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因地制宜、机动灵活地处理问题。如果墨守成规、不会变通，就不能更好体现和贯彻原则精神，甚至适得其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求共同抗日之大同，存阶级斗争之大异，把过去打土豪分田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从而广泛团结了地主阶级中赞成抗日的人士，发展壮大抗日力量。由此可见，原则性是基本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和方针政策，灵活性是具体的策略举措和方式方法，两者不可分割，相辅相成，并统一于实现党的目标任务的实践之中。统战思维就是正确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把握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就是在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实践中，必须坚持政治原则，在涉及目标、方向、道路、制度等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政治基础，始终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在为实现党的目标任务共同团结奋斗中，要针对社会不同方面成员、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因时因势因人因地进行具体分析处置，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这就要求善于把目标方向、方针政策的原则性与对策举措、方式方法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既站稳政治立场、坚守政治底线，又具体分析、灵活运用，把握好尺度分寸，做到宽严不误，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四）正确把握固守圆心与凝聚共识的关系，是运用统战思维的保证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统一战线巩固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形成了三个同心圆：一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二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这是统一战线的新生力量和需要广泛团结的力量；三是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在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三个同心圆涵盖了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要把他们广泛团结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就必须固守圆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处于这三个同心圆中不同层次的中华儿女，具有不同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信仰特点、生活方式、利益诉求，要把他们团结和联合起来，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就必须广泛凝聚和扩大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统战思维就是正确处理固守圆心和凝聚共识的关系，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凝聚起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固守圆心与凝聚共识是辩证统一关系。固守圆心是凝聚共识的基本前提，固守圆心做得越好，团结奋斗的根基就越牢靠；失去圆心，共识就无所依托，就是无本之木。扩大共识是固守圆心的内在要求，凝聚的共识越多，团结奋斗的力量就越强大，如缺乏共识，圆心只是圆点，就不能形成同心圆。要把固守圆心与凝聚共识有机统一于工作实践之中，相互作用、相辅相成。通过固守圆心，把坚持和实现党的全面领导落地落实，贯穿到统一战线发展全过程，体现到统战工作各领域；通过

张献生. 统战思维: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3-21.

凝聚共识, 真正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在党的周围, 形成共同致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政治局面。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05-606.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12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36.
- [3] 毛泽东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237.
- [4] 毛泽东文集: 第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4-75.
- [5] 孟醒. 毛泽东在50年代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7: 267.
- [6]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155.
- [7]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06.
- [8] 江泽民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7-30.
- [9] 江泽民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40-143.
- [10] 胡锦涛: 充分认识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EB/OL]. (2014-02-27) [2024-06-26]. <https://www.rmzxb.com.cn/c/2014-02-27/298159.shtml>.
- [1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 [M]. 人民出版社, 2021: 18-19.
- [1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M]. 人民出版社, 2022: 39-70.
- [13] 张献生. 构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 [J]. 政治学研究, 2023 (5): 3-16.
- [14] 毛泽东文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348.
- [1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1日) [N]. 人民日报, 2014-09-22 (2).
- [16]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新境界 [EB/OL]. (2016-08-08) [2024-06-26]. <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8617657>.
- [17] 毛泽东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09.
- [18]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 王沪宁出席 [N]. 人民日报, 2019-09-04 (1).

责任编辑: 林华山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文明学旨趣及生成进路： 以大一统为中心的讨论

俞佳奇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大一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文明根脉。从更广阔的宏观视野理解统一战线，需要以大一统为线索，以文明学为旨趣，挖掘统一战线在中华文明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成进路。古典大一统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基本内核，创造传统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在维护共同利益、缔造共同身份、弘扬共同价值、凝聚共同情感、构筑共同家园等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提供源于中华文明深层结构的传统资源。古典大一统崩解后，中国共产党在新型现代国家构建中坚持“两个结合”，运用统一战线推动古典大一统实现现代转化，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条件。作为重建现代大一统的核心要件，统一战线深度嵌入现代大一统的整体架构，呈现出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系统逻辑：以高度权威的现代政党为统领，以集中统一的现代国家为目标，以命运与共的现代民族为要义，以组织起来的现代人民为中心，以制度建设的现代治理为路向，凸显建立团结、巩固团结、增进团结的总体性动势。“活”的大一统贯通统一战线深度关联中华文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使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学。加深统一战线植根于中华文明主体性、内生性的学理阐释，将是统一战线学研究垒筑理论增量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大一统；统一战线；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学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4-0022-14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4.003

作者简介：俞佳奇，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俞佳奇.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文明学旨趣及生成进路：以大一统为中心的讨论[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4）：22-35.

一、问题的提出

统一战线是一定条件下不同社会政治力量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结成的联盟。它源于人类最朴素、最原始的团结之需, 蕴含着增进理解、弥合分歧、谋求共赢等丰富的文明实践智慧, 彰显人类文明开化的进步状态和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聚焦中华文明历史演进的特殊坐标, 统一战线内生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血脉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1]。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不同,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发挥着延续历史、吸纳多元、凝聚认同等重要作用, 以“合”的逻辑创造人类文明史上的团结奇迹, 孕育形成在广袤地域中团结广大人民的独特文明道路和文明传统, 即涵纳广土众民、崇尚天下一统的大一统秩序。这是统一战线在文明论的大视野和文明史的大格局中推崇团结、追求团结、实现团结的鲜活体现。特别是秦汉以降, 古典大一统结构基本定型并经过数千年的传承与弘扬, 构成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血脉基因。大一统的起源、演进及其历史底蕴和文化根基, 铭刻着解读统一战线的文明密码。从统一战线的视角理解和把握以大一统为基本内核的中华文明, 有助于研究探查中华文明的发展轨迹以及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文明学的真谛, 为统一战线促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思想资源。

近代以来, 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依旧稳固发挥作用, “在世界历史时刻, 根据新的条件、利用新的资源创造新的政治大一统, 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要求”^[2], 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要求。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正是古典大一统向现代大一统的转型。这种转型不是简单照搬和机械复制古典大一统, 而是新型现代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真正动员组织最广泛的人民群众, 在新型现代国家构建中再造现代大一统。从蒙尘到复兴, 从救亡图存到旧邦新命, 由于中国共产党统揽各类资源、整合各方优势, 现代大一统在否定古典大一统服务君主意志、维护王朝统治等狭隘价值的过程中实现批判性继承、创新性超越, 具备整合社会、服务人民等根本区别于古典大一统的文明新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提供更新动能和行动方略, 给予现代大一统新的条件和资源, 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蓬勃发展的深远影响, 形成新的文明意义。文明学的视野为统一战线学研究打开新面向, 这需要以大一统为根本理据, 整体连贯地解释统一战线同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及其转型之间的密切关联。

既有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审视中华文明的研究理路。姜义华认为, 大一统作为中华文明的力量源头, 是中华文明恢复活力、重建秩序的宝贵历史资源^[3]。刘志刚认为, 大一统的超稳定结构体是中华文明的历史主流^[4]。这些研究在整体结构上准确把握中华文明的大一统特质, 但尚未专门纳入统一战线的观察视窗。二是考察统一战线的研究理路。肖存良认为, 大一统是统一战线的文化基础^[5]。陈喜庆针对先秦时期^[6]、秦汉时期^[7]、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8]的统一战线智慧进行断代史考察。喻中认为,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建立了当代中国文明秩序的同圆心结构^[9]。这些研究讨论分析中华文明的统一战线智慧和统一战线内蕴的文明秩序及其建构方式, 但有的研究对大一统之于中华文明与统一战线的底层逻辑关注不足。三是剖析现代国家构建的研究理路。林尚立认为, 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建国家和人民共和的国家建构模式, 推动中国由传统大一统帝国转向现代国家^[10]。汪

仕凯认为，中国共产党运用民主集中制实现古代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形成新政治大一统^[11]。王建国认为，大一统在建构民族国家中发挥价值规范、凝聚人心和引导国人的作用^[12]。刘永刚认为，大一统是近代国人共同建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础^[13]。这些研究在中国新型现代国家传承古典大一统、发展现代大一统的脉络中，论及统一战线助力建设现代国家的特殊逻辑，但尚不足以涵盖统一战线与现代文明的丰富意涵。

鉴于此，本文试图将三者联系起来，以大一统为主轴，串联中华文明与统一战线：从大一统的古典形态，分析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统一战线意蕴；从大一统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古今之变，说明统一战线推动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转型的内在机理；从大一统的现代形态，分析统一战线制度化参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系统逻辑。

二、以大一统为基本内核的文明秩序：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统一战线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从中华文明诞生伊始，大一统的思想观念经历复杂演变，逐渐涵括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民族一统、宗教一统、思想一统、文教一统等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丰富内涵，始终是中华文明弦歌不辍、日新又新的重要动力。在赓续向前的历史链条中，大一统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等传导联动、叠加化合为大一统的中华文明“总秩序”，通过创造中华民族传统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彰显统一战线意蕴。

（一）大一统经济秩序维护共同利益

大一统经济秩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建构基础，创造经济聚合的中华民族传统物质文明。就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来看，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于疆域广袤、民族众多的中华大地。地理环境的差异性造成经济上的强烈互补性，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14]。西周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关键时期，其推行的朝贡政策要求诸侯向王室按期朝服纳贡。王畿与封国之间相对密切的经济联系，有效强化周天子统辖众多邦国的文明秩序，为中华民族传统物质文明奠定基础。汉唐以来，中原农业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虽在生计方式上存在耕种、畜牧之别，但农牧之间山水相依、共生共荣。从汉代匈奴“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15]，到唐代频繁互市交易后“国家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缯帛，彼此丰给”^[16]，各民族在资源上相互依赖，在分工上相互补充，形成中华文明辐射广阔腹地、融合多元文化的独特景观。大一统经济秩序以农耕文明为基底，包容吸纳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等文明形态，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传统物质文明的形式与内涵。许倬云指出：“全国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络，即使在国家分裂时，还能发挥经济一体的功能。中国常常分裂，然而分久必合，正是由于经济的互依，创造了国家复合的契机。”^[17]尽管中华民族共同的生存空间面临着适应不同地理类型、调剂不同地域物产等严峻考验，但经由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各民族在共同利用、改造自然进行生产生活的过程中，紧密联结成基于共同利益的中华民族传统物质文明。正如马克思所说，真正的联合“就必须有一致的利益”^[18]，大一统经济秩序塑造各民族互利互惠、繁荣一体的经济生活，为中华民族传统物质文明开辟和拓展生存空间，彰显共同利益水乳交融的统一战线意蕴。

（二）大一统政治秩序缔造共同身份

大一统政治秩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建构保障, 为各民族共创中华奠定基本政治架构, 创造政治联合的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明。无论是以汉族为主导所建立的王朝, 抑或是以蒙、满等少数民族为主导所建立的王朝, 都将大一统视为终极政治目标, 力争在重建大一统政治中获取王朝更迭、九鼎迁移的正统性。此举事实上形成各民族归属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 渐至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明的牢固基石。从少数民族的角度看, 大一统政治秩序为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创造便利条件, 少数民族为稳固大一统政治秩序作出重要贡献。以魏晋南北朝为例, 前赵刘渊、前秦苻坚等少数民族政权为获取一统中华的正统性, 创造性地推出并践行“脱夷统华”的理论, 极大地冲击了“夷狄不可为君”的狭隘大一统思想, 彰显出各民族均为中华民族的史实^[19]。这反映出, 大一统政治秩序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明的基本载体, 承负着少数民族积极建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理论创造及其政治实践, 有效加深各民族认同中华民族集体归属的身份意识, 为联合起来的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明缔造共同身份。从汉族的角度看, 采取羁縻、和亲等政策, 追求涵盖少数民族在内的政治大一统, 亦始终是汉族政权扩大统治版图、更好实现政治联合的宏伟治国理想。比如, 在民族重新组合的基础上^[20], 隋唐重归政治大一统, 与之相联系的是各民族深度互动、逐步联合为华夷一家的共同身份。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说: “自古皆贵中华, 贱夷、狄, 朕独爱之如一。”^[21] 大一统政治秩序打破华夷之间“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的狭隘思想观念, 将更多的民族纳入天下一家的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明, 推动构筑中华民族“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身份共融状态, 中华民族成为各民族有机融合、广为接受的共同身份, 彰显共同身份唤醒认同的统一战线意蕴。

（三）大一统文化秩序弘扬共同价值

大一统文化秩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建构的理念支柱, 创造文化融合的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期”, 各家学派纷纷推出维系统一、拒斥分裂的主张。儒家提出天下“定于一”“齐一天下”, 墨家强调“一同天下”“一天下之和”, 法家推崇“霸天下”“一匡天下”, 等等。诸子百家以追求“一”、博纳“多”的格局与气度, 妥善处理思想上的共同性与差异性, 为大一统文化秩序提供丰富的思想与理论资源, “奠定了后来帝国统一的思想基础”^[22], 形塑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明尊奉儒学、广纳百家的文化底色。秦一统天下后, 共同的文字、货币、交通、度量衡等更高层次的元素不断增加, 为大一统文化秩序创造条件, 引领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明朝向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文化融合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秦朝缺乏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系^[23], 未能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牢固可靠的共同价值基础, 遂造成王朝分崩离析。汉承秦制, 在恢复秦代政治大一统的基础上推进文教大一统, 以文教一统不断累积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的凝聚力优势, 塑造共同的价值观并实现人民精神与行为模式的整合^[24]。在学校教化、礼乐教化、民间教化和家庭教化的共同价值浸润中, 个人的原初意向聚拢为大一统国家偏好统一、团结、集中的集体意向^[25]。在文教一统开启儒家意识形态化进程的意义上, 日本历史学家西嶋定生认为, 秦汉帝国“因统一国家的建立而形成的国家构造基本形态, 与这一时代造就的精神文化基本形态, 一同跨越并规范了其后中国两千年的漫漫历史”^[26]。大一统文化秩序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明厚植思想根基、达成价值共识的历史文化渊源, 彰显共同价值营造稳定的统一战线意蕴。

（四）大一统社会秩序凝聚共同情感

大一统社会秩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建构的伦理条件，创造社会整合的中华民族传统社会文明。侯外庐在考察古代社会时曾指出，“氏族遗制保存在文明社会里”是东方国家走进文明的发展趋向^[27]。从文明初创的集体取向来看，以血缘纽带整合社会关系并形成普遍规约力，构成中华民族传统社会文明的柔性伦理秩序。由血缘亲疏关系聚集的社会结构具有较为稳固的向心力和内聚力，并以礼治、德治等方式进行社会整合，有效强化中华文明在情感上相互亲近的内部团结。正如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的观察，以“礼”的形式规范社会生活，是巩固“以伦理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化的基础”^[28]。氏族社会瓦解后，尽管社会生产、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的基本结构发生变化，但礼制传统和礼治意识构成的伦理规范并未改变，凝聚共同情感的伦理之治并未消解，而是以家国同构的形式成为中华文明长期演进的重要助推力，推动形成更加稳固的社会秩序和社会价值。家庭与国家高度同构化为密不可分的家国共同体，成为大一统社会秩序内部声气相通、心灵契合的精神依托。“由个人到家庭，由家庭到家族，由家族到国家，由国家到天下，构成总的等级差序格局”^[29]，中华文明内部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层级均获得安身立命的必要保障，家国天下内化为社会成员在情感上的集体意识，家国情怀成为中华儿女血脉中流淌的共同情感。具有黏合力的中华民族传统社会文明不但发挥敦睦人伦、消弭隔阂的秩序建构功能，外显为人与人之间建立和睦关系、滋养和谐社会的公序良俗，更将心怀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活化为社会成员的行动逻辑。其道德建构功能最终导向匡扶社稷、平治天下等共同情感所感召的伦理实践，彰显共同情感联合行动的统一战线意蕴。

（五）大一统宇宙秩序构筑共同家园

大一统宇宙秩序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建构人与自然关系的集中反映，创造自然和合的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文明。从广义上看，天人之间亲密关联的大一统宇宙秩序，将天下视为一体同源的世界，天下万物同质同构的宇宙呈现为和谐的有机秩序^[30]。外在于人的天地与人构成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天人大一统，这是中华文明思考人与自然关系即天人关系的结果。董仲舒认为，“天、地、人是万物之本，依据《春秋》就可以知天意，接地情，通人事”^[31]。大一统宇宙秩序说明，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统一的。自然是人的栖息之所、安家之基，人按照自然时令的客观规律生存生活，就能通达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境界。在此境界中，人与自然之间亲密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家园意识，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文明尊崇自然之道、构筑生命家园的丰沛智慧。更进一步看，作为农业文明的典型形态，中华文明饱受自然灾害之困，与自然灾害的抗争是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现实情境。根据灾荒史的研究统计，“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就文献可考的记载来看，从公元前 18 世纪，直到公元 20 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时，几乎无年无灾，也几乎无年不荒”^[32]。为抵御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冲击、防止饥荒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文明从理念扩展为实践，中华民族以尊重与合理利用自然的方式方法，积极建设防灾、避灾、救灾的交通仓储、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自然灾害应对措施所反映的人与自然亲近和谐的关系，延展为人与人相互依赖、人与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于国家与民众、民众和民众在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中形成了紧密的联系，重建一个领土规模巨大、民众风俗各异的大一统国家才能有广泛而牢固的心理根基。”^[33]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家园意识上，自然和合的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文明培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独特文明特质，彰显共同家园互助互济的统一战线意蕴。

三、从古典大一统转向现代大一统: 统一战线推动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转型的内在机理

大一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连贯相接、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枢纽。但是, “近代以后, 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到文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 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34], 古典大一统在文明蒙尘中走向瓦解。在探索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世界历史时刻, 各派政治力量抛出各种主义、各条道路并付诸实践。“中国新型大一统建构的总体图景是将中国建设成为现代文明国家, 这是中国持不同学说政见精英的共识。”^[35] 在新型现代国家构建中, 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 将统一战线作为古典大一统转向现代大一统的核心要件, 推动大一统发生现代化, 增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为全方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独特契机和不竭动力。

(一) 统一战线增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正如钱穆所言: “罗马帝国亡了, 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 依然有中国, 有宋有明有现代, 还是如唐代般, 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36] 古典大一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不断成长与壮大的深层动因, “中华文明要延续、中国作为中国要存在, 就必须守住这种中华民族的大一统”^[37]。中国共产党在新型现代国家构建中运用统一战线, 传承古典大一统的优秀文明遗产, 培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韧性。

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不是与历史相断裂, 而是置身于古典大一统深层文明结构的合理延续。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结构、地理空间等古典大一统的构成要素, 是中华文明之所以为中华文明的特质与象征, 是支撑现代大一统的重要文明遗产。比如, 共同的语言文字衍生于秦朝大一统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制度设计, 在塑造中华民族强大向心力、中华文明持久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凝聚作用。在国家形成发展中, 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以及语言文字的融合, 立国基础往往都比历史上的统一国家更为坚固, 整合程度更为深入”^[38]。作为重构现代大一统的重要资源, 共同的语言文字至今仍具有维系文明的强劲作用, 其现代形态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性要素。在中国新型现代国家构建中, 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充分唤醒语言文字所承载和延续的文明内核, 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长存不息、坚韧顽强的鲜活生命力。从工具理性的应用角度看, 统一战线作为内嵌于中国新型现代国家构建各条块、各环节、各场景的战略机制, 其覆盖领域包括中华文明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结构、地理空间等古典大一统相对“不变”的元素。统一战线通过与此类社会场域及其具体事务的紧密结合,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现代转型中发挥不间断、长时段的形塑作用。

(二) 统一战线增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另一突出特性。运用古典大一统的文明遗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所以具备可行性, 根本上取决于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及政治实践处于“进行时态”^[39]。在建构现代大一统的变动时空中, 中国共产党将统一战线基因嵌入传统文明转型与现代国家构建相辅相成的历史, 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团结创新应变的品格。

辩证地看, “将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视为落后的国家体制并予以淘汰, 否定的只是政治大

一统的古典形态，并不等于全然否定政治大一统本身”^[2]。古典大一统所积淀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基础上固本革新的文明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1] 8}近代以来，统一战线通过凝聚革命力量的方式再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大一统政治格局，新型现代国家以富含统一战线意蕴的制度设计实现对大一统传统的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不断健全和完善延续文明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创造文明中国的现代气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为整合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力量，建立爱国统一战线，更好顺应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发展潮流。在新型现代国家构建的特定时空场域，统一战线与时代深刻互动，有效服务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和目标任务，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添新求变的时代内涵。

（三）统一战线增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又一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1] 3}为结束近代以来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乃至社会近乎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整合社会、塑造人民，建设反对分裂、追求统一的现代国家，促使团结内聚的文明信念在现代大一统的重建中更趋强固。

从世界历史来看，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一度试图强行将中华文明纳入其开辟的所谓“东方从属于西方”^{[18] 405}的世界秩序中。外部力量的极端压迫与强势冲击，不仅导致古典大一统遭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可能被帝国主义肢解的生存危机，更严重威胁中国新型现代国家构建的独立自主性。傅斯年指出：“这些年以来，我们老百姓的第一愿望是统一，第一要求是统一，最大的恐惧是不统一，最大的怨恨是对于破坏统一者。”^[40]实现国家独立自主，保障国家主权统一，成为当时国人的强烈愿望。在西方列强侵略、奴役、分裂等野蛮行径面前，孙中山明确表示：“我完全赞同被压迫国家民族革命运动结成统一战线。”^[41]毛泽东总结道：“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42]在自主选择 and 探索中国新型现代国家构建方案的目标下，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等“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42] 674}，从强调主要依靠无产阶级发展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发展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大程度地凝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力量，成功唤起民众“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43]。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构建独立自主的新型现代国家政权，夯实现代大一统的国家基础和国家格局，有效保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疆域空间、社会结构等诸方面完整转型为现代文明。

（四）统一战线增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另一突出特性。古典大一统虽然尊重差异、接纳多元，但本质上仍然是前

现代的统治阶级实现政治集中的理论工具。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所归属的现代大一统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根本基点, 将社会取向和人民本位作为新型现代国家的立国之基, 在更为深广的团结开放中将包容性的抽象原则转化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现代转型的包容性环境。

古典大一统包容的边界主要限定在统治集团内部及其阶级利益所能承受的范围。“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考察, ‘大一统’思想中君权神授的观念归根到底是唯心主义的”^[44], 相当程度上烙刻着君主专制的痕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虽然汲取了古典大一统的文化资源, 但实质上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结晶。中国共产党确立并实施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 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族政策体系,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着, 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相应地, 现代大一统就能集聚容纳多民族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多宗教、多地域、多习俗等广泛多样性, 统领建立包容开放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如《共产党宣言》中的庄严宣告,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 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8] 411}。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是创造性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本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新型现代国家以统一战线机制建立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 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工农联盟的基础地位, 赋予现代大一统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正当性依据和道义性力量。基于人民立场的包容性,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所归属的现代大一统既非古典大一统的简单复刻, 更绝非古典大一统随意拼贴现代元素的生硬组合。它创造了多元并存、开放博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五）统一战线增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另一突出特性。古典大一统的现代转换始终具有以和平方式处理外部关系的鲜明特征,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新型现代国家继承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 将团结世界人民作为重建现代大一统所长期秉持的理念, 在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 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现代转型构建和平之路。

现代大一统的重建以及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与在世界上凝聚多方力量、应对多重挑战密不可分。为整合中华文明与不同文明交往互动的国际力量, 中国新型现代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重大主张追求人类福祉、维护世界和平, 运用统一战线理念和方式化解文明冲突、增进世界和平。早在建党之初,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就明确提出要“联合第三国际”^[45], 通过扩大合作对象, 形成遏制侵略、反对霸权的集体行动, 应对晚清以来民族危机与文明危机交织叠加的危局, 为重建现代大一统争取有利国际环境。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将有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际环境作为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42] 513}。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再次强调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奋斗的重要意义^{[43] 1472}。现代大一统运用团结世界人民的国际观, 体现既立足本土又放眼世界的实践取向。其文明指向就在于崇尚正义、反对霸权的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和共同行动。“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46], 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窠臼、摒弃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国际观, 有利于联合更多国家、追求更高目标, 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关键性贡献, 赋予和巩固现代大一统超越文明冲突、促进世界和平的全新内涵, 进而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现代转型创造和平的世界性空间。

四、重建现代大一统：统一战线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系统逻辑

从文明转型的历史本源和现实语境出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服务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发展历程内在契合大一统传统并促进其现代转化，这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现代发展同构共进、融为一体。在现代文明生发的特殊场域，统一战线深嵌于政党建设、国家建设、现代化与现代社会建设的历程^[47]，体现出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战略价值。作为重建现代大一统的核心构件，统一战线及其运行形态呈现出型塑现代政党、建设现代国家、凝聚现代民族、组织现代人民、推进现代治理的系统逻辑。统一战线建立团结、巩固团结、增进团结，形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独具特色的现代转型特征与文明发展机理。

（一）高度权威的现代政党强化团结核心

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生存危机亟需现代政党发挥重建大一统的政治保障作用，将一切力量组织在一起、团结在一起。与同时代诞生的诸多政党相比，只有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形式建立同心圆的政治格局，积蓄起更为团结的广泛政治力量，承担起赓续中华文明的历史重任。

作为核心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理念、方式和制度包容吸纳多样政治社会力量，凝心聚力实现共同目标。“新政治大一统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因此它是高度组织化的。”^[48]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46]¹²⁵⁷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高举大团结大联合旗帜，形成大团结局面，再造大一统格局。在纵向上，中国共产党通过内部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等形式，实现上下联动、行动有序的党组织全覆盖，解决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发挥无产阶级政党团结统一的全部功能。在横向上，通过统一战线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联合不同阶级、阶层、团体等合作者和同盟者，广泛调动各阶级、各阶层、各领域力量。另一方面，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确定同心圆政治格局的圆心，其他政治社会力量以“众星捧月”的圈层方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构成权威辐射的政治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49]从现代政党的逻辑看，统一战线形成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强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团结核心。

（二）集中统一的现代国家强化团结秩序

“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50]，建设现代文明需要建立集中统一的现代国家。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方式，通过重建现代大一统的国家政权，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稳定的团结秩序。

国家政权问题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现代国家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中国新型现代国家与统一战线内在互构。新中国从其在革命时期的酝酿准备到建立再到建设发展，国家建构中统一战线基因不断嵌入和拓展，确立富含统一战线基因的新型国家形态^[51]。就关键节点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探索建立“工农共和国”，即“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5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工农共和国”构想发展

为“民主共和国”，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42] 675}，“三三制”政权实践是其重要成果。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发展为建立“人民共和国”，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别和各方面代表人士协商建立新中国，实质上是通过统一战线方式完成现代国家的正式建立。最终确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是统一战线从政治联盟上升为国家形态的制度成果。在政权问题上，毛泽东曾指出：“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42] 760}统一战线在现代国家建设中沟通协调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制度化联系，助力形成民主集中的政治基础、有机团结的政治整合、整体稳定的政治安全，重建集中统一的国家权威。从现代国家的逻辑看，统一战线把分散的政治力量整合成为现代国家的总体性能力，增强现代国家集中统一的聚合性、稳定性、包容性，强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团结秩序。

（三）命运与共的现代民族强化团结纽带

吕思勉认为，绵亘不绝的中华文明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大一统所塑造的多民族共同体。“这就是我国民族，可以为世界民族模范之处；亦即从前的所以成功。从前业已成功了，今后还宜照此进行。”^[53]在重建现代大一统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的制度设计及其具体实践，将各民族命运始终同中华民族整体命运紧密相连，“具有重构或重塑中华现代文明的内涵”^[54]。

推动众多民族融合成为凝聚一体的现代民族，贯穿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的团结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55]从一体的角度看，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的出场，实质上是众多民族在文明转型的历史条件下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继续趋于一体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56]。统一战线是加强各民族内在关联、凝聚现代民族整体力量的关键平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抗侵略的共同使命不断生成和强化各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国族意识，把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推向新高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发展进步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动员各民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各民族一体化凝聚的方向中加速推进。从多元的角度看，作为与现代文明相匹配的现代民族，中华民族摒弃强制性同化、封闭性排他等前现代观念，尊重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客观存在的差异性。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尊重差异性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民族向现代民族方向发展的行动机制。中国共产党所实施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民族关系的制度安排和民族工作实践，富含深刻的统一战线逻辑，为中华民族深度联结为现代民族奠定坚实基础，持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融入中华民族建设的全过程。从现代民族的逻辑看，统一战线直接影响多元一体的国族塑造及国族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强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团结纽带。

（四）组织起来的现代人民强化团结基础

人民团结一体是重建现代大一统最基本的社会条件。近代以来一段时期“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42] 511}，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转型的重要难题。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将中国广大民众凝聚成为政治实体，以人民为中心创建现代大一统国家”^[57]，破解低组织化困局。

现代人民作为具有集体性含义的整体性概念，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存续与发展的稳固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事实上构成了‘人民’的实体内容”^[58]，是有力组织人民、有效团结

人民的基本路径。革命战争时期，工农联盟是人民的基础结构，统一战线通过阶级联盟壮大力量。毛泽东强调，“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59]，“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分子”^{[59] 156}。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工农联盟为主体、团结联合进步力量的形式，组成人民的基本形态，将一切潜在革命力量变成推动社会革命的现实力量，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重要基础。和平建设时期，统一战线通过拓展政治联盟，将各部分阶层、各方面力量整合进人民范畴，继续壮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从阶级联盟转变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人民范畴的半径持续延伸、外延动态扩容，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机制激活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民主体意识，通过政治整合构筑中国人民自觉凝聚为一体的根本政治基础，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不可摧的政治基础。从现代人民的逻辑看，统一战线根据时代条件以及社会结构演变，持续将中国人民组织熔铸为创造文明的系统性、整体性力量，强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团结基础。

（五）制度建设的现代治理强化团结效能

从现代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现代治理取代传统管理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普遍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60]。中国共产党将统一战线作为大一统传统价值与现代治理相融相适应的重要通道，建构富含统一战线特质的政治制度及治理体系，为重建现代大一统提供有利条件。

超大规模国家有效吸纳现代文明所需的广泛治理资源，是开展现代治理的重大课题。统一战线以治理制度、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等样态嵌入现代治理的全过程、全链条，形成支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治理制度看，统一战线的理念充分融入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体系。

“新型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制度，共同型构了新大一统模式的主体框架”^[61]，推动现代治理秩序与效率长期保持高度平衡、高效稳定的状态，满足超大型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现代文明的治理需求。从治理主体看，统一战线是组织调适多元力量应对治理挑战的弹性治理主体。团结生成秩序，秩序产生效率，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善治状态。统一战线紧密联结不同社会政治力量，深化团结奋斗、合作协商的治理氛围，在大规模文明体中实现最广泛联合的团结治理。从治理方式看，统一战线是科学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复合治理机制。统一战线参与现代治理时巩固一致性、包容多样性，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与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文明格局。从现代治理的逻辑看，统一战线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优势，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强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团结效能。

五、结语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发展至今，具有活的文化传统^[62]。“活”的大一统是统一战线的文明根脉，贯通统一战线深度关联中华文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在新型现代国家重建大一统的艰难探索中，中国共产党运用统一战线的价值理念、组织形式和制度化渠道塑造人民、凝聚民族，

俞佳奇.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文明学旨趣及生成进路: 以大一统为中心的讨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22-35.

建设和治理国家, 将古典大一统隐性的文明遗产持续转化为显性的文明实践, 解决中华民族传统文明曾面临的整体秩序危机, 生成具有厚重历史感和旺盛生命力的现代文明成果。据此, 统一战线创造性运用中华文明古今相因、革故鼎新的大一统传统及其现代形态, 生动连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学。面向未来, “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真正考验, 是在维系大一统的基础上, 如何能同时实现秩序与自由, 如何能同时兼具‘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制度之美”^[63]。这更需要将统一战线视为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学, 深度开掘统一战线的文明史意义^[64], 认真研究共同体视角下统一战线的战略功能与发展趋向^[65], 充分激活现代大一统促进秩序与自由内在平衡的发展潜力, 发挥统一战线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体功能和效益。

基于拓展统一战线学知识边界与学科视野的立场, 大一统为理解统一战线的文明学旨趣提供方法论上的标识性概念, 是统一战线学研究亟需阐明的理论课题。加深统一战线植根于中华文明主体性、内生性的学理阐释, 将是当代中国统一战线学研究的理论生长点。但大一统的思想及其实践异常繁复驳杂, 仍有待学界以大一统为基轴, 多维度、多层次发掘统一战线的文明价值, 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提炼具有自主性、原创性意义的新范畴、新判断、新理论。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年6月2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4.
- [2] 汪仕凯. 论政治大一统: 内涵、本质和演进 [J]. 学海, 2022 (5): 21-31.
- [3] 姜义华. 中华文明的经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168-170.
- [4] 刘志刚. 从中西方文明差异看中华文明的内在统一性 [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6): 14-22.
- [5] 肖存良. 大一统: 中国统一战线的文化基础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7 (5): 35-43.
- [6] 陈喜庆. 中国先秦时期的统一战线智慧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5): 137-146.
- [7] 陈喜庆. 秦汉时期的统一战线智慧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6): 146-159.
- [8] 陈喜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统一战线智慧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1): 148-160.
- [9] 喻中. 文明秩序的同圆心结构——中国宪法中的“统一战线”析论 [J]. 法学评论, 2022 (2): 28-37.
- [10] 林尚立. 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 (4): 1-6.
- [11] 汪仕凯. 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解释 [J]. 社会科学, 2023 (5): 88-101.
- [12] 王建国, 朱莉. 大一统: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基础 [J]. 江汉论坛, 2019 (6): 57-63.
- [13] 刘永刚. 国族、国族建设与中华现代国家 [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6): 97-103.
- [14] 杨蕤. 观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十个窗口 [N]. 中国民族报, 2023-11-21 (8).
- [15] 桓宽. 盐铁论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145.
- [16] 司马光. 资治通鉴: 第14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6863.
- [17] 许倬云. 说中国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71.
-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13.

- [19] 武沐, 冉诗泽. 中国大一统思想及各民族共创中华的集体记忆 [J]. 民族研究, 2022 (1): 110-125.
- [20] 白寿彝. 中国通史: 第 1 卷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14.
- [21] 司马光. 资治通鉴: 第 13 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6360.
- [22] 尤锐. 展望永恒帝国: 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 [M]. 孙英刚,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5.
- [23] 康拉德·赛茨. 中国: 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 [M]. 许文敏, 李卡宁,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 28.
- [24] 姚中秋. 以国家整合为中心的大一统理念: 基于对秦汉间三场政治论辩的解读 [J]. 学海, 2022 (5): 32-41.
- [25] 周光辉, 赵德昊. 教化: 大一统国家韧性的形成路径 [J]. 探索与争鸣, 2021 (4): 53-64.
- [26] 西嶋定生. 秦汉帝国: 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 [M]. 顾姗姗,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4.
- [27] 侯外庐, 赵纪彬, 杜国庠. 中国思想通史: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1-15.
- [28] 谷川道雄. 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增订本) [M]. 马彪,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53.
- [29] 姜义华. 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及其现代嬗变 (上) [J]. 河北学刊, 2011 (2): 48-54.
- [30] 李宪堂. 大一统的迷境: 中国传统天下观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100-101.
- [31] 刘跃进. 《春秋》“大一统”观与秦汉时期的思想及创作 [J]. 文史哲, 2021 (3): 12-26.
- [32] 邓拓. 中国救荒史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7.
- [33] 周光辉, 赵德昊. 荒政与大一统国家: 国家韧性形成的内在机制 [J]. 学海, 2021 (1): 5-13.
- [34]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62-63.
- [35] 张伟军, 蒋锐. 中国新型大一统的建构逻辑及其基本特质 [J]. 兵团党校学报, 2023 (5): 56-66.
- [36] 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73.
- [37] 林尚立. 大一统与共和: 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 [J]. 复旦政治学评论, 2016 (1): 3-54.
- [38] 王浩宇. 流动视域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1): 16-23.
- [39] 林毅. “变中求统”: 大一统政治思想研究中的语境与逻辑问题 [J]. 政治学研究, 2020 (2): 27-37.
- [40] 傅斯年全集: 第 4 卷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126.
- [41] 孙中山全集: 第 8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644.
- [42]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74.
- [43]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472.
- [44] 王伟光. 唯物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进步历史观 [J]. 北京社会科学, 2024 (1): 4-16.
-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1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
- [46]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 刘绯, 张立平, 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 372.
- [47] 肖存良.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 地位与作用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2): 1-10.
- [48] 汪仕凯. 政治大一统的创造性转化: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国家建构的解释 [J]. 社会科学, 2023 (5): 88-101.
- [49]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89.

俞佳奇.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文明学旨趣及生成进路: 以大一统为中心的讨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22-35.

- [5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310.
- [51] 林华山, 罗振建. 新型国家形态的独特道路——以统一战线为视角 [J]. 理论与改革, 2019 (6): 14-28.
- [52] 毛泽东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5.
- [53] 吕思勉. 中华民族源流史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9: 76.
- [54] 周平, 郭志凯. 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及其意义 [J]. 探索, 2023 (6): 28-40.
- [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50.
- [56]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修订本)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8: 43-44.
- [57] 汪仕凯. 以人民为中心建构现代大一统国家: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1): 1-22.
- [58] 李俊. 统一战线的现代化国家建设逻辑及其优势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1 (5): 118-124.
- [59]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60.
- [6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105.
- [61] 韩向臣, 李龙. 政治制度与政治文明: 现代中国的新大一统模式 [J]. 河南社会科学, 2020 (7): 34-43.
- [62] 程赞, 吴俊.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3): 10-19.
- [63] 潘岳. 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2): 5-32.
- [64] 俞佳奇, 秦宣. 统一战线文化形态的内涵、价值及实现——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思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38-52.
- [65] 林华山. 共同体视角下统一战线的战略功能与发展趋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6): 26-38.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略考量、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

朱松岭

（北京联合大学 政治学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涉台“五个共同”和“四个坚定”重要论述，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新时代对台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主张。在这一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了以往多在民族工作场合谈到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课题。这是党中央准确把握严峻复杂国际形势作出的战略判断和战略举措，针对岛内绿营政客不断“去中国化”、不断“解构”中华民族和建构所谓“台湾民族”所采取的战略措施，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四个共同”为起点，夯实两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以“三交”为理论框架，促进两岸心灵契合；以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做好中华文化的守护、传承和弘扬；坚持立体互嵌，引导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有助于强化国家统一的合法性、推动两岸社会整合与和平发展，还能对抗外部干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创造条件。

关键词：台湾问题；中华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两岸关系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4-0036-11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4.04.004

作者简介：朱松岭，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引用格式：朱松岭. 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略考量、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36-46.

202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见马英九一行时,以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为核心,提出了涉台“五个共同”和“四个坚定”重要论述^[1],即“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要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岸同胞”概念是对“台湾同胞”概念的理论延伸,是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重要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第九自然段明确规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2]这一自然段规定了两个“神圣”:一是从属地、领土角度规定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二是从血缘、属人、人民角度规定了台湾同胞是全中国人民的有机组成部分,规定完成统一祖国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可见,“台湾同胞”是一个宪法概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

“五个共同”和“四个坚定”重要论述相互联系、逻辑相承,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新时代对台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主张。其中,“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强调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的最基本出发点,即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只有在统一的框架内,在守护共同家园中,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的长期稳定和发展,这一“坚定”的提出为其他三个“坚定”奠定了基础。“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应有之义和实现渠道,即着眼于两岸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融合,增强两岸同胞的实际利益和情感联系,共同创造、不断提升两岸同胞的民生福祉。“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和对共同家园的领土认同,关注心理和情感层面的统一,即通过教育、文化、历史等方面的交流和融合,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增强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国家统一、推动民族复兴的社会基础和精神支柱。“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四个坚定”中的最终目标,也是前面三个“坚定”的必然逻辑结果。通过坚定守护共同家园、共创福祉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必然能够在世界舞台上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向复兴,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两岸同胞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从国家统一、经济社会共同发展、文化和心理的统一,到最终实现整个民族的伟大复兴,“四个坚定”重要论述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和理论体系。每一环都以前一环为基础,每一环也都是后一环的推动力,共同构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连续过程。在“五个共同”和“四个坚定”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了以往多在民族工作场合谈到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战略考量、丰富的理论内容和深远的重要意义。

一、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考量

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3]的深刻延伸和具体化。它不仅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和实践指导,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加强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和文化归属感,是反对和抵抗外来势力插手中国内政的重要战略考量,是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不

断“去中国化”、“解构”中华民族并建构所谓“台湾民族”的强烈反制，是在更高理论视野上对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全面提升和系统发展。

（一）党中央准确把握严峻复杂国际形势作出的战略判断和战略举措

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中央准确把握严峻复杂国际形势作出的战略判断和战略举措。台湾岛内分裂势力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利用民族、宗教、人权、涉疆、涉藏等议题攻击中国的抓手。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抓住“台湾问题”这个关键，系统地将国家统一、国家发展、国家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处理相关问题。

这一战略构想具有深邃的远见和高度的政治智慧。一方面，它充分认识到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和台湾问题的敏感性，透彻揭示“台独”分裂势力的本质和危害。这一重要论述的提出有助于加强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抵制“台独”势力的影响，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这一战略构想超越了单一的国家统一问题，从国家发展、治理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等全局性角度出发，提出了富有创见的整体性解决方案。这是一个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抉择，体现了党中央高瞻远瞩、胸怀天下的政治智慧。这一战略构想必将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证。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些国家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大打贸易战^[4]、科技战^[5]、舆论战和认知战^[6]等，联合反华势力在民族、宗教、人权、涉疆、涉藏等领域频频发难，试图挑拨离间中国的民族团结，抹黑中国的民族工作，且不断通过台湾当局、以台湾为支点插手上述领域。有关国家企图使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在中国境外有种子、境内有土壤、网上有市场。境内外分裂势力不遗余力推动“民族问题国际化”，影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在这种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必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挑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内在需求，也是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教育和宣传、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可以有效抵御外部势力的干扰和分裂主义的渗透。

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常识，能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引起共鸣，也能引起海外侨胞的赞同和支持。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经济和军事上，更体现在文化和精神层面。弘扬中华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展示中国的软实力，争取更多的国际理解和支持。

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中央面对复杂国际形势和日益严峻的台湾问题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不仅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通过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最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针对岛内绿营政客不断“去中国化”、不断“解构”中华民族和建构所谓“台湾民族”所采取的战略措施

民进党等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去中国化”的根本目的，不仅是妄图在政治上解构“一个中

国”、建构所谓“法理台独”，还妄图“解构”中华民族认同、建构所谓“台湾民族”^[7]。它妄图篡改台湾岛内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潜移默化地影响台湾地区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思想和情感，从而在根本上挑战中华民族的整体统一和国家的主权。民进党等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建构所谓“台湾民族”本身就属于民族问题。特别是，赖清德多年来不间断叫嚣“台独”，其“台独”言论已经严重冲击台湾民众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对两岸关系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两岸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的最大隐患^[8]。对此，我们需要从全中国民族工作的战略高度提出理论规划、具体策略及推进措施，从理论到实践全面系统地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这不仅是对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负责，更是对中华民族未来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维护。长期、全面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为有效打击和消解分裂势力，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基础。

其一，立足中华民族整体战略高度提出坚实的理论框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共同”重要论述便是这一框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1]这一框架需要深入理解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本质，深入挖掘两岸“五个共同”的理论内涵，深刻揭示其中的逻辑原理。这“五个共同”有不同的面向。“共同的血脉”一是强调从生物学、遗传学角度阐述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遗传基因和血脉关系，这是两岸同胞最基本、最不可分割的生理纽带；二是强调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两岸同胞在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通过婚姻等方式形成了紧密的血缘和亲缘关系，无法切割，无法辩驳。这既是从情感认同角度强调两岸同胞的亲缘关系，借以消除民进党当局挑拨两岸同胞制造的陌生感、隔阂感和敌对感；更是从家庭纽带角度强调中华民族的家国议题，倡导亲情交流、家族凝聚、民族振兴和国家统一。“共同的文化”强调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延续，有着共同的文化认同和归属。“共同的历史”强调两岸同胞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历史传承，通过纪念共同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可以增强两岸同胞的历史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共同的责任”强调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共同肩负着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共同承担着社会进步的责任和担当。“共同的期盼”则是指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对未来发展的憧憬和愿景，即两岸同胞共同期盼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整个国家繁荣富强，两岸同胞对未来充满希望，期待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最强民族之林，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其二，要对岛内“台独”分裂势力“解构”中华民族、建构所谓“台湾民族”的西方理论刨根揭底，深刻批驳。学界尤其要深挖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本质，阐明其与中国实际情况的不符合、“台独”分裂势力无理嫁接的荒谬。进一步完善科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能够为具体政策提供指导，也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清晰的解读框架，彻底从理论上驳倒、消灭“台独”势力。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多是基于欧洲的历史经验和政治现实，而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百余年来中国革命先驱们的实践证明，直接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必然会造成水土不服。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和统一的国族，是在几千年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缔造了中国这个国家。中华民族的认同不仅基于血缘和地缘，更基于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记忆。中国的国家认

同和民族认同，既包括对共同文化、历史和价值观的认同，也包括对统一国家的认同。这种认同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一直是国家统一极为重要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台独”分裂势力试图利用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来构建所谓“台湾民族”，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和文化根基的。“台独”分裂势力试图通过构建所谓“台湾文化”，否认中华文化在台湾的根基，这是对文化的否定和对历史的篡改。批驳“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理论，必须进一步构建科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一是学界要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地批驳所谓“台湾民族”谬论的理论基础、框架体系和理论遗毒，进一步丰富、发展、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通过理论创新，学界要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为解决包括台湾地区分裂势力操弄的民族问题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二是我国要更加重视国际宣传，通过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和交流，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性，揭示“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和危害，进一步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为实现国家统一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三是要深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入岛入脑入心，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增强台湾同胞对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认同，形成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

其三，推进相关战略实施时，需要具有高度的策略灵活性和耐心，得到两岸同胞的广泛支持和理解，形成国内对台政策的社会共识，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要通过教育、宣传、文化交流等方式，加强两岸同胞的情感联系，增进理解与互信，使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客观现实和文化根脉。比如，岛内政治复杂多变，绿营和蓝营的轮替、选举结果、社会运动等都可能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产生影响。政策制定中需要根据岛内政治动态调整策略，不断适应新形势。又如，台湾社会存在多样化的群体，不同群体对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有不同态度。国家统一前、统一后如何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需要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策略。例如，对于年轻人，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他们对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商界人士，可以通过经济合作等方式潜移默化影响他们；对于学术界，可以通过学术合作加强他们对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与理解，推动相关政策贯彻实施。这些措施有利于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在台湾问题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显现，两岸关系中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时间。因此，理论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需要保持耐心，坚持不懈地推进相关工作，逐步积累成效，为统一后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三）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解决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统一大业的关键一环，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和具体实践。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不仅是对台湾问题的现实应对，更是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在这一过程中，学界需要进行理论创新、完善理论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既是学术自主、理论自信的具体表现，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9]。

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创新需要从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高度出发，深刻阐释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通过融合和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具有统一性、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这一格局不仅体现在两岸同胞的血缘和地缘上，更体现在两岸同胞的文化和精神上。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其二，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需要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深入展开理论纵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10]解决台湾问题并实现两岸心灵契合的统一，不仅是政治层面的迫切需求，更是心理和文化层面上构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环节。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增强台湾同胞的民族自信和自豪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在这个理论体系中，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满足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的深层次需求，是中华民族从历史深处走向未来的必然选择。

其三，从实践层面看，构建这样一个理论体系需要我们从多维度思考和实施。一是要在教育和文化传播中强化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让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更加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二是要通过经济、社会、科技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实现两岸发展的互利共赢，增强两岸同胞的经济联系、提高生活质量，使其在实际利益上支持统一大局。三是要通过政策沟通和民间交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增进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和信任，逐步消除隔阂。这一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实施，旨在通过全面和多层次的努力，将台湾问题的解决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构建过程中，确保最终实现两岸心灵契合的统一和全民族的共同伟大复兴。

二、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内容

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体系完备、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方向明确，通过阐明其历史基础、实现路径、精神命脉、核心任务等，能够全面提升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的理论高度，必将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以“四个共同”为起点，夯实在台湾问题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马英九先生时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建设了包括宝岛台湾在内的祖国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民族精神。”^[1]习近平总书记从系统论角度阐述了台湾问题视域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共同建设祖国疆域”突出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理和意识形态边界，“共同书写中国历史”强调的是连续性与共同身份构建，“共同创造中华文化”强调的是系统内部元素多样性和一致性的平衡，“共同培育民族精神”着眼于系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共同建设祖国疆域”不仅意味着两岸在地理上的统一，也蕴含着两岸政治和文化的整体性。这一点强调系统的边界。在这个系统中，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接关系到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不仅是对历史和法理的尊重，也是确保系统

功能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共同书写中国历史”充分说明两岸的共同身份是历史铸就，不容分割。历史是构成民族系统记忆的关键要素，它不仅提供了民族存在的时间线索，还塑造了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通过共同书写的历史，系统中每名成员都能充分认识到自己与其他成员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整个民族命运中的位置。共同书写的中国历史不仅包括国家历史，还包括家族历史和个人历史，这种共同性强化了系统内部的连接，增强了面对外部压力时的凝聚力。“两岸同胞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一个复杂系统，由不同地域、民族、语言的文化元素组成，但这些元素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实现了一致性。这种文化系统的强大在于保持内部多样性的同时，展现出惊人的整体一致性，从而在全球文化竞争中拥有独特性和竞争力。“共同培育民族精神”是驱动系统所有部分向着共同目标前进的精神力量。在这个框架下，每个成员的行为和选择不仅受个人利益的驱动，更受到整个系统价值观的指引。强大的民族精神能够激发成员之间相互支持，共同对抗外部挑战，增强系统的整体功能性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的“四个共同”系统的健康运作依赖于其内部的统一性、连续性、多样性和凝聚力，每个方面都不可或缺。这种系统性的理解有助于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更全面地把握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任务。

（二）以“三交”为途径，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马英九先生时明确指出：“两岸同胞从来都是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我们将采取更有力措施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交心，在交往中增信，促进心灵契合。我们热诚邀请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一走，也乐见大陆民众多去祖国宝岛看一看。”^[1]这明确提出了在台湾问题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交”（交流、交往、交融）理论框架和具体政策。这是增强两岸民族认同感的重要途径，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也是实现心灵契合式的国家完全统一。两岸同胞多往来、多走动、多交流、多合作，才能拉近距离、增进互信、改善关系，才能减少分歧误解、促进心灵契合^[11]。通过实际的互动和体验，两岸同胞可以加强基于血缘、文化和历史共同体的深层联系，促进实现全面统一的政治和社会目标。

交流是信息与观念的互动，交往是社交与情感的链接，交融是融合与整合的实现。交流是知识和信息交换的基础，是打破误解和偏见的第一步。在当前民进党当局有可能长期当政的情况下，破除民进党当局对两岸交流的阻碍，破除岛内因绿色恐怖形成的信息茧房和畸形宣传，增加正面信息交流，可以有效消除由不透明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猜疑和敌意。两岸在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交流可以帮助两岸同胞尤其是岛内同胞更新对大陆的认知，从而建立起基于现实认识的相互理解。学术交流、文化艺术活动、体育比赛等不仅传递信息，更是在传播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共同性，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交往侧重于社交活动和人际关系的建立，是交流的深化，可以增进彼此的信任和情感。系统论认为，系统的稳定性依赖于内部各部分的和谐运作。两岸同胞通过旅游、商业合作、家庭和亲属访问等方式增加直接接触，有助于增强两岸同胞情感联结、构建信任网络。当两岸同胞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对方的善意和友好时，心灵的距离自然缩短。交融是“三交”中最深层的一环，它关注的是两岸同胞在生活、工作、学习等方面的融合。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视角来看，交融不仅仅是表面的融洽，更是深层次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乃至认同感的相互融入和整合。

实现这一点，需要制度上的支持和政策上的便利，比如简化两岸同胞的旅行和居留手续、提供更多就业和教育机会、互认资格证书等。这些措施可以帮助两岸同胞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和理解对方的生活状态和价值取向，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实现心灵契合。

总之，“三交”不仅是简单的交流交往交融的行为，更是从系统论角度出发，通过三个层面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系统性地增强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这种策略的实施有助于打破由政治隔阂带来的障碍，建立一个更加紧密、和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三）以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做好中华文化的守护、传承和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马英九先生时明确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自觉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对于海峡两岸的同胞而言，中华文化不仅是情感共鸣的纽带，更是共同的精神家园和认同的基石。在台湾问题视域下，中华文化的核心地位愈显重要，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和核心。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其成员共同认同和价值观念的集合体。这种认同基于共享的语言、历史、宗教、传统和习俗。在中华文化的背景下，这些元素构成一个综合的文化系统，不仅为两岸同胞提供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参照，也成为其心理归属和社会认同的基础。中华文化的共享性和连续性是形成和维持两岸同胞民族身份的关键。民族身份不仅是个体对自我在民族群体中位置的认知，更是个体与集体之间情感联系的体现。中华文化通过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共同的历史经验，为两岸同胞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的存在加深了两岸同胞对中华民族这一超越地域和政治的大集体的认同。在文化和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作用尤为明显。整合理论认为，文化是社会结构和个体行为之间的桥梁。中华文化通过其包容性和整合性的特点，不仅抵抗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也促进了内部的社会和谐。两岸同胞不断强化文化交流和互动、增进文化理解和欣赏，是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最终实现心灵契合式统一的有效途径。

总之，在两岸关系的复杂纽带中，中华文化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不论是居住在宝岛台湾的同胞还是生活在广袤大陆的民众，都曾在同一片星空下诵读《诗经》，在同一轮明月下赏析《红楼梦》。这种文化共同性跨越了地理的界限，深植于每个人心中，形成了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正是这种认同感，让两岸同胞在面对外来文化时，能够自豪地称呼自己为“中华儿女”。在台湾问题的背景下，中华文化更显其桥梁作用。通过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两岸同胞可以找到更多的相似之处而非差异。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尤为重要。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中华文化也要结合现代科技和国际元素创新发展。文化自信是维护文化多样性和促进文化对话的基石。文化自信不仅是两岸同胞对传统文化深层价值的认可，也是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坚持和推广中华文化的动力源泉。文化自信可以促进更广泛的文化认同，增强民族的内聚力，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两岸同胞作为中华文化的守护者，需要保护文化遗产免受侵蚀和遗忘，这包括对传统艺术、语言、习俗等的保护与法律支持。传承者应通过教育、家庭、社会活动等途径，将文化知识和技艺传授给下一代，确保文化的连续性。弘扬者需要在创新和适应中使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例如将传统艺术与现代技术结合，创作符合现代审美的文化产品。归属感、认同感和荣誉感是构成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

感基础。归属感源于对共同家园的认知和情感连接，认同感来自于共享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内在联系，荣誉感则是对民族历史和文化成就的自豪。增强归属感、认同感和荣誉感可以使两岸同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通过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和承担相应的文化角色，两岸同胞可以更加有效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岸同胞共同维护和传承中华文化，不仅是文化责任，也是构建统一后政治和社会基础的必然要求。

（四）坚持立体互嵌，引导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在于强调两岸同胞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命运共同体建立在深厚的历史、文化、血缘基础之上，其内涵包括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四个层面。休戚与共突出的是两岸同胞情感和利益的共享，荣辱与共强调的是文化和尊严的共维，生死与共强调的是安全和危机的共承，命运与共强调的是未来和梦想的共创。

休戚与共强调两岸同胞在情感和利益上的紧密联系，这直接关联每个人的福祉。例如，大陆的经济发展为台湾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而台湾也应对等开放相关领域。共同体意识要求两岸同胞在追求个体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对方的需求和感受，实现互利共赢。荣辱与共指的是在国际舞台上，两岸应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在国际竞技场精彩表现、在国际交往中展示文化魅力，都是增强民族自豪感和集体荣誉的源泉。当外部势力试图诋毁或分化中华民族时，两岸同胞应站在一起，共同维护民族的正当权益和文化尊严。生死与共是指面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危机或外部威胁时，两岸同胞应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例如，在抗击疫情、救灾行动中，共享信息、物资支持和技术交流不仅可以提升应对危机的效率，还可以增强两岸同胞的情感联结，深化生死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命运与共是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展望，强调两岸同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应共担重任、共创辉煌。

三、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

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这有助于在理论上增强国家统一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合法性，巩固历史和法理依据，增强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感。另一方面，这有助于从战略高度对打破僵局、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规划，并从实践层面提出具体的推进思路。最重要的是，这有助于对抗外部势力干预，通过增强内部凝聚力、提高对外宣传效果、制定反制措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通过这一战略举措，我们必将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推动国家统一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有助于在理论上增强国家统一与民族身份认同的合法性

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质上是在强化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略举措。这一举措可以增强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是有助于强化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中华民族有着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历史和传统，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消除政治对立、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必然归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进一步增强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和历史的认同，确保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延续，进一步增强国家统一的合法性、正当性，为最终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奠定重要基础。二是有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进一步强化台湾作为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明确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强化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抵制任何分裂中国的企图。三是有助于加强两岸同胞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从历史、文化、教育、媒体、经济、社会和国际等多个层面，全面增强两岸同胞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强化了个体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是推动经济社会融合和政治整合的关键因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有效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理认同和情感联结，减少身份认同上的差异感，为国家完全统一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

（二）有助于从战略高度对打破僵局、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规划

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还具有深远的策略意义。在台湾问题的多层次复杂性中，促进两岸同胞的社会整合是最终解决政治分歧、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重要途径。两岸经济社会融合涉及文化、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文化传承、经济互利合作以及社会交往加深有助于改善两岸融合发展局面。

其一，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推动两岸共同文化的传承可以增强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文化交流是增进两岸同胞情感联系的重要途径，举办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可以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联系和文化认同。其二，两岸经济的互补性和协同性为经济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壮大中华民族经济。”^[1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增进认同的工作，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需要壮大中华民族经济^[13]。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可以为两岸同胞提供共同发展的平台，增强两岸同胞的实际利益联系。继续维持、发展跨海峡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是提升两岸经济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强化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其三，民间交流是促进两岸同胞相互理解、加深两岸同胞情感联系的重要途径。广泛开展两岸民间交流活动，可以增加两岸同胞的亲近感和信任度。社会融合是实现两岸同胞社会整合的重要目标。推动两岸民间广泛互动，可以在非正式层面实质性改善两岸同胞的关系。推动两岸社会保障合作、公共服务共享等，可以增强两岸同胞的社会安全感和福祉，强化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意识，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

（三）有助于对抗外部势力干预

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通过对内团结和对外统一立场，更加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减少外部势力在台湾问题上的影响力和干预能力。

一是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两岸同胞团结程度、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增强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和历史的认同感。增强认同有助于形成强大的内部凝聚力和向心力，确保在面对外部压力时，两岸同胞能够团结一致、共同维护民族和国家的根本

利益。二是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对外统一立场、提升国际影响力。建构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的共识和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向国际社会解释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强化国际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三是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减少外部势力的影响力和干预能力。在涉台问题的国际舞台上，有效传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增强中国在此议题上的话语权和主导力，有助于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下两岸关系的特殊性。

四、结语

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深刻尊重，更是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和两岸关系的精准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纽带和情感依托，以此唤起两岸同胞的情感共鸣，共同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方位和发展规律。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助于我们更加系统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规律，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找到正确的战略方向，从而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政策，推动国家统一、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有机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会见马英九一行 王沪宁蔡奇等参加会见 [N]. 人民日报, 2024-04-11 (1).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EB/OL]. (2018-03-22) [2024-07-03]. http://www.npc.gov.cn/npc/c191/c505/201905/t20190521_263492.html.
- [3] 本书编写组.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2023: 4.
- [4] 孔繁颖. 拜登政府为何坚持对华实施贸易战 [J]. 当代美国评论, 2023 (1): 105-125.
- [5] 郭永虎, 于艳文. 美国对华科技遏制: 演进、影响与中国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3): 154-165.
- [6] 喻国明, 郭婧一. 从“舆论战”到“认知战”: 认知争夺的理论定义与实践范式 [J]. 传媒观察, 2022 (8): 23-29.
- [7] 王喜, 朱松岭. 论台湾地区“转型正义”中的“台独”建构 [J]. 海峡法学, 2018 (2): 13-24.
- [8] 高杨. 警惕! 赖清德可能推动“法理台独” [N]. 人民政协报, 2024-01-06 (5).
- [9] 严庆, 郭雨晨. 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构建的思考 [J]. 西北民族研究, 2024 (2): 5-17.
- [10] 习近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J]. 求是, 2024 (3): 4-8.
- [11] 张仕荣. 在两岸交流交往中促进心灵契合 [N]. 学习时报, 2024-06-21 (1).
- [12] 习近平.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2019 年 1 月 2 日) [N]. 人民日报, 2019-01-03 (2).
- [13] 徐光木. 中华民族经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及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5): 13-25.

责任编辑: 龚静阳



习近平总书记涉台“五个共同”重要论述 的内在关系和实践指向

赵南宁 康秀云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涉台“五个共同”重要论述是一个逻辑清晰、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内在耦合体。它们既有各自的内涵和作用, 又分属不同逻辑层次。在“五个共同”耦合体中, 共同的血脉是先决条件, 共同的文化是精神纽带, 共同的历史是事实基础, 共同的责任是使命担当, 共同的期盼是力量源泉。它们相辅相成、依次递进, 清晰地呈现出“五个共同”的内在逻辑。同时, 共同的血脉、文化、历史与共同的责任、期盼层次分明, 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过往、现实、未来图景, 饱含辩证统一的关系。“五个共同”统一于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 彰显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同属一个民族的根本性质。从实践指向上看, 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是把握“五个共同”的根本前提, 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是夯实“五个共同”的持久根基, 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构筑“五个共同”的精神支撑,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共圆“五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五个共同”立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是新时代对台工作的实践指针和根本遵循。

关键词: “五个共同”; 两岸关系; 祖国完全统一; 反“独”促统; “四个坚定”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4-0047-11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4.04.005

作者简介: 赵南宁,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 康秀云,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重点项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40年建设实践研究”(23VSS012)

引用格式: 赵南宁, 康秀云. 习近平总书记涉台“五个共同”重要论述的内在关系和实践指向[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4): 47-57.

一、问题的提出

2024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马英九一行时强调：“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我们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1] 习近平总书记涉台“五个共同”重要论述（以下简称“五个共同”）既从历史、现实、未来的时空维度阐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事实，也对“台独”顽固分子和境外反华势力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作了有力驳斥，还向全体中华儿女发出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号召。“五个共同”是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本体论和顶层设计，是新时代对台工作的实践指针和根本遵循，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倒行逆施，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吹“两国论”、炮制“台独史观”^[2]，妄图“倚外谋独”“以武谋独”，严重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罔顾台湾民众安危福祉。特别是赖清德在“5·20”讲话中，大肆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两岸互不隶属”“台湾住民自决”等分裂谬论，极力乞求外部势力撑腰打气，妄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企图“以台制华”，通过操弄“台湾牌”来遏制打压中国进步和发展。自 2020 年起，美国频频联合其他国家，推动“台湾问题全球化”、干预台海体系化、“以台制华”合围化^[3]。2024 年 5 月，美国等少数国家派员参加赖清德“就职仪式”并对其“就任”致贺，这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的严重错误信号。

学界关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主要有如下方面。一是核心要义论。学者们将该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概括为“五个有机统一”^[4]和“九个强调”^[5]。二是资源基础论。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对台工作实践^[6]是该重要论述的基础和资源。三是重大论断论。学者们分别对该重要论述中的“心灵契合论”^[7]、“同心圆”^[8]、“四个坚定”^[9]等重大论断作了阐释。四是理论特质论。有学者认为该重要论述具有目标明确性、原则不可动摇性、立场坚定性、内涵丰富性等特点^[10]，体现了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辩证思维^[11]。五是实践路径论。有学者从提高认识、明确形势、关注台胞、加强交流、抓住重点人群、壮大工作队伍、加强党的领导等七个方面，阐述了落实该重要论述的实践举措^[12]。总体来说，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整体上对该重要论述进行学理性阐释和对策性探究，缺乏对相关重大论断特别是“五个共同”的探析。

“五个共同”逻辑清晰、层次分明、内涵丰富，形成了完整严密、特色鲜明的结构体系。其以“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1]为基本事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最大公约数，以“四个坚定”为实践方法，对内促进统一、反击“台独”言论和行为，对外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为此，有必要对“五个共同”的内在关系进行学理性论析，厘清它们的层次、联系和作用，把握落实“五个共同”的实践指向，进一步丰富新时代对台工作理论研究成果。

二、“五个共同”的内在逻辑

“五个共同”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层层递进，构成了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实践原则和根本

遵循。其中，共同的血脉是先决条件，从生物学意义上阐明两岸同胞的亲缘关系；共同的文化是精神纽带，强调中华文化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灵归宿；共同的历史是事实基础，承载了两岸同胞的共同起源、记忆和情感；共同的责任是使命担当，明确了两岸同胞应尽的共同义务；共同的期盼是力量源泉，为两岸同胞携手圆梦提供了不竭动力。

（一）共同的血脉：构成“五个共同”的先决条件

共同的血脉从生物学意义上确证了海峡两岸儿女同根同源，具有不可选择、无法改变的亲缘关系。马克思指出：“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关系。”^[13]恩格斯也强调：“血缘家庭——这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14]从这个意义上讲，共同的血脉是一个人产生一切社会关系的首要前提，自然也是构成“五个共同”的先决条件，阐明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亲缘关系。

一是强调两岸同胞天然形成、阻隔不断的血脉亲情。血缘、亲缘关系是深深刻在骨子里、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的社会关系。“大家同根同源、同文同宗，心之相系、情之相融，本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没有什么力量能把我们割裂开来”^[15]。事实也是如此，诸多台湾同胞会在每年清明来大陆寻根拜祖、慎终追远。这说明无论台海局势如何变化，两岸同胞血脉相连、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联结永远不会断。二是突显两岸同胞是密不可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唯物史观认为，“共同体”范畴在时空上的演进形态是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经由“虚假的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16]。其中，“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由血脉联系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推动人类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前置条件。共同的血脉将两岸同胞联结成为一个密不可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三是阐明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不可阻挡。“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17]共同的血脉是两岸同胞建立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中华儿女认祖归宗的事实依据。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家国情怀能够凝聚起强盛不衰的中国力量，这种力量势不可挡、所向披靡。祖国完全统一既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

（二）共同的文化：维系“五个共同”的精神纽带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18]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宝贵财富和精神命脉，是全体中华儿女心灵的根脉和归宿，同时也是维系“五个共同”的精神纽带。

一是呼唤起台湾同胞对祖国最深层次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18] 285}。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是深深刻在骨子里、流淌在血液中，永远无法被“台独”势力用所谓“去中国化”来磨灭的身份标识。这是海峡两岸有着同根同源的文化认同、台湾同胞对祖国有着最深层认同的结果。二是构筑起两岸同胞的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文化具体表现为两岸具有共同的文化元素、文化精神、文化表达。例如，台湾至今仍将繁体汉字作为通行文字，两岸同胞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爱国主义精神，两岸共同具有梨园戏曲、书法、国画等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形式，等等。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两岸同胞秉持和传承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基因，以强烈的文化自信构筑起共有的精神家园。三是凝聚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的作用及其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的深度认同和执着信念^[19]。“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

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两岸同胞坚定文化自信的本质，是对承载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执著追求。文化自信使中华民族在历经无数风雨后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共同的历史：认知“五个共同”的事实基础

唯物史观认为，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创造了人类历史。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1]共同的历史承载了两岸同胞共同的起源、记忆和情感，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认同感、归属感，为深刻理解“五个共同”提供了事实基础。

一是回溯两岸同胞共同的起源。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漫长历史，记载着历代先民迁居台湾、繁衍生息，记载着两岸同胞共御外侮、收复台湾。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二是加深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记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再加工和再呈现，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但记忆的产生和延续离不开客观事物这一事实基础。回顾共同的历史，有利于两岸同胞加深共同的记忆、增进历史认同，为继续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篇章而团结奋斗。三是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的情感。共同的历史使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记忆，继而产生共同的情感。“共同起源”的根基情感可以使个体产生同本群体中其他成员相类似的自我感知，从而达成社会一致性^[22]。这种社会一致性对台湾同胞来说，就是产生热爱祖国、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共识性群体感知和行为。

（四）共同的责任：坚守“五个共同”的使命担当

共同的血脉、文化、历史决定了两岸同胞同为中华儿女，在享受国家政策福利、追求自身发展利益的同时，也应积极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5] 36}为了实现这个几代中华儿女的共同夙愿，两岸同胞应当携起手来，一起担负共同的责任。

一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从情感上讲，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从法律法规上讲，无论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条款》、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日联合声明》，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反分裂国家法》，都阐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推进两岸交流融合。交流融合是增进两岸同胞情谊、推进两岸各领域合作深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不管遭遇多少干扰阻碍，两岸同胞交流合作不能停、不能断、不能少。”^[23]两岸要持续推动交流融合，特别是进一步推进民间组织交流合作和青年互学互鉴，共同携手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三是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当前两岸正常对话交往的最大阻碍在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特别是赖清德在“5·20”讲话中毫不掩饰“台独”立场，宣扬操弄“台独”的恶劣程度甚至超越陈水扁、李登辉、蔡英文。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不讲道义、不得民意、违背大义的“台独”分裂谬论，严厉遏制赖清德、萧美琴等“台独”顽固分子的狂妄气焰，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2024 年 5 月，“两高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明确“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24]，对“台独”顽固分子形成极大震慑。

（五）共同的期盼：深化“五个共同”的力量源泉

期盼可以促进行为主体自发地产生内在动力，并转化为具体实践力量来推动事物发展。“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25]共同的期盼串联起共同的血脉、文化、历史、责任，为两岸同胞深化“五个共同”、携手圆梦提供了不竭动力。

一是以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为当前目标。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热切期盼。“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关系就能重回和平发展正轨，两岸协商谈判就可以恢复，什么事情都可以谈、都好商量。”^[26]这样的表态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当前目标触手可及，充分彰显了大陆对台的善意。可是民进党当局不仅不领情还充满敌意，为一己之私挟持台湾民众坐上“台独”战车，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二是以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为阶段目标。“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和势所决定的。”^[27]两岸要以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为阶段目标，在把握两岸关系大局中维护中华民族核心利益和台湾同胞切身利益，共同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三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长远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需要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全体中华儿女应在祖国完全统一的基础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荣光。

三、“五个共同”的辩证关系

“五个共同”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时空维度，对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这一不容争辩的事实加以阐述。其中，共同的血脉、文化、历史是共同的责任、期盼的过往呈现和客观依据，共同的责任、期盼是共同的血脉、文化、历史的现实要求和未来憧憬。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五个共同”重大论断时，没有将它们进行并列阐述，而是以“更重要的是”将共同的血脉、文化、历史升格到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全面理解“五个共同”的内在关系，不仅要厘清它们的内在逻辑，还需要把握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共同的血脉、文化、历史：共同的责任、期盼的过往呈现和客观依据

在五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能够在饱经沧桑岁月、历经苦难磨难后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书写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人类文明历史，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拥有伟大的中国精神。共同的血脉、文化、历史“三位一体”，构成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宗同祖的历史图景，展现出中华民族辛勤耕耘、繁衍生息的过往史实，为两岸同胞“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1]提供了客观依据。

一方面，阐明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部分。台湾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公元230年，吴王孙权派遣1万官兵抵达“夷洲”（今台湾），吴人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对此有明确记载。隋唐时期，隋王朝曾三次出师“流求”（今台湾），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始有汉族人移居澎湖地区。宋元以后，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开始在澎湖、台湾设治，实施行政管辖。1624年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1684年清政府设立台湾府，1885年改设台湾行省。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后签订《马

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1941 年 12 月，中国政府发出《中国对日宣战布告》，宣布将收回台湾、澎湖列岛^[27]。1945 年 8 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 年 10 月，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共同的血脉、文化、历史深刻阐明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部分，揭示了两岸同胞都说中国话、写中国字、叫中国人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极为有力地驳斥了荒谬错乱的“台独史观”。“台独史观”的核心就是切断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企图使台湾“独立于”祖国之外，把台湾的历史与祖国历史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属于典型的分离主义史观^[28]。一直以来，“台独”分子大肆向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学生贩卖“台独史观”，妄图切断他们与祖国的血脉联系和认同，成为所谓“天然独”一代。其中，最荒谬的做法莫过于民进党当局推出“台独课纲”。自 20 世纪 90 年代李登辉上台开始，台湾历史课纲先后经历了“88 课纲”“95 暂纲”“98 课纲”“101 课纲”“104 课纲”“108 课纲”6 次修改。历次修改大都是把中国部分越改越少，把“台独”成分越改越多。令人发指的是 2019 年施行的“108 课纲”，直接把中国史从历史教科书中完全抹去，替换为“东亚史”^[29]。共同的血脉、文化、历史是对“台独史观”的有力驳斥，用大量事实阐明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从根源上拆穿“台独史观”谎言，揭露“台独”分子包藏的“去中国化”祸心。

（二）共同的责任、期盼：共同的血脉、文化、历史的现实要求和未来憧憬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关键是要“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18]，在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两岸和平统一。这需要两岸同胞肩负起共同的责任、凝聚起共同的期盼。共同的责任、期盼，是两岸同胞立足当下、放眼长远，对共同的血脉、文化、历史的现实要求和未来憧憬，是对它们进一步的延续、传承和发展。

一是运用法治方式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的责任、期盼促进了“以宪法为统帅，以反分裂国家法、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等为主干的涉台法律规范体系”^[30]的形成和发展。宪法明确规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31]《反分裂国家法》把反“台独”、反分裂活动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全民意志，为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了强大有效的法律武器和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32]。二是谨防别有用心之人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可是，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总是明里暗里支持“台独”，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近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谴责”中方出台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司法文件、美日澳等 27 国代表团窜台举办“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国际研习营”等，都是外部势力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具体表现。种种迹象表明，“台独”顽固分子之所以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两岸关系底线，是因为有像美国这样的外部势力撑腰打气。三是描绘实现祖国统一的光明前景。《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从四个方面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光明前景作了描绘：（1）台湾发展空间将更为广阔；（2）台湾同胞切身利益将得到充分保障；（3）两岸同胞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4）有利于亚太地区及全世界和平与发展^[27]³⁰⁻³²。这一光明前景既是共同的责任、期盼的具象化勾勒，也是对共同的血脉、文化、历史的深化和续写，为新时代两岸关系和祖国完全统一擘画了光明蓝图，为两岸同胞描绘出一幅迈向统一的生动画卷。

（三）“五个共同”统一于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

“五个共同”根植于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之上，孕育于漫长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之中，统一于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的伟大实践。“五个共同”分属不同层次，体现了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内在张力，是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方针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守正与创新层面上的辩证统一。

一是凝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合规律、合目的的理论精髓。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成功的实践都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五个共同”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价值尺度在对台工作实践中的辩证统一。从真理尺度来讲，“五个共同”正确反映出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的本质，符合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实践的一般规律；从价值尺度来讲，“五个共同”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生存发展中总结得出符合自己标准和实践需要的评判尺度，体现了中国人自由自觉活动的目的性。总之，“五个共同”立足于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既符合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发展规律，也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二是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团结两岸同胞促统一、谋复兴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认为，多民族国家是历史的常态，哪怕在强调“一族一国”的欧洲也是如此。建立多民族的国家，必须统一集权。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33]可见，实现完全统一符合一个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逻辑。“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18] 49}“五个共同”凸显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主观性，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带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逻辑。三是内蕴着中国共产党把握两岸关系求大同、存小异的实践智慧。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既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也是一个聚同化异的过程。两岸应求大同、存小异^[34]，秉持相互尊重、管控分歧的原则，避免干扰两岸间的交流合作。“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有共同的认知”^[1]是两岸最大的“同”。事实证明，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存在的分歧并不会影响两岸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四、“五个共同”的实践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五个共同”重大论断后，进一步强调把握两岸关系大局要做到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这“四个坚定”从根本前提、持久根基、精神支撑、奋斗目标四个方面，阐明了中华民族与两岸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提出了新时代两岸关系践行“五个共同”的实践指向。

（一）把握“五个共同”根本前提：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是全体中华儿女历经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发展所创造的生存沃土，拥有包括宝岛台湾在内的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域，养育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14 亿中国人。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马英九一行时多次提及“家”字，体现了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同胞情谊，意在说明大陆仍以最大诚意、最大善意、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意在强调“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两岸都是中国人；意在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回家”走亲^[35]。“五个共同”是两岸同胞拥有共同家园的基础和

依据，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是把握“五个共同”的根本前提。

一是强调两岸共同家园。共同家园意识既是中华民族历经挑战而不断焕发活力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华儿女能够有机凝聚成为一个多元一体格局、历史文化悠久、长期和谐稳定文明大国的根本原因^[36]。二是需要两岸共同“守护”。曾经的台湾爱国先烈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道，抛头颅、洒热血，誓死御侮还我河山；今天的诸多两岸有志之士为统一而奔走，为守护共同家园、反对“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发出正义之声。他们都是为了守护好中华儿女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故土家园。三是彰显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中华民族始终有着国土不能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1]这“四不”昭示了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来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中国人民解放军近年来组织的系列位于台湾海峡及其周围特定区域的实战化联合演训，就是对“台独”分子嚣张气焰和分裂行径的沉重打击、对外部干涉势力挑衅的严重警告。

（二）夯实“五个共同”持久根基：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归根到底就是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过上更好的日子”^[1]。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体现了对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福祉的共同关注，是两岸同胞不断夯实“五个共同”的持久根基。

一是传递出维护两岸关系持久和平稳定的意愿。两岸人民特别是台湾同胞是两岸和平最大的受益者，两岸都在交流合作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能量^[37]。然而，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给两岸关系带来巨大的冲击和伤害。没有两岸关系持久和平稳定，就没有两岸同胞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意在表达维护两岸关系持久和平稳定的意愿。二是表达了让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成果之意。自 1990 年两岸红十字组织签订“金门协议”起，台湾当局打破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僵局，两岸实现了从“三通”到“四通”再到“新四通”的迈进。大陆相继出台“31 条措施”“26 条措施”“11 条措施”“农林 22 条措施”等一系列惠台利民政策，深受台湾同胞欢迎。可是，台湾陆委会日前将赴大陆及港澳地区旅游警示提升为“橙色”，声称台湾民众非必要避免赴大陆及港澳地区旅行^[38]。民进党当局通过阻挠两岸共享发展成果等方式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严重损害台湾民众和相关业者利益。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体现出负责任大党大国的胸襟气度和对待骨肉同胞的真诚态度，彰显了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对台工作理念。

（三）构筑“五个共同”精神支撑：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客观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对中华民族的最高认同，以及由此产生对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归属感、荣誉感^[39]。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对台工作领域的拓展运用，为台湾同胞深化“五个共同”夯实了精神基础。

一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书写辉煌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进程中融聚而成的民族实体，与各民族是一体与多元的关系^[39]，具有统一性、共同性、不可分割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涉台重要讲话中提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对台工作领域的创新探索，为促进两岸民众不断强化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根本遵循。二是加强两岸交流交往交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

民族融合是民族生命力的体现, 是社会主义目的之所在。要想民族融合, 必要政治统一, 必要人心相通, 必须建立真正的共同体^[39] 10-11。“交往交流交融, 是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由之路。”^[40] 习近平总书记在涉台讲话中首次提出两岸同胞“交融”这一概念, 强调要“积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交融, 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交心, 在交往中增信, 促进心灵契合”^[1]。这是将民族工作理论创造性地运用到对台工作之中, 彰显了两岸同胞是政治统一、人心相通的真正的共同体。

（四）共圆“五个共同”奋斗目标：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中国共产党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目标和追求, 也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互相映衬。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共圆“五个共同”奋斗目标的实践载体, 极大地凝聚起两岸人民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共识和力量。

一是重在希望两岸同胞消除歧见。台湾当局通过政治手段向年轻世代推行“去中国化”教育, 妄图影响台湾民众对祖国的认同、对“五个共同”的认知, 妄图阻断两岸同胞的交流交往交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有利于两岸同胞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消除歧见, 携手向共同心愿和目标努力奋斗。二是旨在让两岸人民过得更好。台湾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 不应成为影响两岸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路障”。“台湾的前途系于国家统一, 台湾同胞的福祉离不开中华民族的强盛。”^[41]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旨在让两岸人民一道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 享受更多生活便利、文化福利、生态红利。三是意在鞭策两岸青年共同肩负起民族复兴使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17] 59, 需要两岸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同心共创、接续奋斗。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意在鞭策两岸青年共同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 在追梦、筑梦、圆梦中互学互鉴、相依为伴、同心同行, 用青春和汗水在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中不断丰富“五个共同”的时代意涵。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涉台“五个共同”重要论述, 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围绕“中华民族”这一重大命题, 高屋建瓴地从“共同”这一角度来论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时代意涵和实现路径。“五个共同”逻辑清晰、内涵丰富, 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 深刻阐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历史和事实依据, 有力驳斥了“台独史观”等荒谬言论, 是一堂生动讲述中华民族来龙去脉的“历史大课”。“五个共同”坚持问题导向, 既体现了大陆方面的一贯立场, 又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一是阐明了台湾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和法理事实; 二是传递了大陆对台政策立场和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三是回击了“台独”势力妄图虚无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一个中国的丑恶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行为; 四是绘就了两岸关系发展、两岸青年交流新蓝图。新时代新征程上,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指引下, 两岸同胞一定能够完成祖国完全统一这个历史重任, 携手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会见马英九一行 王沪宁蔡奇等参加会见 [N]. 人民日报, 2024-04-11 (1).
- [2] 陈思. 从“民族叙事”角度看“台独史观”论述之演变——以明郑台湾史相关建构为例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2): 82-96.
- [3] 王海良. 台海已成中美全球反霸与称霸之争的主场域——兼论反霸导向下的国际环境塑造 [J]. 中国评论, 2023 (10): 4-11.
- [4] 孙东方. 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J]. 台湾研究, 2020 (4): 1-9.
- [5] 史晓东. 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 [J]. 台湾研究, 2022 (6): 1-9.
- [6] 康杰. 学习习近平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 [J]. 长江论坛, 2021 (3): 16-20.
- [7] 李义虎. 习近平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论”解析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2): 133-140.
- [8] 闫旭阳, 权麟春. 习近平关于统一战线“同心圆”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研究 [J].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2): 53-59.
- [9] 钟厚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的“四个坚定”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101-113.
- [10] 严安林. 新时代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基本内涵、特色与历史意义 [J]. 台海研究, 2018 (2): 1-10.
- [11] 林子荣. 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辩证思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4): 40-47.
- [12] 张久营, 寇子春. 习近平对台工作思想初探——兼谈推进对台工作的一点思考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 (5): 8-13.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2.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7.
- [1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8: 237.
- [16] 刘同舫.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沉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7.
-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410.
- [18]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536.
- [19] 蒋金锵. 文化自信: 中国自信的本质 [N]. 光明日报, 2016-10-26 (13).
-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49.
-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70-471.
- [22] 宣朝庆, 葛珊. 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 [J]. 人文杂志, 2021 (12): 16-25.
- [23]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38.
- [24]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 [N]. 人民日报, 2024-06-22 (6).
- [25]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 [N]. 人民日报, 2022-01-01 (1).
- [26] 国台办: 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两岸关系就能重回和平发展正轨 [EB/OL]. (2023-12-27) [2024-07-01]. http://www.gwytb.gov.cn/xwdt/xwfb/wyly/202312/t20231227_12590237.htm.
-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

赵南宁, 康秀云. 习近平总书记涉台“五个共同”重要论述的内在关系和实践指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47-57.

- 业 (2022年8月)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16.
- [28] 李细珠. “台独”史观平议 [J]. 台湾历史研究, 2023 (1): 1-23.
- [29] 石苇. 台湾多次篡改历史课纲 “台独史观”毒害青少年影响深远 [EB/OL] (2023-07-13) [2024-07-01]. http://big5.taiwan.cn/plzhx/ZBPL/202307/t20230713_12550356.htm.
- [30] 张志军. 运用法治方式扎实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N]. 人民日报, 2015-03-13 (7).
-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5.
- [32] 彭维学. 反分裂国家法: 遏制“台独”的强大法律武器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03-06 (3).
- [33] 列宁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58.
- [34] 郝小刚, 任志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的“四个坚定”重要论述的叙事逻辑与内涵意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126-137.
- [35] 海涵. 仇长根语中评: 习马二会为两岸关系架桥开路 [EB/OL]. (2024-04-15) [2024-07-01]. https://bj.crntt.com/doc/1069/2/0/8/106920841_3.html?coluid=93&kindid=19311&docid=106920841&mdate=0415002428.
- [36] 张润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的“四个坚定”重要论述的叙事结构及价值意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114-125.
- [37] 刘国深, 柯娟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两岸双赢——习近平涉台重要讲话学习体会 [J]. 中国评论, 2024 (5): 15-20.
- [38] 国台办: 强烈反对民进党当局借提升所谓旅游警示进行政治操弄 [EB/OL]. (2024-06-28) [2024-07-01]. http://www.gwytb.gov.cn/xwdt/xwfb/wyly/202406/t20240628_12631508.htm.
- [39] 本书编写组.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2023: 4-5.
- [40] 习近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J]. 求是, 2024 (3): 4-8.
- [41] 习近平.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 [N]. 人民日报, 2014-09-27 (1).

责任编辑: 龚静阳



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叙事话语建构

许丹荔^{1, 2} 蒲瑶¹

(1. 西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9;

2. 石河子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00)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和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必须实现人工智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互嵌。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内容魅力与平衡困局, 是实现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内在机理。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 既要深刻洞察其以“智”塑造体验、以“算”解析数据、以“媒”创新转化的优势, 也要深度剖析其模式固化消解叙事话语的主体性、数字鸿沟割裂叙事话语的整体性、信息茧房遮蔽叙事话语的真实性及资本驱动歪曲叙事话语的价值性等现实问题。立足新时代, 政府部门、平台企业等主体应当从“价值引领”与“智能传播”交互贯融、“重视技术”与“崇尚艺术”并向而行、“积极入圈”与“破壁出圈”协同并行、“资本助力”与“多维治理”有机结合等四个维度, 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实践进路。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4.006

作者简介: 许丹荔,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蒲瑶,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陕西省高校思政课省级名师工作室负责人。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2XKS02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兵团高校讲好兵团故事叙事体系研究”(BTSZ20221203);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智库项目“‘大思政’视域下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研究”(2024ZD490)

引用格式: 许丹荔, 蒲瑶. 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建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58-69.

许丹荔, 蒲瑶. 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建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58-69.

关键词: 人工智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叙事话语; 文化传播; 信息茧房

中图分类号: TP18;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4-0058-12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自治、实践进路、价值融通的自主知识体系,也是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符号表征方式和价值阐释式样^[1]。只有加快建构并不断完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话语体系,才能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传播好中国声音。

作为民族瑰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对过往历史的简单累积,它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变、发展,在当前凸显了我国文化主体性和原创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3]。由此,我们既要赓续中华文脉、发扬民族精神,也要立足新时代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

近年来,ChatGPT、文心一言、Sora 等的问世,既展现了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道路,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的深刻反思。目前,学术界掀起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浪潮,从人工智能视角出发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命题,已经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概括起来主要聚焦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是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扬的全新变量^[4],有利于拓展传承渠道、丰富表现形式、优化用户体验^[5],实现精准个性化推送、深化“具身性”用户在场感、增强主体“情感性”体验^[6],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新可能与新契机。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赋能话语叙事带来风险挑战。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带来了“不可预料但在意料之中”和“不可预测且在意料之外”的风险挑战^[7]。例如,技术自主或技术失控诱发话语叙事的主导权失控^[8],信息茧房导致话语叙事的内容低质化、同质化^[9],网络信息泛滥降低话语叙事的影响力等^[10]。需要指出的是,已有研究多从具象视角切入,而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厘清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耦合关系等成果的研究较少,对其系统考察则更显不足。据此,本文试图全面审视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内在机理,检视固有思想认知对人工智能优势和独特价值的遮蔽,探索人工智能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实践进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注入更强大的动力。

二、缘起: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内在机理

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何以可能、何以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

内容为人工智能赋能叙事话语提供了宝贵资源，人工智能的独有技术特性也为叙事内容和叙事形式的丰富转化提供了技术支持。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内容魅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和意涵。同时，叙事话语既是思想观念的表征，也是理论内涵的表达^[11]。它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具有庞大的“数据体量”和充足的“智慧燃料”，这为人工智能赋能提供了丰富而永不枯竭的语料数据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深厚的历史底蕴形成了叙事话语数据优势。这些叙事数据不仅映射出古代社会的伦理观念、道德尺度和审美趣味，更蕴含着对人生哲理、人性本质及社会规律的洞察与探索，例如，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顺应自然、法家的法治理念以及农耕文化的勤劳致富等思想。在漫长而久远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文明逐渐形成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12]等智慧结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详尽的叙事话语，不仅充分彰显了对人及人之情感的深邃洞察，也传达出古代先哲对宇宙万物的探索与独特理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独特生活智慧使叙事话语内容更加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3]古人的生活方式、礼仪规范和举止言谈，构筑了一套独特的生活哲学和行为准则，潜移默化、深远持久地影响着后世。对这些传统生活智慧的传承与发扬，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长期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借由文学、音乐、舞蹈、绘画、戏剧等多元化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多样化的叙事话语传达出中国人对人生起伏、命运轮回的思考，对道义真理、良善选择的探寻^[14]，对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的体悟。这些叙事话语不仅在表达方式上引人入胜，更在深层次上启迪人们的心灵。例如，从《诗经》的诗歌情感到《资治通鉴》的历史起伏，从《三国演义》的时代巨变到《闲情偶寄》的生活态度，都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与处世省思，这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赓续传承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平衡困局

叙事话语的建构不是简单的材料堆集和文字铺排^[15]。伴随数字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既要保持“古色古香”的韵味，传承和发扬文化精髓，又要积极融入现代语境，不断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方面，智能技术是打破传统与现代之间内在张力的关键力量。悠久厚重的中国历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长与发展的肥沃土壤，是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演变轨迹的基石。“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16]在全球化浪潮与科技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的出现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及信息获取途径。传统的叙事话语主要依赖经典流传和故事传颂，叙事话语的内容侧重于道德教化和责任担当，而智能信息时代的传播方式使叙事话语的载体更加多样、效率更高。尤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影响下，叙事话语能实现精准推送与个性选择，简短、直观、易懂成为普遍的叙事风格。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支撑作用，

许丹荔, 蒲瑶. 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建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58-69.

有助于打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 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 智能技术是文化传承与创新动态平衡的有力保障。“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17] 新时代的文化传承与发扬, 既要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精髓要义, 也要积极融入现代元素, 以更为开放、包容的态度拥抱智能技术,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舞、可视,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可感、可知^[18]。伴随智能技术的多元应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更多样、生动的形式呈现, 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例如, 创作者借由数据分析、智能编排、精准推送等方式, 深入洞察当代社会的文化需求与审美趋势,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

进入新时代, 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并非简单模仿或全面照搬, 而是在保持其精神内核的基础上, 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与发展趋势进行富有创意的转化与创新, 从而更为有效地激活新时代中华文化强劲生命力^[19]。“兴文化, 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 在继承与创新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正在逐步构建起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表达,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深厚的文化底蕴。

三、驱动：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现实观照

人工智能是一种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能力的技术, 它的迅速发展直接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 智能技术的出现也为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叙事话语和实现路径, 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和应用前景。

(一) 以“智”塑造体验, 打破时空壁垒

随着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 人工智能彰显的优越性日渐凸显,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话语注入新的生命力。算法、大数据分析、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科技应用, 不仅重塑了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感知方式, 更使其不再囿于时空局限, 打破传统叙事的话语壁垒。

首先, 跨文本呈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传承提供了全新路径。通过深度挖掘和精准分析, 智能算法和大数据以文化数字化的形式转录和保存经典古籍、文化信息, 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发展形式。例如, 在典籍文献方面, 人工智能有助于共建面向知识服务的文化数字化体系, 以知识可视化的形式解读古籍经典; 在文物古迹方面, 图像识别、深度学习等技术有助于重现历史遗迹, 以高精度的数字化建模还原其初始面貌, 再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味道。我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极为丰富的古籍资源。据统计, 全国汉文古籍总量为 270 余万部^[21]。目前, 中国国家博物馆数字展厅有藏品数量 143 万余件, 涵盖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艺术品等多种门类, 藏品系统完整, 历史跨度巨大, 材质形态多样。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资源需求的变化, 智能技术的“复活”作用以跨文本的呈现方式为探索经典古籍结构化、体系化、数字化、智慧化发展开创了新模式, 有利于激活文化遗产的时代“芯”, “让收藏在故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2]。

其次, 跨时空对话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创新发展开拓了新形式。布尔迪厄认为: “场域可以被界定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或一个构型。”^[23] 以人工智能为基础

打造的数字空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传播提供了新场域、开拓了新视野。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以及音频处理等多模态交互，重构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方式；虚拟现实等技术再现了传统建筑风貌与传统手工技艺。同时，智能技术更是以沉浸式的形式增强了大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兴趣。例如，央视播出的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以现代视角解读古籍，运用时空对话的创新手法，结合戏剧、影视化及虚拟现实技术，降低古籍阅读门槛，提升人们对古籍内容的理解，生动呈现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璀璨的中华故事。

最后，跨文化交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发扬创造了新的可能。人工智能的机器翻译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可以打破文化跨语言、跨地域、跨时间的壁垒，帮助人类扩大交流、互相了解、消除误解^[24]，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各地文化深度交流和融合。例如，“李子柒视频”在国内外的社交平台备受关注。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短视频”在海外非官方传播的典型案列，这既体现了李子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耕，也体现了智能技术促进跨文化传播的良好效果。视频中没有一个字直接夸中国好，却以独具创新的叙事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了国外友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二）以“算”解析数据，满足受众需要

算法的基本逻辑在于智能捕捉内容关键词，并与相应兴趣用户匹配，有针对性地发布信息^[25]。人工智能以强大的算力算法为基础，具有采集处理和对象反馈的能力。它通过分析海量数据，掌握受众的活动偏好，打造更加精准、个性化的文化体验。

首先，人工智能算法通过分析和解析海量数据，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以艺术、音乐、图像等形式在网络平台呈现。例如，人工智能算法通过对《唐诗三百首》《红楼梦》等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提取出经典的人物形象、情节结构、价值观念等，利用这些元素创作出既符合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又具有现代审美特色的影视作品、文化产品，实现传统人文之美的挖掘、接受、体验和再创造。又如，云冈研究院与有关团队通过研究服饰制式、图案元素及染色工艺，复原北魏时期不同阶层的人物造型服饰，并以“又见云冈”为主题开展大型实景时装秀，向世界呈现中国传统服饰之美。

其次，实现个性生成与精准推送。智能算法将机器学习内容与复杂的神经网络架构相结合，分析用户的兴趣偏好和行为习惯，并对用户的未来行动做出预测，以个性化生成与精准推送的形式增强用户文化体验。例如，《敦煌学大辞典》与智能技术结合打造的莫高窟智能讲解员“敦煌小冰”，它能以新的文化叙事话语准确回答有关敦煌文化、历史、旅游、学术研究等方面的提问，为文化传承、文物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后，情感共鸣的跨时空再现。从社会文化景观理论来看，现实社会所倚重的物理空间、时间状态和地点被数字技术打破、抽离、重置甚至“虚化”，技术让人们既身处“此在”亦可以转场至“彼处”，实现与他人共时性交往^[26]。人工智能具有情感计算和情感分析的功能，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和沉浸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内核。例如，忠诚、孝顺、仁爱、礼仪等情感仍深刻影响着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认知判断。借由智能技术对古代文本情感与价值观念的整合分析，人们可以精确掌握这些情感元素的深层含义，激发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

（三）以“媒”创新转化，助推文化出圈

许丹荔, 蒲瑶. 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建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58-69.

文化传播力、影响力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参考因子和内在衡量尺度^[27]。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新媒体技术融合,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世界广泛传播搭建起新的桥梁。同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繁荣与发展, 有利于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推动人类文明共同繁荣发展。

首先, 数字技术与新媒体融合增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数字化传播方式。“数智融合”将传统的文化元素、符号和图案融入数字媒体产品中, 实现“数”“智”“媒”的有机结合, 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话语。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数字技术相结合, 创造出全新的文化产品。数媒技术展现中国古代的故事、传说和历史事件, 让人们在线下参观、线上浏览的同时获得在场感和强烈的沉浸体验。例如, 《原神》通过“网络游戏+传统文化”的叙事话语形式, 将我国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元素融入多元丰富的游戏情节, 并以符号化传播和互动式参与实现民族文化国际化传播。游戏中包含京剧、灶神、中式园林等文化元素, 礼玉“六器”、阙楼等深层次的文化符号, 让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玩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共鸣。

其次, 文化数字化发展助力国潮文化输出, 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发展探索新模式。截至 2020 年, 我国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新业态快速发展, 其中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50 106 亿元, 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 30.3%^[28]。智能技术赋能文化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智能化生产、精准化营销、个性化服务等方式有效提升了文化产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在此基础上,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核、以现代时尚潮流为外显的国潮风, 标志着文化产业发展步入新台阶。通过现代设计和智能技术的融合, 服饰美妆、食品日用品、影音游戏、模型手办等国潮产品, 既展现了中华审美风范, 又实现了与世界艺术潮流相融合。例如, “故宫日历”“刺绣古风香膏”“青铜时代键帽”“三星堆天气风暴瓶”等正是传统文化 IP 与新技术相结合、广受市场欢迎的文创产品。从安踏、李宁等本土运动品牌, 到泡泡玛特、52TOYS 等潮流玩具, 国潮产品市场竞争力不断攀升, 在海外实力“圈粉”。

最后, “云享”技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开创了新机遇。当前, 人际互动移位至互联网, 尤其是以希壤、网易瑶台、soul 元宇宙社交平台等为代表的智能技术, 使人们可以跨时空地组织、调整、选择社交对象并重新建立社会关系。“在线”“云共享”等现代社交模式,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新方向。例如,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用户, 通过共同话题、相近的价值观念与投契的话语模式, 建立独特的圈群文化。又如, 一经出现就风靡全球短视频平台的“科目三”, 不断打破文化圈层的界限。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以跳《天鹅湖》著称, 在以天鹅之姿优美旋转以后, 摇身一变跳起了“科目三”, 巨大的反差让“科目三”更加出圈。总的来看, 新媒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创新文化叙事话语的成功实践,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价值性延展提供了新思路。

四、把脉：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问题透视

伴随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浪潮, 智能技术逐渐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重要引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应用使传统叙事话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实现前所未有的变革。然而, 机遇与风

险总是并存，ChatGPT、Sora 等智能技术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与思考^[29]。

（一）模式固化消解叙事话语的主体性

人工智能模式固化体现为人工智能决策和行为的僵化、死板。以 ChatGPT 等大型语言模型为例，它在获得话语灵活性和创造力的同时，也会在预训练阶段吸纳数据文本中蕴含的人文观念，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类思维与文化中的固有偏向^[30]。这些潜在偏向藏匿于人机对话的文本之中，对日益依赖人工智能进行信息整合和内容创作的用户产生深远影响，不仅弱化了人的主体地位，也削弱了文化独有的内涵和魅力。

一方面，人工智能以其独特的生成逻辑与模拟能力威胁着人的主体性发展。从技术本身来看，人工智能通过广泛采集、深度学习海量数据来生产信息，而主体选择倾向、文化价值观念等主观因素不可避免地会掺杂进来。从人工智能模拟与生成来看，“智能”体现在技术能够独立采集用户的行为习惯、价值偏好、选择倾向等数据，并通过算法逻辑生成拟态身份，以精准推送的形式引导现实人的决策和行为，使其陷入自我承认的螺旋之中。由此，对人工智能的过分依赖，也将严重影响人的主体性作用实现。

另一方面，模式固化将淡化甚至扭曲叙事话语中的情感表达，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魅力。人工智能过度渗透，不仅将艺术的美感简单化呈现，更是削弱了主体自身的创造能力。在文化领域，人工智能虽能携带大量内容提升传播效率，但难以转述人类的情感趋向以及文化内容中的情怀、温度、体验和深度，会降低传播效果。面对复杂的人机互动与情感丰富的内容结构，人工智能往往会反应迟钝，甚至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例如，通过人工智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哲学思想可打破时空壁垒广泛流传，也会引发“建立数字肌肉”和“没有空间运动”等重复、单调的运行模式，严重影响文化内容的传播效果。相较于真实的社会感知，以智能技术为载体的数字成像没有留下空间让人们发挥创造力^[31]。算法模式的固化也带来思维模式的固化，人们陶醉于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便捷和利益，迷醉于技术支配的快感，将逐渐丧失创造力和艺术美感，不断强化刻板印象。

（二）数字鸿沟割裂叙事话语的整体性

个性化定制和算法推荐使个体接触到的信息类别更加单一，个体与个体之间愈发形成数字鸿沟。在人工智能系统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是“计算”出来的，这就难免会出现信息同质化、群体化现象，割裂叙事话语的整体性。

算法通过数据掌握用户偏好，推送人们希望看到的内容，将受众割裂为多个难以沟通、理解的“小群体”^[32]。选择性接触机制与数字鸿沟造就了圈层区隔的非传统差序格局；人工智能网络空间“自给自足”的假象特征，促使个体出现原子化形态。同时，个人的认知难免受限于自身经验立场，在“回音室效应”的接续暗示与感染下，“同盟”之间个体的“一己之见”被不断强化，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建构出现碎片化现象。正如列宁所指出：“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33]

此外，“镜像世界”被误读为“全部景观”，人工智能难以超越其设计目的，实现功能优化。趋于窄化的信息、单一定向的视角进一步固化个人的立场与观点，在集体意识的裹挟与暗示下，群体内成员的态度会因为“非理性”特质的循环叠加而逐渐转向极端化。群体对于外界的信息只有“非

此即彼”的两个选择：全盘接受，奉为圭臬；或一律拒绝，视如敝屣。在圈群的加持与氛围的烘托下，网络场域中主体容易走向“强者阶级化、弱者碎片化”的分化格局，甚至呈现“去主体化”的特征，其思考判断被群体的狂热偏执所瓦解和取代。

（三）信息茧房遮蔽叙事话语的真实性

在桑斯坦看来，“由于用户倾向于根据个人喜好接触信息，很容易出现陷入桑蚕一样的茧房之中”^[34]，形成信息茧房现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被屏幕文化所吸引，平台垄断使得技术权力不断滋生，人工智能技术逐渐诱导着人们的思与行。数字技术遮蔽了个人的现实身份，使其置身于网络空间时能够克服现实世界的束缚与规制；同时，赋予个人“数字生命”的多样性，使每个人能够在不同的社交媒体进行多重面相的、可自行设置的呈现。“虚体”的出现褫夺了现实世界中的个人^[35]，扼杀了人的主体创造能力，严重收缩了人的自由发展空间。此外，信息超载分散了人的注意力，甚至导致技术脑倦怠^[36]，不断遮蔽真实问题。

其一，虚拟与实存的二元对立使人们对“所成之像”的真实性形成质疑与反思。人工智能强调利用先进技术产生放大效应，虽然打破时空壁垒衍生出诸多“副本”，但问题在于“副本”与参照物在何种程度上趋近等同？若人们将算法生成的叙事话语与传统叙事话语简单等同，或者将生成的屏幕文化视为文化原貌的再现，摒弃质疑与反思，那么人们将慢慢失去人道主义的理性反思能力而独断地追求算法结果。这也就意味着，信息茧房将人们困于虚拟幻象之中，使人们切断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变得孤僻独断。

其二，信息茧房使得叙事话语出现简单化、庸俗化倾向，虚拟与真实的界限难以划清。文生图、文生视频的结果与内容描述想表达的意思是否具有高度相似性，关键在于输入端信息提供的完整度与真实度。从当前知识数据库的储备来看，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匮乏、语料不足、数据结构不完整、知识体系不健全。加之部分群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片面解读，使得叙事话语出现庸俗化、简单化危机。此外，智能算法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编码解码的过程中，会出现文化扭曲甚至损坏现象，导致传播错误思想、诱导认知偏向。

（四）资本驱动歪曲叙事话语的价值性

算法陷阱、算法霸权、算法垄断和算法黑箱等概念的出现，标志着算法背后资本利益驱动的因素开始受到人们关注。有研究认为：“无算法，不生产；无算法，不生活。”^[37]

其一，泛娱乐化的叙事图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化叙事方式。在资本的利益驱动与个体主观选择等多重因素之下，信息泛娱乐化已悄无声息地融入了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娱乐成为媒介话语表达的‘超意识形态’”^[38]，娱乐正从之前的“调剂品”转变为现在的“必需品”。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的泛娱乐化现象越来越突出。就受众而言，泛娱乐化信息满足的是个体暂时性感官刺激；就旨趣而言，泛娱乐化信息衍舍出的是低质浅薄的认知、萎靡低俗的理念、畸变猎奇的审美和虚幻无望的精神寄托；就趋势而言，泛娱乐化将外部世界纳入“一切皆可娱乐”的逻辑与话语体系中，通过杂乱的媒介信息达成对于“经典美学范式与崇高价值意蕴的消解”^[39]。这种泛娱乐化的叙事图景，逐渐诱导传统的叙事话语出现博人眼球、增加流量、吸引资本的特性。这本质上是资本的逐利性将人们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无限放大。毫无疑问，这不仅冲击了文化叙事方式，也会遮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尚的价值与独有的魅力。

其二，数字资本主义叙事逻辑是歪曲叙事话语价值性的根本原因。叙事出现的地方总有一种“需要”隐匿于叙事性的背后。资本增殖、垄断治理、霸权护持等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叙事话语的出场。从宏观来看，数字资本主义的叙事话语由三个叙事节点构成：以“自由”为内容动员用户参与，市场的“智能”处理与共享机制为平台企业获得参与合法性，以开放平等的关系获取权力认同，三者相互联动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和期望。具体来看，数字资本主义高扬算法叙事话语却隐匿了资本技术高度集聚的事实。在数字资本主义叙事逻辑下，传统的文化叙事话语容易遭到扭曲，加之信息传导与扩散过程中平台的参与放大、算法的精准推送、群体的效仿等“背书行为”，都会削弱人们的理性意识和认知。智能技术下无序的传播扩散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中的一个点无限放大或编译修改，歪曲了原本的意涵。

五、路向：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实践进路

人工智能是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40]。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控制变化不是要和变化同步前进，而是要走在变化的前面。”^[41]

（一）“价值引领”与“智媒传播”交互贯通

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话语实践要坚持“价值引领”与“智媒传播”交互贯通的根本遵循，推动其创新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12]“价值引领”确保智能技术在赋能与应用过程中始终坚守文化价值底线；“智媒传播”则强调发挥智能技术与新媒体的融合作用，同时谨防技术内在局限性导致的叙事话语不完整与非真实问题。

首先，树立正确价值导向，规范合理地发挥智能技术赋能作用。要尊重和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创性、独特性和价值性，也要防止技术滥用和误用，避免传播过程出现扭曲和异化。同时，要关注智能技术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是否符合原本的内容与价值取向，是否符合当前社会的伦理标准，以及是否有助于提升公众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

其次，加强中国特色的数媒技术研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广泛、深入、准确传播。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术，深度挖掘整理并系统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特点，汲取其内在的核心旨意和价值向度。另一方面，要融合新型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等平台，拓宽传播渠道和覆盖面。

最后，打造“价值引领”与“智能传播”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在政策层面，政府要积极鼓励、支持和引导各参与主体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方式，利用高度契合智能化、互动化、场景化的智能传播特性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在产业层面，平台要推动文化产业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叙事话语品牌。在个人层面，要加强公众的文化素养教育，提升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认知和理解能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二）“重视技术”与“崇尚技艺”并肩同行

在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创新实践中, 需要把握好“重视技术”与“崇尚技艺”并向而行的基本要求, 将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新有机统一, 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42]。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 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2] 我们既不能因为追求先进技术而忽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也不能过于保守而拒绝接受新技术的创新融入, 要积极探索二者并肩发展的实践方案。

“重视技术”意味着既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 也要加强技术监督与管控, 降低信息鸿沟、信息茧房对叙事话语构建的威胁。一方面, 平台要利用大数据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揭示其深层逻辑和价值规律;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 实现自动化筛选和智能化生成, 提高传播效率和准确性; 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 为公众提供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增强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知和理解。另一方面, 政府部门要以“人工智能”治理“人工智能”提升监管能力与力度, 防范信息泄露、信息伪造、虚假传播等风险。“重技”与“尚艺”是相互促进、并向而行的发展关系。技术为艺术传承提供了可能性和多样性, 而艺术则赋予技术更为深刻的意义和价值。政府部门、平台企业要引导受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尚内涵和审美价值。

（三）“积极入圈”与“破壁出圈”协同共行

“积极入圈”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要主动融入现代社会的多元文化圈层, 与各类文化形态、传播渠道和受众群体进行深度互动和交流。首先, 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现代社会的文化需求和审美趋势, 为传统文化叙事话语注入新的元素和创意。其次, 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型传播渠道需要重点推出优质内容, 筛除低俗、消极内容, 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网络空间多圈互动, 增强其传播力、影响力和感染力。

“破壁出圈”意味着打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壁垒, 打破传统媒介与数智媒介之间的屏障, 实现古今文化之间、新旧叙事话语的有机动态融合与互动。内容生产要注重使用引发群体共情的叙事话语, 营造感官互动和身心沉浸的叙事氛围, 突破次元壁、跳出传统叙事场域。“积极入圈”与“破壁出圈”的协同并行, 需要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让两者在相互碰撞中激发新的火花和灵感。

（四）“资本助力”与“多维治理”有机结合

数字时代, 叙事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与结构重组应坚持“刚柔并济”。一方面, 政府部门要鼓励数字资本有序扩张; 另一方面, 多元主体要协同治理, 营造健康和谐的网络文化生态, 不断吸引社会资本、政府投资等。从宏观上来看, “资本助力”与“多维治理”的有机结合, 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资本运作和市场机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 加强政府的引导和监管作用, 完善综合治理模式, 确保资本在合法、合规的轨道上运行。具体而言, 要继续完善相关法规和标准, 规范市场秩序, 防止文化过度商业化; 加强文化监管和评估, 确保有关叙事话语创新和传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众利益; 建立健全社会参与机制, 鼓励公众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逐步打造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治理格局。

六、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现代社会中承担着传承历史、塑造民族身份和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人工智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人工智能时代，我国要充分把握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时”与“势”、“危”与“机”。中国式现代化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沃土之上，熔铸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的积极作用。人工智能赋能不是简单的“拼盘”，而是以文化赓续传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科技创新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增强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 [1] 张国启, 蔺叶坤. 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建构: 时代旨趣、思维逻辑及实践向度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3 (3): 1-8.
-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236.
- [3]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 年 10 月 15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26.
- [4] 于水, 范德志. 新一代人工智能 ChatGPT 的价值挑战及其包容性治理 [J].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5): 82-90.
- [5] 耿玉芳. 人工智能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方面的应用研究 [J]. 出版广角, 2019 (11): 43-45.
- [6] 王佳, 王锋. 人工智能视域下红色文化传播的机遇、风险及应对机制 [J]. 新闻爱好者, 2023 (12): 89-91.
- [7] 张成岗. 人工智能时代: 技术发展、风险挑战与秩序重构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 (5): 42-52.
- [8] 陈映畴. 牢牢把握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J]. 当代传播, 2022 (1): 71-73+86.
- [9] 张珊, 周琪. 人工智能时代的红色文化精准传播: 机遇、模式与策略 [J/OL].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1-7 [2024-06-05]. <https://doi.org/10.15886/j.cnki.hnus.202403.0202>.
- [10] 胡泳. 人工智能驱动下的虚假信息: 现在与未来 [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 (1): 96-109.
- [11] 潘文丽, 孟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的逻辑探论 [J]. 理论导刊, 2023 (7): 32-36.
- [1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1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N]. 人民日报, 2014-10-14 (1).
- [14] 彭文祥, 张丁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VR 艺术创作中的审美转换及表征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3 (12): 101-109.
- [15] 谢迪斌.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党史教学叙事话语的建构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 (6): 96-99.
- [16]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2016 年 11 月 30 日) [N]. 人民日报, 2016-12-01 (2).
- [17] 马知遥, 常国毅.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非遗的文化建构 [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3): 21-30.

许丹荔, 蒲瑶. 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叙事话语建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58-69.

- [18] 王璠. 让优秀传统文化“可知可感” [N]. 人民日报, 2023-09-18 (12).
- [19] 张瑜.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破除文化虚无主义: 文化逻辑、理路遵循、践行方式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2): 17-34.
- [2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21.
- [21] 陈雪. 全国汉文古籍普查工作基本完成 [N]. 光明日报, 2021-12-10 (9).
-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1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161.
- [23] 皮埃尔·布迪厄,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 [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133-134.
- [24] 孟达, 周建新. 社会参与视角下人工智能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遇与路径 [J]. 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 2019 (6): 41-47.
- [25] 孙浩, 巩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短视频中的符号重构与创新表达 [J]. 中国编辑, 2024 (4): 90-96.
- [26] 龙钰. 数字舆情的传播趋势、演化机理、治理进路 [J].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5): 88-96.
- [27] 韩振峰, 李思涵.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的创新性贡献 [J]. 湖南社会科学, 2024 (1): 22-29.
- [28] 国家统计局. 2022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 [EB/OL]. (2023-06-29) [2024-03-24].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06/content_6888979.htm.
- [29] 曹克亮. Sora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治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166-178.
- [30] 马文, 陈云松. 文化主体性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导向干预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4 (2): 66-74+242.
- [31] 王保民, 武朝阳. 人工智能技术异化风险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探析 [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4 (4): 31-40.
- [32] 张真源, 张富利. 人工智能发展的系统性风险治理: 实践反思、理性建构与策略优化 [J]. 学术论坛, 2024 (1): 133-148.
- [33] 列宁全集: 第28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64.
- [34] 杨芳芳, 宋雪雁, 张伟民. 国内信息茧房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 兼论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 [J/OL]. 情报科学, 1-13 [2024-03-1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2.1264.G2.20240315.1633.012.html>.
- [35] 郝志昌. 数字资本主义与现代生命政治的接榫 [J]. 甘肃社会科学, 2020 (1): 167-173.
- [36] Leshkevich, T. Motozhanets, A. Social Percep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igit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Russian Context [EB/OL]. (2022-02-18) (2022-03-05). <https://doi.org/10.3390/app12052712>.
- [37] 向玉琼. 论政策共识构建中的算法支配: 模式与维度 [J]. 理论与改革, 2024 (2): 117-128+171.
- [38]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 [M]. 章艳,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4, 106.
- [39] 黄寿松, 程晋红. 批判与超越: 泛娱乐主义审美的当代反思 [J]. 山东社会科学, 2023 (7): 151-158.
- [40] 何宇, 陈珍珍, 盛三化. 人工智能与全球价值链重构: 理论机制与中国对策 [J/OL].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1-12 [2024-03-18]. <https://doi.org/10.19331/j.cnki.jxufe.20240304.002>.
- [41]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 [M]. 何道宽,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 20.
- [42] 哈战荣, 郑佳.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30-42.

责任编辑: 龚静阳



司法对“台独”行为的认定与制裁

张龔 邵丞玉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以司法形式解决政治争端问题是现代法治文明的标志, 对“台独”行为采取司法审判是依法解决台湾问题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经过多年建设, 我国基本形成了反分裂法律体系, 为司法制裁“台独”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司法审判的机构设置上, 可以考虑采取专门机构的常态化审判和特殊法庭的非常态化审判两种机制。在对“台独”行为的司法认定与制裁上, 辨别隐性“台独”行为的分裂性质并证成国家统一之法理是关键难题。中国是主权国家与祖国的统一体。“台独”行为侵犯的国家统一之法益, 既包含主权统一, 也包含祖国统一。前者以意志论为法理基础, 后者以体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连属论为法理基础, 连属关系可为识别隐性“台独”提供重要判准。司法机构对意志论和连属论的结合运用, 正如《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列举和打击的四种“台独”行为, 有助于积极预防和惩戒各种显性与隐性“台独”行为, 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法治力量。

关键词: 国家统一; 连属关系; 反分裂; “显性台独”; “隐性台独”; “两高三部意见”

中图分类号: D618; D9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4-0070-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1]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2]对于分裂国家、妄图独立的行为, 我国有着专门、系统的立法规定, 而制裁是法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4.007

作者简介: 张龔,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邵丞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 张龔, 邵丞玉. 司法对“台独”行为的认定与制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70-81.

律概念中的基本要素。当前, 台湾岛内存在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大肆宣扬“台独”分裂谬论、妄图“倚外谋独”甚至“以武谋独”的“台独”分子, 触犯了国家相关法律, 依法应当受到法律制裁。无论是统一台湾前后, 也不管以何种方式实现统一, 设立专门的司法机构, 对各种类型的“台独”分裂行为加以司法认定并实施制裁, 都是现代法治文明回应统一问题的应有之义。2024年6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两高三部意见”), 昭示了我国依法惩治“台独”的信念与决心。然而, 如何识别各类复杂的“台独”行为、如何界定“台独”行为侵犯的国家统一之法益, 从而对“台独”行为进行准确的司法认定和惩治, 目前学界和实践领域尚未展开充分的讨论, 亟需从法理上深入探讨, 服务相关司法实践, 为实现祖国统一贡献法治力量。

一、司法解决政治争端作为现代文明标志

现代法治文明的一个标志性进步, 是以司法形式解决政治争端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司法审判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内战争善后的通行方式。国际上来看, 在1945年德国二战投降仅6个月后, 纽伦堡审判就对纳粹首要分子进行了制裁。1946年5月, 由11国指派法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将侵略宣布为国家罪行,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最早成立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 这是首次用法律手段清算国际罪行^[3-4]。除国际法庭的审判外, 一些国家也以司法手段解决国内政治争端。联邦德国司法机关在战后开始系统追诉纳粹嫌犯, 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成为执行纳粹罪行审判的唯一主体^[5]。就我国来说, 采用司法方式处理相关问题, 于1980年专门在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审判指导委员会, 严格依照法定程序, 对“四人帮”的反革命行为进行司法认定与制裁。这一新中国历史上标志性的司法行为, 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时代序曲。

较之政治争端的解决方式, 司法审判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首先, 司法裁判的程序比政治解决方式表现得更加理性。在对“政治性争端”进行裁判的过程中, 法律上占理至关重要^[6]。司法裁判中恰好需要法律说理论证, 通过对特定立场的论证与推理, 通过法律规范、法学理论、法理逻辑, 形成对特定问题和立场的理性表达^[7], 得以证成其观点的合理性。其次, 司法程序提供了一种程序正义, 司法程序提供了对被审判者权利的充分尊重和保障, 强化了司法判断的结果正当性。相比起政治解决方式, 司法审判在实体和程序上同时体现出法律权威性, 使司法裁判具有说服力和可接受性。

危害国家统一与完整、谋求地方独立等分裂行为具有非常复杂的政治属性, 既属于国家内部的政治争端, 往往也交织着复杂的国际秩序问题。一旦处理不慎, 会引发国内外一系列连锁的政治冲突。从各国经验来看, 运用法律手段来制裁分裂行为、遏制分裂行为, 已经是国际社会通行的惯例^[8]。在台湾问题上, 我国很长时间都是采用政策的方式促进统一。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1993年8月)、《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2000年2月)和《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2022年8月)三部白皮书。这些文件传达出我国希冀通过政治策略实现祖国统一, 并在实

践中已经发挥出相应的效力。在重视用政策方式推进国家统一的同时，针对反分裂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为了更加有效遏制“台独”分裂行为，我国开始更加重视运用法治方式反“台独”。2006年3月，我国在宪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标志着我国对台工作的方式已经从政治手段转向政治与法律手段兼用，虽然这部法律并没有规定实施环节，但是，以国内司法审判方式解决分裂政治争端，维护国家统一，已是其中应有之义。2024年6月，“两高三部意见”为依法打击“台独”分裂、推进国家统一进程规定了战略性举措，进一步充实了反“台独”、反干涉法律工具箱，回应了最大多数两岸民众的诉求与期盼，彰显了捍卫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

二、关于反分裂行为的立法

国家分裂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各国的法律体系中都有一些反国家分裂的规定。经过几十年的法治建设，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关于反分裂行为的法律体系。这一法律体系一方面吸收借鉴了国际法以及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另一方面立足本国立场，从中国的实际问题与需求出发，为我国以法治手段预防与惩治反分裂行为提供了有效的法律支撑。

（一）各国反分裂方面的立法

通过国家立法反对分裂国家的活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与重要经验^[9]。美国的反分裂立法可以追溯到其建国之初。早在1861年，以工业化发展以及奴隶制问题等为导火索，美国南北方矛盾加剧，南方部分州组成了南部同盟，公开主张南方独立，与美国联邦政府对立。为此，美国颁布《反对脱离联邦法》等一系列法律坚决反对分裂。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在1868年对宪法进行了修正，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规定“国会有权宣告对叛国罪的惩罚”，“在任何一州被控犯有叛国罪的人，如逃脱法网但在其他州被寻获，应解送到对犯罪行为有管辖权的州”^[10]，将分裂国家认定为非法的叛国行为。

加拿大也通过立法和司法手段遏制魁北克分裂势力。1980年和1995年，魁北克人曾就是否脱离加拿大举行了公投。1998年8月，加拿大最高法院发布法案，提出魁北克省如果再以公投形式决定魁北克省的独立问题，不论公投结果是否支持独立，都不具有效力，公投效力必须以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为前提，而不能由魁北克单方面决定独立。该法案还要求，加拿大下议院有权对魁北克的省级公投议题的内容明确性进行审查。如果公投议题只要求选民授权谈判主权独立，而不让选民直接说明他们是否愿意脱离加拿大，公投就是不明确的。1999年12月，加拿大联邦政府又推出《清晰法案》，作为专门性的反分裂立法，该法案对独立公投的“清晰度”作出了明确规定，分裂势力在就独立问题进行公投时，公投的问题必须清晰表达出公投的独立意图，不得有倾向性或者模糊混淆误导民众，导致民众误解公投的内容和后果进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另外，对于公投所设的问题是否清晰，判断和决定权在加拿大联邦议会手中。除了公投内容方面的清晰度之外，该法案还对参与公投人数的数量清晰度给出了要求，即独立公投不仅限于魁北克人，而需要全部加拿大人的支持^[11]。加拿大凭借这部“铁法”实质否定了魁北克人的独立公投效力，成功打击了魁北克分裂势力，虽然由此也遗留了法理疑难，即联邦议会代表的主权意志与公投意志之间的矛盾。

俄罗斯是苏联解体后的继承人, 处理解体后遗留的分裂问题就成为俄罗斯的棘手事务。如针对车臣分裂的问题, 俄罗斯也尝试从法律上进行补救。车臣分裂问题是苏联时期以联邦制度解决民族问题而遗留下的问题。为了应对车臣的分裂活动, 俄罗斯于 1993 年 12 月 12 日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否定了苏联时期由于误估民族关系而提出的双重主权国家原则, 取消了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 把主权收归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在其全部领土上享有主权; 剥夺联邦主体的自由退盟权; 禁止以暴力方式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2003 年, 俄罗斯车臣共和国公民举行公决, 通过车臣新宪法, 其中规定, 车臣是俄联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 这些法律规定保证了俄联邦主权和领土完整, 同时也确认了车臣分裂势力的违法性质^[10]。此外, 《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和《俄反恐法》等法律也对分裂势力的活动施加禁止。

依法约束和打击此类主权国家内部出现分离主义势力的情形不在少数。西班牙政府也曾通过宪法法院裁定维护国家安全。2017 年 10 月,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不顾西班牙宪法法院裁定, 举行“独立”公投, 西班牙政府随即收回该区自治权^[12]。英国也针对北爱尔兰共和军制造的恐怖性事件制定了相关法律, 以反恐的名义打击分裂主义势力, 捍卫国家主权。许多国家在本国宪法或刑法中规定分裂国家的相关罪名, 对分裂行为加以制裁。对我国而言, 两岸统一是民族复兴伟业中的重要一环, “台独”行为则是阻碍国家统一的分裂行为。我国针对分裂行为的立法, 首要针对的就是“台独”行为。

(二) 我国反分裂的相关立法

截至目前, 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宪法》《反分裂国家法》和《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构成的反分裂实定法体系。我国《宪法》序言规定: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反分裂国家法》是一部特别法, 是专门针对当前台海两岸关系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专门针对“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的活动而立法的^[13]。《反分裂国家法》第 1 条阐明了立法目的, 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刑法》也对分裂国家的行为规定了刑事制裁的内容。《刑法》分则第一章就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 《刑法》第 103 条规定了“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从效力层级上看, 《宪法》居于我国法律体系的顶端, 决定了其是处理台湾问题的根本大法^[14]。《反分裂国家法》和《刑法》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 前者是现阶段我国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法律, 后者则是解决我国刑事问题的基本法律。从内容上看, 《反分裂国家法》与《刑法》相互补充。《反分裂国家法》第 4 条规定“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明确了反分裂行为的具体行为模式以及统一义务。《刑法》的相关条款明确了义务主体的刑事法律责任, 即在不遵守《反分裂国家法》所规定的义务或者采取消极违法措施分裂国家时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它为《反分裂国家法》的实施, 尤其是对分裂行为的制裁, 提供了具体的刑事路径。在实体规范之外, 《刑事诉讼法》则为“台独”行为的逮捕程序、公诉程序和司法审判程序提供了规范指引, 保障在不侵害“台独”分子合法权利情况下对犯罪行为实施打击和惩罚。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国的反分裂法律体系在效力上及于台湾地区, 对“台独”行为具有刑事立法管辖权和刑事司法管辖权。1971 年 10 月 25 日, 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2758 号决议, 决

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因此，我国有权继承前政府所遗留的所有权利，包括对台湾的主权^[15]。不过，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处于分治而非分裂状态^[16]。在当前主权统一但治权不统一的状况下，我国《刑法》效力虽然在应然层面上及于台湾地区，但台湾地区刑事及其运用有关规定相对独立于大陆，对于一般性的犯罪行为的制裁和相关法益的保护，其能够独立实现，因此大陆地区对台湾地区的刑事司法管辖权未实际启动。然而，“台独”行为触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国家统一与完整的法益，台湾地区刑事有关规定对此未做保护，此时就有必要对台湾地区启动国家刑事司法管辖权。

除了国内立法，我国的反分裂立法还受到国际法的支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分裂国家”等政治话语对应到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等法律原则。这些原则在《联合国宪章》《国家权利义务宣言草案》《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等多项国际关系宣言中被多次重申和确认，构成国际关系中主要的行为体和最重要的国际规范^[17]。经由国内法对国际法的转化，国内法对以上原则加以具体化。比如，《反分裂国家法》第 3 条将台湾问题界定为“中国内部事务”，就回应了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而“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对应的则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国际法上通行的现代民族国家和主权原则。

三、司法适用中的难点

法治体系是一套包含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在内的复杂体系。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反分裂法律体系，由此直接带来的问题是，这些反分裂法律如何适用。这里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审判机构的设置，特别是对于“台独”行为，由现有的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审判，还是专门设立一个审判机构；二是分裂行为的隐蔽性导致分裂性质认定困难；三是反分裂行为破坏的是统一，统一的法理何在。本文在下面详细论述这三个问题。

（一）司法审判机构的设置

1971 年，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代表席位，这一决议从政治上和法律程序上明确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国际代表权问题。该决议的通过表明，“一个中国”的主张已经受到国际承认，联合国等组织机构中不存在台湾的独立地位，也即台湾在一个中国的主权管辖之下。在此基础之上，我国的主权立法已基本完备，只是司法管辖权尚未启动。如今，面对两岸统一进程的形势变化，特别是岛内“台独”分子日益猖獗，通过司法管辖权对“台独”行为加以裁定与惩治，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法律实施角度观察，相关审判和制裁的对象不都在大陆境内，可能会在中国台湾地区或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对审判执行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以针对“台独”分子的司法审判工作可以区分为常态化审判形式与非常态化审判形式。就常态化审判形式来说，“两高三部意见”第 17 条对审判机构作出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从审判与执行上看，这一规定适合两种情形：一是在统一进程未彻底实现之前，主要在大陆地区进行审判和执行，包括缺

席审判以及跨境执行;二是在实现统一后的和平阶段,对存在的“台独”行为进行审判和执行。

此外,对于政治性争端的司法审判来说,为同类案件规模化审判设置特别法庭,是国际和国内司法审判的惯习性方法。除了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例子外,2006年联合国安理会与黎巴嫩达成设立黎巴嫩特别法庭的协议,以审判在黎巴嫩地区实施爆炸袭击者的刑事责任^[18]。1956年6月至8月,我国组成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和制裁在侵略战争时期犯有严重侵略中国罪行的日本战犯^[19]。此类法庭带有临时性质,在特定审判任务结束后即行撤销。在将来实现台湾统一之初,可能会面临针对台湾地区“台独”分子的大规模司法审判,涉及审判人数多,政治影响大。为了提高审判的统一性,也为了提升司法审判的政治与社会威慑力,可以通过设置“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涉“台独”行为专事专办。

(二) “台独”行为的性质判断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我国的反分裂法律体系为制裁“台独”行为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如何对“台独”分裂行为进行性质认定与裁判就变得非常关键。根据现行的一般观点,从《刑法》中分裂国家罪的犯罪构成来看,分裂国家罪的直接客体是国家统一^[20],分裂国家行为所损害的法益是“国家统一”;该行为客观上表现为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行为^[21]。具体来说,“组织、策划、实施”是实行行为的方式,不以造成实际的分裂结果作为制裁条件。对于何为“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学界对此解释不尽一致。综合来看,学界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另立中央政府,成立地方割据政府;二是拒绝中央政府领导;三是制造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22]。这一规定并非只针对“台独”分裂行为,过于一般化。《反分裂国家法》针对“台独”分裂活动的行为模式作了专门规定,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二是“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三是“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这一规定的特点是后果模式,具有很强的政治宣示性。

事实上,现实中“台独”行为的形式要比以上归纳的情况更为复杂,更具隐蔽性。如仅按照以上标准,会对部分“台独”分裂行为产生遗漏。根据《刑法》和《反分裂国家法》,将极端的分裂行为和显性的“台独”行为认定为分裂性质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蕴涵“台独”目标的制定、修改、解释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等操作,以及发表“台独”的相关言论等,都具有较为明显的分裂国家特征,较易识别为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台独”分裂活动^[23]。但是根据此类标准,还有一些隐性的“台独”行为,如篡改历史教科书,在历史教育中抹去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文脉联系;再如在文化教育中主张“台湾文化民族主义”,此类行为表面看只是试图对国家历史、文化和台湾地区历史、文化等因素进行篡改和模糊化,行为者并没有直接表明“台独”意图,短期看也不会对国家主权分裂、领土丧失造成直接后果,但均具有严重危害性。依据《刑法》和《反分裂国家法》的规定,由于该行为实现分裂国家和寻求台湾“独立”的特征不够明显,很难认定为“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如果以“分裂”意图和后果的明显程度,将“台独”行为区分为“显性台独”和“隐性台独”的话,那么,依据现有的法律和刑法教义学解释的一般观点,对“隐性台独”的认定与制裁可能就较为困难。

(三) “台独”行为认定的法理依据

“台独”行为的性质之所以难以分辨,其实主要是“隐性台独”行为的分裂性质难以识别,这

同当前认定“台独”行为的法理基础的局限性密切相关。在认定“台独”行为的说理过程中，“分裂”与“统一”相对，二者的对象一致，“台独”行为所要分裂的对象就是法益所要保护的对象——国家统一。对国家内涵的理解将影响对“台独”行为的认定范围。《反分裂国家法》第 2 条规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从文义上看，这里的国家指“主权国家”，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国家统一”是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统一。国家统一因此也有两层涵义。其一，根据耶利内克的观点，国家的构成要素是领土、人口和主权。主权国家概念下的国家统一，就是对主权国家构成要素的统一，即物理空间中领土的统一。其二，主权国家又以意志论作为其基础，根据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主权国家秩序是借由单纯的人民意志决断而形成的，而这种意志决断，在代表制的现实下，是通过公投，即自由意志的共同表决和多数同意，达成了实现国家主权统一的契约或者合意^[24]。对国家的分裂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主权国家背后的主权者意志的破坏。简言之，这里的国家统一仅指基于领土的物理空间统一，以及基于主权的主权者意志统一。对国家统一的破坏，也就是分裂行为，是通过破坏领土完整性或者主权者统一的意志来实现的。

然而，若仅以主权国家及其背后的意志论作为认定“台独”行为的法理依据，会遇到一系列困难。一方面，如前所述，“台独”行为可区分为“显性台独”和“隐性台独”两类行为，在意志论的法理依据下，只有外在表现出物理分裂倾向或结果的具有明显分裂特征的“显性台独”行为才能被识别为分裂行为。而对于篡改历史教科书等行为，由于此类行为没有造成实际分裂，就很难以“主权国家”分裂的理由认定其分裂性质。然而，此类行为虽然没有明确表达分裂意志，但却对国家分裂产生了间接且不确定的影响。此类“隐性台独”行为没有明确指向主权分裂，若仅将“国家统一”以及对应的“分裂行为”理解为主权者意志的破坏，就无法从法理上解释和证立当前台湾问题中的诸多“隐性台独”行为的分裂性质。另一方面，这种基于意志论的国家统一，虽然能够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统一正当性和合法性理据，但意志论内在是有先天断裂的，即整体的公共意志与分散的个体意志之间的断裂^[25]。比如，“当问到满足什么条件，一个空间内的人群可以称之为人民，从而成为主权者，得到的往往是循环论证：一个地区的人对自己所在空间拥有主权，这群人的整体就是人民，而主权只能属于人民，所以这群人对这个空间拥有主权”，所以从意志论观察统一与独立的关系是无解的。若是以此为法理基础，意志论很容易被利用和误读为所谓“台湾人民的意志觉醒和自由选择”，既包括身份认同的选择，也包括在台湾地区举行“公投”。当中央政府依法对“台独”行为进行司法审判时，基于意志论的说理和裁断，就会难以对“隐性台独”行为的意图、行为和后果之间的因果关联作出明确认定。因此，在意志论之外，探求更准确的国家统一的法理对于司法认定“台独”分裂行为至关重要。

四、认定分裂行为的客观方面：国家统一

现代国家大多是主权国家与祖国的统一体，也即不是在一个空白的空间，而是在拥有特定历史文化的空间内经过革命构建的新主权国家。正如我国宪法序言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传统的祖国基础上建立的现代主权国家。因此，中国是历代世居之地的祖国与自主构建的现代主权国家的统一体。相应地，法律中的“国家统一”既包含主权统一，也包括祖国统一。主权统一是对祖国统一的立法确认，祖国统一是对祖国空间享有主权之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一）中国是主权国家与祖国的统一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现代新型国家属于现代主权国家的类型。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主权原则就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法律原则。国家作为主权国家存在，国家的统一、独立与分裂都是在“主权国家”的意义上思考的。对现代主权国家的证成意味着国家对其领土空间拥有的主权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这种独立性和完整性不受国内和国外非法势力的干涉。经历过近现代反殖民、反侵略战争以及内战，我国通过政治决断以宪法的形式对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加以确认，这种政治决断和宪法规定充分表明了我国对本国命运发展的自主意志。作为主权国家，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就主张国家主权的范围是包含台湾地区在内的“一个中国”，这一点在国际上一直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

主权国家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概念的一个方面，此外，它还是祖国意义上的国家。国家的历史、文化以及国家内部人民情感的联结，构成了国家概念的另一层内涵。“祖国”是人们将自身的出生、血统和某一块特定的土地相联合，并融入了主观感情色彩的概念。随着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祖国成为标识人们自己或祖先的生活和文化的符号^[26-27]。我国长久以来形成了有关中国这一片领土以及在领土上生活的共同历史记忆，历代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血缘或亲缘关系，积累了共同的文化经验，并产生了文化和心理上的归属感，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对过去的祖国得以成为祖国的总结，也是面向未来、不断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历程中滋养连属而成的新祖国。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历史的总结；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也是未来发展的目标。中国的国家概念是“主权国家”与“祖国”，也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体，主权国家是表，中华民族共同体是里，国家统一是表里一致，包含了主权统一与祖国统一的双重意涵。

国家的两重意涵意味着，国家统一的法益也包含两个层面：任何对国家统一的侵犯，就不仅仅是侵犯主权国家意义上的统一，还包括侵犯祖国意义上的统一。将“台独”行为侵犯的国家统一的法益局限于主权国家的统一，无法充分且周延地揭示“台独”行为的分裂性质，也会对“隐性台独”行为失去法律上的规制，放任其侵蚀国家统一的肌体。

（二）意志论与连属论作为国家统一的法理基础

国家统一包含国家主权统一与祖国统一两个不同的层面，二者背后有着不同的法理基础。对主权统一的侵犯破坏的是主权国家背后的主权者的统一意志，对祖国统一的侵犯破坏的则是其背后的连属关系。

主权国家观念以意志论作为基础。意志论强调的是个体、组织以及国家等为主体的自主意志表达及其行动。从博丹提出主权概念，实现了上帝主权到君主主权的转型，到卢梭的《社会契约》主张替代君主主权的人民主权，以及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由意志理论，对国家法理论产生了延续至今的深远影响。卢梭的意志理论影响至今，他区分出了三种意志——个别意志、众意以及公意。公意是个

别意志的结合，“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方式，使它能以全部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24] 18-19}，并且这种结合被要求不能限制个人原本的自由。因此，实现结合的决定是由各个个人基于自身的自由意志联合作出的。与此相对，众意则是个别意志的集合。公投是意志论的一种表达形式，是否属于公意或众意，之所以充满争议，是因为需要取决于一系列条件。在主权无争议的条件下，经主权者同意或授权的公投，所产生的意志是公意的一部分。在主权存在争议的时候，公投未经主权者的同意或授权，其实是个别意志的集合，即众意。这其实是循环论证，根本原因在于，如卢梭所表达的“只是那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24] 21}。这一共同体及其公意是一个神学拟制的概念，是一个没有历史和现实的概念。

祖国观念的理论基础是连属关系。连属关系意指人与人、群体、空间等成为一个有机关联的整体。沃格林最早洞察到，部分与整体、符号与空间之间无法用意志关系来表达，而是一种连属关系^[28]。整体不是部分之和，而是部分之间连属而成为一个整体。连属关系根本上是一种历代养成的关系，社会意义上的连属关系指的是社会中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人与空间历代养成为一个有机关联的整体的过程^[25]。连属关系表达了整体之整体的本质特征，即各个部分之间的历代养成，包括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民族认同、共同的血缘和共同的历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马英九时指出的：“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共同建设了包括宝岛台湾在内的祖国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民族精神。”^[29]大陆和台湾都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拥有共同的亲缘关系、共同的语言和历史记忆，两岸统一不只是来自于特定主体的意志或愿望，更是客观的连属关系使然。长期以来，这种连属关系引导、塑造出了两岸人民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实现祖国统一，就要守护和强化两岸的连属关系，反对任何形式的对连属关系的破坏，不断增加两岸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台湾人民对中华文化和历史的认同感。

意志论和连属论共同构成了“国家统一”的完整法理基础，二者缺一不可。单纯的主权统一或者连属关系统一，即主权国家统一或祖国统一，都是对国家统一的片面理解。从共同体的形式来看，意志论基础上形成共同体的并非整体，而只是数量的集合。那种个别意志的结合，不过是政治神学思维的产物。也就是说，单纯意志论意义上的国家，独立与分裂是合逻辑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国家意识不到构建牢固的连属性而没有出现分裂问题，是一种幸运和偶然。连属论基础上的国家，是内在改变了以意志数量作为基础的国家形式，是自觉将共同体内部独立的意志互相连属起来的国家。“公民与领土”以及“族裔与血缘”两组不同的社会关系通过历代养成而被整合进新型的人群共同体之中^[30]。在中国这一空间内构建所有民族的连属关系，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主权统一和自主的连属关系建构并存，才构成完整的国家统一的法益。对两个基础的任何一项进行破坏，都构成对国家统一的破坏，由此对分裂行为的认定就有了两项标准：一是行为破坏了主权统一的意志；二是行为破坏了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内核的祖国统一。

五、司法对“隐性台独”行为的认定

严格来说，“台独”分子的分裂行为是一种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行为，虽然并非每种“台独”

行为都显而易见、易于识别。基于刑法的构成要件理论, 司法审判认定“台独”行为的性质, 需要考察主客观要件和主客体要件。然而, 对于认定“隐性台独”行为来说, 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不好判定, 以至于法网恢恢, 却可能漏掉“吞舟之鱼”。如前所述, 如果将“国家统一”的双重内涵作为《反分裂国家法》和《刑法》中反分裂国家罪所保护之法益, 应用到相关司法裁判的实践中, 将有助于识别出具有隐蔽性的“台独”行为, 以便及时、有效地威慑和遏制“隐性台独”。

(一) 立法对保护连属关系的规定

一般来说, 连属关系主要包含三种类型, 即语言的连属、历史的连属以及文化习俗的连属。凡是没有明确表态坚持或支持“台独”, 却实施破坏连属关系的行为, 包括破坏语言的统一性、历史的统一性与文化习俗的统一性, 都可以认定为“台独”分裂行为。

《反分裂国家法》第 1 条载明: “为了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其中,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和“祖国和平统一”二者以规范性文字表述并列出现在法律条文中, 意味着法律既维护主权国家统一, 也维护祖国统一, 也就是说, 主权国家背后的主权者意志与祖国背后的连属关系均受法律保护。《反分裂国家法》第 3 条规定: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其中, “遗留”意味着台湾与大陆存在无法割裂的历史关系, 台湾与大陆关系问题不是主权问题, 而是主权内部的连属关系的判断问题。这一规定表明了大陆与台湾存在连属关系的事实证据。基于此, 在司法认定“台独”行为时, 除了明确主张独立或分裂的破坏国家主权的行之外, 若其所实施的行为同时破坏了三种连属关系之一种或多种, 都可以认定为“台独”分裂行为。

(二) “两高三部意见”对显性与隐性“台独”行为的规定

由上可知, 《刑法》与《反分裂国家法》虽然触及到了对连属关系的保护, 但对于何种行为属于破坏连属关系的行为并没有给予明确规定。“两高三部意见”对“台独”行为采取了列举式规定, 在第 2 条明确规定了四种“台独”行为, 既包含了“显性台独”行为, 也包括“隐性台独”行为。这说明我国司法机关已经明确意识到“隐性台独”行为的危害, 虽然由于司法解释文本的简洁严谨需要而无法具体申明其法理基础, 却实际上承认了祖国统一背后的连属关系之法益。

根据前文对“台独”行为的区分, “显性台独”行为的分裂对象是国家主权统一, 其分裂行为的客观方面较易辨别。“两高三部意见”第 2 条前 3 款列举了三种“显性台独”行为: (1) 发起、建立“台独”分裂组织, 策划、制定“台独”分裂行动纲领、计划、方案, 指挥“台独”分裂组织成员或者其他人员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活动的; (2) 通过制定、修改、解释、废止台湾地区有关规定或者“公民投票”等方式, 图谋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的; (3) 通过推动台湾加入仅限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或者对外进行官方往来、军事联系等方式, 图谋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显然, “台独”顽固分子实施的诸如在台湾地区举行“公投”行为, 明确提出“台独”主张, 以及发动所谓“台湾独立运动”等行为, 主观意图明确, 无论其行为还是行为的结果都充分表达了行为者的独立或分裂的意志, 属于显性的“台独”分裂行为。相关司法机关通过对《刑法》之反分裂国家罪的解释, 并结合“两高三部意见”的规定, 即可给予定罪量刑。

相比之下，“隐性台独”行为则较为隐秘。“两高三部意见”第 2 条第 4 款的规定是一个重要创新：将利用职权在教育、文化、历史、新闻传媒等领域大肆歪曲、篡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或者打压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的政党、团体、人员的，认定为分裂行为。以篡改历史教科书等行为为例，这些行为不具有明显的分裂主权的特征，但是这些行为在教育的潜移默化中改造台湾同胞的历史认知，试图切断大陆与台湾地区在语言、历史和文化习俗等方面的连属关系，这就侵害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连属统一性，因此属于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同样应受到刑事司法制裁。此外，语言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文化的载体。“两高三部意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自然也包括对语言连属性的维护。从明确性角度而言，相关司法解释和实践可将这条规定延伸为“利用职权在语言、教育、文化、历史、新闻传媒等领域”。这样更能充分地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连属性，维护国家主权统一与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六、结语

依法对“台独”势力和“台独”分子进行制裁，是维护台海和平和统一台湾前后都必然面临的重大课题。运用法治方式妥善处理政治争端，既可以彰显我国应对分裂行为所采用手段的正当性，反击国际上某些国家借口台湾问题对我国内政进行非法干涉，也可以加速两岸法治进程的统一。对国家统一进行法理证成，在主权国家之外承认祖国内涵，在意志论之外补充连属关系作为国家统一的理论基础，可以更为周延地揭示国家统一的内涵。令人欣喜的是，“两高三部意见”明确规定了四种“台独”分裂行为，充分保障了国家统一所包含的意志关系和连属关系。这为识别和认定“隐性台独”分裂行为提供了具有充分学理支撑的司法意见，确保各类复杂的“台独分裂”行为均可纳入司法制裁的范围当中，及时、有效威慑猖獗的“台独”分裂势力，加速两岸统一进程，为实现统一后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历史性追责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 年 7 月 1 日）[N]. 人民日报, 2021-07-02 (2).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EB/OL]. (2018-03-22) [2024-07-03]. http://www.npc.gov.cn/npc/c191/c505/201905/t20190521_263492.html.
- [3] 何勤华, 朱淑丽, 马贺. 纽伦堡审判与现代国际法的发展 [J]. 江海学刊, 2006 (4): 125-132.
- [4] 何勤华. 关于东京审判的历史反思——以东京审判对现代国际法的贡献为中心 [J]. 政治与法律, 2015 (11): 65-72.
- [5] 李乐曾. 战后对纳粹罪行的审判与德国反省历史的自觉意识 [J]. 德国研究, 2005 (2): 4-9.
- [6] 徐崇利. 国际争端的政治性与法律解决方法 [J]. 国际政治研究, 2018 (2): 11-37.
- [7] 周叶中. 论反分裂国家法律机制的问题意识与完善方向 [J]. 法学评论, 2018 (1): 1-8.
- [8] 李龙, 魏腊云. 中国《反分裂国家法》与美国《反脱离联邦法》的比较研究 [J]. 政治与法律, 2005 (4): 30-34.

张龔, 邵丞玉. 司法对“台独”行为的认定与制裁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70-81.

- [9] 殷啸虎. 解读《反分裂国家法》的四个法律亮点 [J]. 检察风云, 2005 (7): 28-29.
- [10] 张仕荣. 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反分裂斗争的经验及思考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1 (5): 119-122.
- [11] 倪春乐, 王泊勋. 加拿大反分裂立法的历史图景、演进规律及当代镜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1): 144-160.
- [12] 张仕荣. 全球治理视阈下的各国反分裂斗争 [N]. 学习时报, 2020-01-10 (2).
- [13] 游志强. 法教义学视域下的《反分裂国家法》 [J]. 海峡法学, 2019 (2): 13-25.
- [14] 周叶中. 论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 [J]. 法学评论, 2008 (3): 3-12.
- [15] 颜三忠, 洪萍. 论《反分裂国家法》的立法依据与现实意义 [J]. 求索, 2005 (10): 3.
- [16] 尹生. 分裂·干涉·主权——《反分裂国家法》的国际法分析 [J]. 当代法学, 2006 (1): 126-132.
- [17] 王首伟. 国际关系学中国家主权理论 [J]. 东北亚研究, 2012 (4): 45-48.
- [18] 胡耀辉. 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法庭的历史、现状与前景 [J]. 中东研究, 2019 (1): 117-138.
- [19] 邹瑜, 顾明. 法学大辞典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 12.
- [20] 赵秉志. 新刑法教程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421.
- [21] 马章民. 分裂国家罪及其司法认定 [J]. 河北法学, 2006 (8): 56-61.
- [22] 赵秉志. 中国刑法案例与法理研究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 4-9.
- [23] 游志强. 论《反分裂国家法》的实施机制及其构建 [J]. 台海研究, 2022 (3): 1-10.
- [24] 卢梭. 社会契约论 [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7-18.
- [25] 张龔. 国家统一义务的法理与实践 [J]. 晋阳学刊, 2021 (1): 102-114.
- [26] 李乐. 论祖国与国家的关系 [J]. 理论月刊, 2012 (9): 168-171.
- [27] 张龔. 家的“律法”: 祖国与主权国家之辩 [J]. 原道, 2014 (2): 3-20.
- [28] 埃里克·沃格林. 新政治科学 [M]. 段保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41.
- [29] 习近平会见马英九一行 王沪宁蔡奇等参加会见 [N]. 人民日报, 2024-04-11 (1).
- [30] 刘永刚.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意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1-14.

责任编辑: 林华山



反“独”促统的涉台涉外法律斗争： 动态、制度与前景

田飞龙

（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中国中央政府面对 2024 年台湾地区选举变局、赖清德激进“台独”路线与美西方非法干预，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指引下，紧紧抓住反“独”促统主线，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斗争和法律斗争，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2024 年台湾地区选举加剧了民意裂变和政治多极化，金门海域渔船事件和赖清德就职演说立场暴露出激进“台独”的法理和实践风险。大陆在应对金门海域渔船事件中发展出一种具有主权管辖性质的管治新常态，在依法反“台独”层面推动从个案突破走向普遍司法解释，在反干预方面强化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法维护以及按照《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规范精准反制和惩罚外部干预势力，并以“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叙事深化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法理根基，从而逐步形成了更加完备的涉台涉外法律斗争规范体系和执行机制。大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系统、精准、持续开展反“台独”、反干预、促统一的有效法律斗争，稳健掌握两岸关系与国家统一的法理主导权和主权管辖的主动权，向台湾地区和国际社会展现中国中央政府管控及解决台湾问题的法治文明信号和理性行动能力，为两岸完全统一与优良治理提供了最佳法理基础和制度条件。两岸完全统一进程从政策主导型路径向法治主导型路径的转化与发展，以及政策与法律更有效的协调，展现了中央对台整体工作方针与治理模式的政治成熟以及具体规制技术的理性进步。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4.008

作者简介：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基金预研工作坊项目“行政法团队国家基金预研工作坊”（2024GJYY29）

引用格式：田飞龙. 反“独”促统的涉台涉外法律斗争：动态、制度与前景[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4): 82-97.

田飞龙. 反“独”促统的涉台涉外法律斗争: 动态、制度与前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82-97.

关键词: 两岸关系; 反“独”促统; 涉台法治; 涉外法治; 司法解释; 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4-0082-1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但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合谋勾结破坏两岸和平统一进程，扭曲解释联合国第 2758 号决议以炮制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否认“九二共识”以破坏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治基础，逐步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规范内涵，企图推动台湾的“主权化”和“国际化”，甚至试图推动台湾“乌克兰化”及实施“法理台独”“以武拒统”等地缘政治阴谋。这些来自两岸之间和国际体系的变化，既对反“独”促统整体进程造成巨大挑战，也对我国涉台涉外法律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了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新时代全面法治观^[1]，其中服务于反“独”促统大局的涉台涉外法律体系^[2]是我国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充满风险挑战和制度创造性的独特部分。涉台涉外法律体系是我国法上的一个独特概念，指向的是以台湾问题为中心的两岸法制关系与涉外法制关系相整合的法律规范整体，与“一国两制”范畴的涉港涉外法律体系、涉澳涉外法律体系具有规范性上的相似性。但涉台涉外法律体系又具有自身独特性，因“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的勾结对抗以及对两岸统一的法理与制度破坏，这一体系的斗争性日益凸显。涉台涉外法律斗争就是涉台涉外法律体系中以反“台独”、反干预为基本制度目标的立法、执法、司法斗争及整体性的法理斗争。涉台涉外法律斗争对于大陆稳健掌控两岸关系主导权、塑造两岸完全统一话语权以及积极探索设计“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具有重大的政治博弈和制度创新意义。

2024 年以来，两岸关系出现了新变化、新挑战与新契机。2024 年 1 月台湾地区选举，“蓝白合”破局，民进党渔利连任，赖清德路线进一步加大两岸冲突风险，但台湾民意出现裂变，立法机构内出现制衡民进党的政治态势，这又使得两岸关系出现复调格局。2024 年 2 月，金门海域渔船事件对闽台融合发展及两岸关系回暖造成不利影响。针对此事件，大陆尝试进行涉台新常态管辖，这既是“主场统一”的有益进展，也对“台独”分裂势力给出强有力警告和反制^[3]。2024 年 4 月马英九再次登陆及第二次“习马会”凝聚形成“中华民族”共识，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探索两岸和平统一新思维与新路径，开辟了一系列新观念和新课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统一战线理论、文明理论与国家统一理论的创造性结合与展开^[4]。2024 年 5 月 20 日，赖清德就职演说激进宣扬“两岸互不隶属”的“实质两国论”，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华民族的基本事实与法理，并以“民主价值论”和“国际盟友论”来“务实”推行台湾“主权化”与“国际化”路线，对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与完全统一造成进一步的威胁与损害。

2024 年 5 月 22 日，外交部宣布对美国涉台军售企业及其高管实施《反外国制裁法》框架下的反制性制裁^[5]。2024 年 6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对我国刑法中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如何具体适用到“台独”行为上进行了细致的司法解释和程序规定，为我国司法机关依法开展反“台独”法律斗争提供了权威、规范、清晰、精准的法律依据。我国之前已经建立“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制度并对清单人员实施制裁，同时根据《刑法》对“台独”分子杨智渊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进行刑事管辖，以及对美国有关实体与个人开展反制性制裁，

积累了涉台涉外法律斗争的初步经验。此次有关反制性制裁及普遍司法解释的制度举措，进一步提升了涉台涉外法律斗争的法治化水准。

由此观之，大陆涉台涉外法律斗争逐步进入法律规范更为明确、司法程序更为精准、法律责任更具威慑性、长远制裁与斗争效力更为凸显的新阶段。本文拟对上述变化进行法理和政治评析，着重从反“台独”、反干预、促统一的有关涉台涉外法律斗争层面，对大陆“主场统一”的法律动态与制度进展作出分析，对两岸关系演变与国家统一前景进行研判和展望。

一、台湾地区选举加剧民意裂变和政治多极化

2024 年台湾地区选举中，蓝、绿、白三方竞逐。这场选举发生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进和岛内政党轮替的关键时刻，其结果反映了台湾民意的裂变和迷茫，“台独”思潮虽未显著得势但仍存在强大影响力。在基本盘作用、当政 8 年的公权力护持以及外部势力影响等多重因素下，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以 40% 的新低得票率当选，立法机构民意代表选举中民进党丧失第一大党地位，仅得 51 席。蓝绿持续对抗与白色中间势力的崛起，代表台湾主流民意更难聚焦和共识化，更代表民进党追求的“台独”目标缺乏清晰的民意基础，台湾政治社会更加分裂。

本次选举在法理性质上属于中国内部事务范畴的地方选举，两岸之间的治权之争不影响台湾地区从属一个中国的法律地位和行为属性。从国际法来看，二战后《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清晰确认台湾属于中国，联合国第 2758 号决议更进一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一个中国”的唯一代表权，台湾不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和国家资格^[6]。从国内宪法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台湾属于中国，并设定了国家统一义务。台湾地区的任何选举不具有主权属性，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国家行为，不构成对任何“台独”行为的正当法理授权，只是治权意义上的内部管理和地区治理行为。

2024 年台湾地区选举结果可以进行政治和国际视野的多重解读。其一，台湾民意结构裂变，约六成选民未投票支持民进党，相当大比例的选民不同意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和两岸“脱钩”路线。其二，国民党基本盘保持稳定，显示和平发展、和平统一仍构成岛内民意的重要取向，这股力量遭受多重压力，但并非不可培育和期待。其三，民众党得票率明显上升，吸走了民进党部分选票特别是青年人选票。这显示台湾青年的某种政治觉醒以及寻找新出路的渴望，未来这一部分选民的政治行为及其影响将催生台湾政治光谱进一步多极化。其四，民进党赖清德当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蓝白合”破局，否则以事后得票率来看，下架民进党的政治机会很大。其五，民进党新一届当局必然是弱势的，立法机构内议题性甚至联盟性的“蓝白合”仍有空间，立法机构的民主监督与政治制衡的制度效能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激发和运用。这些分析和结论表明，民进党未来在推进“台独”路线上将会遭遇更多阻力，在民生政绩上受到更多严格监督与问责，但“台独”路线不会改变。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继续展现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肯定和对“台独”路线的抑制态势。就在台湾地区选举结果出炉前后，瑙鲁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意味着台湾当局的所谓“邦交国”又减少一个，其国际空间因自身错误政治定位和路线而更受压缩。同时，因民进党拒绝承认“九二共识”，顽固坚持“台独”路线，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商务部就台湾地区

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对后续有关制裁措施及其效应，台湾本身无法忽视，其产业界与民众利益可能因为民进党错误路线而进一步受到影响。再者，随着赖清德逐步展现所谓“务实台独”路线及更强硬措施，大陆必然依法进行反制和综合性打击，两岸关系有可能进一步受到波动冲击。在不投民进党的近六成选民中，上述预期和影响应已得到适当理解，他们后续如何因应行动，对民进党当政基础和路线取向之影响不可低估，这也是反“独”促统需要精准考量的杠杆性政治变量^[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大变局中潜藏着中国式现代化和两岸完全统一的深刻契机，两岸中国人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以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新的辉煌篇章。民进党一叶障目，对抗历史主流和民族大义，误判内外形势，操弄岛内民意，制造两岸对抗，是中华民族的政治公敌。此次选举不代表民进党得势，而是反映了台湾民意对内外变局一定程度的敏感性和回应性，也反映了台湾青年人对民进党的政治区隔趋势。这为台湾政局未来进一步演变埋下了伏笔，也为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与完全统一留下了想象和实践的空间。

二、赖清德、“台湾牌”与民族复兴的终极考验

赖清德的就职演讲致使两岸完全统一进入新的风险挑战期。他的就职演讲本质是主张“台独”，手法是“务实”主义和渐进主义，靠山是美西方，思想根源是民主虚妄症，思维内核是机会主义。这些因素的组合形成了赖清德在岛内及国际层面的基本定位与影响状况^[8]。“蔡规赖随”显示了“台独”基本面的延续性。“两岸互不隶属论”这样的“实质两国论”，从蔡到赖一以贯之。“九二共识”继续被民进党当局封杀雪藏，所谓“中华民国台湾”论粉墨登场、掩人耳目，试图在认知上误导台湾民众与国际社会。可以说，赖清德是一个难缠的、顽固的、持续的、机会主义的“台独”主义者。

赖清德打“台湾牌”，用这张牌谋求所谓“终极台独”，以及捆绑台湾民众和美西方势力。在台湾地区与美国的关系中，并不总是美国控制台湾地区及占据主导，台湾地区也在反向渗透和控制，甚至运用包括“民主、自由、冷战堡垒”之类的价值符号与政治功利性捆绑美国^[9]。这样的反向捆绑在人类历史上不乏先例，在美台关系上也有表现。长期以来，民进党对美国的院外游说投入巨大，“台独”势力不惜利用各种资源和机会推进美国对台湾地区的“价值亲和”与政治交互。台湾当局利用了美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的思想倾向和政治需要。笔者认为，不能以为只有美国在打“台湾牌”及控制台湾，也必须正视“台独”的内在韧性及反向捆绑美国的政治可能性，加强对“台独”势力的综合性打击。

自蔡英文上台以来，民进党当局费尽心机打“台湾牌”。其一，从政治上看，以“民主”与“威权”的二元对立叙事^[10]取代大陆的“统一”与“独立”叙事，将“台独”隐藏在所谓“普适民主价值”之下，企图博取西方普遍同情和支持。其二，从经济上看，以台湾的高端芯片制造业张扬台湾对西方乃至全球的技术文明与产业链的积极贡献，从而嵌入美国对华科技冷战与卡脖子战略，充当“急先锋”。其三，从地缘上看，以台湾所在第一岛链及西太平洋战略堡垒地位捆绑美西方的战略思维和军事部署，以台海为地缘军事安全阵营的分水岭，企图达到“以武拒统”的目的。其四，从文化上，民进党极力推进“去中国化”，宣扬台湾历史与文化“主体性”，以及台湾“民主文化”

与“本土文化”的综合杂糅，企图从文化认同上切断台湾与大陆的历史和血肉联系^[11]。这四个方面的“台湾价值和优势”逐渐被建构为岛内“台独”势力的完整意识形态，并在美西方形成某种认知共识。西方世界“挺台”的各种势力，既有冷战思维和反华力量，也有所谓同情甚至支持“台独”的理念型思维和力量。从本岛到境外，“台独”势力的族群、话语、游说网络、政治资本与认知战技法，不容小觑，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破解。由此，反“台独”、反干预、促统一的伟大事业必然需要承受巨大压力及作出巨大开创性贡献。

美国打“台湾牌”的伎俩充分暴露其霸权主义的本质。其一，美国虽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为中美建交基础，但一直试图诱导中国走和平演变的西化道路，暗藏所谓“以民主方式改造东方中国的道德热情和政治优越感”。其二，以“对台六项保证”作为“美台关系”的政治承诺，利用台湾对抗大陆，企图以分而治之的地缘策略阻止中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并同时从大陆和台湾谋求高额战略利益。其三，以所谓“台湾关系法”作为美国两岸政策的国内法基准，对一个中国政策进行弱化和裁量性利用，谋求保持对台湾事务干预的主动权和选择性。从 1979 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对台政策的上述差异均衡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台湾当局利用美国考虑到台湾对西方阵营的地缘和经济价值，顽固阻挠和破坏两岸统一进程。赖清德上台后，民进党当局妄图美国对中国大陆施加压力，阻止大陆的军事施压，甚至逼迫大陆放弃“九二共识”。从结果来看，美国对赖清德更多是利用，美方施压中国大陆的基本目标落空，大陆针对赖清德的“台独”演讲进行了更具全岛包围性质和威慑力的军事演习，以及从官方立场上严厉批判赖清德的“台独”立场及其危害性。

大陆绝无可能放弃“九二共识”，这是最后的底线。这一底线的基础不仅仅是联合国第 2758 号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两个神圣”条款（神圣领土与神圣职责），更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五千年的大一统政治传统及其责任伦理。基于文明和政治的超强稳定性和连续性，一个中国不是一个可以谈判或拆解的架构，而是在历史进程中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而凝聚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上的超稳定国家形态。一个中国具有历史、文明、民族和政治的规范正确性和制度坚定性，不可能通过所谓“台独”或西方式民主的程序甚至公投方法加以拆解。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宪法层面来看，任何对一个中国原则及其政治实体的背叛、偏离和敌对，都是宪法的公敌，也是民族的公敌。在此意义上，两岸任何政治谈判中，“一个中国”都是默认和强制性的前提，是不可谈判的固定基础。两岸任何政治谈判只能是这一基础之上的治权和事务谈判，这一宪制原理对港澳台共同适用，是“一国两制”的规范原理，也是最高原则^[12]。所以，当“港独”势力以“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企图胁迫中央在主权与安全问题上让步时，迎来的只能是香港国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同样，当“台独”势力一方面“倚美谋独”，另一方面又机会主义且虚伪地宣称两岸交流不设任何前提时，迎来的就只能是军事威慑和法律惩戒。以中华文明之智慧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熟，绝不可能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犯下颠覆性错误。民进党当局和外部势力诱导大陆以放弃“九二共识”之一中国原则为代价，换取所谓“两岸交流”短期利益，将两岸完全统一的最高原则置之不理，这完全是对中华文明和中国共产党的无知。

当然，台湾问题触及到了中西方的“文明总体战”，构成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终极挑战。一方面，中央宣布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具有强关联^[13]，完成国家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台独”势力以所谓“民主化”和“本土化”的结合形态制造两岸对立，并勾结外

田飞龙. 反“独”促统的涉台涉外法律斗争：动态、制度与前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82-97.

国势力进行国际化对抗和机会主义，造成两岸统一的多重障碍。面对赖清德上台带来的终极挑战，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进取心的有机结合与动态运用，主动创造两岸统一的话语、态势、条件和机会窗口，主动承担起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责任，创造中华民族的新历史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央在涉台涉外法律斗争上的主动作为，就是因应这些挑战的重要抓手。

三、主权管辖的危机实践：金门海域渔船事件与涉台管治新常态

大陆与台湾在具体治权意义上的管辖与执法互动早就存在，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条件下存在良性的惯例和互动法则，体现两岸中国人之间的默契和信任。但是随着“台独”分裂势力的挑衅破坏，两岸治权执法冲突时有发生，大陆的主权管辖与治理行为日益规范化、清晰化并凸显了法治新常态^[14]。2024年初，大陆对金门海域渔船事件的应对就是显著实例。

2024年2月14日，台湾海巡部门在金门海域的恶意暴力执法导致大陆2名渔民死亡，引发两岸冲突风险和后续事态的不确定发展。大陆官方在谴责之外启动实质性执法行动，宣布不承认金门的所谓“禁止、限制水域”，并进行厦金海域的常态化海巡执法行动，维护渔民安全和有关海域管辖秩序。这一事件进展与佩洛西窜台后大陆突破所谓“海峡中线”及实施威慑性围岛巡航的管辖新常态具有类似性质。这不仅是大陆依据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和中国宪法进行主权宣示，更是逐步展现和确立了治权执法的新常态，在法理与管辖实践上具有推进两岸统一的制度性进展意义。

台湾方面指责大陆渔民所谓“越界”。大陆的官方反应及反制行动宣布了台湾海巡部门暴力执法行为的非法性，属于权力“越界”。台湾方面依据自身的所谓“法统”和法规进行执法，对大陆渔民进行驱离和追逐，从其法理认知和执法习惯来看认识不到自身行为的源头违法性和执法过程的过度暴力特征，以僵硬甚至有些泄愤意味的所谓执法行动在金门具体海域空间内将“两岸一家亲”的中国人和气和闽台融合发展的政策善意^[15]予以挤压破坏。台湾指责大陆渔民突破其“法规之界”，殊不知他们的所谓“法规”在中国法律体系中不具有合法效力，大陆只是惯例和善意上容忍其过往的执法行动而已。

台湾海巡部门才是真正的“越界”一方。台湾以地方当局的“法规之界”对抗中国的“主权之界”，无论是在国际法理还是宪法法理上均站不住脚。按照这一法理事实，台湾只能接受大陆海警对厦金海域的新常态执法管治权，且从此不敢再“越界”侵害大陆渔民受中国宪法保护之合法权益。美国等外部势力的干预更是不可能的依靠，美国也接受了佩洛西窜台后大陆涉台管治权的新常态。这里形成了“大小两岸”的新博弈规则，即“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每挑衅越界一步，以如今大陆的对台立场和行动意志则必然造成涉台管治的新常态，在主权归属一个中国的恒定宪制前提下，依据联合国决议和中国宪法确实承担起更广泛、精准、负责与可持续的管辖责任。

这是台湾当局和外部干预势力必须要看清楚的两岸关系新常态，也构成对勉强当选的赖清德及其团队的重要约束。两岸关系目前处于晦暗不明的规则转换期，美国“以台制华”甚至将台湾“乌克兰化”的图谋和干预行动一直在持续且危害极大。“台独”势力“倚美谋独”的全方位政治工程与外联行动一直在持续且危害极大，岛内蓝营在分化，统派力量遭受打压，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两岸和平发展、和平统一路线遭遇新的障碍。大陆不可能接受民进党提出的任何背离“九二共识”

的新论述，坚决抵制和惩治有关“两岸互不隶属”的“台独”性质言论和行动。在此条件下，ECFA 保持完整性及效力续期成为难题，两岸 20 余项经济民生领域协议的存续也成了难题。美西方干预台湾事务的有关立法和政策行动如切香肠般逐步逼近甚至突破底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加速，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战略行动有序展开。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的全球治理哲学与制度行动展示了中华文明特性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自信。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带来的必然是此次金门海域渔船事件中大陆涉台管治新常态的形成。

这显示了大陆“主场统一”的政策思路和执法策略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和执法力量作为支撑。国台办在针对性声明中明确否认了台湾方面作为执法依据的所谓“禁止、限制水域”，并坚定支持大陆海警的综合性海巡执法。国台办一方面断然否认台湾单方面划定的所谓“禁止、限制水域”，从主权法理上封杀了台湾执法权的源头合法性；另一方面明确肯定厦金海域属于两岸渔民传统渔场，两岸渔民合法权益由大陆执法力量保护。相比源头不合法及不负责任执法的台湾海巡部门，由大陆海警全面承担起厦金海域的海巡执法与保护责任，是杜绝此类冲突事件的最好制度安排，对两岸渔民都有利。但这样的新常态管治安排毕竟不是经由两岸协商确定的，而是大陆依据主权法理和反制必要性予以直接实施的，台湾当局在官方层面不可能予以认可。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有关两岸渔业作业协定及其互动规则，客观上需要新的协商和协议安排。然而，民进党当局否认“九二共识”并中断两岸各项协议协商进程，尤其以公权力全力封堵“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专题性协商，导致两岸之间的“两会机制”被严重削弱甚至边缘化，两岸治权冲突与管辖冲突无法获得制度化协商和解决。这是民进党敌意立场和“去中国化”的政治恶果，并导致了此次金门悲剧事件的发生。如果两岸之间不能建立行政权力的经常性协商沟通机制，类似的悲剧事件仍然难以彻底避免。“九二共识”正是建立此类协商沟通机制的最重要政治前提。

此次事件的进展显示了大陆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掌握从国际法理到主权法理上的话语权，显示了管辖行动的正当意志与力量，并得到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大多数国家的理解与支持。国台办进一步提出了要求台湾方面释放渔民、道歉赔偿、惩罚执法元凶等要求，并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进一步措施”可以不限于目前的海警覆盖性执法，而是可以进行刑事立案以及实施人员制裁，使台湾执法肇事者付出惨重代价，以儆效尤。大陆的反应绝对不是仅仅止于“谴责”，两岸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必须诉诸严格的主权法理、执法行动和保持沟通的协商理性，在涉台斗争中持续塑造新常态、新话语和新的互动规则。这就是在负责任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16]，也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两岸完全统一的大局利益。金门海域渔船事件是危中有机，大陆涉台管治新常态进一步形成，台湾当局的对抗性政策进一步受挫，外部干预的承诺和成效进一步暴露短板，两岸中国人之反思与互动进一步深化及展现积极面向。

四、刑事反“台独”的制度进展：从个案到司法解释

以刑事手段开展反“台独”斗争，特别是在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方面的刑法规制，近年经历了从个案到普遍司法解释的重要制度进展。个案以 2022 年 8 月的“杨智渊案”为代表，属于破冰式的刑事管辖，不仅宣示对台主权和管辖权，而且进行具体罪名和程序的日常化管辖，对“台

“独”势力形成重要震慑力和惩治性。普遍司法解释指 2024 年 6 月 21 日“两高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对“台独”顽固分子从事的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行为进行严密的刑事规制和惩罚，全面筑牢反“台独”法律斗争的制度屏障，最大限度为两岸完全统一扫清障碍。

（一）杨智渊案：刑事反“台独”的破冰案件

2022 年 8 月 3 日，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对台湾居民杨智渊采取刑事拘传强制措施，对其危害国家安全的有关嫌疑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和讯问。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定，办案机关于 8 月 4 日依法变更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由拘传转为指定住所监视居住，并于 8 月 5 日通知其家属。2023 年 4 月，杨智渊被依法批准逮捕。针对“台独”分子杨智渊的刑事诉讼程序正在开展，从大陆办案机关采取的有关强制措施以及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调查活动来看，符合刑事正当程序的基本原则和法治标准，是依法进行的惩治“台独”、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常司法活动。

从大陆刑事法律层面来看，对杨智渊采取有关强制措施并推进司法检控具有充足的法律依据，也符合刑事正当程序的法治标准。从管辖权来看，杨智渊是中国台湾地区居民，受中国刑法的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其所从事的“台独”分裂行为虽主要发生于台湾地区，但其危害结果波及大陆，有充分的管辖连接因素支持大陆办案机关的法律行动。从刑事实体法来看，《刑法》第 103 条明确规定了分裂国家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罪，可用于检控嫌疑人的有关犯罪行为。从目前披露的有关杨智渊的“台独”行为来看，完全达到触犯有关罪名的实施行为标准。其一，长期宣传“台独”，煽动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其二，成立非法组织“台湾民族党”并担任副主席，以政党平台从事岛内“台独”分裂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其三，鼓吹“公投建国”，支持和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走“急独”政治路线。大陆刑事司法程序奉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该案主要犯罪事实和证据正在调查整理之中，随着司法程序的展开，我们可以见证大陆刑事法治的规范性和惩罚的精准性。

从民进党习惯挑刺的刑事正当程序来看，该案已有司法程序完全经得起法治检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类案件的侦查机关和相应的司法程序。温州市国家安全局是有法定办案权限的刑事侦查机关，在掌握一定的犯罪证据和线索后可以依法采取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从已采取的强制措施来看，主要包括刑事拘传和监视居住。根据法律规定，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通常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办案机关根据案件调查和司法程序推进的需要依法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在本案中，办案机关首先采取拘传措施，对嫌疑人依法强制其到案接受讯问，并在拘传法定期限届满前依法变更为监视居住。在监视居住期间，嫌疑人不得离开指定住所，并需要被依法监视和限制人身自由，其目的在于确保嫌疑人配合刑事诉讼程序的推进，以及避免嫌疑人脱逃或对外串供。办案机关依法将嫌疑人有关司法情况通知其家属，而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嫌疑人可以申请获得法律帮助与辩护。这些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要素和标准符合法治原则，体现了大陆的法治进步和司法公正。民进党动辄政治化的指责毫无根据。

杨智渊案引起广泛关注，从法理和政治层面来看需注意如下方面。其一，该案属于首例以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名义展开刑事侦查的涉台案件，显示大陆办案机关在依法惩治“台独”层面的执法强化和突破。其二，杨智渊政治身份特殊，是民进党政治范畴的“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有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的行为表现，但又在大陆有一定的经商、交往活动，政治光谱驳杂，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显著。其三，该案刑事程序启动于佩洛西窜台之际，引起民进党当局关于大陆故意反制及“侵犯人权”的指责，触及两岸敏感的政治互动神经。其四，民进党当局长期对大陆政治体制和司法程序存在歧视性认知和误导性宣传，杨智渊案再次被其用于攻击大陆制度合法性。这就导致该案必然卷入两岸局势之中，成为司法与政治交织的敏感案件。

从中国法律体系的整体脉络来看，“台独”是受到严格的法律非难的，对“台独”行为进行法律惩治是正义的。其一，我国宪法规定了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统一是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这里的神圣性具有历史事实根据、文明文化正当性和法哲学上的基础规范性。“台独”是中华民族의公敌，也是宪法秩序的公敌。其二，在具体法律层面，《刑法》专辟“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刑事诉讼法》配置完整检控程序，《反分裂国家法》规定和平统一与非和平统一的辩证法律体系，《国家安全法》规定全体中国人维护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法律义务，这些法律元素存在内在法价值的共通性和相互协调的惩罚理性。“台独”在中国法上没有任何生存空间，必然遭到严厉惩治。其三，从大陆执法与司法的法治标准和规范性来看，刑事程序中已基本完成正当程序的规范建构、证据规则的确立、辩护制度的完善以及定罪量刑的科学化，对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人权有着明确的制度保障。

总之，杨智渊案是我国依法反“台独”、惩治“台独”分子并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的破冰案件，其司法程序正在依法展开。该案一方面可印证大陆法治进步与司法公正，另一方面可释放出依法严厉惩治“台独”的国家意志和法律行动能力，震慑和打击一切“台独”分子，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二）普遍司法解释：反“台独”的法治里程碑

对“台独”顽固分子的刑事处罚，大陆学界已有一定讨论^[17]，而在个案实践中已有发生，但还需契机进行普遍制度化。2024年6月21日，《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发布并实施，将“台独”分裂行为纳入国家刑事规制范围，对犯罪认定、诉讼程序、量刑指南等进行了细致规定。这是一份具有法治里程碑意义的司法解释文件，是具有直接法律约束力的操作性规范文件，标志着大陆对台管治进入了一种法治新常态。

从地缘政治和法治层面来看，对此事件可以有如下观察和分析要点：

第一，大陆对赖清德当局及“台独”本质认知已经锁定，综合性斗争态势基本形成。2024年台湾地区选举中，民进党赖清德当选，其就职演讲坐实“台独”本质，“两岸互不隶属”论挑战一个中国底线。本次司法解释可视为对赖清德“台独”行为的法律回应和严厉反制。

第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锚定“反台独、反干预、促统一”的完整逻辑链条，其中“反台独”是首要任务。反“独”促统是大陆对台长期方针政策，面对外部干预的危害性，近些年又凸显了“反干预”斗争。就在本次司法解释文件出台同时，外交部宣布了对美国军售企业及其高管的反制决定。“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都是两岸统一的敌人及障碍，本次司法解释重点针对“台独”分裂势力，关联威慑外部干预势力。勾结外部势力从事“台独”行为的，将受到从重处罚。

第三，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在对台斗争中的凸显和强化。大陆长年对台工作较为倚重政策调控和利益引导，在法律规制方面有一定欠缺。近些年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及涉外法治的理论与实践发展，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逐步成为主导。对台斗争需要争夺法理话语权和法律主动权，本次司法解释是这一转变的显著标志。

第四，罪名条款与刑罚配置的科学化和精准化。本次司法解释是以《刑法》中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的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作为解释对象，将“台独”行为纳入上述罪名范畴并列明具体罪状和构成要件。在对分裂国家罪的具体罪状化过程中，所谓“法理台独”“倚外谋独”“以武谋独”之类的典型“台独”行为均被纳入刑事规制范畴，基本堵死了“台独”行为的法律空间。在刑罚配置上，最高刑是死刑，这比对“港独”的法律规制更严。根据香港国安法与《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没有死刑，最高是无期徒刑，但“台独”行为最高刑罚是死刑。这显示出国家在法律立场上对“台独”行为的零容忍与严厉性，也警示了“台独”的特殊危害性。

第五，缺席审判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程序机制明确有力。本次司法解释的一个亮点是明确了对“台独”案件管辖程序上的缺席审判机制，这一点很关键。“台独”分子的犯罪活动大多在台湾岛内或国际空间进行，大陆刑事司法程序无法直接将其羁押和进行常规的庭审，但“台独”行为的危害性持续存在。本次解释文件将缺席审判机制引入，确保在事实证据确凿和法律规范清晰的条件下进行审理和判决。这对于“台独”分子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和惩戒性。解释文件还同时规定了“台独”案件立案后存在逃避侦查或审判情形时的终身追责机制，追诉程序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有关全球通缉令机制及其他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程序机制，可有效支撑大陆对“台独”行为的法律管辖。

第六，司法解释否定了“法理台独”包括“公投投票”形式的合法性，有效阻断了“台独”势力利用台湾自身“民主”与法制程序谋独的制度通道。统一还是独立，既是实力较量，也是法理博弈。本司法解释文件将改变台湾法律地位的所谓“立法”行为或“公民投票”行为归入“台独”行为加以惩治。赖清德在就职演讲中大谈特谈所谓“台湾民主，世界之光”，但忽视了台湾地区“民主”的宪制前提是“一个中国”，也忽视了从联合国第 2758 号决议到中国宪法关于台湾的“两个神圣”条款的规范约束力。台湾地区选举只是地方选举，不是主权国家的选举，不具有改变一个中国地位的正当权利。台湾地区选举不构成对赖清德推行“台独”的任何正当合法的授权。赖清德搞“台独”，本质上是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违宪行为。“公民投票”不可能构成“台独”的合法性基础，因为这种投票不能代替全体中国人民做出任何有关台湾法律地位改变的决定。当然，“法理台独”的风险仍然是存在的，此次司法解释文件充分意识到这点并加以明确规制，是一种积极反“台独”和运用日常法治程序打击“台独”的理性制度安排。

第七，司法解释凸显了中央对台湾事务的主权和直接管辖权，是“主场统一”逻辑和国家制度自信的直观体现。一个中国原则具有充分的国际法基础和宪法基础，为中央对台湾事务的直接管辖提供合法性依据。在今年初的金门海域渔船事件中，大陆对台有关海域实施直接管辖并登临检查有关船只和人员，就是管治新常态的体现。大陆对台湾地区有关海域和空域的巡航与管制也是基于同样的法理基础。从国家刑法的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来看，台湾地区和台湾居民适用中国法律统一管辖，台湾地区有关规定和治权事实不能对抗主权权威性和国家具体管辖制度。

第八，司法解释是对爱国统一力量的全力支持和两岸统一与和平稳定的强大制度保障。本次司法解释文件明确禁止对爱国统一力量的制度打压，这针对的就是民进党当局以所谓“安全五法”和“反渗透法”打击爱国统一力量的非法行为。民进党当局对爱国统一力量的打压就是在分裂国家，

就是在为“台独”准备条件，故本次司法解释将其纳入规制范围。有相关的法律做支撑和保护，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就有了底气和斗争的可持续动力。同时，本次司法解释将引导更多台湾民众看清“台独”本质，积极进行政治切割和斗争，有助于最大化地孤立“台独”势力。本次司法解释多个条款提及对悔改表现的司法宽宥，如第 15 条。这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富有政治智慧和法治理性。

总之，本次司法解释文件是依法反“台独”的制度里程碑，是大陆追求“主场统一”和运用法治方式掌控两岸关系主导权与主动权的积极表现。本次司法解释出台后，预期会有相关案例和司法审判，“台独”分子将面临政治前途和法律责任的严厉压制，两岸完全统一的进程将由此加速。至于外部干预势力，根本不具有法理正当性^[18]，且我国的涉外法治本身就具有针对外国干预制裁的法律安排，反干预斗争同样在路上。在本次司法解释开辟的反“独”促统的新战场上，国家的法治自信和追求完全统一的制度智慧将得到充分展现。

五、反制性制裁：反对西方干预台湾事务的涉外法律斗争

对于两岸完全统一的民族复兴终极目标而言，只有一手反“台独”，一手反干预，才能取得促进统一的最佳效果。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瞻远瞩、谋划周全，将反“台独”与反干预有机结合，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从涉台涉外法律斗争来看，依据《反外国制裁法》^[19]等法律规范对美西方支持“台独”的有关团体和个人进行反制性制裁，已成为我国较为成熟运用并具有一定威慑力的涉外法治机制。

美国对台军售的一再升级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精神，损害两岸和平统一根本利益和前途，制造两岸军事冲突风险，有着将台湾“乌克兰化”“准殖民地化”以及“以武拒统”的非法本质和严重的危害性。近年来，我国多次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规范对美国军售企业及其高管进行反制。2023 年 2 月 16 日，中国商务部宣布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 Corporation)、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Raytheon Missiles&Defense)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进行主动制裁。2024 年 5 月 22 日，中国外交部宣布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对洛克希德·马丁导弹与火控公司等 12 家美国军工企业以及 10 名企业高管进行反制性制裁。

这些被制裁的实体都是美国顶级军工企业，其政治、资本背景与能量巨大，但中国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进行主动制裁，显示了中国涉外法治在规范上的健全化和具体执法上的精准性。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是新时代中国法治体系建设的关键特征之一。中国对于外来干预和制裁依法作出正当反制，甚至施加主动性制裁，这是中国法治自主性的彰显，也是应对美西方干预中国内政的斗争新常态。

这些美国企业参与了对台军售，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安全。美国对台军售早已存在，1979 年《台湾关系法》有专门条文进行“授权和支持”。但那只是美国的国内法，中国从未承认其干预台湾事务的合法性，而是一直进行着斗争和批判。但既往的斗争主要限于外交层面，因实力差距而难以直接落实到制裁行动上。随着中美实力接近，中国对美国对台军售实施强力反制，宣布为非法行为，并采取直接制裁措施。此次针对性制裁还有一个直接背景，即美国“2024 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在对

台军售和武装台湾对抗统一方面登峰造极, 对中国核心利益造成前所未有的损害。制裁参与对台军售的主要美国企业, 是中国整体性反制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制裁相关美国企业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其一, 法律依据, 即《对外贸易法》《国家安全法》和《反外国制裁法》等。美国对台军售破坏了中美贸易关系的信任基础和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需要引入制裁作为反击措施。其二, 规章依据, 即《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的有关条款。这是中国商务部 2020 年制定的行政规章, 也可视为中国“阻断法案”的早期制度形式。2021 年, 商务部又推出了一部“阻断”规章即《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 二者均可适用于对外反制^[20]。

下面, 笔者结合《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中反制性制裁的具体机制解释我国反干预法律斗争的基本情况。就执行机制而言, 上述商务部通告给出的是“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 这是一种协调性联合执法机制。根据《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 4 条, 国家建立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参加的工作机制, 负责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组织实施。这种工作机制不是实体化、专责化的执法机构, 而是多部门合作的执行机制。未来进一步完善这一机制, 可探索专门机构化思路。就制裁措施落实而言, 通告指出的措施包括禁止进出口, 禁止新增投资, 禁止高管入境, 不批准或取消高管在中国境内工作许可、停留以及居留资格, 双倍罚款与加罚机制。这些制裁措施不是象征性的, 而是实质性的, 且时间线越长, 被制裁对象越痛苦、付出代价越大。这是由于前述两家美国企业存在庞大的全球产业链与业务生态, 以及军用、民用融合的利益链, 而上述制裁措施就是在剥离有关利益链, 使得被制裁对象丧失中国市场、中国合作伙伴以及中国可影响的海外合作利益。制裁措施中对高管的限制或禁止也是有影响的, 那些高管必须得自我审查留任现职与辞职的利害得失, 他们如若希望与中国发生业务关系就必须切割与这两家公司的关系。这会对两家的高级经理人群体的稳定性、服务连续性、潜在候选人才、企业管理质量等造成波动性影响, 同样是时间线越长, 影响越显著。

双倍罚款也是非常新颖的制裁措施。通告的计算标准是《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实施以来对台军售合同金额的两倍, 如不能按期缴纳罚款则要加重处罚。这里存在非常有威慑力的法律作用机制。其一, 罚款决定确立了这两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债务关系, 时间线越长, 债务越高, 未来偿债成本越高。其二, 中国主权管辖范围内涉及这两家企业的直接或间接财产、利益可作为扣押执行标的。其三, 中国可以要求与中国有司法互助协议的国家扣押这两家企业的有关资产并加以强制划拨执行。其四, 罚款决定给出了一个罚款总额递进增加的计算公式, 即军售合同金额+逾期处罚额。按此测算, 即便是这两家企业在规定期限内缴纳罚款, 也会是天文数字, 更别说长期拖延造成的未来巨额数字了。其五, 罚款是有效的制裁手段。美国常用它来打击其他国家优质企业。中国依法正当采取这一手段, 是法治行为上深思熟虑的选择。

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实施反制性制裁案件中的具体制裁措施也有多种形式。针对企业, 可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针对高管个人, 可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当然, 这些制裁决定的具体效果还需要跟进观察, 制裁决定机关也可以根据被制裁对象的后续行为追加更严厉的制裁项目。

总之, 制裁与反制的法律行为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国内法治原理和范畴, 也不是通常的国际法救济方式, 而是演变为国家间的综合实力对比, 其中市场的总体力量是国家实力的关键支柱。在这里, 市场与国家不是对立的, 而是完美结合的。国家的制裁或反制利用了国内市场的实力和惩罚能力。

作为世界级大国，中美两国的市场都不是纯粹的国内市场，而是深度嵌入并带动世界市场的“超级市场”。其溢出主权范围的超强影响力和趋势影响力，是有关制裁或反制之法律执行力的真正基础。为了使得中国的反制性制裁措施在法律执行意义上更加强大有效，就必须进一步做大做强中国市场和中国技术标准，并深度开拓海外市场和海外利益控制网络。对国内外市场的影响和塑造能力越强，国家的涉外法治斗争力量就越强。当然，中国一切涉外法治斗争的根本目的不是模仿美国霸权，而恰恰是为了反霸权，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人类和平发展的根本利益。

六、法理根基的深化：“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制度塑造

2024 年 4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马英九一行时，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角度深刻阐述了两岸和平统一的民族维度与民族交融思想，提出了推进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四个坚定”重要论述，即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1]。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是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框架内进行的观念与政策的创新论述，拓展深化了“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提出这一共识的核心是“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有共同的认知”。这就将“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纳入了“九二共识”范畴，为两岸中国人凝聚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推进和平统一提供更为宽厚的政治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次重要讲话还提出了中华文化、中国式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系列观念与目标在两岸和平统一进程中的认同与行动意义。这次重要讲话可视为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完全统一问题上进行的最新和最深刻的理论思考和政策构想。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台湾同胞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台湾在区域和族群意义上始终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从岛内认同实际来看，“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纽带更为扎实和广泛，既可从中充分挖掘两岸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认同资源，也可对“两岸同属一中”的政治认同提供民族认同的深层支持和加持。

这次会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实践的里程碑事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发展的新契机与新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会见中以“中华民族”为最主要关键词，以“五个共同”为理论根据，以“四个坚定”^[22]为实践指南，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探索与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政治论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指明了理论方向和实践路径，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的新发展和新增量，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第一，两岸关系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具有关键地位。台湾问题在宪法上是内战延续、反“台独”与国家建构问题，在国际法上是一个中国代表权与反对外来干预的主权建设问题，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文明、两条道路最激烈竞争博弈的世界体系斗争问题。美西方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制度上分隔两岸，以“民主”与“威权”的二元对立从精神上分割两岸，不仅是从主权意义上挑战一个中国，也是从民族意义上分裂中华民族共同体。美西方无节制武装台湾，推动台湾“主权化”和“国际化”，试图将台湾“乌克兰化”，埋下中华民族分裂风险。如两岸不能统一，民族复兴就不能闭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不能自成体系和定型成熟。以最充分的中

华文明力量解决台湾问题，以最智慧的实践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关键检验，也是对中西文明竞争的最有力回应。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一国”之最深刻基础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岸同胞都盼望家园和平安宁、家人和谐相处，为此就必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关键是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核心是对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有共同的认知。”^[21]这里的共同认知，就是对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认知。如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框架和实践优势精准锚定两岸关系，结构性提升对台工作的理论话语权和实践主导权，成为新时代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重大课题。

第二，“五个共同”指明了“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理论根据和共同性基础。“台独”分裂势力长期奉行“去中国化”政策，炮制台湾“本土主义”意识形态与“本土民族论”，滥用“想象共同体”的西方民族理论，割裂台湾同胞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血肉联系，为“政治台独”“法理台独”制造理论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重要讲话中将中华民族 5000 多年历史与台湾开发史、两岸同胞爱国统一史紧密结合起来，指出：“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漫长历史，记载着历代先民迁居台湾、繁衍生息，记载着两岸同胞共御外侮、光复台湾。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书写了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历史，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实。”^[21]这是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历史角度论证两岸同胞同文同种，并在漫长历史中共同奋斗及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概括性提出了“五个共同”作为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根据，即“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21]。这里对共同性的论证凸显了共同的血缘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责任认同和前景认同，凸显了两岸同胞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续性认同，奠定了共同性基础。“血脉”与“文化”指向“同文同种”，“历史”指向两岸同胞互动一体的长期经验事实，“责任”和“期盼”指向两岸同胞的共同政治伦理和共同发展利益。“五个共同”具有铸牢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本体论属性，是“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规范性根基，是任何“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无法从理论和政治上反对并拆解的。其中的“更重要”凸显了当代的两岸同胞对共同责任与共同期盼的自觉，亦即对两岸和平统一与民族复兴的自觉。

第三，“四个坚定”提出了铸牢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路径。在“五个共同”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岸同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实现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具体路径是“四个坚定”。其一，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这里的“家园”意识及其政治存在指向了一个中国与中华民族，在实践上要求开展反“台独”、反干预斗争及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促进行动，在具体方法上以认同一个中国、中华民族为前提开展交流协商，寻求统一共识，积极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实际行动实现“守护”的责任和承诺。其二，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民本主义和民生主义是两岸共同的文化与政治传统，是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性与优势。“绵长”指向了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普惠分享，“共创”指向了共同奋斗与共同实践。两岸不能陷入冷战，更不能陷入热战，而应当共同作为民族复兴的建设者并共同分享建设成果。大陆惠台政策、融合发展政策及有关两岸统一后台湾同胞更优福祉的承诺是真实可信的，也是从心理、治理和利益上铸牢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其三，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岸同胞在历史上模范实践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共同建设了祖国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共

同培育了民族精神。两岸同胞之间有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经验和共同记忆，有着以中华文化为强大纽带的信仰基础和心理认同基础。在共同反对“台独”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以及从理论上与实践上反击各种分离主义思潮和行动过程中，两岸进一步开展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及共同传承守护中华文化，本身既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一环，又构成巩固深化两岸和平统一精神基础的最有力实践。其四，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具有政治上的强关联，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的全面现代化。将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从制度、政策上广泛纳入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使两岸同胞接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进程，在共同奋斗中巩固提升对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更强认同与凝聚力，这本身就是从结构上、力量上凝聚两岸人民共识及夯实国家统一的政治基础。

第四，两岸共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面向打破新冷战与地缘冲突困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两岸同胞的心智和力量^[23]。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演进与中美体系性斗争博弈复杂波动条件下，立足国家统一与区域和平发展大局，作出的战略思考和理论阐述。两岸关系发展前途的根本点在于两岸之间是否能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否能够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供稳固的“一国”根基以及“爱国爱台”的主体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在向两岸同胞乃至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发出两岸共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实现和平统一的最新倡议。这一倡议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运用于两岸关系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鲜明体现，也是这一理论实现对中华文明内部之草原文明、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全覆盖与有机整合的鲜明体现。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台湾同胞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组成部分对台湾发展、中华民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贡献，并呼吁台湾同胞继续作出新的贡献。

七、结语：两岸统一是中国法治文明的关键篇章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中华民族，这是两岸完全统一的坚固历史基础、法理基础和民族基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文明性，在此基础上凝聚壮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于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有着内在信仰和坚定的政治追求。宪法序言中关于台湾地位和国家统一义务的“两个神圣”条款，表明国家大一统是具有历史和民族神圣性的宪法义务，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政治责任。中国共产党代表承担了这一伟大的使命与责任，致力于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国家完全统一。

从涉台涉外法律斗争来看，对台主权管辖与反“台独”司法解释均属于针对台湾区域、同胞的依法保护以及对于分裂国家、谋求独立势力的精准惩治，二者共同服务于两岸完全统一的大局和大业。从涉台法律基础来看，我国不仅有国际法上联合国第 2758 号决议的清晰确认和国际法律支持，更有中国宪法提供的根本法规定，还有《反分裂国家法》对两岸统一之和平方式与非和平方式的辩证性框架规定，更有《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规范提供的反干预执法依据，以及本次司法解释提供的专门针对“台独”顽固分子的刑事法律规制。从我国法律体系构成来看，涉台涉外法律规范是中国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反“独”促统进程中不断丰富发展的一类专门规范，也是全

田飞龙. 反“独”促统的涉台涉外法律斗争: 动态、制度与前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82-97.

面依法治国时代中国法治文明的关键篇章。两岸完全统一进程从政策主导型路径向法治主导型路径的转化与发展, 以及政策与法律更有效的协调, 展现了中央对台整体工作方针与治理模式的政治成熟以及具体规制技术的理性进步。

参考文献:

- [1] 黄进. 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2 (12): 84-95+200-201.
- [2] 杨德明. 完善涉台法律规范体系 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J]. 统一论坛, 2016 (5): 4-6.
- [3] 樊巍. 福建海警厦金海域释放强烈信号 [N]. 环球时报, 2024-02-26 (10).
- [4] 田飞龙. “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的法理阐释及其实践意义 [J]. 中国评论, 2024 (6): 41-49.
- [5] 关于对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2024 年 5 月 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令第 7 号公布, 自 2024 年 5 月 22 日起施行) [EB/OL]. (2024-05-22) [2024-07-04]. https://www.mfa.gov.cn/web/wjbxw_new/202405/t20240522_11309756.shtml.
- [6] 饶戈平. 联合国大会 2758 号决议与一个中国原则——兼评葛来仪报告 [J]. 台湾研究, 2023 (2): 1-11.
- [7] 倪永杰. 解读 2024 台湾选举: 决胜因素、政治新结构、台湾新民意及台海新态势 [J]. 台海研究, 2024 (1): 1-9.
- [8] 高杨. 揭开赖清德假和平真“台独”面具 [N]. 人民政协报, 2024-05-22 (8).
- [9] 周文星. “以文谋独”?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台湾当局对美游说新形态 [J]. 统一论坛, 2022 (2): 33-35.
- [10] 赵成斐. 对“民主”与“威权”话语叙事的认知及评判——以民主峰会的议题为例 [J].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 44-56.
- [11] 李细珠. “台独”史观平议 [J]. 台湾历史研究, 2023 (1): 1-23.
- [12] 田飞龙. 一国两制 [G] // 俞可平. 政治通鉴: 第 5 卷.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4: 469-471.
- [13] 鞠海涛. 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J]. 两岸关系, 2019 (5): 14-16.
- [14] 叶正国. 国家统一进程中实际管辖的法律建构——一种方法论的视角 [J]. 台湾研究, 2020 (3): 43-50.
- [15] 李立.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助力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J]. 统一论坛, 2023 (6): 45-50.
- [16] 李鹏, 王梦诗.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之系统观念解析 [J]. 台湾研究集刊, 2023 (4): 1-12.
- [17] 彭莉, 姜韬林. 论“台独”分裂活动的刑法惩治 [J]. 台湾研究集刊, 2023 (4): 13-27.
- [18] 林冈, 周文星. 美国国会涉台立法的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 [J]. 美国研究, 2020 (3): 35-51.
- [19] 赵德铭, 周文桐, 金挺峰. 《反外国制裁法》述评 [J]. 国际经济法学刊, 2022 (1): 1-14.
- [20] 沈伟.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法律战——从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到阻断办法 [J]. 比较法研究, 2021 (1): 180-200.
- [21] 习近平会见马英九一行 王沪宁蔡奇等参加会见 [N]. 人民日报, 2024-04-11 (1).
- [22] 钟厚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的“四个坚定”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101-113.
- [23] 本书编写组.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民族出版社, 2024: 365-367.

责任编辑: 林华山



2016 年以来中央政府反“台独”政策的 进展、挑战及影响

张建 常帅兵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200233）

摘要：2016 年蔡英文上台以来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制度化沟通和协商谈判机制中断，两岸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针对这种变化，中央政府反“台独”工作出现了新的进展：在政治层面相继出台多个反“台独”文件并发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军事上形成了对台军事政治高压态势；外交上强化联合国 2758 号决议的作用，限缩台湾地区的所谓“国际空间”，同时推进中美共管“台独”；经济上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同时采取措施对“台独”分子进行经济制裁；人文层面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中央反“台独”工作仍然面临民进党长期当政、岛内社会认同变化与外部势力持续干涉的严峻挑战。中央反“台独”政策显示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国家主权的鲜明态度，促进反“台独”、反分裂的态势向有利于大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社会巩固了一个中国格局。未来进一步排除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政治阻力，中央需要从自身实力、对台政策和国际叙事三个方面继续发力。

关键词：中央政府；国家统一；反“台独”；一个中国；“九二共识”；民进党当局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4-0098-19

2024 年 6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4.04.009

作者简介：张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政党与政治研究中心秘书长、复旦大学统战研究基地研究员，厦门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研究员；常帅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研究”（23ZDA120）

引用格式：张建，常帅兵. 2016 年以来中央政府反“台独”政策的进展、挑战及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98-116.

张建, 常帅兵. 2016年以来中央政府反“台独”政策的进展、挑战及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98-116.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发布施行, 显示中国政府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惩治, 表明中央政府反“台独”的坚定立场。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以来,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及其核心意涵, 对两岸关系的提法不断修正, 给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蒙上了阴影。2024年5月, 自称为“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上台, 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此背景下, 中央政府大力反“台独”, 特别是依法惩“独”, 维护国家统一。中央出台这项依法打击“台独”分裂、推进国家统一进程的战略举措, 进一步充实了反“台独”、反干涉法律工具箱, 回应了最大多数两岸民众的诉求与期盼, 彰显了捍卫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

回顾以往的文献发现, 有学者对蔡英文上台以来两岸关系发展的趋势进行分析, 认为马英九推行的两岸和平与和解路线因国民党的下台而遭到抛弃, 民进党当政后加速推动“去中国化”教育, 台湾媒体的绿化倾向进一步加剧^[1]。有学者认为, 蔡英文两岸政策的实施导致从“暗独”走向“明独”, 从“缓独”走向“急独”, 从“冷对抗”走向“热对抗”, 全面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严重破坏了两岸关系^[2]。鉴于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赖清德当选, 学者们对赖清德的台海政策也及时进行了分析。有学者特别指出, “台独”行径在台湾岛内外存续了数十年, “台独”理论的构建工作已经基本完备, 赖清德对“台独”理论创新的空间并不大, 其主要操弄将放在“台独”论述落地方面, 进一步将“台独”论述和理念渗透到“制度、经济、教育文化(意识形态和认同)”等方面, 建构所谓“台湾国族”, 企图使台湾彻底摆脱“中华民族共同体”, 将所谓“台湾共和国”实质化^[3]。对于反“台独”工作, 学者们也进行了研究分析。有学者从国家统一话语叙事的角度切入, 认为中国要掌握国家统一进程中反“独”促统话语叙事构建的主导权和主动权, 塑造“以我为主”的国际传播态势^[4]。还有学者将“一国两制”台湾模式作为推动两岸政治统合的重点, 认为“一国两制”台湾模式具有动态与包容、务实灵活以及坚持和平发展等理论特点^[5]。也有学者认为, 政治认同的分歧始终影响和制约着两岸政治互信的建立与巩固, 需要重构新的两岸政治认同, 建立两岸政治互信, 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和平统一的进程^[6]。还有学者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台独”的重要论述, 归纳出六个未来聚焦点: 政治上对“台独”势力持续施压、持续增强外交封锁、增强经济向心力、做好港澳治理、提升国防力量、加强民间往来^[7]。

综合来看, 目前学界对于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来中央反“台独”政策新进展的系统性总结较少, 对于当前反“台独”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和影响的分析不足。鉴于此, 本文对2016年以来中央政府反“台独”政策的进展、挑战及影响进行系统探究, 以期为应对未来一段时期民进党持续当政带来的台海风险、推进祖国统一事业提供参考。

一、反“台独”的进展

自2016年5月坚持“台独”立场的民进党上台, 并于2020年和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连续胜出,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受到严峻挑战。面对这种形势, 中央反“台独”工作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人文层面都出现了一些新进展。中央对台工作体现出了“反独”与“促统”相结合的特点, 具有政策延续性、措施具体性和对象明确性。中央反“台独”工作的布局继续向多重维度、多个领域、多个方面扩展。

（一）政治层面：出台多个反“台独”文件，发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其一，中央出台文件阐释反“台独”主张，党的二十大把反“台独”写入党章。蔡英文上台后，由于其持续实行“台独”政策，中央在《反国家分裂法》以及《国家安全法》一系列刚性法律文件和政策基础之上，陆续出台了阐释反“台独”主张的文件，进一步加强对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打压。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坚决反对“台独”的宣示相对党的十八大报告有所升级，除了连续使用“绝不容忍”“必将遭到”和“绝不允许”等词汇外，还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三个任何”升级为“六个任何”，即“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8]，给“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划出了明确的底线和“红线”。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还突出提到“九二共识”。在蔡英文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背景下，这是一个向对岸释放的坚定信号，意在告诉民进党“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一个中国原则，试图否定“九二共识”和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就不可能被大陆接受。

2020 年蔡英文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再次连选连任后，中央加大了反“台独”的力度。2022 年 8 月佩洛西窜台，随后中央发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该白皮书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完全统一”定义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明确中国大陆的发展进步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指出“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后保留手段”^[9]。该白皮书在提及“两制”台湾方案时还指出，“在两岸同胞共同致力实现和平统一的过程中，‘两制’台湾方案的空间和内涵将得到充分展现”。这意味着“两制”台湾方案的空间和内涵可以在两岸民主协商过程中共同探讨，加以充实和填补，给台湾方面留有极大的参与空间。可见，该白皮书不但凸显出新时代反“独”促统的任务，而且从台湾的发展空间、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等方面，描绘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统一后台湾更美好的前景，体现出党和政府始终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上考虑台湾问题。如此种种均体现了大陆希望两岸同胞共同探索实施“两制”台湾方案，发展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不变初心。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在总纲部分加入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10]。此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反“台独”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重要内容，还将极少数“台独”分子与广大台湾同胞作了明确区分，指出“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11]。

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将反对“台独”写入党章，还是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台独”相关论述的调整，抑或是发表新版台湾问题白皮书，这些都意味着党和国家在推进国家统一进程中，把反“台独”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和指标。特别是 2024 年 6 月，“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12]，明确规定了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的具体适用情形和条件，对犯罪认定标准、追责程序规范等均作出了详细规定；对“首要分子”“罪行重大”“积极参加”等关键角色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清晰界定；同时作出对犯罪首要分子、对外勾连者从重处罚，以及对相关犯罪分子依法终身追责、缺席审判的规定。这些细则为公安机关依法打击实施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行为的“台独”顽固分子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武器，在准确认定犯罪、正确适用程序等方面提供了更精准的指导。该《意见》也标志着对“台独”顽固分子惩治手段的变化，即开始运用刑事司法手段追究“台独”顽固分子的犯罪责任。凡此种种表明了中国共

张建，常帅兵. 2016年以来中央政府反“台独”政策的进展、挑战及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98-116.

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对台政策和国家统一政策上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有其符合新时代基本特征的与时俱进之处。

其二，中央发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粉碎各种形式的谋“独”挑衅。蔡英文上台后，纵容、操纵岛内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挑衅大陆，恶意制造两岸对立，勾连外部势力分裂国家。这不仅严重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更严重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彰显反对“台独”分裂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意志，中央针对“台独”挑衅强化制裁措施。2020年11月，国台办发言人向外界释放了正拟定“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信息，宣告要对那些被列入其中的涉“独”言论嚣张、谋“独”行径恶劣的分裂势力成员，包括在岛内外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活动的首要分子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依法予以严惩。2021年11月5日，国台办再次明确指出，大陆方面将依法对清单在列的苏贞昌、游锡堃、吴钊燮等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戒。2022年8月16日，国台办宣布新的“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并禁止其本人及家属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限制其关联机构与大陆有关组织、个人进行合作，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在大陆谋利，以及采取其他必要的惩戒措施，依法终身追责^[13]。国台办对“台独”顽固分子和宣扬“台独”的组织进行制裁和惩戒，清晰有力地表明了在台湾问题上寸步不让的态度以及坚决反对“台独”、反对美台勾结的立场^[14]。

表1 “台独”顽固分子清单

姓名	时间	时任职务
吴钊燮	2021年5月	台湾地区外事部门负责人
苏贞昌	2021年11月	台湾地区行政部门负责人
游锡堃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负责人
萧美琴		民进党当局所谓“驻美代表”
顾立雄	2022年8月	台湾地区“安全会议”秘书长
蔡其昌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负责人
柯建铭		民进党“立委”
林飞帆		民进党副秘书长
陈椒华		时代力量“主席”
王定宇		民进党“立委”

注：表格根据相关材料自制

（二）军事层面：形成对台军事政治高压态势，解放军提升在台海拒止能力

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企图“以武拒统”对抗大陆，打压岛内的统派势力和主张与大陆交流的团体和人士，有意升高台海紧张局势。在此背景下，中央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同时采取了必要的反制措施。对台持续的政治与军事高压态势，特别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干涉台海事务的外国势力进行的军事演练，及在台海空域和海域进行的军机军舰绕台行动，显示出遏制“台独”力度前所未有的。

解放军于2016年开启了绕台行动，201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架战机自1999年来首次跨越所谓

“海峡中线”。2022 年 8 月 2 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中国人民解放军于 8 月 4 至 7 日在多个海域和空域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弹射击。与此同时，东部战区迅速开始组织共 27 架次军机，正式穿越所谓“海峡中线”，并取消中美气候变化商谈、禁毒合作、国防部工作会晤等八项双边合作^[15]，解放军在台湾岛周边的巡航力度也进一步加大。根据岛内有关方面的统计，2022 年解放军军机在台海周边的出现频率比 2021 年翻了一倍，达到 1 727 架次；在海上，仅 8 月到 12 月，解放军军舰就在台湾岛周边出现了 660 余次。

2023 年解放军更是两度举行环台军事演练。针对蔡英文“倚美谋独”式的窜美并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解放军于 4 月 5 至 7 日开展“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16]，4 月 8 至 10 日又开展了“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17]。2023 年 8 月 17 日，赖清德“过境”美国，解放军于 8 月 24 至 25 日采取海空联合战备警巡演练。2024 年台湾地区选举结束后，台湾地区防务部门表示，自 1 月 17 日开始，大陆共有 24 架次军机和 5 艘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据台湾地区防务部门透露，这是今年岛内选举结束后，解放军军机绕台数量最多的一次。

目前，中国大陆凭借航母、战机等先进装备已经在台海构建起了有效的拒止机制，而且解放军还多次出动军机、军舰，在台海周边进行绕飞等演训活动。这表明，中央在各方面做了充足准备以应对挑战，“工具箱”里包含军事手段等诸多选项，遏制各种谋“独”挑衅和外部势力干涉的能力不断增强。

（三）外交层面：在国际社会阐释一个中国的内涵，中美共管“台独”达成一定共识

其一，强化联合国 2758 号决议的作用，限缩台湾地区的所谓“国际空间”。蔡英文当局的“对外关系”中无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是围绕“台独”这个总目标。其一方面试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边一国”的舆论；另一方面，通过“金援外交”等手段巩固所谓“邦交国”，以营造台湾是所谓“独立国家”的假象。对此，中央一面阐释联合国 2758 号决议的真正意涵，在国际社会“拨乱反正”；一面凭借自身发展带来的巨大吸引力，下架台湾当局的所谓“邦交国”。

在国际社会，民进党当局直接声称 2758 号决议“没有决定台湾代表权”^[18]，宣称台湾绝不接受大陆单方设定的政治前提及两岸终局^[19]。对此，中央不断强化联合国 2758 号决议的作用，国台办和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在记者发布会上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法文件进行阐释，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台湾领土及主权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经归还中国。以 2022 年发表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为例，书中进一步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和现状，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新时代推进实现祖国统一的立场和政策。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庆祝解放军建军 96 周年活动期间，中国驻美国使馆国防武官刘展少将发表演讲，强调台海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针对任何国家将台岛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图谋，解放军将毫不迟疑地出手^[20]。当天出席招待会的人士有美国军官、各国驻美使团、社会各界人士等 300 余人，中国以这样的方式表明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的态度可谓前所未有。

在台湾地区所谓“国际空间”问题上，鉴于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中央不可能对台湾当局所谓“拓展国际空间”企图作出让步。因此，中央坚定依照一个中国原则、中国法律与相关国际法准则，要求跨国公司或机构处理台湾地区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地位或不当规范用语问题，更改

张建, 常帅兵. 2016 年以来中央政府反“台独”政策的进展、挑战及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98-116.

将台湾地区“列入国家行列或等同国家”的做法。2016 年以来, 台湾地区的“国际能见度”越来越低: 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缔约方会议、国际刑警组织大会, 纷纷拒绝台湾地区参与其中; 在中国民用航空局致函多家外国航空公司, 要求纠正将台湾地区“列入国家行列”的错误做法后, 44 家外国航空公司相继将网页上的“台湾”改为“台北”。另外, 在中国大陆民间监督举报与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 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西班牙时尚品牌 ZARA、美国医疗集团美敦力 (Medtronic) 等跨国企业纠正错误表述, 将台湾的标注改为“中国台湾”^[21]。这些行动使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得以巩固, 中央进一步掌握了实现中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主动。

其二, 中国以自身发展带来的红利惠及其他国家, 下架台湾地区所谓“邦交国”。大多数与台湾地区有所谓“邦交关系”的国家都是经济状况不佳甚至极度贫穷的国家。长期以来, 这些国家除了借着所谓“邦交”获取台湾当局送来的资金外, 还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和控制。这也让部分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得不跟台湾当局保持所谓“邦交关系”。随着中国对部分国家的投资和经贸合作的拓展和近几年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下降, 蔡英文当政时期台湾地区已经与 10 个所谓“邦交国”“断交”。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的第三天, 太平洋岛国瑙鲁就宣布与台湾当局“断交”, 这让台湾当局的“邦交国”数量减少到了 12 个, 再次刷新了历史最低纪录。多个国家与中国复交再次充分说明,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持续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 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日趋巩固。

其三, 中美共同管控“台独”达成一定共识, 台湾民进党当局谋“独”诉求面临限制。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挑衅行径, 中国政府及时提出严重警告和强烈抗议, 采取了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等反制措施, 并对参与售武的雷神技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海耶斯、波音防务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尔伯特等人实施制裁。历史经验也表明, “台独”势力引起的台海紧张局势不符合美国战略利益, 面对陈水扁当局的一系列“台独”行径, 中美曾共同管控“台独”, 小布什总统称陈水扁为“麻烦制造者” (trouble maker)^[22]。2016 年民进党再度上台, 为防止民进党当局走向“急独”的道路, 给美国涉台利益带来风险, 中美在管控“台独”上达成一定的共识。

2021 年底中美元首举行视频会晤时, 双方各自重申了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中方除了既有立场宣示外, 还强调三项重点: 第一, 停止武装台湾; 第二,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第三, 中国终将统一^[23]。美方则重申不支持“台湾独立”, 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以拜登和白宫的说法来看, 美方持续保持“战略模糊”以维持它最大利益, 美国反对台海任何一方改变现状也意味着反对台湾当局“谋独”。比如, 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 (Kurt Campbell) 就说过: “拜登政府不支持‘台独’, ‘台独’会造成战争, 这是中国大陆的底线, 美国非常清楚这一点。”^[24] 2022 年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前, 拜登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 他希望让中美双方都能了解对方的“红线”。习近平主席在会晤时作为回应再次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25]。会晤后, 拜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其相信没有必要出现新的冷战, 同时不认为中国近期有任何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这一回答呼应了当时美国情报机构炒作中国加剧台海紧张一事, 有助于缓解佩洛西窜台之后日益紧张的海台局势。2023 年初“气球事件”爆发, 布林

肯访华被取消，但中美双方继续保持互动：6 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7 月美国财长耶伦访华，8 月雷蒙多访华并成立两个中美对话组，9 月王毅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晤等。经过一系列互动、交流，“气球事件”发生以来的两国紧张关系有所纾解。2023 年底，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时，拜登再次表态“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次会晤还就恢复两军沟通交流达成共识，随后中美军方高层时隔一年多来首次通话，为中美之间未来重启更多军事交流机制打下基础。

此外，在中国的警告下，美国白宫还对国会的涉台行动进行限制，以防止国会的涉台行动威胁台海局势稳定。2022 年佩洛西窜台引发中方反制后，白宫施压国会低调处理了所谓《台湾政策法案》。2023 年 4 月，美国低调处理蔡英文“过境”，将与众议长麦卡锡会面地址选择在洛杉矶近郊的罗德·里根总统图书馆，让蔡英文在美国停留期间基本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麦卡锡声明立法者并没有试图改变美国与北京保持官方关系以及与台北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模式^[26]。8 月赖清德“过境”美国期间，国会没有安排议员与其见面。2023 年下半年，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arles Ellis Schumer）率领的美国两党国会代表团访华，这是自 2019 年以来美国议员首次进行此类访问。

2024 年初，美国在台湾地区选举后隔天就派出跨党派代表团窜访台湾，但拜登在台湾地区选举后第一时间重申了不支持“台独”。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和东亚事务高级主任韦德宁（Dennis Wilder）分析称，拜登政府目前在乌克兰和中东面对动荡局势，美国不希望再出现另一场危机^[27]。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举行会晤时表示，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是“台独”，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也是“台独”，同时敦促美方将不支持“台独”承诺落实到行动上，支持中国和平统一^[28]。这次会晤中，双方的表述虽有差异，但整体评价都相对积极，显示出中美关系中缓和的一面和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共同管控分歧的一面。可以看到，拜登政府认识到对华进行无底线式挑衅非但不能令中国“屈服”，反而可能引发冲突，从而给自身带来无法承受的代价，导致国内有关势力不满，且不利于维持与盟友在对华方面的立场。因此，美国将避免冲突作为对华竞争的行为边界，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收敛，减少一些激进的对台支持，防止因激烈竞争带来灾难性后果。

（四）经济层面：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对“台独”分子进行经济制裁

其一，推动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出台为台胞台企创造更多就业创业机会的新措施。蔡英文上台以来在经济层面谋求与大陆脱钩断链。针对蔡英文当局经济上的谋“独”图谋，大陆一方面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对“台独”分子实施经济制裁。2018 年 2 月 28 日，大陆推出《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惠台 31 条”），包括在投资和经济合作领域加快给予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的 12 条措施，和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的 19 条措施^[29]。继“惠台 31 条”后，大陆又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26 条措施”），应对疫情统筹做好支持台资企业发展和推进台资项目有关工作的“11 条措施”，《关于支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简称“农林 22 条措施”）等一系列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文件，使大陆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体系更加完善^[30]。2023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31]正式发布，中央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这为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打开了新的大门，也标志着和平统一迈出重要一步。尽管在民进党

张建，常帅兵. 2016年以来中央政府反“台独”政策的进展、挑战及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98-116.

2016年5月上台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遭到严重削弱，新冠疫情的冲击导致两岸投资和人员往来受到严重影响，但两岸经贸依然保持了强劲的逆势增长。从数据上看，仅2023年两岸贸易额就达到了2678.36亿美元，保持高位运行，大陆稳居台湾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2023年1至11月，大陆新批准台资项目（含经第三地转投资）6936个，同比增长26.8%，实际利用台资金额26.9亿美元，同比增长39.9%^[32]。两岸产业合作不断深化，产供应链稳定，台商投资结构优化，台商台企在大陆持续发展的信心更加坚定（表2）。大陆通过凝聚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并通过不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的方式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新思路，是实现“两岸一家亲”“两岸命运共同体”“两岸心灵契合”的重要途径，为两岸关系由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注入了新动力。

表2 台商投资大陆项目

年份	台商投资大陆项目数 (含经第三地转投资)	年份	台商投资大陆项目数 (含经第三地转投资)
2016年	3 517个	2020年	5 105个
2017年	3 464个	2021年	6 595个
2018年	4 911个	2022年	5 470个
2019年	5 252个	2023年	6 936个

注：作者根据相关材料自制

其二，采取中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部分产品关税减让措施，要求台湾民进党当局取消贸易壁垒。除了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以外，中央政府还针对“台独”分裂势力展开经济制裁。针对在大陆违规经营并为“台独”顽固分子撑腰张目的台资企业，大陆方面进行了处罚。台湾远东集团是台湾地区政治献金的大户，2016年苏贞昌及其女儿参选的政治献金中就包含远东集团提供的200万新台币，在2020年选举中该企业还曾为47名蓝绿民意代表参选人提供资金支持。2021年11月22日，上海、湖北等省市执法部门开展执法检查，发现台湾远东集团在当地投资的化纤纺织、土地利用、税务等方面都存在违法行为，对其处以罚款及追缴税款约4.74亿元人民币。2023年12月21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大陆决定中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从2024年1月1日起，对于原产于台湾地区的丙烯等共计12个税目进口产品，中止使用ECFA的协定税率^[33]。同时，公告还对台湾当局提出明确要求，希望他们采取有效措施，立即取消对大陆设置的贸易限制。在大陆促进两岸经济融合与针对“台独”进行经济制裁的背景下，当两岸融合“磁吸效应”大于民进党相关政策所产生的“寒蝉效应”时，民进党的两岸论述话语权将陷入“自我边缘化”困境。

（五）人文层面：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其一，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大陆与台湾保持一定官方交往。由于蔡英文当局不断采取限缩两岸交流的措施，2016年以来两岸民间交往不断降温，但中央政府仍然努力推动两岸人文社会交流。针对民进党在台湾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全面“去中国化”行径，国台办发言人一再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去中国化”行径都无法割裂两岸的历史和文化连结。在批驳民进党“台独”言论的

同时，大陆积极推动两岸官方往来。“双城论坛”自 2010 年开始，已连续举办 11 年，由上海、台北两市轮流举办，已成为上海与台北两市之间重要的机制化交流平台。2022 年，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受邀参加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并在北京参加第二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自 2022 年 8 月以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几次率团赴大陆沟通交流，向大陆各界反映台湾基层农渔民和中小企业希望两岸交流合作、平等互惠的心声，获得大陆方面积极正面回应。2023 年，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赴大陆交流与祭祖，先后访问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上海等多个城市，并带领马英九基金会“大九学堂”的青年学生们，参访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重要历史遗迹，与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及复旦大学的学生进行交流。保持两岸官方交流，是促进两岸民间相互认同、相互理解、相互情感交流非常重要的方面。两岸官方交流能够避免政治上的对立，由岛内统派力量带动两岸民间认同增强和两岸的情感提升。

其二，大陆以更加积极姿态全面推动各项惠台举措落实落细，为广大来大陆发展的台胞施展才华和实现人生理想抱负提供广阔舞台。大陆积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对台工作会议强调要逐步恢复扩大两岸交流，同台湾各阶层人士交朋友，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34]。在具体政策上，海峡论坛、世界妈祖文化论坛等活动持续举行，2016 年以来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数量不断增加。2023 年 2 月 1 日，大陆航空主管部门通过两会协议联系渠道促请台方恢复两岸直航航点，优先恢复 16 个台胞反映较为集中的两岸直航航点^[35]；同时，在中央“惠台 31 条”“惠台 26 条”的指引下，目前大陆已经有 28 个省区市的 100 多个地方分别制定了具体的惠台实施意见或实施细则，基本实现了全覆盖。2023 年 12 月 28 日，《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的实施意见》^[36]正式公布，在落实落细台胞在闽求学研习、就业创业、社会参与、便利支付、医保社保、基层治理、法治建设等方面作出两岸同胞同等待遇的政策安排。

同时，中央以加强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为重点，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添新生力量，注入青春活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鼓励青少年交流交往”“支持闽台各领域各行业青年团体建立常态化交流渠道”^[31]。2017 年至今，海峡两岸校园（网络）歌手大赛已成功举办五届，引导两岸青年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2018 年以来，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连年举办，成为两岸青年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青年作为两岸交流的桥梁，他们跨越海峡的友好互动，有助于减少误解和刻板印象。台湾青年通过分享自己在大陆的经历和感悟，可以让更多台湾青年了解大陆，为两岸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夯实基础。

二、反“台独”面临的挑战

蔡英文上台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与道路面临波折，和平发展的进程受到冲击，无论是发展速度、发展程度与协商互动都受到了阻碍，中央反“台独”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自于民进党持续当政，推行“台独”政策；还源于外部干预的不断提升，美国及其盟友频频插手台湾事务。另外，岛内社会认知也在民进党“台独”史观的影响下，“台湾人认同”逐渐与“中国

人认同”对立起来。

（一）民进党持续当政，刻意阻碍两岸关系发展

中央持续推动反“台独”工作面临的最主要障碍是民进党持续当政的现状。在两岸关系上，民进党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这一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声称“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的现状”。蔡英文当局称“‘九二共识’其实就是‘一国两制’”，故意将两者混淆。在回避两岸关系实质的同时，蔡英文当局还炒作香港话题，用所谓“民意牌”对抗大陆释出的善意，宣称“会坚守台湾的民主自由，也会持续声援香港”，还曾提出“反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37]七大纲领。在此基础上，民进党炒作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的错误论调，公然推行“两国论”，在岛内“双十庆典”“元旦讲话”“就职典礼”等公开场合不断使用所谓“中华民国台湾”说法，并以所谓“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八字方针作为两岸重启互动的条件。俄乌冲突爆发后，蔡英文当局渲染所谓“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论调，摆出“备战但不求战、亦不避战”的态度，不断炒作大陆“收复台湾”的决心等言论，竭力强化大陆所谓“武统台湾”的叙事。在岛内，蔡英文不断打压统派力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率团访问大陆时，蔡英文在民进党“中执会”上声称，“国民党的做法是向国际社会传递错误的讯息”。赖清德更是回应称，“两岸对话应该慎重，避免释放错误讯息。台湾人民都很清楚，大陆定义的‘九二共识’中，没有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2024 年 1 月 13 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揭晓，赖清德以约 558 万票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随后，他火速同美国进行两笔军事装备采购案，总价值超过 1.5 亿美元，继续走“倚美谋独”“以武拒统”的路线。在 5.20 就职演讲中，他鼓吹所谓“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在延续蔡英文“台独”路线的基础上，抛出了升级版的“新两国论”，大肆宣扬分裂谬论，煽动两岸对立对抗。赖清德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更是妄称，“要与中国尊严与对等交往”“中国应拿出诚意跟台湾民选合法政府”交流合作，一再贩卖“两国论”。在民进党持续当政的背景下，两岸关系因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政策而陷入危险境地，增加了台海局势的不稳定性。

在国际上，民进党加大力度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台湾前途自决”等谬论，攻击联合国第 2758 号决议，挑战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格局。2017 年，蔡英文当局声称“未来，台湾方面要不卑不亢，稳住两岸，走向国际”。新冠疫情期间，民进党“以疫谋独”，抹黑大陆抗疫成果，并借机提出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与此同时，民进党不断配合美国及其盟友加大力度打“台湾牌”。从 2016 年底“川蔡通话门”事件后，台湾当局声称“台海和平稳定已经从两岸关系的范畴提升到印太区域甚至是全球焦点”^[38]，与美国的官方来往逐渐从半遮半掩走向明目张胆。在 2017 年底的所谓“防务报告”中，台湾当局首次公布了美台军售流程。2021 年 3 月，美国与台湾当局签署所谓“设立海巡工作小组备忘录”，以作为对中国开始实施《海警法》的回应；为捆绑美西方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民进党当局也借美国对华进行核心科技封控、中美脱钩断链之际与美国展开多方面的经贸科技合作。台湾当局还与美日澳及立陶宛、捷克等多个国家保持密切的立法机构交流，企图增加台湾的所谓“国际空间”。

2022 年 11 月，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失利后，蔡英文辞去党主席，由赖清德接任。2023 年 1 月 18 日，赖清德声称：“将务实地认定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没有另外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并表示会延续蔡英文提出的“四个坚持”立场。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籍候选人赖

清德胜出。其长期标榜“台独务实工作者”身份，赖清德上台后两岸关系面临的风险和冲突会较蔡英文时期增加。虽然赖清德在竞选过程中将两岸路线由所谓“抗中保台”调整为“和平保台”，但其本质仍是追随蔡英文的两岸路线。赖清德将来有可能既做又说，支持和纵容各种“台独”活动，阻挠限制两岸交流合作，升高两岸对抗。

（二）岛内“台独”叙事扩散，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与对台政策认知不断下降

蔡英文当局宣扬“台独”理念，大肆在思想、教育、社会文化领域推行“文化台独”政策，强调“台湾主体意识”的重塑以及“本土化运动”的再扎根，这就使得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知上出现了歪曲。2017 年 3 月，蔡英文出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频繁推出“去中国化”的提案或相关政策。她首先撤回了 2014 年的“微调课纲”并将“反课纲运动”的骨干学生纳入了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的课纲审议会^[39]，一年后又推出了“108 课纲”。新课纲不仅在历史事实部分扭曲，更是删除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历史文件的内容。

同时，民进党不断污名化、抹黑大陆惠台政策措施，并且以各种借口阻止两岸民间往来。2020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委”选举前夕，民进党凭借“立委”多数优势，在台湾立法机构三读并通过“反渗透法”草案^[40]。根据该文件，大陆机构组织、媒体等都有可能被归为“渗透来源”，而未来与这些“渗透来源”打交道的台湾民众、台商、台生、民间团体以及大陆赴台人士和游客，都可能被冠上所谓“涉嫌渗透或被渗透”的“罪名”，两岸互动有可能被视作“指示”“委托”或“资助”等“违法行为”。2021 年，蔡英文当局将“海峡论坛”定位为“大型统战平台”，不批准国民党高层赴大陆参加论坛活动的申请。新冠疫情爆发后，民进党当局以防疫为借口单方面中断了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地区的直接往来。在疫情缓和的形势下，岛内开放“小三通”的呼声增强，民进党当局以需要取得“两岸双方航管部门许可”，涉及所谓“公权力事项”等为由，阻止两岸交流恢复，拖至 2023 年 1 月才陆续重启。日前，民进党当局还成立了所谓“认知研究中心”，搜集分析所谓境外势力散播影响台湾安全的信息，溯源清查所谓“异常账号”，协请社区平台下架，反制所谓“认知作战”，以此抹黑大陆，给两岸关系制造障碍。

从目前情况来看，台湾当局所实行的“去中国化”政策对两岸文化交融产生明显阻力，导致台湾同胞民族认同感偏低，两岸文化“对立”意识仍然存在。根据台湾一家基金会的长期民调，从台湾民众身份认同多年变化趋势来看，1990 年仅有 13% 的民众自认为“台湾人”，2020 年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已升至 83%，而现在自认为是“台湾人”的比例更接近 90%。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 2024 年 1 月公布的关于台湾民众身份认同及对中国大陆看法的最新民调显示，67% 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是“台湾人”，28%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亦是中国人”，只有 3% 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41]。与 2022 年 4 月中下旬俄乌冲突刚开始时的调查相比，各项数据几乎未发生很大变化，这意味着台湾民众的认同已相当稳定，不太容易受外在因素干扰而波动，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逐渐形成所谓“台湾命运共同体”认知。当然，我们也需要警惕相关“民调”通过引导性设置题目和诱导回答以塑造舆论的风险，做到充分自信，坚定既有对台方针政策。

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认知出现错乱，对“一国两制”的误解进一步加深，对“九二共识”的态度也趋于消极。台湾民意基金会在马英九访陆后的民调中针对“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属一个中国”提问，结果发现超过 66% 的受访者不赞同^[42]。2024 年台湾地区选举后公布的最新民调中，53.5% 的

民众支持赖清德“反对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对于马英九称“就两岸关系而言，必须相信中国国家领导人”则仅 12.5%的人同意。由此可见，在民进党持续污名化“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的背景下，台湾社会的“拒统”认知不断加深，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遭到破坏，大陆的惠台政策也被当成了“统战工具”。

（三）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加强干预，“台独”国际化趋势有所抬头

2019年，特朗普在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位为所谓“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43]，把台湾地区纳入“印太战略”框架中，作为遏制中国的主要筹码，对台政策上表现出“一个中国”政策空心化的趋势。拜登上台以来，继续把中国定位为美国“后果最为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和“头号战略竞争对手”^[44]。在台湾问题上，拜登虽反复申明“四不一无意”，但在实际行动上不断以“切香肠”方式挖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内涵，打“台湾牌”的手法更加灵活。

其一，国会涉台行动逐渐增多。特朗普政府时期国会议员窜台达 25 次之多，拜登政府至今国会议员已经窜台 40 次（截至 2024 年 1 月）。国会还先后提出了多部涉台法案，用国内法的方式力挺台湾。其中，所谓《与台湾交往法》《亚洲再保证法》《台北法案》《指示国务卿制定政策为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和其他目的法案》《美台 21 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议实施法案》由总统签署成法，《台湾政策法案》最终被部分纳入 2023 年国防授权法案中获得通过。虽然国会立法行动大多难以最终通过成法，但其按程序进行的听证、讨论本身就是渲染“中国威胁论”，起到了扩充美国“以台制华”工具箱的作用。其二，提升了对台军售力度和美台军事合作层级。特朗普政府时期累计对台军售 11 次，涉及金额高达 183.3 亿美元。拜登政府上台后（截至 2024 年 1 月），先后 13 次对台军售，涉及金额达 45.6 亿美元。其售台武器更加先进，同时注重发展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目前美国对台军售形成了“外国军事销售（FMS）、直接商业销售（DCS）和总统提取权（PDA）”三位一体和“军售、军援、军训”三管齐下的格局。其三，重视美台供应链安全、加强半导体合作。在炒作中美脱钩断链之际，美国加紧与台湾地区开展供应链安全合作。2020 年 5 月，台积电宣布将在美国设立新厂。2021 年 6 月 30 日，美国与台湾当局恢复展开“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TIFA）谈判，随后又开展了第二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双方还宣布共同建立“科技贸易暨投资合作架构”等，2023 年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达成。

在美国的错误示范作用下，一些国家也不断插手台湾事务。2021 年，欧洲议会发表加强同台湾关系的文件并组团窜台。2022 年，欧洲议会通过“关于欧盟和印太安全挑战的报告”，声称在印太地区的利益遭到中国“威胁”，并呼吁欧盟加强和台湾地区的关系。2022 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对台湾安全部分的记述多达 10 页，还强调台湾是日本重要的伙伴与朋友，反映出日本对台湾事务的干涉。在 2023 年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召开之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日本外相林芳正，多次提及台湾问题，并妄称不许中国大陆“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45]。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也声称，“如中国武力犯台，澳洲将与美国同进退”等^[46]。此外，台湾当局所谓“邦交国”也为其发声，以提升自己的国际能见度，获得台湾当局和美国的更多援助。2021 年，立陶宛在台湾地区设立了所谓“代表处”^[47]。2022 年，斯洛文尼亚总理扬沙在接受专访时用“国家”指称台湾，扬言斯洛文尼亚正与台湾洽谈互设“代表处”的问题^[48]。在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针对 9 月初台湾民进党当局提出的

“参与联合国四大诉求”展开辩论，危地马拉、巴拉圭、帕劳、捷克等四国总统鼓噪联合国体系“接纳台湾”^[49]。

可以预见，在美国国内遏制中国、以台制华已成为“政治正确”，以及民进党持续当政的背景下，未来无论 2024 年美国大选哪位人士上台，打“台湾牌”的手段将会更加多样，一些国家操弄“台湾议题”的频率也将不断提升。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干涉极为敏感的中国内政问题，导致台湾问题“国际化”趋势加剧，危害中国核心利益，阻碍中国统一进程。这无疑给中央对台工作带来了更多外部干扰。

三、反“台独”的影响

中央政府持续推进反“台独”工作，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央反“台独”政策显示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国家主权的鲜明态度，促进反“台独”、反分裂的态势向有利于大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社会巩固了一个中国格局。

（一）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信心不断提升，形成反“独”促统的有利态势

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我国 2023 年全国 GDP 达 126.06 万亿元，2023 年国防预算达到了 1.5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2%^[50]。我国包括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极大提升，大陆已经对台湾形成全面性实力优势。解决台湾问题离不开中国大陆的发展。随着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大陆坚定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文等角度全方位反“台独”，维护国家主权的信心和能力不断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呼吁“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这是指导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宣示了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力量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指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 70 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51] 这彰显了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求国家最终统一目标的坚定意志。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主动权”，并在表述上把“国家统一”前置于“民族复兴”，彰显了对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战略自信，标志着推进国家统一事业已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反“台独”被写入党章，说明中国共产党尤其重视对反对“台独”事业的领导，突出了当前反对“台独”事业的紧迫性，意味着我党在新形势下会坚定意志，加快统一步伐。未来，中国将在坚决遏制和打击“台独”势力、粉碎外来势力干涉图谋、扫清国家和平统一障碍等方面做更多努力。

（二）增进岛内民众对大陆政策的理解，凝聚反“独”促统合力

目前，岛内各界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希望加强两岸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曾发文呼吁，希望民进党当局不要再不择手段阻碍两岸交流，也别再漠视台商朋友的权益，“请给台海和平一个机会、给台湾未来一条生路”^[52]。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吴家莹在接受台媒采访时表示，扩大两岸通航、完全恢复“小三通”是重要议题^[53]。2023 年初，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一行访问大陆，其后台湾多个工商团体相继宣布将组团赴大陆访问，两岸民间交流正在冲破民进党当局的重重阻挠。对于岛内期盼两岸交流的呼声，大陆在“九二共识”

张建, 常帅兵. 2016 年以来中央政府反“台独”政策的进展、挑战及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98-116.

的基础上一直在不断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关键地位, 将其喻为“两岸关系之锚”和“定海神针”。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汇聚力量、排除干扰, 让交流合作道路越走越宽, 让两岸同胞日子越过越好。”^[54]

中央反“台独”工作一面推动两岸交流交往, 一面针对性打击“台独”分子。这一方面回应了岛内民众分享大陆发展红利的愿望, 团结了岛内一切反“独”力量和积极因素, 使岛内一部分民众认清了“台独”分子的本质, 要求两岸和平、交流、合作和反“台独”的呼声日益高涨;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升岛内民众对大陆政策和两岸历史关系的理解, 挫败民进党抹黑大陆的言论。台湾民众在中央反“台独”工作下逐渐认识到, 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是把台湾变成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外部干涉势力牺牲的也是台湾同胞的利益, 维护台海和平就必须坚决反对“台独”。总之, 中央持续反“台独”工作有利于凝聚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持续有力地开展反干涉反分裂斗争, 形成更为强大的反对“台独”统一战线, 为和平统一创造有利氛围。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三) 推动国际社会巩固一个中国格局, 一些国家对台认知进一步下降

在中央坚持反“台独”工作、对国际社会反复阐释一个中国原则、巩固联合国 2758 号决议作用的背景下,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越来越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主流认知。2009 年至 2016 年, 基于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和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的谅解之上, 世界卫生组织连续 8 年邀请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名义和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自民进党上台以来, 台湾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世卫大会连续 7 年拒绝涉台提案。特别是 2022 年 5 月, 美国通过“要求美国国务卿制定战略使台湾重获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地位法案”, 试图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强化其在全球卫生议题中的“台湾牌”, 但台湾当局依然未收到世卫大会邀请函, 这再次证明了主流国际社会对卫生问题“政治化”操弄所秉持的鲜明反对立场。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束后, 国际社会更是持续发声, 100 多个国家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不容歪曲挑衅, 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弗朗西斯重申, 联大工作将以联大 2758 号决议为指引遵循一个中国原则, 东盟、阿盟、非盟、上合组织也以不同方式重申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经过我国外交多年的努力, 国际上已经形成了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

新时代以来, 我国在社会、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绩, 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越发重要, 这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商机和红利。而台湾地区对其所谓“邦交国”的经济红利减弱, 在美国支持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贸易机会和贸易资源不断增长的背景下, 台湾地区的一些所谓“邦交国”国内支持与与中国建交的力量正在不断积聚, 与中国建交越来越被认为是明智的选择。随着中国综合实力提升产生的巨大吸引力, 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多认可, 台湾当局将面临“邦交国”对台认知度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 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55]。

(四) 两岸统一不是一蹴而就的, 反“台独”工作仍任重道远

从目前来看, 两岸和平统一依然困难重重, 民进党利用所谓“国安五法”“反渗透法”恐吓打

压统派人士，压制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声音，同时加速推动“去中国化”教育，使得岛内“台湾意识”越来越强大并向“台独意识”发展；对外屡屡勾结美日等国，试图通过寻找“外援”，不断挤压和平统一空间。与此同时，外部势力对中国的打压遏制日趋升级，尤其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愈加频繁，将台湾当作遏制我国发展的一枚棋子，进一步加剧了台海局势的复杂程度。

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既没有正面回应“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也没有提出未来如何推动两岸关系，反而强调“当选反映了台湾新的民意”。这意味着民进党所坚持的“台独”主张在赖清德当政期间难以改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依然不乐观。而作为在野党的中国国民党，自 2020 年竞选失利后曾陷入两岸路线之争，国民党改革委员会的两岸论述仅表示尊重“九二共识”的历史成果。江启臣声称：“九二共识”是过去曾经扮演两岸能够求同存异、搁置争议的重要工具。而后国民党又提出包括以“维护台湾安全优先”等所谓“四大支柱”来建构台海新关系，且未提反对“台独”。国民党自身理念不清晰、立场不确定，党内各种利益盘根错节，同僚之间明争暗斗，难以对民进党形成有效制衡。而民众党虽然已经成为岛内第三大党，但自身政治理念和主张还不成熟，也难以承担起独自推动两岸关系的重任。

因此，我们应该意识到两岸统一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央反“台独”工作依然任重道远，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提仍然必须坚持与“台独”作斗争。但即使有民进党当局的各种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仍在推进，两岸融合发展仍在向前。不管岛内局势怎么变，岛内谁当权，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的历史大势。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只要大陆保持向上发展势头、坚持全面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两岸同胞同担祖国统一重任，“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呼声不断，就能早日实现国家统一。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央反“台独”的决心非常坚定，对国家统一的信心毫不动摇，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一致要求，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以司法文件的形式公布，在法律层面强化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法律事实，表明了国家司法机关对台湾地区的管辖权，展示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始终在大陆一方。

四、结语

民进党的投机本质决定了其“倚美谋独”“以武拒统”政策的顽固性，台海和平稳定局势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不过，尽管两岸关系因中美战略竞争激化与民进党当局采取的“台独”路线而从“暖和解”进入了“冷和平”时期，但和平统一已是不可逆趋势。为了进一步排除国家统一过程中的政治阻力，中央需要从自身实力、对台政策和国际叙事三个方面继续发力。一是坚持自身发展。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两岸实力对比差距的不断拉大，大陆处理两岸问题的能力与自信也不断增强，大陆的发展进步成为决定两岸关系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雄厚的实力基础和可靠保障。二是坚持和平统一与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重。面对民进党持续当政以及“台独”分裂势力借中美博弈之机“倚美抗中”，给台海局势造成了极大风险现状，我们更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政治底线，在努力推

张建, 常帅兵. 2016 年以来中央政府反“台独”政策的进展、挑战及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98-116.

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同时, 继续在政治、军事、涉外事务等诸多方面采取高压态势, 使其在反“独”促统中发挥护栏作用。三是重视两岸同胞之间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 要通过多种方式重塑以中国、中华民族为主要意涵的台湾同胞“我者”意识, 消弭台湾民众对大陆狭隘偏颇的“他者”意识, 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为祖国和平统一和统一后台湾治理打下认同基础, 以赢得更多岛内民众对于台湾问题的理解。四是加强国家统一、反“独”促统叙事。针对国际社会上的一些杂音, 我们要讲好中国和平统一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清晰阐释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 包括其在台湾地区的经济利益, 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尽一切力量团结国际社会积极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11] 中央将继续把反对“台独”作为对台工作的重要任务, 祖国统一进程正加速向前推进, 祖国完全统一终将实现。

参考文献:

- [1] 严安林. 蔡英文上台后的两岸关系走向 [J]. 台湾研究, 2016 (1): 4-5.
- [2] 温天鹏, 刘相平. 蔡英文连任以来民进党当局的两岸政策析论 [J]. 台湾研究, 2021 (3): 10-21.
- [3] 刘相平. 赖清德“台海政策”述评 [J]. 台海研究, 2024 (1): 88-103.
- [4] 张建. 中国国家统一进程中反“独”促统话语叙事的构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79-89.
- [5] 李义虎. “一国两制”台湾模式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65-66.
- [6] 张文生. 两岸政治互信与台湾民众的政治认同 [J]. 台湾研究集刊, 2010 (6): 1-9.
- [7] 彭韬, 聂锐.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台独”重要思想解析 [J]. 社会主义研究, 2017 (5): 18-24.
- [8]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 年 10 月 18 日) [N]. 人民日报, 2017-10-28 (1).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 (2022 年 8 月) [N]. 人民日报, 2022-08-11 (5).
- [10]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的决议 (2022 年 10 月 22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2-10-23 (2).
- [1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12]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EB/OL]. (2024-06-21) [2024-06-26]. <http://m.mps.gov.cn/n6935718/n6936579/c9626279/content.html>.
- [13] 国台办: 依法对苏贞昌、游锡堃、吴钊燮等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戒 [EB/OL]. (2021-11-05) [2024-06-26]. http://www.gwytb.gov.cn/xwdt/xwfb/wyly/202111/t20211105_12389168.htm.
- [14] 陈立非, 赵觉理, 王琪, 等. 中方对“台独”发起密集制裁, 点名惩戒岛内顽固“独派” [EB/OL]. (2023-04-08) [2024-06-2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2559001561012689&wfr=spider&for=pc>.
- [15] 赵觉理, 白云怡, 陈青青, 等. 中方重磅反制佩洛西窜台, 叫停中美两国八项合作交流! [EB/OL]. (2022-06-26) [2024-06-2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0372214105771970&wfr=spider&for=pc>.
- [16] 于晓. 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启动 [EB/OL]. (2023-04-05) [2024-06-26]. <https://>

- www.chinanews.com.cn/gn/2023/04-05/9984795.shtml.
- [17] 李秉宣, 韩学扬. 东部战区圆满完成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 [EB/OL]. (2023-06-26) [2024-06-2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2789615208841997&wfr=spider&for=pc>.
- [18] 国台办: 民进党当局反复在联大 2758 号决议上做文章是痴心妄想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1-01-11 (3).
- [19] 台陆委会: 绝不接受中国大陆单方设定政治前提及两岸终局 [EB/OL]. (2022-09-25) [2024-06-26]. <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220925-1316600?amp>.
- [20] 驻美国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6 周年 [EB/OL]. (2023-07-25) [2024-06-26]. http://us.china-embassy.gov.cn/sgzc/202307/t20230726_11117890.htm.
- [21] 左妍冰. 2018 年两岸关系: 僵局与交流并存 斗争与融合共进 [EB/OL]. (2018-12-25) [2024-06-26]. <https://taiwan.cri.cn/20181225/ad3cef7a-9f95-985d-d91c-c467227cd50c.html>.
- [22] 杨亲华.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绝无任何妥协空间——写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五十周年之际 [N]. 人民政协报, 2022-02-26 (5).
- [23] 习近平: 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既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 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 [EB/OL]. (2021-11-16) [2024-06-26].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11/16/c_1128067775.htm.
- [24] Chung L. US signals it's still not ready to cross Beijing's red lines over Taiwan [EB/OL]. (2021-07-09) [2024-06-26].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140383/us-signals-its-still-not-ready-cross-beijings-red-lines-over>.
- [25]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巴厘岛举行会晤 [N]. 人民日报, 2022-11-15 (1).
- [26] 美国众议长麦卡锡会见蔡英文, 中国警告引发担忧 [EB/OL]. (2023-04-07) [2024-06-26]. <https://cn.wsj.com/articles/%E7%BE%8E%E5%9B%BD%E4%BC%97%E8%AE%AE%E9%95%BF%E9%BA%A6%E5%8D%A1%E9%94%A1%E5%9C%A8%E5%8A%A0%E5%B7%9E%E4%BC%9A%E8%A7%81%E8%94%A1%E8%8B%B1%E6%96%87-20577ac1>.
- [27] 美前官员: 拜登会强硬对待赖清德刺激两岸局势言行 展示管控中美关系能力 [EB/OL]. (2024-01-18) [2024-06-26]. <https://www.zaobao.com.sg/news/china/story20240118-1462955>.
- [28] 潘晓燕, 卿松竹. 中美高官曼谷会晤, 两天谈了超 12 小时 [EB/OL]. (2024-01-28) [2024-06-2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9332287147631851&wfr=spider&for=pc>.
- [29] 关于印发《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EB/OL]. (2018-02-28) [2024-06-26]. http://www.gwytb.gov.cn/zccs/zccs_61195/gza31ta/zcfb/201805/t20180510_11953573.htm.
- [30] 王治国. “31 条措施”五周年: 惠台利民政策措施助推两岸融合发展 [EB/OL]. (2023-02-28) [2024-06-26].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2020/2023-02/28/content_85132070.shtml.
- [3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2023-09-13 (1).
- [32] 国台办: 2023 年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克难前行、稳中有进 [EB/OL]. (2024-01-19) [2024-06-26]. https://swt.fj.gov.cn/xxgk/jgzj/jgcs/twc/202401/t20240129_6387847.htm.
- [33] 国台办: 有关部门决定中止 ECFA 部分产品关税减让合理合法、有据有节 [EB/OL]. (2023-12-27) [2024-06-2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6425383254088457&wfr=spider&for=pc>.

张建, 常帅兵. 2016 年以来中央政府反“台独”政策的进展、挑战及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98-116.

- [34] 2023 年对台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3-05-11 (2).
- [35] 国台办: 4 月 1 日起调整两岸客运航线旅客核酸检测规定 [EB/OL]. (2023-03-26) [2024-06-26]. http://www.gov.cn/lianbo/2023-03/31/content_5749379.htm.
- [36] 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EB/OL]. (2023-12-28) [2024-06-26]. http://fujian.gov.cn/zwgk/zxwj/szfwj/202312/t20231228_6368234.htm.
- [37] 民进党打“抹红、恐中”牌终将害了台湾 [EB/OL]. (2019-03-18) [2024-06-26]. 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hxsp/201903/t20190318_12149184.html.
- [38] 蔡英文用“国安讲话”骗岛内民众, 国台办痛斥: 民进党当局本性再次暴露无遗 [EB/OL]. (2021-02-10) [2024-06-26]. <https://m.huanqiu.com/article/41rrfSrLnUr>.
- [39] 民进党当局“文化台独”的发展历史 [EB/OL]. (2023-11-17) [2024-06-26]. https://h5.ifeng.com/c/vivoArticle/v002XLDhIkF6C6egI7DDgS3Tni2A90Im4IJZgJnMpfM3B4__?isNews=1&showComments=0.
- [40] 反渗透法: 台湾大选前夕通过该法瞄准了哪些目标 [EB/OL]. (2019-12-31) [2024-06-26].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0922074>.
- [41] Huang C, Starr K J. Most people in Taiwan see themselves as primarily Taiwanese; few say they're primarily Chinese [EB/OL]. (2024-01-16) [2024-06-26].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4/01/16/most-people-in-taiwan-see-themselves-as-primarily-taiwanese-few-say-theyre-primarily-chinese/>.
- [42] 台民调: 逾六成台民众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 [EB/OL]. (2023-04-17) [2024-06-26]. <https://www.kzaobao.com/guping/20230417/137194.html>.
- [43]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7.
- [44]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22 [EB/OL]. (2022-10-12) [2024-06-2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 [45] G7 reaffirms importance of peace across Taiwan Strait [EB/OL]. (2023-07-12) [2024-06-26]. <https://focustaiwan.tw/politics/202312070011>.
- [46] Brands H. Why Australia Is Gearing Up for Possible War With China [EB/OL]. (2022-11-10) [2024-06-26].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features/2022-11-09/australia-will-support-us-in-war-with-china-over-taiwan>.
- [47] Hale E. Lithuania Deepens Relations With Taiwan Amid China Tensions [EB/OL]. (2022-09-13) [2024-06-26]. <https://www.voanews.com/a/lithuania-deepens-relations-with-taiwan-amid-china-tensions-/6745292.html>.
- [48] 唐湘. 斯洛文尼亚总理近日发涉台不当言论, 斯商界称“中国伙伴正在撤资” [EB/OL]. (2022-01-26) [2024-06-26].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6YIb8fRteM>.

- [49] 台湾各“友邦”在联合国大会上接连呼吁让台湾参与联合国 [EB/OL]. (2023-09-20) [2024-06-26]. <https://www.voachinese.com/a/un-general-assembly-taiwan-20230920/7275965.html>.
- [50] 中国合理确定 2023 年国防支出规模 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7.2% [EB/OL]. (2023-03-06) [2024-06-26]. http://www.mod.gov.cn/gfbw/qwfb/yw_214049/16206474.html.
- [51] 习近平.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2019 年 1 月 2 日) [N]. 人民日报, 2019-01-03 (2).
- [52] 听! 台湾各界期盼两岸交流“春暖花开” [EB/OL]. (2023-01-02) [2024-06-26]. http://www.news.cn/tw/2023-02/01/c_1129329479.htm.
- [53] 台湾岛内人士期盼两岸交流回暖 [EB/OL]. (2023-01-23) [2024-06-26]. <https://new.qq.com/rain/a/20230123A03UUN00>.
- [54] 尽早尽快恢复两岸正常交往 [EB/OL]. (2023-02-09) [2024-06-2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7302490406597018&wfr=spider&for=pc>.
- [55] 中央台办: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 必将随民族复兴而解决 [EB/OL]. (2022-09-21) [2024-06-2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4561770388790794&wfr=spider&for=pc>.

责任编辑: 林华山



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内容、认知与影响 ——以 2024 年台湾地区选举为背景

李恒 周生龙

(西南政法大学 国家安全学院, 重庆 401120)

摘要: 美国智库与美国政治界、战略界、情报界联系紧密, 具有很强的政治服务性, 是美国涉台政策的“风向标”和“探路石”。随着美国政府不断强化对华竞争和对抗政策, 美国智库在涉台问题上广泛开展研究。本研究以 2022 年 2 月至 2024 年 6 月美国 10 家主流智库的 46 篇研究报告为对象, 深入考察报告内容、认知和影响。在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背景下, 美国主流智库的涉台问题研究报告数量显著增加, 特别是围绕政治议题的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 政治议题、军事议题是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主要方向, 但经济、网络、科技、核安全等议题也得到美国主流智库的广泛关注, 反映出美国智库紧跟美政府行动导向、针对台湾问题全面谋划对华政策。在涉台认知方面, 美国智库将美国自身视为台湾当局的“支持者”和台海冲突的“调和者”, 对中国“全面对抗”的认知态度进一步深化。美国智库将台湾作为中美博弈的政治筹码和“印太战略”的关键一环, “以台遏华”战略在不同智库之间形成共识。在政策影响方面, 独特的“旋转门”机制使得美国智库的涉台政策主张及时、有效地进入美国决策层, 实现意见的高效交换传导, 串联不同的政策参与主体。面对美国主流智库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应深入把握美国智库相关议题研究动向, 前瞻研判美国对华政策措施, 开展有效反制策略, 加强中国智库战略建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4.010

作者简介: 李恒, 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周生龙, 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全球发展倡议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及推进路径研究”(23AGJ012)

引用格式: 李恒, 周生龙. 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内容、认知与影响——以 2024 年台湾地区选举为背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17-135.

设，争取在中美博弈中占据主动。

关键词：美国主流智库；台湾问题；知识生产；“一国两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4) 04-0117-19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1]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不容动摇的政治基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不会动摇。然而，美国长期通过“切香肠”战术进行涉台滋扰分裂活动，在虚化、掏空、歪曲一个中国原则道路上不断加速演进，意图阻碍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在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以微弱优势当选，折射出台湾地区政治运行机制已经偏离了“多数人共识决策”的良性轨道，正面临着代表性不足和“少数人对多数人暴政”的困境^[2]。同时，美西方反华势力、“台独”势力与我国之间分裂与反分裂、介入与反介入、干涉与反干涉的复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当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两国进入以存量博弈为主的战略相持阶段，持久竞争与速决冲动构成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两极^[3]。在此背景下，涉台问题成为美国政治界、战略界、情报界关注的焦点。准确把握以智库为代表的美国政治界、战略界、情报界涉台问题的政策主张，对中国开展国家安全情报分析研判，有效应对美西方国家对华围堵、打压、干预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智库最早诞生于 20 世纪初期的美国，当时主要作为军事战略和政策研究机构，此后在全球普及并作为重要力量参与政治决策。安德鲁·里奇认为，智库是一种以专业知识和思想为终极产品，并以此获取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的独立、无利益诉求、非营利性组织^[4]。涉台问题是美国智库的重点研究对象，它以台湾或两岸关系为切入点，研究美国如何干预、介入其中从而展现美国立场、服务对华政策，引导具体话题展开。美国围绕涉台问题的智库研究呈现研究主体多、研究范围广、研究程度深、研究影响大等特点。

中国学界长期以来比较关注美国智库，但近五年对美国智库涉台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既有文献主要指涉两方面内容。一是美国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和行为影响。王先伟等^[5]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美国智库涉台主要行为、功能定位和行为动因，探究其作用和影响。赵恒煜^[6]以布鲁金斯学会的涉华研报为研究对象，使用量化方法分析该智库涉华研究的趋势和动向。二是美国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主要议题和认知态度。周金星^[7]通过比较分析法，比较美国智库专家对台湾问题认知的共识和分歧，强调智库专家对华政策共识远未形成。齐欣^[8]以新美国安全中心智库专家的推特发言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分析的方法，挖掘出涉台认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词。杜鑫等^[9]从“竞合观”与“冲突观”两种基本形态出发，研究拜登“百日新政”期间美国智库的涉华内容。贺孝康等^[10]基于内容分析，研究美国智库对华“冷合作”战略的态度和主张。总的来看，既有研究对美国智库涉台内容的基本情况、研究议题、认知态度、发展动向做出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并得出了提升中国智库影响力、坚持积极的合作态度、灵活处理中美关系等一系列有价值 and 现实意义的结论。既有成

果也存在一些局限：一是研究对象的局限性。现有研究多将“台湾问题”作为美国智库对华政策研究的子议题看待，对美国智库涉台内容的专门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处于劣势。二是研究时间的局限性。情报具有严格的时限性，既有研究多将取样时间限定为“特朗普时期”，或是更久远的时间段，对近年来美国智库涉台动向缺乏足够关注，特别是缺少在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背景下对美国智库涉台动向的研究。三是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既有研究多采取内容分析法，较少开展大规模文本分析和实证分析。

美国智库是美国政治决策的重要参与力量。拜登政府不断加大同“台独”势力的勾连力度，通过涉台活动试探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红线，“以台制华”图谋愈加明显。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智库为美国的国家政治决策提供了参考支撑，既为美国政府提供专业知识、外部意见，同时也为社会民众提供信息和公共情报，广泛传达政策目的与主张。总结美国智库的中国观既是了解“镜中我”的突破口，也是开展对外传播、公共外交的基础，还能为中国对外决策提供更多信息支持^[11]。本文以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作为研究背景，以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报告为主要研究内容，分析其主要议题、认知变化和研究影响，力图及时准确把握美国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认知观点和变化动向，为形势的分析研判和政策运筹提供一定借鉴和参考。

二、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整体面貌和主要议题

美国主流智库是指规模较大、研究领域广泛、研究专业性强，能够代表美国智库界主流观点、对美国政治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美国智库。按照功能作用，可将美国主流智库进一步分为以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政策研究型智库；以兰德公司、城市研究所为代表的课题研究型智库；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交叉型智库等^[12]。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兼具政治导向性和对两岸现状发展的描述性。分析美国主流智库的涉台问题研究报告，可以大致把握其对台湾问题的研究全景。本文以研究专业度和影响力为依据，确定能够代表美国智库涉台问题研究主要观点的主流智库；以这些智库 2022 年 2 月至 2024 年 6 月发表的涉台问题研究报告为样本，综合运用内容分析、话语分析和数据统计等方式展开研究。

（一）样本的选取

结合宾夕法尼亚大学 TTCSP《2020 年全球智库报告》^[13]和浙江大学 CIRAA《2022 年全球智库影响力评价报告》^[14]的排名情况，共确定 10 家有涉台问题研究板块且排名靠前的美国智库，分别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企业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上述主流智库具有三大核心特征，能较充分地代表美国智库的主要观点。一是智库综合影响力较大。以上 10 家智库均属于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前 30 家智库，其影响力和话语权得到了 TTCSP 和 CIRAA

两份智库评价报告的积极肯定。二是智库研究议题集中。上述智库均设置了台湾研究主题，或下设专门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三是智库研究保障充足。上述主流智库均是大型综合智库。在资金支持、人员保障、项目配置、政治资源等方面具备领先美国其他智库的显著特点。此外，10 家智库涵盖传统基金会等保守派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等中立派智库和美国进步中心等激进派智库，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美国智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倾向。上述主流智库在军事、政治、外交、国家安全等不同方面各有所长，研究成果各有侧重。

在上述智库官网中，以“Chinese Taiwan”为关键词，以报告“Report”为成果限定类型，检索 2022 年 2 月至 2024 年 6 月发布的研究成果，共得到 51 篇。经过初筛，除去重复报告、与涉台问题关系不大的报告和分析文章，得到 46 篇有效报告（见表 1），以整体抽样的方式选取全部有效报告建立研究样本库。2023 年 5 月，民众党候选人柯文哲率先宣布参选，标志着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由在野整合进入预备竞选阶段。因此，本文以 2023 年 5 月为分界，将 2022 年 2 月至 2023 年 4 月的研究报告作为选举期前研究报告（以下简称“选期前报告”），将 2023 年 5 月至 2024 年 6 月的研究报告作为选举期研究报告（以下简称“选期报告”）。

表 1 涉台问题研究报告的基本情况

出版智库	出版时间	题名
布鲁金斯学会	2022.05	TAIWAN AND THE DANGEROUS ILLOGIC OF DETERRENCE BY DENIAL
布鲁金斯学会	2022.07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TAIWAN IN US-CHINA RELATIONS
布鲁金斯学会	2022.08	CAN CHINA TAKE TAIWAN?
布鲁金斯学会	2023.05	DOMESTIC POWER RESHUFFLES IN 2022 AND U.S.-TAIWAN-CHINA RELATIONS
布鲁金斯学会	2023.08	China's Response to American-led "Containment and Suppression"
传统基金会	2022.04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Must Act Now to Deter China from Attacking Taiwan
传统基金会	2022.09	Why Taiwan Matters to Beijing
传统基金会	2023.01	Applying Lessons of the Naval War in Ukraine for a Potential War with China
传统基金会	2023.05	Winning the New Cold War: A Plan for Countering China
传统基金会	2023.08	Managing Trade-offs Between Military Aid for Taiwan and Ukraine
传统基金会	2024.01	The U.S. Is Right to Support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传统基金会	2024.03	The American Case for Taiwan
哈德逊研究所	2023.04	Empowering Ukraine Prepares Us for China
哈德逊研究所	2023.04	Winning in Ukraine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Deterring a War in Taiwan
哈德逊研究所	2024.01	Taiwan: After-Election Report
哈德逊研究所	2024.04	Hedging Bets: Rethinking Force Design for a Post-Dominance Era
哈德逊研究所	2024.06	Deterring China: Imposing Nonmilitary Costs to Preserve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023.02	The Many "One Chinas": Multiple Approaches to Taiwan and China
兰德公司	2022.05	Implications of a Coercive Quarantine of Taiwan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兰德公司	2023.03	Supply Chain Interdependence and Geopolitical Vulnerability

李恒, 周生龙. 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内容、认知与影响——以2024年台湾地区选举为背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17-135.

出版智库	出版时间	题名
兰德公司	2023.06	Simulating Chinese Gray Zone Coercion of Taiwan
兰德公司	2023.06	Can Taiwan Resist a Large-Scale Military Attack by China?
兰德公司	2024.03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Private Sector Innovation to Defeat a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
兰德公司	2024.06	Middle-Power Equities in a Cross-Strait Conflict
美国进步中心	2024.04	Taiwan: A Progressive, Principled, and Pragmatic Approach to Managing Tensions With China
美国企业研究所	2022.07	Getting Ready for a Long War with China——DYNAMICS OF PROTRACTED CONFLICT IN THE WESTERN PACIFIC
美国企业研究所	2023.03	China's Three Roads to Controlling Taiwan
美国企业研究所	2023.08	Defense Authorization Highlights and Conference Issues
美国企业研究所	2024.02	Preparing Supply Chains for a Coming War
美国企业研究所	2024.05	From Coercion to Capitulation: HOW CHINA CAN TAKE TAI WAN WITHOUT A WAR
外交关系委员会	2023.06	U.S.-Taiwan Relations in a New Era
新美国安全中心	2023.02	Atomic Strait——How China's Nuclear Buildup Shapes Security Dynamics with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新美国安全中心	2023.11	Resisting China's Gray Zone Military Pressure on Taiwan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22.02	Shadow Risk——What Crisis Simulations Reveal about the Dangers of Deferring U.S. Responses to China's Gray Zone Campaign against Taiwan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22.06	The Collapse of One China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22.10	What If...Alternatives to a Chinese Military Invasion of Taiwan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22.10	It's Moving Time——Taiwanese Business Responds to Growing U.S.-China Tension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23.06	Analyzing China's Escalation after Taiwan President Tsai's Transit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23.08	Cyber attack on Civilian Critical Infrastructures in a Taiwan Scenario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23.09	Manufacturing beyond Shores——The Taiwanese Checklist Approach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23.10	The First Battle of the Next War——Wargaming a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24.01	Deterring Xi Jinping's Taiwan Ambition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24.01	Beijing's More Coercive Approach toward Taiwan in 2024 and Beyond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24.01	U.S. and Taiwan Views on China's Approach to Taiwan in 2024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24.02	Skirting the Shores: China's New High-Tech Research Ship Probes the Waters around Taiwan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2024.06	How China Could Quarantine Taiwan

(二) 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整体面貌

从整体上看, 46篇有效报告中, 18篇为选期前报告, 28篇为选期报告。可见, 在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背景下, 美国主流智库对涉台问题的研究重心进一步倾斜, 研究力度和成果数量均较选期前有明显增加。从数量上看, 不同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差异十分明显。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聚焦外交、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 出版的相关研究报告数量最多, 达到13篇。偏向国际主义与

多边主义立场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从事外交和国际事务研究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美国进步中心则对涉台问题关注较少，均仅有 1 篇报告出版。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综合智库出版涉台问题研究报告数量居于平均水平。从标题内容上看，大部分研究报告对中国持有明显的敌意偏向，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对手和假想敌，背离“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抹黑、曲解两岸关系。例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份报告将两岸关系视为大陆对台湾的“隔离”，兰德公司也在其报告中以“Quarantine”一词来扭曲两岸关系。

美国智库与美国政治界、战略界、情报界联系紧密，直接服务于美国各届政府的“以台制华”图谋。台湾问题一直是美方企图遏制中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强力抓手，也是参众两院议员提交议案的重点议题。几乎所有研究报告的内涵主旨都与涉台法案的主张高度一致，两者互为激发、相互作用，导致美国在涉台问题上愈发走向对抗和极端。2021 年 2 月参众两院均提交的所谓“防止台湾遭侵略法案”，授权总统在台湾地区遭受所谓“袭击”时使用军事力量“保台”。2021 年 6 月提出的所谓“2021 年台湾防卫法案”，呼吁美国陆海空三军阻止大陆“武力收复”台湾。这些提案都极力强调台湾地区对美国的所谓价值利益，策动台湾地区成为美国遏制大陆的“桥头堡”。这些主张在美国智库的成果中有充分体现，并成为 2022 年来美国主流智库研究涉台问题的基本参考。2022 年 7 月，由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议员起草的“2023 年国防授权法案”获得众议院院会通过，该法案大力鼓吹支持邀请台湾地区参与 2024 年美举行的环太平洋军演，强化所谓“美台伙伴关系”，加快交付对台军售武器。同年 8 月，美国企业研究所紧扣这一法案，出台“Defense Authorization Highlights and Conference Issues”报告^[15]，突出“对台导弹防御、供应链弹性和运输节点保障”等内容，呼吁相关措施尽早落实。美国智库长期充当美国对华政策的“智囊团”，主张加大对台支持力度，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侵蚀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同时，美国这些智库为民进党当局“站台”，引导其进一步“挟洋自重”，加大与大陆的对抗力度，进而“以武谋独”。

（三）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主要议题

基于国家安全关键领域和智库的研究方向，本文确定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网络、核安全六个主要议题。通过解读式内容分析法，对 46 篇涉台问题研究报告进行主题划分和分类归纳，结果如表 2 所示。在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背景下，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数量明显增加，军事议题和政治议题是美国主流智库持续关注的主要议题。美国主流智库研究主题和方向不断拓展，特别是在政治安全领域。

表 2 涉台问题研究报告的议题分类

议题	研究方向	数量/篇	
		选期前	选期
政治	台湾政治、美台勾连、中美博弈	6	15
经济	企业经营、国际贸易	2	3
军事	台海冲突、军事行动、兵棋推演	9	7
网络	网络攻击	0	2
科技	半导体	0	1
核安全	核设施	1	0
总计	—	18	28

1. 美国主流智库涉台军事议题

军事议题是大国博弈的关键领域,也是大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参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因素叠加,推进全球安全格局加速演进,由此产生的地区冲突、军事竞争、混合战争等军事议题为美国智库所关注。中国被美国错误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台湾问题又是美国干预中国内政、牵制中国发展的“关键牌”。因此,台海冲突的可能性和解决方式等涉台军事议题始终是美国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焦点。在本文选取的 46 篇报告中,有 16 篇聚焦涉台军事议题,来源于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等 7 家智库。报告内容重点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台海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和结果。台海军事冲突是美国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传统主题,美国智库特别关注“爆发军事冲突可能性”“兵棋推演结果”等问题。当前美国智库的涉台观点在总体性、方向性问题上日益趋同,但在具体问题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分歧。在共识点上,多数美国主流智库认为中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难以预测,一旦爆发冲突势必“两败俱伤”,并声称美国应加强对台军事援助,阻止中国实现统一。在差异点上,一些报告认为中国在相关区域的控制能力更强,在台海冲突中取胜的可能性更高。但更多学者声称,在台湾地区积极抵抗所谓“两栖登陆作战”的前提下,美国能够在台海冲突中取胜,维持台海现状。还有一些学者声称,俄乌冲突将成为台湾问题的镜鉴,美国干预俄乌冲突的结果将直接影响美国介入台湾问题的定位^[16]。

二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主张倾向。在对台政策方面,美国战略界长期存在“保台派”“维持现状派”和“弃台派”三种主张^[17]。但从近期美国主流智库相关研究报告看,“弃台派”主张同美国政府对华“强化对抗”的需求明显不符,已较少出现在智库研究报告中。“保台派”与“维持现状派”趋同化明显,成为美国战略界对台主流思想。从战略目标上看,越来越多的智库主张美国政府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支持,维持海峡两岸关系现状,将台湾问题牢牢绑定在所谓“印太框架”内。从手段措施上看,相关研究声称美国应以威慑为主要手段,使中国政府认识到两岸统一极其困难、成本极大、无法实现,迫使中国政府放弃“以武促统”。同时,这些智库声称美国要在维持台海局势现状的情况下,强化危机模拟、风险管控、情报研判、对华遏制、意识形态渗透等工作,提升美国在台海冲突中的胜算。

2. 美国主流智库涉台政治议题

政治议题是大国之间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策方针和意识形态对抗的重要领域,也是美国智库主要的研究议题,相关研究包括美国政治、中美关系、国际局势等方向。为了服务美国政府对华全面对抗政策,美国智库聚焦涉台政治议题并不断加大研究投入,相关研究在选期报告中占比迅速增长,成为选期美国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首要议题。46 篇报告中有 21 篇聚焦政治议题,占比接近 50%,来源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 8 家智库。梳理报告内容发现,美国智库的研究热点集中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美博弈和两岸关系等主题上。

一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选举结果和后续动向。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是美国智库长期关注的话题,相关研究呈现规律的周期性变化,研究数量在选期有明显增长。随着 2024 年 1 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公布,美国智库迅速对此开展分析研判,评估谋划新一轮干涉台湾问题的政策与路线。哈德逊研究所的报告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广泛而强劲”地支持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

美国将同台湾当局在贸易谈判和关税协议等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加强经济和军事“合作”^[18]。美国进步中心的报告声称，世界各国应制定强有力的战略应对中国大陆不断升级的所谓“干涉和威胁”，从而维护所谓“全球民主进程”的完整性。选举结果和国际反应凸显了台湾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从复杂性上看，台湾问题虽然是中国内政，但仍存在外部国家的干涉，暴露出部分国家和地区面对台湾问题时的双重标准和政治角力。从敏感性上看，美国智库在认知态度上对中国大陆持有大量的误解与偏见。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为美国智库提供了有力切口，美国智库有意借此将台湾地区塑造为所谓“全球民主典范”，将大陆推向全球民主的对立面，进一步掀起对华“人权攻势”。2024 年 5 月 20 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就职演说，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宣扬分裂谬论，煽动两岸对立对抗。6 月，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中国大陆在 5 月 23 至 24 日开展的“联合利剑—2024A”大规模军事演习，是对台湾地区实施的所谓“灰色地带隔离行动”，显示出“执法和军事力量”共同行动的明显迹象^[14]。由此可见，美国智库对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话题保持长期关注，并就台湾当局和两岸关系最新动向进行分析研判，为赖清德等“台独”势力幕后站台。

二是中美战略博弈的程度和必要限度。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事关人类前途命运^[19]。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伴随这一过程加速演进，中美博弈主题愈发为全球战略界、情报界重视。美国智库从自身立场出发，贯彻从美国霸权视角看待“中国挑战”的价值取向，围绕台湾问题中的中美战略博弈进行研究，展现出浓重的意识形态底色和“零和博弈”竞争观念。在这种上层建筑的影响下，美国智库逐渐失去客观性、科学性的研究原则，以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价值观分析中美关系，推进新型“阵营驱动型竞争”。但是，美国智库普遍认为这一竞争必须有所限制。美国智库认为，美国插手台湾问题深刻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甚至存在引发中美军事冲突的潜在可能，需要保持谨慎态度，在关键问题上保持冷静和克制，避免陷入“螺旋式上升”的安全困境。

三是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和美国介入。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对实现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和外部势力相互勾连，加紧实施“台独”分裂活动，加剧两岸关系紧张恶化。为服务美国政府“以台遏华”的图谋，美国智库持续对两岸关系开展跟踪研判，并对两岸关系走向做出消极预测，为“台独”势力加速掏空一个中国原则、推进“去中国化”运动、构建所谓“一中一台”体系提供参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报告，声称 2024 年可能是决定两岸关系未来走势的关键一年，在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后，台湾将面临更多来自大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美国进步中心发布报告称，美国介入两岸关系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帮助台湾地区保持其所谓“战略弹性”和所谓“自主权”，应对所谓来自大陆的施压手段，以最大限度和平解决台海紧张局势。对两岸关系的消极预测体现出美国智库引导我国台湾地区“亲美抗中”“去中谋独”的企图，反映出当前中美双方围绕两岸关系的激烈认知对抗。

（一）美国主流智库涉台认知的整体态势

语义搭配能够揭示某些语义特征的搭配词与意核之间的共选关系，是寻找本文中意义单位的重要步骤^[21]。通过语义搭配分析，可以发现美国主流智库对台湾问题的认知态度变化，揭示背后的认知逻辑和变化趋势。

在选期前报告中，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研究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事业的动向趋势，为美国“以台遏华”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如图 1 所示，在这一阶段的研究报告中，核心区主题词按频次高低依次为“大陆”“台湾”和“美国”，描述主体间联系的主题词依次为“战争”“行动”“军事”“能力”“经济”。在中间层和边缘层中，超过半数的词语与军事安全、台海冲突有关，如鼓吹中国军事威胁的“攻击”“威慑”，指责大陆孤立台湾的所谓“封锁”，污名中国统一事业的“入侵”等。这一时期，美国主流智库的涉台认知主要围绕台湾问题武力解决的可能性、方式途径和对策建议。

在选期报告中，受中美博弈、贸易冲突、美国大选、乌克兰危机等因素影响，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重心向政治领域转移，分析研判两岸关系、中美博弈的趋势和影响，研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对台军售、涉台法案、供应链转移等主题。如图 2 所示，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报告中，核心区主题词按频次高低依次为“台湾”“大陆”和“美国”，描述主体间联系的主题词依次为“经济”“行动”“军事”“部队”“政治”。受“政策导向”的政治氛围影响，美国智库的党争性不断增强^[22]，立场日趋“右转”，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右转”的背后推手^[23]。因此，政治领域取代军事领域，成为美国智库最热门的涉台问题研究方向。此外，美国主流智库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拓展，由政治、军事安全为代表的传统安全领域向经济、网络、科技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延伸。在中间层和边缘层中，与军事安全相关词语的数量减少、权重降低，与外交和国际关系有关的“国际”“盟友”和与科技安全密切联系的“供应链”权重增加，反映出在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背景下，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认知的调整。

（二）美国主流智库涉台认知的突出动向

结合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后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文本内容和共词关系变化，本文认为美国主流智库涉台认知存在三点突出动向。

一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可能性极低。在本文研究的 46 篇报告中，美国智库极少提到“合作”“改进”等推动中美关系缓和、促进友好合作的积极性词语，反而一味渲染“中国威胁论”。此举表明，美国智库在明知台湾问题是中国的红线，没有任何妥协空间的情况下，依然执意干预台湾问题、拱火台海冲突，突出对抗色彩。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双方改善期望低、冲突性高的关键议题。拜登政府秉持“投资+遏制”的对华政策，坚持对抗竞争的政策主基调，投资美国本土提升自身综合实力，以遏制措施意图削弱中国国际影响。在这种施策思路的影响下，美国绝不会放弃台湾这一维护自身霸权的“政治工具”，中国需要在这一问题上做好长期斗争准备。

二是刻意构建台湾问题同俄乌冲突间的认知联系。由图 1 和图 2 可知，“乌克兰”一词始终居于词义网络的边缘层，同“美国”“俄罗斯”等词存在搭配联系。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同俄罗斯的矛盾急剧升级。在此背景下，美国智库将台湾问题和俄乌冲突错误对比，刻意制造两者之间的认知联系，妄图将中国内政上升到国际层面，大肆污名中国为破坏台海稳定和世

界和平的所谓“入侵者”。例如，哈德逊研究所发布报告称，对俄乌冲突的干预为美国介入台湾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借鉴，美国应调整策略，加大对台军售力度，为所谓“台湾战争”做足准备，并向台湾当局做出防务承诺^[24]。美国智库无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这一国际共识，将台海冲突称作所谓“国家争端”，为强化对台军事合作开展政策引导和铺垫。我们需要关注和警惕由此产生的舆论战、认知战风险。

三是加速解离、掏空一个中国政策。有学者认为，在世界舞台上，中国呈现的国家形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的“他塑”，同真实情况往往存在偏差^[25]。在美国主流智库塑造的认知中，一个中国原则“不存在”国际共识，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将以各自理解的“一个中国”为基本原则，处理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发布报告称，美国对“一个中国”的理解是“承认”中国立场的存在，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但保留与台湾当局维持非官方关系的权利；台湾当局对“一个中国”的理解具有明显的分裂主义倾向，即妄称台湾已经“独立”，管辖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报告声称，美国认为的“一个中国”必须通过和平且符合台湾民众意愿的方式实现，而台湾民众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也在逐渐减弱和偏离。由此可见，美国智库正积极配合美国政府对台战略，加速解离、掏空一个中国政策，对台湾当局“去中国化”做法选择性忽略，导致中美两国就台湾问题达成共识的难度不断增加。

（三）美国主流智库涉台认知的基本态度

高频词搭配的变化说明语义关联不同，反映主体对事件认知模式和思考方式的变化^[26]。“大陆”“台湾”和“美国”三词是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词义网络核心。本文根据共词关系数据，分别选取这三个主题词，排除其他主题词和功能词（情态动词、连接词等）后，进行高频词搭配和语义倾向分析，以此揭示美国主流智库对不同主体的不同定位和认知态度变化。

一是由“大陆”一词的高频搭配出发，分析美国主流智库涉台认知。美国智库将中国作为情报对抗的首要目标。分析“大陆”一词的出现次数、搭配和语义倾向，结果如图3、图4所示。分析发现，美国智库对中国的认知由军事对抗向政治、经济、政策、外交等全方位、多领域转变。在选期前报告中，“大陆”与“行动”（14%）、“经济”（13%）的搭配频次最高，还与“军事”（13%）、“战略”（11%）、“战争”（11%）、“战争”（11%）、“战争”（11%）等词搭配出现。结合报告内容，美国主流智库倾向利用战争模型和兵棋推演来评估武力冲突升级的可能性，预测两栖登陆作战的过程等。不同智库的研究结果各有侧重、相互补充，为美国政府和军队提供了咨政建议和决策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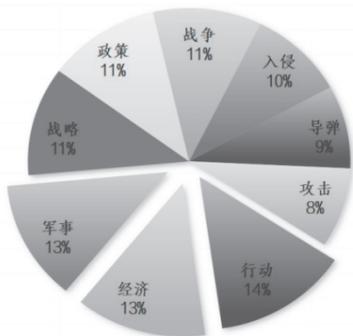


图3 选期前主题词“大陆”的高频词搭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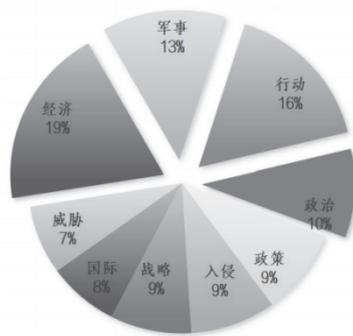


图4 选期主题词“大陆”的高频词搭配

进入选期，“中国经济”“国家政治”“对台政策”“中美关系”等成为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智库对华情报对抗的范畴不断扩大。随着美国政府悍然宣布中国为所谓“修正主义国家”和“首要战略性竞争对手”，美国智库愈发主张推动中美全面战略竞争，形成了一批意在遏制、围堵、打压中国的方案设计和对策建议。例如，传统基金会发布报告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新冷战”，主张美国政府应连同其盟友与中国开展全方位对抗，以此维系全球霸权。美国智库鼓吹“中国威胁”、加剧摩擦对抗，鼓吹“中美脱钩”、构建中美新冷战体系，进一步增加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二是由“台湾”一词的高频搭配出发，分析美国主流智库涉台认知。台湾是美国智库开展涉台问题研究的主要对象，分析“台湾”一词的出现次数、搭配和语义倾向，结果如图 5、图 6 所示。分析发现，美国智库对台湾的认知重心由“行动”（15%）向“经济”（15%）、“军事”（13%）、“支持”（13%）领域转变。以政党关系、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美台勾连为代表的政治议题和以供应链、半导体为代表的经济、科技议题，成为美国智库的研究重点。同时，报告中的“台湾”和“入侵”（11%）、“攻击”（8%）等词联系密切，搭配形成“入侵台湾”“攻击台湾”等具有军事冲突色彩的词语，体现出美国智库有意将台湾地区置于军事冲突的阴影下，渲染大陆“威胁论”，引发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误解，离间两岸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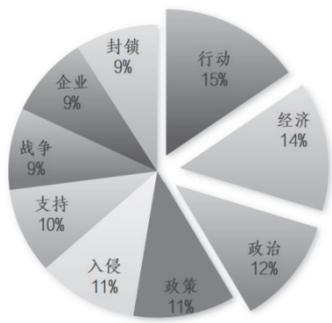


图 5 选期前主题词“台湾”的高频词搭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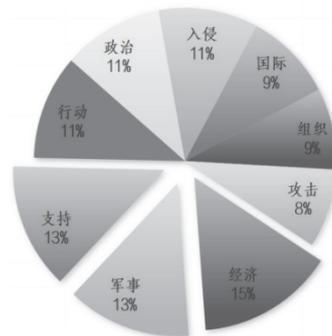


图 6 选期主题词“台湾”的高频词搭配

在选期报告中，“台湾”与“国际”“组织”等词搭配的比例明显提高。可见，美国智库正积极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企图借国际社会力量破坏两岸关系、阻碍中国统一，为台湾当局“谋独”寻求国际支持。例如，传统基金会发布报告鼓吹美国政府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所谓必要性和紧迫性，称此举为“保护中国台湾及其 2300 万公民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并声称应恢复中国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的会员资格^[27]。

三是由“美国”一词的高频搭配出发，分析美国主流智库涉台认知。美国利益是智库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本立场。分析“美国”一词的出现次数、搭配和语义倾向，结果如图 7、图 8 所示。分析发现，美国主流智库对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中的角色定位日益清晰，处置态度趋于稳定。在角色定位上，相关智库认为美国应继续作为台湾的“支持者”，采取新手段、变换新方法，利用台湾问题持续同中国展开博弈。在中美博弈升级和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背景下，“美国”同“经济”（14%）、“支持”（13%）、“盟友”（11%）等词的搭配比例明显提高，同“战争”“攻击”等词的搭配比

例有所降低。报告显示, 美国智库支持美国政府连同其盟友, 为台湾提供包括经济、军事、防务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在经济方面, 继续密切对台“非官方合作”联系, 利用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特别是在半导体领域的关键作用, 搭建“以台遏华”的经济壁垒。在军事方面, 加大对台军售力度和广度, 增加军事设施的部署规模, 提升当地作战力量。在防务方面, 美国将协助台湾当局开展“安全防务”, 并试图将台纳入所谓“美日安保体系”, 拉拢亚太盟友及其他国际反华势力干涉两岸关系。例如, 兰德公司发布报告妄称, 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英国作为美国的盟友, 一旦发生两岸冲突, 将以外交和强化对大陆制裁的方式支持台湾当局, 但以军事力量积极介入两岸冲突的可能性较低^[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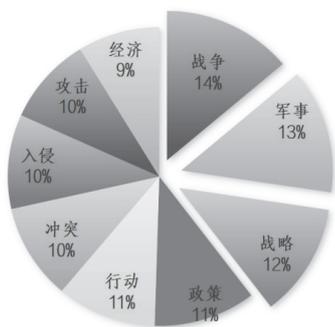


图7 选期前主题词“美国”的高频词搭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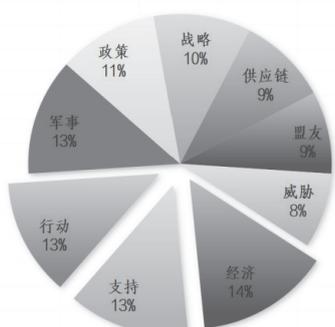


图8 选期主题词“美国”的高频词搭配

在处置态度上, 美国主流智库倾向“不改变台海现状与武装台湾并行”的立场, 将台湾维持在所谓“不统不独”的现状中, 主张既要阻止台湾当局和美国政府采取过激行动, 避免中美两国爆发直接冲突; 又要进一步干预、武装、分离台湾, 提高中国实现统一的成本。例如, 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报告声称, 维持台湾政治现状、减少美中两国产生灾难性冲突的可能性, 是各方可以接受的唯一选择, 并主张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增强台湾实力。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 美国智库通过佩洛西窜访台湾、蔡英文“过境”窜美、赖清德发表“台独”言论等事件, 结合中国官方反应, 不断评估、预测、试探中国处置台湾问题的底线, 研判美国的干涉和介入空间, 为美西方对华极限施压提供参考。

四、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现实影响

建构主义认为, “社会认同”能够建构国家的利益与安全, 规范、法律、认同、机构等因素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行为和利益^[29]。智库对国家安全和具有重要作用, 对于塑造“社会认同”的影响力日益凸显, 特别是在美国本土, 巨大的政治空间显著放大了美国智库的影响力, 使其能够发挥远超其他国家智库的政治影响^[30]。

(一) 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生成传导

智库研究的影响传导分为两个过程。一是围绕知识生产与应用展开的智库知识生产过程; 二是围绕智库成果向政治决策转化的智库政策影响过程。这两个密切联系的过程, 加之美国独特的“旋转门”机制, 使得美国智库能够与政治决策层密切联合, 实现美国智库研究主张的影响传导。

1. 知识生产过程

知识生产是创造为物质世界转化提供条件的思想、观点、方法的过程。智库成果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生产过程，思想生产、观点供给、决策参与和学术研究是美国智库的生存价值基础^[31]。美国智库对台湾问题偏向负面认知，这种认知源于国力对比变化、意识形态冲突、社会制度差异、发展理念不同、历史遗留问题等多重因素。这些因素也是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的知识生产基础。

针对涉台问题，美国主流智库从自身话语、“敌人”话语、第三方话语三个维度展开知识生产与创造活动。从自身话语看，美国主流智库将美国打造为台湾当局的“支持者”，为强化美台勾连和对台政策不断寻找和创造法理、伦理和历史依据，使得美国政府能够“名正言顺”地介入和干预台湾问题。美国主流智库刻意营造对立，制造所谓“敌人”话语。美国主流智库长期对中国抱有敌意，在介入两岸关系时，大肆渲染“威胁论”，鼓吹大陆对台湾存在所谓武力威胁和政治压迫，持续输出“敌人”话语。美国智库在涉台问题上，明显秉持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对大陆和台湾持有误解偏见，不断歪曲事实、造谣污蔑，自下而上、由外到内影响着美国决策层和广大民众对相关问题的认知。从第三方话语看，美国主流智库不断尝试将台湾问题包装为国际问题，将中国内政迁移为国际争端。这是一种面向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知识生产活动。通过这种知识生产，美国妄图为其盟友特别是日、韩等亚洲国家介入台湾问题预留切口和通道，使台湾问题愈发复杂化。

2. 政策影响过程

政策网络理论有助于“理解与解释在政策过程与公共治理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32]，是西方国家公共政策的探索产物，也是理解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政策影响的有效方式。美国主流智库作为美国政策网络中的一方，以研究前瞻性和预测性成为美国涉台政策的“风向标”。其提出的涉台政策主张，特别是围绕涉台法案、对华竞争文件等提出对策建议，在美国涉台政策和政府行动上多有落实和体现。

在政策网络理论中，政策的行为取向是协调特定政策领域的利益，由不同的横向部门来处理相关的政策议题。美国智库作为政策议题的参与主体，是涉台政策主张的提出者，在政策网络中具有明显的政治导向作用。“旋转门”机制使美国智库成为政治资源储备库。由于这一机制，美国智库的涉台政策主张能够影响美国决策层，实现意见的传导，串联不同的政策参与主体。由此，智库主张得以通过官方渠道影响国家意志，服务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和涉台行动。此外，美国智库受美国党派政治影响，为了表达利益团体和行政官僚的政治主张，整体立场趋向消极，其涉台问题研究除了服务对华政策外，也为党派竞争、拉拢选票等国内政治目标服务。

（二）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现实影响

智库是美国国家政治决策的重要参与力量，能够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为社会舆论构建框架甚至改变政府职能、参与美国政府运作等。在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背景下，美国主流智库的涉台问题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影响。

一是影响美国涉台决策。美国智库具有很强的政治服务性，是美国涉台政策的“探路石”。“旋转门”机制使得美政府部门和高级智库人才牢牢绑定，智库与白宫、国会和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纵横交错的人际网络，智库主张能源源不断地渗透到美国政治之中。当前，智库主张同政府行为之间具有高度一致性，诸多美政府对华政策都能在智库研究中找到前期影子。以美国涉台法案为例，

“2024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于 2023 年 12 月正式通过, 包括加速“武装”台湾等内容。在此之前, 美国企业研究所“Defense Authorization Highlights and Conference Issues”报告详细分析了国防授权的重点领域, 声称要通过该法案支持台湾, 增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控制能力。2024 年 1 月, 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不歧视台湾法案”, 妄称要求美国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主张同传统基金会一份报告的观点高度吻合。由此可见, 美国智库的涉台主张正在深刻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和行动, 强化了美国涉台政策规划网络, 实现知识和政治体系的紧密结合。

二是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与核心利益。外部势力干涉是中国推进统一进程的突出障碍^[33]。美国智库在台湾问题上频繁渲染“中国威胁”, 鼓吹中美新冷战, 成为加剧中美对抗的幕后推手, 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核心利益造成威胁。从内容上看, 多家美国智库批评美国对华接触战略, 悍然否认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通过多种路径妄图解离一个中国原则, 谋划对华全方位围堵、打压的路线。在经济领域, 推行“进口代替”和“友岸外包”策略, 促进产业“回流”; 在政治领域, 继续实施“印太战略”, 加强对台“非官方联系”; 在科技领域,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等。从手段上看, 为了应对互联网带来的传播挑战, 强化对研究成果的知识管理, 美国智库往往采取多种方式发布研究成果, 如制作专题网站、组织线上研讨会、运用新媒体传播等, 以此扩大受众范围, 广泛动员国内外包括媒体和公众在内的社会力量, 深化智库成果影响力, 扩大对华舆论攻势。

三是为台湾当局“谋独”活动提供支持。近年来, 美国智库利用强大的议题设置功能, 加大涉台问题研究力度, 频繁赴台参加交流活动或邀请台湾相关人士线上演讲。美国智库正同美国政府之间形成某种默契, 代替官方开展非正式交流活动, 为推动所谓“美台关系”拉抬声势。台湾当局一直期待美国对台湾的防务和经济支持“背书”, 在美国政府迟迟不做承诺的情况下, 得到美国智库的认可成为一种心理安慰。美国智库通过影响国会立法, 妄图将干涉中国内政“合法化”, 严重破坏国际规则、违背联合国宪章精神。特别是在美国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影响下, 台湾当局以 2024 年大选为契机, 加强同美国勾连, 持续推动政治体系、社会体系朝所谓“一中一台”定位运转, 为其“谋独”活动寻求更多支持。面对美国国会涉华立法烈度不断加剧, 要善于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运用国际法维护本国正当利益, 挫败一切损害中国利益的图谋。

五、结论与对策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全球政治经济持续博弈使得发展与安全面临的突出问题交织叠加。本研究以 2022 年 2 月至 2024 年 6 月美国 10 家主流智库的 46 篇研究报告为对象, 深入考察报告内容、认知和影响。在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背景下, 美国主流智库的涉台问题研究报告数量显著增加, 特别是围绕政治议题的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 政治议题、军事议题是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主要方向, 但经济、网络、科技、核安全等议题也得到美国主流智库的广泛关注, 反映出美国智库紧跟美政府行动导向、针对台湾问题全面谋划对华政策。在涉台认知方面, 美国智库将美国自身视为台湾当局的“支持者”和台海冲突的“调和者”, 对中国“全面对抗”的认知态度进一步深化。美国智库将台湾作为中美博弈的政治筹码和“印太战略”的关键一环, “以台遏华”

战略在不同智库之间形成共识，深层次反映了美国智库对台湾问题的认知调整和研究动向。智库知识生产和政策网络理论揭示美国智库涉台问题研究如何深刻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相关研究为“台独”分子的“谋独”活动提供间接支持，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我们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展示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台独’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34]目前，中国在推进国家统一、反“独”促统上存在外部势力干涉、台湾当局渐进“台独”、台湾一些政治势力和人物保持灰色“中立”三个方面的突出挑战^[35]。这需要战略界和情报界正确看待美国智库研究内容，强化跟踪研判，开展有效反制，完善中国智库建设。

一是保持战略定力，深化对美国智库的系统认知。21 世纪以来，随着政策咨询渠道的不断拓展和网络媒介的广泛运用，全球智库“挤出”效应显著、竞争明显加剧。为了自身存续，智库领域的“做库”活动和市场化趋势日益突出。在西方国家智库市场化的趋势下，美国智库研究“注水”严重，大量的成果是为竞争而研究、为经费而研究，成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报市场中的一个“竞品”，本身具有的情报分析价值有限。中国智库应正确看待美国智库的研究内容和在政策舆论场发挥的作用。其一，要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情报，对美国主流智库研究动向保持全过程、常态化跟踪研判，尤其是重点智库、重点人员政治倾向和有关涉华提案，对其可预见风险进行充分研判，对可能受到制裁或遏制的有关事件发出预警，主动规避风险。其二，要重点关注美国智库的高质量涉台问题研究报告，特别是由高影响力作者撰写、参与官方听证或同美国政府政策走向高度吻合的研究。要跟踪其关联成果和发展趋势，掌握其研究人员的身份背景，起底其背后的政治势力、资助来源和政党派别，摸清智库主张的形成过程和影响传导路径，从其提出的对策主张和咨政建议中研判美国下一步的涉台政策方向，做出前瞻性预测和应对工作。其三，中国学界、智库界、情报实务界在面对美国智库涉台问题研究时，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充分认识到随着中美竞争不断强化，美国智库对华认知激进化和极端化的客观趋势。在台湾问题不断复杂、“台独”势力持续活跃的当下，更需要把握好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演变的特点，时刻坚持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清醒头脑，绝不能因美国智库的大肆鼓吹和渲染而陷入西方的认知陷阱，警惕西方在认知上搞“和平演变”。其四，要寻找充分理由对美国相关智库或机构、人员、企业实施对等制裁。在美国国会涉华特别是涉台问题立法常态化的背景下，必须设立一套对等反制的标准和流程，确保打击准确、制裁有效、反应及时。例如，中国政府要为因涉台议题受到美国制裁的个人、企业和组织依法维权并提供帮助，针对美国立法内容和有关问题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公布黑名单对反华势力实施精准打击。

二是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加强中美智库机构的交流合作。历史不断告诫我们，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美国智库既是美国政治的参与者和政策服务者，也是中美强化人文交流的重要窗口。目前，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等原则性问题上出尔反尔，中美官方交流面临机制上、机会上和效果上的重重阻碍，需要拓展新平台、寻找交流机会。强化中美人文交流，积极推动人文交流“去政治标签化”，是摆脱“对抗思维”的政治冲击、打破中美之间认知壁垒的重要方式。中国智库界应在人文交流的基础上，加强同美国智库的交流沟通。双方可以在全球反恐、气候变化、知识产权、文化保护等可合作性高、冲突性低的议题上建立交流合作机制，依托跨国和国际平台共同展开研究，适时推动合作长效化，探索更多合作空间。在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可合作性低、冲突高的议题上，清晰表

达中国智库学者对中美关系的客观把握和政策主张, 广泛传达“妥善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完全统一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的民意事实。中国智库界要引导美国智库消除长期积累的错误认知, 还原客观真实的两岸关系, 建立其关于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的正确认识, 塑造对中美关系止跌企稳、尽快回到健康稳定发展轨道的认同。中美要建立稳固的沟通对话机制, 善于发掘两国交往中的积极因素和友好方面, 扩大合作基础。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上推行多边主义, 坚持底线思维, 争取实现“斗而不破”的中美竞争局面。需要注意的是, 在同美西方进行思想智力碰撞和开展智库交流沟通时, 要善于把握对话主动权, 始终坚持“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 避免在西方语境和西方对台湾问题的定义下进行沟通和辩论, 从“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这一国际共识出发, 提升议程设置的能力和自主性。在开展舆论斗争时, 坚决抵制“西方中心论”的错误倾向, 抓住美西方智库根植资本政治、夸大矛盾差异、贯彻双重标准等痛点有力回击, 化解西方国家围绕台湾问题的舆论攻势。

三是完善中国智库建设, 对冲美智库涉台问题研究负面影响。以智库对智库是应对美国智库涉台问题研究及其影响的有效途径, 既可以通过智库力量跟踪研判美国智库涉台问题研究动向趋势, 研判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向; 又可以发挥智库在引导公众认知和国际舆论上的优势, 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其一, 探索建立健全涉台问题研究平台。依托中国智库在人才资源、地缘区位、史料研究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产出高质量的两岸关系研究报告, 从中国视角、中国认知出发, 清晰阐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和民心所向; 坚决驳斥美西方智库渲染的“大陆威胁论”“军事隔离论”“灰色地带论”等影响两岸关系的错误言论, 消解台湾民众对大陆的错误认知。利用涉台问题研究的专门平台和专门力量, 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在信息搜集方面的算力优势, 提升情报分析研判的效能, 及时发现美国情报界、战略界涉台问题的前瞻信息线索, 服务中国对美战略运筹和战术制定。其二, 提升中国智库的舆论引导和国际话语能力。在国内层面, 综合运用新媒体和新媒介, 强化智库在公众认知和舆论引导方面的积极作用, 揭露美西方国家的“台湾牌”图谋, 引导人民群众强化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意识, 反制美西方国家的谋“独”思想和意识形态渗透。在国际层面, 鼓励中国智库“走出去”, 加强同国外媒体、智库、组织间的国际合作, 配套推进海外话语体系建设, 有效借助“外脑、外嘴”传播中国智库声音, 扩大国际影响力。其三, 在能力建设方面, 进一步完善中国智库人才流动和管理建设, 克服智库人才实务经验不足的弊端。探索智库人员去政府部门锻炼、去企业交流学习、去基层前沿调研的人才流动机制, 打通信息沟通渠道, 掌握真实需求, 促进研究成果有效转化落地^[36]。优化中国智库研究框架, 提升研究效益效率, 发挥不同性质智库的技术特长和研究优势, 组成互相协同、各有侧重的智库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58.
- [2] 钟厚涛. 台湾地区2024年选举对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的深层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22-134.
- [3] 黄仁伟. 中美战略相持阶段与战役缓冲期 [J]. 国际关系研究, 2022 (2): 3-13.
- [4] 安德鲁·里奇. 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 [M]. 潘羽辉,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0: 6.

- [5] 王先伟, 邹顺强. 美国智库近年涉台活动考察 [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23 (6): 81-91.
- [6] 赵恒煜. 美国智库的“中国观”研究——以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研报的综合分析为例 [J]. 情报杂志, 2020 (2): 35-43.
- [7] 周文星. 美国智库对华政策的认知、根源及其应对——基于智库专家涉华研究的比较分析 [J]. 情报杂志, 2023 (2): 57-64.
- [8] 齐欣. 基于推特的美国智库专家对华观察视角分析——以新美国安全中心为例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1 (7): 131-137.
- [9] 杜鑫, 谢晓专, 杨德崑, 等. 拜登百日新政期间美国智库涉华信息内容与态度分析 [J]. 情报杂志, 2022 (8): 87-93.
- [10] 贺孝康, 李宗芳. 美国对华“冷合作”政策评析——基于对美国智库的考察 [J].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20 (2): 20-25.
- [11] 聂书江. 2017 海外智库的中国观盘点和分析 [J]. 对外传播, 2017 (12): 13-15.
- [12] 元利兴. 美国智库与政治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8: 46-47.
- [13] McGann, James G.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EB/OL]. (2021-01-28) [2024-06-06]. <https://repository.upenn.edu/entities/publication/9f1730fa-da55-40bd-a1f4-1c2b2346b753>.
- [14] 编委会. 全球智库影响力评价报告 2022 [EB/OL]. (2023-11-24) [2024-06-06]. <https://ciraa.zju.edu.cn/report/report20231124.pdf>.
- [15] McCusker, Elaine, John G. Ferrari. Defense Authorization Highlights and Conference Issues.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EB/OL], (2023-08-01) [2024-06-04]. <http://www.jstor.org/stable/resrep52745>.
- [16] Brent Sadler. Applying Lessons of the Naval War in Ukraine for a Potential War with China [EB/OL]. (2023-01-05) [2024-06-08]. <https://www.heritage.org/asia/report/applying-lessons-the-naval-war-ukraine-potential-war-china>.
- [17] 周文星. 美国战略界对台政策辩论及其影响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2 (2): 54-62.
- [18] Riley Walters. Taiwan: After-Election Report [EB/OL]. (2024-01-22) [2024-06-08]. <https://www.hudson.org/security-alliances/taiwan-after-election-report>.
- [19] 钟声. 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 [N]. 人民日报, 2023-10-31 (3).
- [20] Cochran, William G. The Chi-square Test of Goodness of Fit [J]. The 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1952 (23): 315-345.
- [21] Sinclair J. Trust the text: Language, Corpus and discourse [M]. London: Routledge, 2004: 35-37.
- [22] 詹姆斯·G·麦甘. 美国智库与决策建议 [M]. 肖宏宇, 李楠,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92.
- [23] 钱力. 简析美国智库及其活动、议程和影响 [R]. 华盛顿: 中美研究中心, 2016: 20-22.
- [24] John P. Walters. Winning in Ukraine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Deterring a War in Taiwan [EB/OL]. (2023-04-28) [2024-06-08]. <https://www.hudson.org/national-security-defense/winning-ukraine-critically-important-deterring-war-taiwan>.
- [25] 王华. 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 [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20: 145-146.

李恒, 周生龙. 美国主流智库涉台问题研究的内容、认知与影响——以2024年台湾地区选举为背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17-135.

- [26] 韩存新, 赵巧容. 批评话语分析中的语料库语言学方法 [J]. 话语研究论丛, 2016 (2): 108-121.
- [27] Brett Schaefer. The U. S. Is Right to “Support”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B/OL]. (2024-01-11) [2024-06-08]. <https://www.heritage.org/global-politics/report/the-us-right-support-taiwans-participation-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
- [28] Rafiq Dossani, Cortez A. Cooper III, Joan Chang. Middle-Power Equities in a Cross-Strait Conflict [EB/OL]. (2024-06-20) [2024-06-26].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3108-1.html.
- [29] 余潇枫. 非传统安全概论: 上 [M]. 3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86-88.
- [30] 王海明. 政治化的困境: 美国保守主义智库的兴起 [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8: 155.
- [31] 彭伟步. 美国智库全球舆论生产与公共外交缺陷 [J]. 社会科学文摘, 2020 (5): 115-117.
- [32] 石凯, 胡伟. 政策网络理论: 政策过程的新范式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6 (3): 28-35.
-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 (2022年8月) [N]. 人民日报, 2022-08-11 (5).
- [34]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
- [35] 郝小刚, 任志锋.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的“四个坚定”重要论述的叙事逻辑与内涵意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3): 126-137.
- [36] 李刚, 王斯敏, 吕诚诚. CTTI 智库报告 (2020)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205.

责任编辑: 龚静阳



美国国会立法干涉中国西藏事务 的特点与动向

杜哲元

（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8）

摘要：2017年美国对中国推行全面战略竞争之后，美国国会随之加大力度以立法方式干涉中国西藏事务。这集中反映在美国国会涉藏专项法案的数量和成为“法律”的几率大幅上升。所谓达赖转世议题、“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和水资源”议题、十四世达赖集团“民主性”议题以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议题，开始成为美国国会立法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四个重点方向。在涉藏问题上要求对中国频繁发起定向制裁、对中国西藏事务大肆进行污名化以及推动涉藏问题进一步国际化，开始成为美国国会立法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三个主要手段。这四个重点方向和三个主要手段相互联系，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带来了一定挑战。对此，中国应未雨绸缪，从内政、外交和外宣三个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关键词：美国国会；涉藏法案；干涉动向；中国西藏；边疆安全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4-0136-13

DOI：10.13946/j.cnki.jcqiis.2024.04.011

作者简介：杜哲元，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大变局下美国干涉我国西部边疆事务的手段与趋势研究”（21YJCGJW003）

引用格式：杜哲元. 美国国会立法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特点与动向[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4): 136-148.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11月,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后,美国开始推行对华战略竞争^[1],对华政策更侧重于遏制打压,中美关系出现明显变化。2017年初,特朗普政府上台。经过近一年的战略摸索和试探后,美国于该年11月正式提出“印太战略”,并在12月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开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2]。这标志着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3],美国开始推行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对华遏制打压政策走向公开化和加剧化,并导致中美关系严重恶化。2021年初,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并扩展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和对华全面战略竞争^[4],将中国定性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5],提升对华遏制打压的强度、广度和精细度,并在对华政策中更加突出“价值观外交”^[6],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可以说,2017年之后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在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总框架下,美国加大力度干涉中国内政,涉疆、涉港问题开始成为美国遏制打压中国新的重点方向。2017年以来,在美国推行全面对华战略竞争和中美关系严重恶化的新背景下,在涉疆和涉港问题的热度大幅上升的新情况下,美国是否仍然关注涉藏问题这个中美关系中的老问题?美国对中国西藏事务的干涉有哪些新的变化?美国的干涉将会给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三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民族宗教工作的大局,而且关系到中国西部边疆的发展稳定和长治久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7]。在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解决影响我国宗教健康传承的突出问题”^[8]。“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9],西藏事务在全国民族宗教工作大局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在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中干涉中国西藏事务,不仅将破坏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而且将严重干扰中国藏传佛教的健康传承。因此,通过细致和深入的学术研究回答上述三个问题并找到恰当有效的应对方案,对于做好涉藏民族宗教工作、实现中国西部边疆的发展稳定和长治久安十分必要。本文尝试通过分析2017年以来美国国会涉藏专项法案和决议案回答上述三个问题。

国内学术界就美国对中国西藏事务的干涉较早予以了关注和研究,相关成果比较丰富。2017年以来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聚焦于美国国会的涉藏法案。有学者分析和批判了美国“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的谬误^[10],有学者对美国国会涉藏立法的国内政治动因进行研究^[11]。但这一类型的研究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对117届国会以来的一系列新的涉藏法案未能及时关注,其次是对这一系列新的涉藏法案缺乏整体性的归纳分析。第二种聚焦于美国政府整体的涉藏政策。有学者对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国会三者的涉藏政策展开研究,认为美国国会的涉藏立法活动愈发频繁和激进^[12];有学者从美国亚太战略角度研究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认为拜登政府对所谓“西藏问题”的操弄更加系统具体^[13]。这一类型研究虽然涉及美国国会对中国西藏事务的立法干涉,但分析的深度相对有限。第三种将美国国会的涉藏立法放置在美国国会涉华立法活动的总框架内进行分析。有学者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会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法案的背景、沿袭和内容^[14],有学者研究了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国会的涉华法案及其影响^[15],还有学者以第115—117届美国国会涉华提案为案例,分析了美国国会涉华立法的特点、机制与走向^[16]。这一类型研究虽然涉及美国

国会的涉藏法案，但在涉藏法案的分析深度上略显不足。

本文聚焦 2017 年以来美国国会的涉藏专项法案和决议案，并以此为主要研究依据，研判 2017 年以来美国对中国西藏事务的关注度和干涉力度，深入而全面地分析 2017 年以来美国干涉中国西藏事务新动向的具体内容以及对中国的影 响，并从内政、外交和外宣三个方面提出应对措施。本文之所以选择美国国会的涉藏专项法案和决议案作为研究美国涉藏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因为它们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美国政府涉藏政策的特点和动向。首先，自 1987 年以来，国会逐渐成为美国涉藏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动者^[17]。其次，这些涉藏专项法案一旦被总统签署，会成为美国政府必须执行政策，而且往往是美国政府涉藏政策中核心性与纲领性政策。再次，即便一项涉藏专项法案在国会两院通过并被总统签署的概率极低，但它仍有较大的分析价值。虽然国会议员不直接参与美国对外事务的决策和执行，但他们提出的涉外法案和决议案仍会对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为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基础或框定方向。复次，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美国国会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它对美国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有着较大的影响，这些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同样也能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最后，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美国政府通常扮演着相对谨慎的角色，而国会更为激进和强硬，在提出对华遏制打压政策方面，往往会先于美国政府，其力度往往会大于美国政府。因此，分析美国国会的涉藏专项法案和决议案，既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预判美国政府整体涉藏政策的走向，也可以预判美国政府涉藏政策严重性和危害性的上限之所在。

二、美国国会涉藏立法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2017 年以来，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了诸多涉藏专项法案和决议案，这些法案和决议案不仅数量较多、成“法”率较高，而且在内容上普遍激进强硬、富有攻击性。相对于美国国会以往的涉藏法案，它们在美国中央政治层面、选区政治层面以及与其他涉华法案的关联性上都表现出一系列新特点。

（一）美国国会提出的涉藏专项法案和决议案

2017 年至今，美国国会已历经四届，共提出过 11 项涉藏专项法案。在 115 届国会，众议员詹姆斯·麦格文和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分别提出了“对等进入西藏法案”，联署议员分别达 55 人和 15 人。众议员詹姆斯·森森布伦纳提出了“藏人难民援助法案”，联署议员有 4 人。这两项法案实际上早在 2014 年的 113 届国会和 2008 年的 110 届国会中已有出现。在 116 届国会，麦格文和卢比奥又分别提出了“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联署议员分别达 35 人和 25 人。众议员斯科特·佩里提出了“自由西藏法案”，无联署议员。在 117 届国会，佩里又提出了“西藏独立法案”，有 2 名议员联署。麦格文和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分别提出了“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联署议员分别有 9 人和 2 人。在 118 届国会前半期，麦格文和默克利再次分别提出“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联署议员分别增至 42 人和 15 人。前者于 2024 年 2 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后者更名为“促进解决藏中争议法案”后，于 2024 年 5 月和 6 月分别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在这些法案中，“对等进入西藏法案”在 2018 年 12 月被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被捆绑进“2021 财年综合拨款法案”，在 2020 年 12 月被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在某种意义上，该法是继“2002 年西藏政策法”之后美国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又一项总纲性“法律”。“促进解决藏中争议法案”则于 2024

年 7 月 12 日被拜登签署成为“法律”。

表 1 2017 年以来美国国会提出的涉藏专项法案

法案名称	提案人	提出时间	法案状态
“对等进入西藏法案”	詹姆斯·麦格文（众议员、民主党人）	2017 年 4 月	成为“法律”
“对等进入西藏法案”	马可·卢比奥（参议员、共和党人）	2017 年 4 月	未成为“法律”
“藏人难民援助法案”	詹姆斯·森森布伦纳（众议员、共和党人）	2017 年 6 月	未成为“法律”
“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	詹姆斯·麦格文（众议员、民主党人）	2019 年 9 月	成为“法律”
“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	马可·卢比奥（参议员、共和党人）	2019 年 9 月	未成为“法律”
“自由西藏法案”	斯科特·佩里（众议员、共和党人）	2020 年 5 月	未成为“法律”
“西藏独立法案”	斯科特·佩里（众议员、共和党人）	2021 年 6 月	未成为“法律”
“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	詹姆斯·麦格文（众议员、民主党人）	2022 年 7 月	未成为“法律”
“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	杰夫·默克利（参议员、民主党人）	2022 年 12 月	未成为“法律”
“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	詹姆斯·麦格文（众议员、民主党人）	2023 年 1 月	在众议院通过
“促进解决藏中争端法案”	杰夫·默克利（参议员、民主党人）	2023 年 1 月	成为“法律”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网站

在这 7 年多时间内，美国国会还提出了 10 项涉藏专项决议案和 2 项共同决议案（H. Res. 65、H. Res. 743、S. Res. 429、S. Res. 686、H. Res. 697、S. Res. 752、S. Res. 75、H. Res. 540、S. Res. 619、H. Res. 1072、H. Con. Res. 89、S. Con. Res. 30）。其中，115 届国会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提出的 429 号决议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116 届国会众议员泰德·约霍提出的 697 号决议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前者意在“确认 2018 年 3 月 10 日为‘藏人权利日’，并呼吁国务院全面落实‘2002 年西藏政策法’的规定”^[18]；后者意在施压“中国在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并肯定十四世达赖为促进全球和平、和谐和理解所做的工作”^[19]。美国炒作涉藏议题的反华顽固派议员已经出现新老更替，老牌反华顽固派议员如丹尼尔·范斯坦、莱西与克里斯托弗·史密斯等人要么已经去世，要么已经退休，要么反华关注重点发生转移，而麦格文与卢比奥则成为美国国会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急先锋”。一些近年进入美国国会的新议员，如佩里和乔什·霍利等人，在干涉中国西藏事务上表现得相当激进。

总体而言，115—118 届美国国会提出的涉藏专项法案的数量不仅远超奥巴马政府时期的 111—114 届国会，而且成为“法律”的几率非常高。从纵向比较来看，111—114 届国会在 8 年间提出过 6 项涉藏专项法案，只有“对等进入西藏法案”为新法案，且没有一项法案成为“法律”。而 115—118 届国会在七年半的时间内就提出过 11 项涉藏专项法案，其中新法案就有 8 项，且有 3 项法案成为“法律”。可见，2017 年以来美国国会对中国西藏事务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奥巴马政府时期。从横向比较来看，在专项法案成为“法律”的几率上，2017 年以来美国国会对涉疆和涉港问题的关注度急剧上升，国会中提出的涉疆和涉港法案的数量剧增，在数量上远超涉藏专项法案，但目前涉疆专项法案有 2 项成为“法律”（“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涉港专项法案有 3 项成为“法律”（“香港自治法”“香港人权和民主法”以及“禁止向香港警察商业出口涵盖军用

品法”）。由此也可见，2017 年以来美国国会立法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力度不亚于它对中国新疆事务、香港事务的干涉。

（二）美国国会涉藏立法的特点

从美国中央政治层面看，首先，在府会政治上，115—118 届国会与白宫之间均不存在“强分立”状态。115 届国会和 117 届国会与白宫是“一致政府”，116 届国会和 118 届国会与白宫是“弱分立政府”，总统面临国会争权的掣肘和压力相对较小，国会借涉藏问题与总统争权的动力也相对较小。其次，在党派政治上，美国国会在干涉中国西藏事务上不存在两党对立的现象。从这些涉藏专项法案的提案人和联署人的数量分布上分析，两党基本持平；在涉藏专项决议案的提案人和联署人的数量分布上，民主党议员的数量略高于共和党。在一些影响较大且已经成“法”的涉藏专项法案上，其提案人往往分属两党。比如，“对等进入西藏法案”和“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的提案人麦戈文和卢比奥分属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院 429 号决议案和众议院 697 号决议案的提案人莱希和约霍也分属民主党和共和党。最后，在两院政治上，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推出涉藏专项法案上没有表现出一方激进、另一方谨慎以及一方制约另一方的情况。两院议员在提出涉藏专项法案上多有勾连，比如 2019 年 9 月，麦格文在众议院提出“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后不久，卢比奥也于同月在参议院提出该法案，而“对等进入西藏法案”则是两人于同日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综合这三点分析，可以发现进行内部政治斗争并非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涉藏专项法案的主要动因，美国府会、两党和两院之间在干涉中国西藏事务上不存在明显的分歧与对立，美国国内政治极化没有分散和削弱美国对中国西藏事务的干涉力度。

从美国选区政治层面看，通过分析涉藏专项法案的提案人和联署人的选区分布可以发现，除了落基山地区和中部地区的蒙他拿州、怀俄明州、新墨西哥州、堪萨斯州、艾奥瓦州、肯塔基州、内布拉斯加州、北达科他州以及阿拉斯加州外，这些议员几乎遍布美国各个州。相关选区中又有 4 个较为集中的区域：从缅因州到佛罗里达州的东海岸 16 州、从华盛顿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西海岸 3 州、五大湖区的 8 州以及南部的得克萨斯州，而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的数量位居前三。这反映出选民的对华态度对议员的涉藏提案有着较大的影响。从意识形态上讲，新英格兰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更偏向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等中南部地区的选民更偏向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这些选民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多持负面看法，出自这些地区的议员则会迎合选民的意识形态偏好，提出意在遏制打压中国的涉华法案。从经济上讲，高科技产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中占比较大，制造业在五大湖地区和得克萨斯州的经济中占比较大，而中国被美国舆论污名为美国高科技产业的竞争者和美国制造业回流的阻碍。受到这种误导，这些地区的选民可能对中国多持负面看法，出自这些地区的议员更倾向于提出意在遏制打压中国的涉华法案以迎合选民。

从与其他涉华法案的关联性看，美国国会中热衷于提出涉藏专项法案的议员也往往热衷于提出或支持涉疆、涉港和涉台法案，尤以麦格文和卢比奥最为突出。麦格文是美国国会中较早关注涉疆问题的议员。2009 年 12 月，他就在众议院提出了一项涉疆决议案（H. Res. 953），后又于 2020 年 3 月提出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并于 2019 年 9 月在涉港问题上提出所谓“保护香港法案”。卢比奥在涉疆问题上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和 2020 年 3 月提出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在涉港问题上于 2019 年 6 月提出过“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在涉台问题上，

从 2017 年到 2023 年, 先后提出过 5 项涉台法案 (S. 1051、S. 1566、S. 1513、S. 1074、S. 1997)。另外, 在这些涉华问题上, 佩里、默克利、霍利、泰德·克鲁兹等人分别提出过相当多的法案和决议案。可以发现, 涉藏问题在美国国会处理对华关系上已经不具有特殊性, 美国国会议员不再是主要基于涉藏问题提出反华制华法案, 更多地是因为要从战略上遏制打压中国而提出涉藏法案。这表明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诸多涉台、涉港、涉疆和涉藏法案之间不是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 而是“狼狽为奸”的关系, 它们共同服务于美国遏制打压中国的总目标。

综上所述, 115—118 届国会在立法干涉中国西藏事务上, 府会、两党与两院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一致性。其立法干涉的社会基础具有广泛性和集中性, 立法干涉中国西藏事务与立法干涉中国台湾事务、香港事务和新疆事务之间有着较大的联动性。2017 年以来美国国会之所以加大力度立法干涉中国西藏事务, 并呈现上述三个方面的特点,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美国朝野的对华错误认知。首先是对中国意识形态上的偏见。部分美国议员、媒体和民众对中国持有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 不仅将中国视为“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破坏美式自由主义”的对手, 而且将中国臆想为所谓压制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威权国家”, 从而在感情上反感和仇视中国。其次是对中国经济上的误读。一方面, 部分美国议员、媒体和民众错误地认为中国强大而完备的制造业体系阻碍了美国制造业回流, 将其自身就业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归罪于中国; 另一方面, 他们还错误地认为中国推动产业升级和发展高科技产业是为了挑战并取代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 认为该领域是零和竞争性的、美国在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直接关系到它的世界霸权地位。最后是对中国战略上的迷思。部分美国议员、媒体和战略研究界精英深受古典地缘政治学说^[20]和“权力转移”理论^[21]的影响, 他们多通过这两个理论学说去观察和评估中国发展与中美关系, 从而得出“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挑战、中国意图取代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错误结论。这三种对华错误认知不仅盛行于美国政界, 而且在美国学界、商界、媒体和民众中也广为流行, 它们集中到国会政治层面会导致相当一部分议员妄图以立法方式遏制打压中国, 而中国西藏事务正是其重点干涉方向之一。

三、美国国会涉藏立法的新动向及影响

2017 年以来, 所谓达赖转世议题、“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和水资源”议题、十四世达赖集团的“民主性”议题以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议题, 开始成为美国国会立法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四个重点方向。在涉藏问题上对中国频繁发起定向制裁、对中国西藏事务大肆进行污名化以及推动涉藏问题进一步国际化, 成为美国国会立法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三个主要手段。这四个重点方向和三个主要手段相互联系, 以遏制打压中国为总目标, 以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抑阻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的发展建设、干扰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的社会稳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五个具体意图。

(一) 挑起与干涉达赖转世问题

通过挑起与干涉达赖转世问题, 美国国会妄图以此破坏中国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的社会稳定, 又以此挑拨印度、尼泊尔、不丹、蒙古国和俄罗斯等国与中国的关系。本来按照宗教仪轨、历史定制和中国的法律法规, 达赖转世并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但由于 1959 年十四世达赖叛逃后长期从事分

裂祖国的活动，随着他年事日高，这个问题便逐渐凸显出来，成为近年来美国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首要重点借口。2018 年 4 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 429 号决议案，该决议案荒谬地宣称：“藏传佛教宗教领袖包括未来的十五世达赖的身份确认和安置应该完全由藏传佛教信众根据不可剥夺的宗教自由权决定。”^[18]“西藏政策及支持法”也荒谬地声称：“关于藏传佛教宗教领袖的选择、教育和崇敬的决定完全是精神问题，应由适当的宗教当局在藏传佛教传统范围内，根据藏传佛教修行者的意愿做出”，“十四世达赖的意愿，包括任何书面指示，应在未来十五世达赖的选择、教育和崇敬中发挥决定性作用”^[22]。此外，该法案还妄称用定向制裁和经济资助的方式配合上述规定。一方面，它宣称要制裁那些未来负责或参与选定十五世达赖的中国高级官员；另一方面，资助所谓“在中国和其他地方保护藏传佛教的项目”^[22]。

涉藏问题不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达赖转世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安全和政治安全。从制度上看，决定达赖世系的存在及达赖转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宗教事务，更不是达赖的个人权利，而首先是西藏地方的重大政治事务，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的重要体现。美国国会打着所谓“宗教自由”的幌子，用藏传佛教信众的概念偷换藏族群众的概念，对中国西藏事务进行强权政治干涉。我国要注意防范美国国会这些干涉行径对中国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的社会稳定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可能会给中国与印度、尼泊尔、不丹、蒙古国的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编造与炒作“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和水资源”问题

青藏高原对于中国和全球都有着重要的生态环境价值，但这一点在近年来开始成为美国国会立法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一个重点方向和干扰中国落实治藏方略的一个新借口。在“西藏政策及支持法”中，美国国会诬称：“在西藏修建大型水电站大坝以及包括川藏铁路在内的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导致数千藏民的重新安置，并改变环境”，诬称“传统的西藏草原管理措施可能是缓解气候变暖对青藏高原负面影响的关键，但由于西藏草原牧民的重新安置，这些措施受到了破坏”，诬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完成了每年调水数十亿立方米的调水工程，并计划从青藏高原调更多的水”^[22]。对此，该法案要求国务卿与中国“合作”，既要“监测青藏高原环境”，又要“评估关于强迫游牧民族重新安置的政策”，还要“推动将青藏高原的水资源安全置于地区框架内”^[22]。中国政府在富民兴藏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指出：“坚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9]为此，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以加强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

然而，美国国会罔顾这一基本事实，编造和炒作“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和水资源”问题。于内，一方面阻碍中国治藏方略的落实，企图迟滞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的发展建设；另一方面，炮制“藏民”与“非藏民”的错误叙事，挑拨中国的民族关系，破坏中国的民族团结，企图破坏西藏及四省涉藏州县的社会稳定。于外，一方面，误导部分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在该问题上的认识，在这些国家中营造出“中国抢夺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水资源”的印象，蛊惑其与美国一起阻碍中国治藏方略的落实；另一方面，借助当前“环境政治”与“气候政治”的全球热度，继续编造和炒作“中国应该为全球气候变暖负责”的谎言，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

（三）虚构与标榜十四世达赖集团的所谓“民主性”

近年来，美国不遗余力地虚构与标榜十四世达赖集团的所谓“民主性”，主要出于三种意图。一是为了给十四世达赖集团增加“合法性”，将其拉入所谓“民主伙伴阵营”中，进一步扩展其所谓“国际活动空间”。二是为了以十四世达赖集团的所谓“民主合法性”消解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挑战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代表权和领导权。三是为了给该集团在后十四世达赖时代“续命”，使其在十四世达赖去世后仍有继续存活下去的理由，确保美国仍能继续对其实施操控。

在“西藏政策及支持法”中，美国国会荒谬地宣称：在 2011 年和 2016 年，“西藏流亡政府成员举行了选举，选出了担任藏人行政中央议会议员和行政长官，选举受到国际观察员的监督，并被评估为自由和公正”^[22]。美国国会不仅毫无事实依据地鼓吹十四世达赖集团采用所谓“民主制度”来选择领导人，还鼓吹十四世达赖根据所谓“民主原则”将权力下放给“民选”领导人^[22]。2021 年 6 月，众议员佩里提出的“西藏独立法案”甚至叫嚣要求美国政府承认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所谓“西藏政府”是“西藏唯一的管理当局”，并要邀请其“司政”对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23]。美国国会大力虚构和标榜十四世达赖集团所谓“民主性”的企图与其大力标榜“台独”势力的所谓“民主性”相似，表明它仍旧沿着“美式人权高于主权”“美式民主优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老路，妄图用所谓“美式民主合法性”挑战并取代国际规范中的主权原则，从而达到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真正目的。美国国会虚构与标榜十四世达赖集团的“民主性”，不仅可能助长该分裂集团的声势，而且可能会进一步误导国际社会对该集团的认知，加大中国开展反分裂工作的外部阻力。

（四）肆意挑战和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2017 年以来，以立法形式挑战和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在美国国会形成了一波新的热潮，相关法案之多为近几十年来所罕见。2020 年 5 月，众议员佩里提出的“自由西藏法案”叫嚣要求“美国总统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24]。2021 年 6 月，他提出的“西藏独立法案”更是荒谬地宣称：“中国对西藏地区的所有领土要求都是无效和没有根据的，不仅要求美国总统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狂妄地要制裁每一个支持西藏属于中国的外国人。”该法案还毫不遮掩地写道，炒作“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将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24]。2022 年 7 月，众议员麦戈文和参议员默克利提出的“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也试图歪曲美国政府对西藏属于中国的立场。该法案荒谬地声称：“美国政府的这一立场主要是由于中国对西藏实行了有效控制，既不是因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不是因为这种控制手段符合国际法，更不是因为得到了西藏人民的同意。”^[25]这是在为以后美国行政系统的涉藏政策走出“两面性”提前找台阶、铺道路。

在这一波挑战和否定中国对西藏主权的热潮中，美国国会积极附和十四世达赖提出的所谓“大藏区”概念，不仅企图挑战和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还企图挑战和否定中国对四省涉藏州县的主权。从美国国会如此肆意妄为的行径来看，尽管近年来美国干涉中国新疆事务的热度更高，但在干涉西藏事务上美国走得更远。美国国会以立法形式大肆挑战与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可能进一步误导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对中国西藏主权归属的认知。

（五）频繁发起定向制裁

2017 年以来，美国国会开始频繁在涉藏法案中强调要对中国官员发起定向制裁。具体的制裁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在拒绝或吊销赴美签证上，禁止被制裁中国官员进入美国；二是阻止和禁止被

制裁中国官员在美国拥有财产或进行财产交易。目前美国以第一种制裁手段为主。从美国国会的涉藏法案来看，美国通常会以这三种理由对相关中国官员发起定向制裁：首先是“制定或执行限制外国人进入西藏地区的政策”^[26]，其次是所谓“严重侵犯西藏人权和宗教自由”^[24]，最后是“负责或参与选定未来十五世达赖的人选”^[24]。

与此相关的还有两种类型的制裁，尽管它们尚未成为现实的政策法规，但不排除将来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一是众议员佩里 2022 年 6 月提出的“西藏独立法案”，狂妄地要求美国政府对除美国以外世界上支持西藏属于中国的政府人员、军事领导人或其他人员实施制裁^[26]。其目的无非是想在全球范围内切断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进入西藏，对西藏的发展建设进行国际经济封锁。二是参议员霍利 2020 年 10 月提出的 752 号决议案呼吁“美国公司应仔细审查其供应链，并与使用西藏和其他强迫劳动或无法证明它们没有使用西藏和其他强迫劳动的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断绝关系”^[27]。该决议案是为以后美国在西藏复制“强迫劳动”谎言，从而对西藏和涉藏企业实施经济制裁制造舆论氛围，其目的亦是要对西藏进行国际经济封锁，阻碍中国治藏方略的落实和西藏的发展建设。

（六）对中国西藏事务进行污名化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污名化呈现明显的框架化态势，并主要指向统一战线领域^[28]，对中国西藏事务进行污名化正是其重点之一。2017 年以来，美国国会对中国西藏事务大肆进行污名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通过歪曲西藏近现代史污名化中国对西藏的主权。2018 年 4 月，美国参议院通过的 429 号决议案将 1959 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称为所谓的“起义”^[18]。2024 年 3 月，参议员克鲁兹提出的 619 号决议案将 1959 年中国平定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武装叛乱诬称为“种族灭绝”^[29]。2020 年 10 月，众议员佩里提出的“西藏独立法案”不顾历史事实，妄言“西藏独立国家的建立比 1951 年《十七条协议》早了几百年”。该法案还诬称：“195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胁迫西藏代表签署了一项被称为《十七条协议》的非法解决方案。”^[24]美国正是通过歪曲西藏近现代史，进而污名化中国对西藏主权的依据与历史合法性，企图挑战和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其次，污名化中国治藏方略。这一行径企图进一步挑战和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破坏西藏发展的有利国际环境，损害中国国际形象和声誉，挑拨中国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美国国会除了给中国扣上“侵犯”西藏“人权”和“宗教自由”的帽子外，还编造了中国在西藏推行所谓“强迫劳动”“强制同化”以及“破坏生态环境”等谎言。比如，2020 年 10 月参议员霍利提出的 752 号决议案诬称：“中国共产党对藏民实行同化政策，不断升级对藏民的攻击，把藏族农牧民赶出他们自己的土地，强迫他们把土地和牲畜交给国家，然后把他们转移到政府控制的机构中，在那里接受强迫劳动培训、政治灌输和其他虐待，并把他们分配到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工作，这些地方通常远离他们的家庭和社区。”^[28]在“西藏政策及支持法”中，美国国会还抹黑中国在西藏修建水电站大坝和川藏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诬称“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会导致众多藏民被重新安置，还会导致青藏高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进而影响全球生态环境，甚至还会导致南亚和东南亚相关国家出现用水问题”^[22]。

（七）推动涉藏问题国际化

推动涉藏问题国际化是美国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惯用手段。但 2017 年以来，从美国国会推出的

涉藏专项法案看, 美国的这一手段在侧重点上出现了一定的调整, 即从冷战后期以多边为主到当前多边与双边并重。未来, 美国仍然会借助国际多边机构来干涉中国西藏事务, 但开始侧重于通过双边合作进行干涉。

首先, 美国开始侧重于与地区性大国联合干涉。在“印太战略”背景下, 美国特别希望拉拢印度来联合干涉西藏事务。为此, 2023年2月和6月, 参议员默克利和众议员理查德·麦考密克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75号决议案和540号决议案, 狂妄要求“美国政府承认中国藏南地区是印度的领土”, 并谴责所谓“中国在中印边境地区采取挑衅行为”^[30]。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按照“西藏政策及支持法”在达赖转世问题上的表述, 在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会谈时声称, 美印两国要针对达赖转世问题制定应急计划、形成共识。美国驻印大使与印度外交秘书专门沟通, 鼓动印度在“声援达赖自主转世”方面与美国保持同步^[31]。印度作为一个对中国西藏抱有较大野心的地区性国家, 虽然长期以来倾向于单独干涉中国西藏事务^[32], 但近年来在遏制中国的共同目标驱使下, 与美国联合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苗头有所上升。

其次, 美国迫使或诱导一些相关国家追随其进行干涉。在这一点上, 美国的目标主要是尼泊尔。“西藏政策及支持法”就声称: “国务卿应敦促尼泊尔政府遵守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达成的君子协议, 并向因逃离西藏‘迫害’和‘威胁’而长期居住在尼泊尔的西藏居民提供法律文件, 使他们能够更充分地参与尼泊尔的经济和社会。”^[22]为此, 美国从高官访问、经济援助和联合军演三管齐下, 意图使尼泊尔为“藏独”分子提供容身之所和活动场域, 并借助尼泊尔的地理位置, 安插大量“非政府组织”向西藏地区进行活动和渗透^[33]。

最后, 美国以涉藏问题为楔子, 破坏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西藏政策及支持法”特别强调印度、尼泊尔、不丹、蒙古国和俄罗斯也有藏传佛教信众^[22], 并暗示这些国家在达赖转世问题上也有“发言权”, 甚至未来达赖转世灵童也有权出自这些国家。这一点明显是在怂恿这五个国家干涉达赖转世事务, 以此挑拨并破坏它们与中国的关系。

综上所述, 这七点新动向中的部分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还有部分负面影响则是长期性和潜藏性的。这些负面影响虽然会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产生制约与破坏作用, 但是对于这种作用的实际危害性, 中国不必过于担忧。一方面,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建设成就, 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改善, 这使得美国的干涉不可能有相应的内部条件。另一方面, 美国如果要对中国西藏的安全稳定构成直接威胁, 离不开印度和尼泊尔的支持。虽然在“印太战略”下美国大力拉拢印度, 不断对尼泊尔施加影响, 但印度的“大国平衡”与“不结盟”外交传统相当深厚, 而尼泊尔介于中印之间, 也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政策, 美国尚不能随心所欲地操纵这两个国家的涉藏政策。最后, 美国目前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污名化, 编造和传播各种涉藏谎言。但是,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传播能力的稳步提升, 以及越来越多的外国民众能够看到和体验中国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的真实情况, 美国的涉藏谎言必然会不攻自破。

四、中国应对措施

中国对于美国国会立法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负面影响, 需要系统防范和化解。中国的应对措施

不能只针对美国国会，而要以解决所谓达赖转世问题和涉藏污名化为重点，从内政、外交和外宣三个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一）内政方面的应对措施

内政方面，要着眼于美国干涉达赖转世事务可能给中国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社会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多谋长久之策，多行固本之举。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持之以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促进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深入推动藏族群众与全国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在藏族群众中稳步有序地加强现代文明教育和科普教育，坚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此外，对于美国的涉藏制裁，应以《反外国制裁法》为基础，提升中国反对外国制裁法律体系的统筹性、协调性、合法性与可操作性，完善相关实施制度，并适时探索制定更为全面系统的《反外国干涉法》。

（二）外交方面的应对措施

外交方面，相关措施可以分为双边和多边两个方面。在双边外交方面，聚焦解决达赖转世问题，既要应对美国利用该问题扰乱中国周边局势的企图，又要挤压十四世达赖集团相关错误主张的国际承认空间，主要工作对象是美国与中国周边相关国家。对于美国，不仅应加强对其行政系统的释疑解惑工作，还应积极开展立法机构交往、地方外交和民间外交。在这个过程中，要坚决亮明中国的原则和底线，清晰表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对美国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任何言行予以坚决反对、及时揭批。对于中国周边相关国家，应做好分类工作，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对于俄罗斯、尼泊尔和蒙古，中国应加强协调与合作。对于印度，在加强沟通的同时，也应坚决亮明中国的原则和底线，清晰表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

（三）外宣方面的应对措施

外宣方面，应以美西方媒体和民众为工作重点，逐渐在美西方媒体和民众心中树立正确的中国西藏观，聚焦达赖转世的历史定制与宗教仪轨、西藏地区与祖国的历史关系、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的生态环境与水资源、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设成就、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人权与宗教信仰自由的发展建设成就这五大议题，让更多国外民众看到相关事实真相。应注重发挥高校和智库作用以及宗教文化交流作用，开展通俗性涉藏外宣，不断提升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的正面国际曝光度。

五、结语

2017 年以来，美国加大力度干涉中国新疆事务、香港事务的同时，未放松对中国西藏事务的干涉。这尤其反映在美国国会立法干涉方面，甚至由于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带动，其干涉力度之大远超冷战结束后的其他时段。美国朝野对中国意识形态上的偏见、经济上的误读以及战略上的迷思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三个重要原因。在美国国会立法干涉西藏事务的四个重点方向中，其干涉达赖转世事务对中国的影响最为紧迫，需要中国从内外两个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和防范。美国国会对包括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和水资源、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中国治藏方略和成就以及西藏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污名化，目前虽然主要是在舆论战层面展开，但其产生的消极影响可能难以快速消除。这需要

杜哲元. 美国国会立法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特点与动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36-148.

中国把美国对中国西藏事务、新疆事务与香港事务的污名化联系起来, 统筹推出应对和反制美国对华污名化的长效机制, 全面提升中国外宣能力和国际话语权, 筑牢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道义基础。

参考文献:

- [1] 张文宗, 王靖元. 美国对中俄实施“双遏制”战略的变化及启示 [J]. 和平与发展, 2022 (4): 1-21.
- [2]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B/OL]. (2017-12-18) [2024-2-18].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17/>.
- [3] 仇朝兵. 大变局下美国对华政策“意识形态化”及其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4): 135-164.
- [4] 王健. 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 本质、特点与内在紧张 [J]. 国际问题研究, 2022 (2): 51-69.
- [5]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EB/OL]. (2021-02-04) [2024-03-0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
- [6] 周琪.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显现全貌 [J]. 当代美国评论, 2022 (4): 52-78.
- [7]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8]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12-05 (1).
- [9] 习近平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0-08-29 (1).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智库课题组. 美国涉藏法案的谬误分析 [J]. 中国藏学, 2021 (3): 15-23.
- [11] 肖杰. 美国国会涉藏立法的国内政治动因研究 (1987—2020) [J]. 中国藏学, 2021 (1): 168-178.
- [12] 郭永虎, 朱博. 从特朗普到拜登: 美国涉藏政策的动向、影响及应对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1): 95-105.
- [13] 唐健.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 基于美国亚太战略的考察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135-148.
- [14] 李捷, 杨恕. 遏制与干涉: 美国涉华核心利益法案分析 [J].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0 (4): 15-35.
- [15] 魏红霞.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国会涉华法案及其影响 [J].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 12-22.
- [16] 石培培. 美国国会涉华立法的特点、机制及走向——以第 115—117 届国会涉华提案为例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1): 130-143.
- [17] 肖杰. 美国国会为何激进推动涉西藏法案? [EB/OL]. [2023-08-20] [2024-03-10]. http://www.tibetology.ac.cn/2023-08/20/content_42489161.htm.
- [18] S. Res. 429. A resolution commemorating the 59th anniversary of Tibet's 1959 uprising as "Tibetan Rights Day", and expressing support for the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of the Tibetan people and the Tibetan Buddhist faith community [EB/OL]. (2018-03-08) [2024-03-11].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senate-resolution/429?q=%7B%22search%22%3A%22S.Res.429%22%7D&s=3&r=1>.
- [19] H. Res. 697. Affirm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dvocacy for genuine autonomy for Tibeta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work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has done to promote global peace, harmony, and understanding [EB/OL]. (2019-11-13) [2024-03-11]. <https://www.congress.gov/>

- bill/116th-congress/house-resolution/697?q=%7B%22search%22%3A%22H. Res. 697%22%7D&s=6&r=1.
- [20] 杜哲元. 论美国的古典地缘政治观——基本内涵、战略影响与主要缺陷[J]. 东北亚论坛, 2022(3): 108-126.
- [21] 游启明. 权力转移理论及其批判[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8(3): 42-61.
- [22] H. R. 4331. 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of 2019 [EB/OL]. (2019-09-13) [2024-03-11].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bill/4331/text?s=7&r=1&q=%7B%22search%22%3A%22H. R. 4331%22%7D>.
- [23] H. R. 4281. Tibet Independence Act [EB/OL]. (2021-06-30) [2024-03-11].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4281/text?s=10&r=1&q=%7B%22search%22%3A%22H. R. 4281%22%7D>.
- [24] H. R. 6948. Free Tibet Act of 2020 [EB/OL]. (2020-05-19) [2024-03-11].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house-bill/6948/text?s=3&r=1&q=%7B%22search%22%3A%22H. R. 6948%22%7D>.
- [25] H. R. 8365. Promoting a Resolution to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Act [EB/OL]. (2022-07-13) [2024-03-11].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8365/text?s=3&r=1&q=%7B%22search%22%3A%22H. R. 8365++Promoting+a+Resolution+to+the%5Cu00a0Tibet-China+Conflict+Act%22%7D>.
- [26] H. R. 1872. Reciprocal Access to Tibet Act of 2018. [EB/OL]. (2017-04-04) [2024-03-11].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1872/text?s=2&r=1&q=%7B%22search%22%3A%22H. R. 1872%22%7D>.
- [27] S. Res. 752. A resolution condemn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use of forced labor and other coercive measures to destroy religious freedom in Tibet [EB/OL]. (2020-10-22) [2024-03-11].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resolution/752/text?s=9&r=1&q=%7B%22search%22%3A%22S. Res. 752%22%7D>.
- [28] 龚静阳. 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 梳理与应对[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6): 129-146.
- [29] S. Res. 619. A resolution honoring the 65th anniversary of the uprising of the people of Tibet in defense of freedom [EB/OL]. (2024-03-22) [2024-06-10].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8th-congress/senate-resolution/619?s=1&r=3&q=%7B%22search%22%3A%22Tibet%22%7D>.
- [30] S. Res. 75. A resolution reaffirming the state of Arunachal Pradesh as Indian territory and condemn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provocations in South Asia [EB/OL]. (2023-02-16) [2024-03-11].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8th-congress/senate-resolution/75/text?s=10&r=1&q=%7B%22search%22%3A%22S. Res. 75%22%7D>.
- [31] 朱德涛, 邓妮. 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中的藏传佛教因素及其对我国的影响[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1): 189-200.
- [32] 韩敬云, 王伟. 印度涉藏政策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取向[J]. 南亚研究, 2020(2): 68-85.
- [33] 李涛, 崔佳宇. 美国“印太战略”对尼泊尔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2): 134-145.

编辑: 杨稀琴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样态、危害与治理

邓观鹏 顾友仁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错误的历史认知和诠释观念，用错误的历史结论来影射和否定现实，解构中华民族成员的历史认知与文化自信，背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衷。其样态表现为在国家层面编纂“无中国说”与“去中国说”的话术，在民族层面醇化“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矛盾，在文化层面实施“去主流化”与“以西为美”的双重基调，在政党层面炒作“执政合法性”与“执政效能性”议题，在道路层面攻讦“两个时期”否定民族复兴道路的必然性。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造成诸多危害：虚无身份认同意识，混乱“我们是谁”的认识；虚无政治认同意识，遮蔽“我们从哪里来”的记忆；虚无理想认同意识，动摇“我们到哪里去”的信念。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虚无是“东升西降”态势下美国霸权焦虑、数字化技术变革与自身阶段性演进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应对这些危害，须坚持话语体系建构，掌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主动权；加强思政教育巩固，掌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领导权；实施技术风险化解，掌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信息管理权。

关键词：历史虚无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认同；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4-0149-16

DOI: 10.13946/j.cnki.jcqi.2024.04.012

作者简介：邓观鹏，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顾友仁，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伟大建党精神的记忆叙事及其意识形态功能研究”（23CDJ008）；安徽省新时代育人质量工程研究生学术创新项目“共同富裕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机理及安徽实践研究”（2023XSCX028）

引用格式：邓观鹏，顾友仁.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样态、危害与治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49-164.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链接下各族成员逐渐形成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与政治关系认同的民族意识与情感，是新时代巩固政权、凝聚共识、增进民族团结的施力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备受关注的政治命题与学术话语，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其进行的理论建构。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要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代议题的出场。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式写入党章，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1]。2021年8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2]。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3]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4]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阐释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架构与工作路向，指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现代政治建设的逻辑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五观”，在共同历史文化记忆中培植“四个自信”与“五个认同”。然而，作为一种错误的历史认知和诠释观念，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历史客观事实与发展规律，对党史、国史与中华民族发展史进行曲解和抹黑，企图用错误的历史结论来影射和否定现实，解构中华民族成员的历史认知与文化自信，这无疑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道而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面对世界权力格局的加速演变，美西方为维系霸权地位，加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意图策动“颜色革命”以颠覆国家政权。从苏联解体到“台独”炒作等事件中，无不有西方敌对势力的助推，弥散着历史虚无主义的魅影，其“虚无”之毒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重大隐患。同时，近年来国际民族分裂主义此起彼伏，涌现出如加拿大魁北克独立运动、法国科西嘉独立运动、苏格兰独立公投运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等问题，其中不乏历史虚无主义滋生狭隘民族意识的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3] 16-17}这里强调的“不迷失方向”与“不犯颠覆性错误”，就内含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之意。“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5]，“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3] 536}。因而，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关注。

国内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从本质论出发，论证历史虚无主义的内涵表征与现实危害。相关研究发现其衍生逻辑主要表现为“割裂人类社会发

的历史逻辑、依附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逻辑、鼓吹‘普世价值’的价值逻辑、固守形而上学思维的方法逻辑、妄图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逻辑”^[6], 并在一定程度上渗透着资本逻辑的操纵与助推^[7]。它通过依循“‘潜隐-吸引’‘消费-触动’‘询唤-异化’的生发机制”^[8]进行软性叙事, 意图根据“去马论、不合法论、西式道路唯一论”^[9], 实施去历史化、去民族化, 达到使中华民族丧失民族独立性、文化独立性的目的^[10]。为此, 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以党的领导凝心铸魂, 坚持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11]。二是立足网络化与数字化背景, 考察历史虚无主义网络化和数字化转向的逻辑与样态。该类成果主要观照网络空间与数字技术对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影响, 认为网络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借助互联网信息传播否定历史、抹黑英雄、歪曲事实的错误思潮^[12]。它在数字化时代, 利用智能生成内容技术、深度伪造技术、虚拟化技术, 加剧虚无信息的生产与扩散^[13], 并采用算法精准化渗透^[14], 由此出现“人机协同”速便化生产与弥散以及用户“靶向化”识别的新样态^[15]。为此, 要从坚守智能场域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出发, 把智能技术运用于历史观教育全过程^[16]。

纵观学界研究成果,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大体是基于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展开。其中, 民族学侧重于民族文化、民族交往与民族关系研究, 如有学者以民族走廊^[17]、各民族利益^[18]、少数民族文化^[19]等对象入手, 分析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资源与实践。政治学聚焦中华民族与现代国家的关系探讨, 有学者指出“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中华民族与现代国家有机结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现代民族”^[20], 中国共产党遵循革命建国理论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 使国家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21]。社会学则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社会现象与社会心理研究, 如关注民族地区的学科教育^[22]、融媒发展^[23]、乡村振兴^[24]等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历史学则从历史时空中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态演变与意识生成,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提供历史文化底蕴^[25], 并特别关注先秦^[26]、清朝的“中国认同”建构^[27]、清朝对中国疆域的民族贡献^[28]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案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则侧重对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结构等内容的阐述, 着重从理论内核、时代意义、实践要求^[29]等角度进行分析。还有学者关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化境遇, 指出其遭遇海量信息、虚拟数字交往、复杂数字信息与自由数字空间^[30]等多重挑战。

综而观之, 尽管学界关于历史虚无主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汗牛充栋, 但从历史虚无主义视角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则暂付阙如。鉴于此, 本文深入厘定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样态、危害及其成因, 进而提出应对策略。

二、逻辑廓清: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现样态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具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属性, 是维护和增进“政党—国家—民族—文化—道路”认同的综合性范畴。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 借由历史怀疑论与不可知论, 实施对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否定与曲解, 企图借此消解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自豪感, 弱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抑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发展。

（一）国家层面：编纂“无中国说”与“去中国化”的话术

中国史，就是中华民族史^[31]。中国各民族与地区的历史叙事构成中国历史的整体，它们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32]然而，历史虚无主义以民族历史与民族身份为切口制造民族矛盾，通过虚构和篡改的方式，意图否定中国历史时空的延续性与完整性，意图瓦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

其一，在整体历史上，历史虚无主义意图以“无中国说”论调在源处截断中华民族历史的系统性与正当性。历史虚无主义者基于西方民族国家立场来审视中国，将“虚无”触角延伸至中国古代历史，通过炮制所谓“胡族汉化亡国论”“长城以外非中国论”“元清非中国论”“崖山之后无中国论”“新清史”等学术观点，否定中国自古以来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解构中国史与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完整性与连贯性。

其二，在中国边疆地区，历史虚无主义以“去中国化”论调割裂中国历史的统一性。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问题，台湾、香港与新疆等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囿于历史与国际政治原因，台湾等地区长期散落着历史虚无主义。美西方等反华势力通过编纂“毒教材”等手段扩散历史虚无主义，从新疆“毒教材”到香港“反国教、非法占中、修例风波”，再到台湾新教材“历史课纲微调”，都显示历史虚无主义对特定地区教育、舆论与文化领域的侵害。这使得一段时间在香港地区“‘港独史观’冒起、‘恨国史观’流传”^[33]；在台湾地区“民进党当局在台湾岛推行‘去中国化’‘去中华民国化’‘去蒋介石化’等一系列‘台独’行径”^[34]，炒作所谓“台湾原住民史观”“台湾国族论”“台湾民族自决论”等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在西藏与新疆地区“鼓吹反动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在西藏和新疆的历史归属问题上散布歪理邪说”^[35]，使其与种族主义、宗教主义、恐怖主义进行融合，意图制造国家与民族分裂的乱局。

（二）民族层面：酵化“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矛盾

民族意识经由民族成员交往而产生，是在“认同”与“认异”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民族身份的情感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民族因语言、历史、习俗等差异，会生成不同层次和强度的本民族意识，由此形成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36]。然而，历史虚无主义以偏概全，选取民族差异性为切口，以各民族差异性遮蔽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割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辩证关系。

其一，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人们有着特殊的生活环境与文化环境，在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礼仪、生活习惯等方面具有独立的民族特性。这种特性本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肆意放大民族特性，借古否今，片面聚焦和夸大乃至于编纂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与民族冲突，将中华民族发展史曲解为“民族斗争史”与“民族压迫史”，意在“以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排他意识为特征，鼓吹民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37]，以此冲击各民族“互融互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制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本民族意识的裂隙。

其二，近年来，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大众认知中存在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汉族中心主义，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非常不利^[38]。受此观念蛊惑，在社交媒体与自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历

史虚无主义者将片面、偏激乃至错误解读的元清历史文帖进行流传, 刻意制造民族历史争端议题, 使网络出现部分民族歧视言论, 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化、排外性和暴力性特征。这种网络非理性话语表达出历史虚无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苟合, 缺乏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正确认知和少数民族情感的关照, 背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意。

(三) 文化层面: 实施“去主流化”与“以西为美”的双重基调

历史与文化相互依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39] 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历史与文化的相互依存关系, 在共同“虚无”意图驱使下, 同文化虚无主义相勾连, 裁剪与篡改历史文化史实, 在纵向维度上“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消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40], 在横向维度上对西方外来文化的依附, 意在瓦解中华文化的自主性, 混乱国民的文化观与价值观, 颠倒是非、善恶、荣辱的标准, 企图诱发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与认同危机。

其一, 历史虚无主义以“去主流化”消解中华民族的精神主体性。鸦片战争后, 中国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困境, 中华民族在精神上陷入被动。一些人士受到“西方中心论”影响, 一度将近代中国贫弱境遇归咎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视中华文明为愚昧与落后, 完全否定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精华, 主张全面清算中华传统文化的弊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 历史虚无主义借助网络平台将文化变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实施“文化资本化”与“资本文化化”策略, 宣扬利己主义、消费主义与泛娱乐主义, 消解文化育人与化人的崇高价值。这既贬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意图解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意涵。有的直播、影视等采取娱乐化、篡改化方式, “把严肃的经典、正统的历史和崇高的英雄演绎编造成一个个‘包袱’‘笑料’在网络上推送传播, 不少正面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恶搞中被歪曲和丑化”^[41]。如 2023 年爆出的“丁汝昌投降图”“火烧圆明园插图”“人教版数学教材插图”等事件, 表明历史虚无主义对教育界与文化界的渗透非常隐蔽。

其二, 历史虚无主义“以西为美”消解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受到西方文化与政治霸权的影响, 历史虚无主义奉行“西方文明优越论”, 片面以生产力为基座将西方粉饰为先进的高等文化, 转而贬损并抽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观念, 以此否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虚无主义以西方文化为坐标系, 服从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 发表了系列“厚西薄中”的话题, 旨在以隐形价值渗透的方式向国民兜售资本主义文化观念, 以“鸠占鹊巢”的方式颠覆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主流价值地位的格局。这种虚无论调让中华文明易陷入“失语”困境, 阻碍各族人民文化自信的生成。

(四) 政党层面: 炒作“执政合法性”与“执政效能性”议题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政治保障,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意涵, 政治认同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然而, “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 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 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 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3] 79}。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意图, 旨在刻意弱化甚至是否定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的领导作用，并干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

其一，制造“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先进性”议题。历史虚无主义始终意图否定党的执政正当性、必然性与科学性，通过设计所谓“革命破坏论”“领袖权力斗争阴谋论”“负面历史人物美化论”“英雄虚构论”“政党腐败论”等论调，选择性忽视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将一切社会问题与弊端归咎于党的领导。与此同时，美化外国侵华史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随之兴起，它宣称近代西方入侵“促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思想、文化、技术、制度等先进要素，将外国侵华史的焦点从“殖民战争”偷换为所谓“生产力与思想解放”，企图洗白西方侵略史，标榜“西方现代化优胜论”。这些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开展革命、建设与改革中的价值、形象与成效，容易消解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和爱国英雄的价值认同，让各族人民产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疑虑，稀释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意识。

其二，制造“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工作的成效”议题。历史虚无主义刻意否认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领导，质疑党的民族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攻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选择性遮蔽党领导少数民族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中取得的辉煌成就，转而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细节问题歪曲特写，如将贫富差距问题曲解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差距，离间各民族关系和情感。此外，所谓“中国民族问题”一直被美西方作为钳制和分化中国的工具，他们借助历史虚无主义，炒作“人权”议题，编造“强迫劳动”“抹除少数民族文化”“限制宗教自由”等谎言，人为编纂所谓“新疆问题”与“西藏问题”，意图抹黑党的民族工作与政策、在国际上引发反华舆论。这种民族工作虚无论调不仅制造各民族的认知与情感隔阂，更丑化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形象，对党和国家的权威造成不良影响，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和情感基础。

（五）道路层面：攻讦“两个时期”否定民族复兴道路必然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着物质、精神与制度基础，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联与性质，企图借此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与有效性。

其一，设置“两个时期对立论”议题。马克思在论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指出，“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42]，这指明了社会形态演进是历史阶段前后扬弃的过程。针对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3] 78}，“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3] 78-79}。历史虚无主义忽略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规律与中国具体实际，一方面断言中国需要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大峡谷才能够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否定改革开放前 30 年实践探索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将改革开放以来对政治经济领域的制度改革歪曲为对“真正社会主义”的背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43]，以此曲解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性质。

其二, 设置“改革开放成效论”议题。历史虚无主义在设置“两个时期对立论”的基础上炒作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与社会议题, 妄称“改革开放是导致贫富差距、贪污腐败、自然生态破坏等现象的‘元凶’”^[44]。这种虚无论调无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现象存在规律, 片面将特权、贪腐、贫富等人类普遍性问题同“主义”与“道路”挂钩, 将其作为评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 以此把所有问题归咎为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与改革开放。事实上, 纵观古今中外, 诸如腐败、贫富差距等问题是历史性与世界性的难题, 其本质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 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 而绝非中国专属。历史虚无主义以“有所虚无、有所不虚”的选择性态度, 错误地进行问题归责, 罔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外交等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 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绝口不提, 企图将各族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效的思索引向歧路。

三、风险透析: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危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必须知道自己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 要到哪里去, 想明白了、想对了, 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3] 24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着鲜明的国家、民族与政治认同情感, 是中华民族历史、当下与未来发展共同叙事的结果, 熔铸于中华民族成员对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记忆追问和信念求索中。历史虚无主义集中对以上“五个层次”的虚无, 是对中华民族来处、现实与未来路向的侵蚀, 稀释着各族人民对民族国家身份、情感与理想的认同意识。

(一) 混乱“我们是谁”的认识: 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认同意识

在现代性语境下, 身份认同源于“自我”与“他者”、“本族”与“他族”、“本国”与“外国”之间的异质性, 这种差异性构成身份的识别与比较, 是身份认同意识形成的客观条件。“它概括了共同体成员所感受到的、与其他民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不同, 以及自己的独特性。”^[45] 从概念来说, 民族综合了两组维度, 一个是公民与领土的, 另一个是族裔与血缘的^[46]。现代民族身份认同主要包含“政治-法律维度的国家公民身份和文化-心理维度的民族成员身份”^[47]的双重维度。“我们是谁”反映着中华民族对现代民族国家集体身份的关切, 它涵盖着“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双重主体意涵, 指向对中国国民身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的双重认同。然而, 历史虚无主义以民族历史文化的异质性为基座, 通过伪造和放大民族历史争端记忆, 将具有冲突性的相关历史事件进行刻意扩散, 制造国民身份与民族身份认同矛盾, 引发不同民族群众对身份差异性的比量和同一性的怀疑。一言以蔽之, 历史虚无主义对“我们是谁”记忆进行扭曲, 混乱不同民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身份的认识, 意在削弱其对国民身份与民族身份的共同认同。

其一, 引致历史身份与现代国民身份认同的矛盾。从中华民族发展史来看, 中国古代王朝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 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无论哪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当权, 中国的文化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保持了中国历史的延续性^[48]。中国各民族一直都处于不断融合之中, 否定少数民族王朝的历史, 也是在否定中国的国家历史。然而, 历史虚无主义无视中华民族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既设定“中国=汉族=汉族政权”等错误基调, 以制造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历史身份认同嫌隙; 也在台

湾等地区设置“中国疆域归属论”的虚无议题，欲实现分裂中国的图谋。它所炒作系列“无中国说”与“非中国说”，不仅在中华民族根处制造民族历史的认知陷阱，更核心的意图还在于以古否今，编纂虚假的历史观点来否定中国历史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通过“造假”历史记忆来虚无民族身份认同，进而混淆各族各地区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国家统一性的历史认知。长此以往，这就容易造成国家身份认同与民族身份认同的裂隙，在侵蚀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历史身份认同基础上，淡化对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国民身份（中国人）的集体认同。

其二，扩大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与本民族身份认同的张力。“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超民族共同体。它以整体包容性弥合着各民族“异”与“同”的结构张力，赋予各民族成员以共同的身份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32] 105}“龙的传人、华夏儿女与炎黄子孙”等称谓是中华民族成员共同的身份标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符号。然而，历史虚无主义放大民族差异性而无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否认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性过程与中华文化的“共造性”特征，炒作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的差异，片面强调各民族历史、文化与身份的特殊性、差异性与个别性，选择性忽视中华民族整体历史文化的普遍性、共同性与系统性，人为割裂各民族历史与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历史关联以及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与情感关联，在汉族与少数民族间设置民族隔阂，扭曲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科学和全面认知。这容易造成各民族局限于对本民族身份的关切，在异化的民族意识驱使下将本民族文化认同转变为对中华民族、其他民族的排斥与疏远，进而滋生大汉族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产生民族封闭、排斥与离心倾向，造成本民族“小我”与中华民族“大我”对立的身份认同矛盾。

（二）遮蔽“我们从哪里来”的记忆：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意识

历史唯物论认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42] 16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39] 32-33}这指明了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实践遵循。“我们从哪里来”反映着中华民族对民族历史与文化来源的追寻，用以回答“中华文化的源起、中华民族的形成、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生成和发展”，显现出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演进的时空脉络。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49]对标中华民族发展史，以近代为分野，“我们从哪里来”的追问标明中华民族“起源”与“存续”的双重答案。一方面，中华民族古代史再现中国古代民族交融与民族认同的景象，它们奠定了中华民族历史记忆基础，回答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何以形成与演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程是现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叙事主线，它构成当代中国与中华儿女的记忆底色，回答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何以存续和发展的的问题。历史虚无主义任意剪裁和歪曲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既意图在源头颠覆中华民族发展史，又企图解构和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进而混乱各族群众对“历史之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和“现代之中华民族何以形成与存续”的正确认识。

其一，历史虚无主义切割中华民族发展史，否认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历史连续性和客观性。历史虚无主义假借“历史还原”与“历史评价”之名，在“学术探讨”与“言论自由”的包装下纂

改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与民族历史谱系, 肢解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脉络。从 17 世纪来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制造的“中华文明西来说”, 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表“中华民族源自中亚说”, 再到 20 世纪 80 年代逐渐在美国兴起的“新清史”学术流派和思潮, 表明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对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进行解构。它意图否定中华文明本土化起源的事实, 把各民族历史切割于中华民族历史之外, 以各民族发展史来稀释中华民族共同历史、以近代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来否定中华民族历史的文明成就与贡献, 从而曲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与发展性, 动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由此, 历史虚无主义者既否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的历史客观性和必然性, 也否定着现代中国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延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企图让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多元一体的历史记忆无处安栖, 从而瓦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客观性与正义性。

其二,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国共产党历史, 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的核心作用。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 多元政党和多种主义的尝试皆告失败, 中国共产党诞生并迅速成长为中流砥柱,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祖国统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 建立了新中国, 使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 开辟了民族关系的历史新纪元。然而, 历史虚无主义内嵌明显的政治诉求, 放大“四史”中的历史支流和历史片段, 以反思历史、重评历史与还原历史为噱头, 通过歪解、臆造、恶搞历史等手段, 对已成定论的历史主流进行质疑与否定, 竭力歪曲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建设史与改革开放史, 贬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民族复兴的客观史实与重大意义。这些行径旨在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必然性, 进而否决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新生与存续”的核心领导作用, 以此动摇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

(三) 动摇“我们到哪里去”的信念: 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理想认同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使中华民族真正具备现代化意义上国家的政治基础, 也使自身成为超民族概念的“国家民族”。尽管国家与民族从属于不同概念范畴, 但就政治共同体维度而言, 中华民族事实上等于中国。作为政治共同体, 中华民族不仅需要厘定“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更为关键的还在于须由共同的信仰和理想来建构回答好“我们到哪里去”的时代命题。共同理想信念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信仰”与“共同追求”, 彰显着共同体成员的整体利益, 是处理好民族与国家、个体与集体关系的价值标准。2012 年,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梦”概念, 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3] 63} 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梦”这个伟大梦想作为中华民族“往哪里去”的路标指引与价值导向, 成为个人与民族、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和谐共融的价值依托。追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始终伴随着各族人民力量的汇聚, 促进中华民族从自为状态转变为自觉状态, 再向自信自强状态跃迁。然而, 历史虚无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否定, 妄图造成中华民族共同信念的混乱与颓圮, 抑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其一, 历史虚无主义否认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 消解各族人民的政治认同, 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往哪里去”的核心作用。就层次结构而言, 中华民族共同体如同一个最大同心圆, 中国共产党是圆心。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和政治保障, 只有坚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圆心”地位, 才能最大程度地延伸团结各民族的“半径”, 进而广泛地凝聚各族人民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然而, 历史虚无主义炒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由外而

成”，能够取得革命事业胜利是“偶然意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过大于功”，而在改革开放后出现“权力腐败”问题。如此，通过歪曲党的历史，污化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导，历史虚无主义企图使人们质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破坏中国共产党与各民族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此瓦解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基础，达到“离心”的目的，使中华民族“往哪里去”失去领导核心。

其二，历史虚无主义迷信“西方中心论”，以西方价值观念否定和丑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瓦解中华民族“往哪里去”的精神动力。现代化肇始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先行优势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度占据现代化话语权的制高点。立足于西方一元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设定“西方化=现代化”的标准，企图赋予西方现代化以“绝对普遍性与优先性”的叙事逻辑，以此窄化人们对现代化的本质认识，对其他现代化道路予以质疑和否定。历史虚无主义将“西方中心主义”作为政治信条，宣扬“西方文明优越论”，诋毁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与现实成就，以此混淆人们的价值观念，制造意识形态信仰危机，使一些人沦陷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窠臼。历史虚无主义以厚“西”薄“中”的方式，叫嚣“去主流化”和“去核心价值观化”，干扰“理想最大公约数”的形成，引诱各族人民产生对“四个自信”的怀疑，同时推崇西方现代化，由此否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行性与必然性。这种行径妄图使中华民族不能同心协力朝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行进。

四、成因研判：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机理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复杂态势，这种虚无并非偶然与暂时，而是在多种内外因素耦合作用下的结果。对此，探究这种虚无的生成机理，既要着眼于历史虚无主义自身特性，又要将其放置于当前时代背景与技术条件下。只有这样，才能阐明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阶段特征与深层动因。

（一）时代环境：“东升西降”态势加剧美西方霸权焦虑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当前世界存在的两种主要社会形态。基于两种意识形态的比量，美西方始终谋求对我国实施“颜色革命”，意图使我国改旗易帜重蹈苏联覆辙。这也是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在内的错误思潮挥之不去的根本原因。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历史虚无主义一直充当着美西方渗透与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理论帮凶。近年来，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两个大局”交互演进。一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世纪疫情、种族主义等复杂因素的影响，美西方逐渐陷入党争乱局、经济治理低效困局，综合实力趋向下降。正如有学者指出：“美利坚合众国已成为美利坚分裂国，‘两个美国’之间的不和日益加深，政治极化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50]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加强顶层设计与整体谋划，锚定“党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六大关键领域，推动各个领域并联式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如今，世界格局出现了“西方现代化之困”与“中国式现代化之荣”的鲜明对比，“东升西降”的国际态势逐渐显现，这使得美国在零和博弈思维下陷入霸权焦虑。对此，美西方加强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

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势, 指向我国党史、国史与民族史等敏感领域, 特别聚焦新疆、西藏、台湾等地区, 通过解构、异构与重构等方式全面否定“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历史与成就, 刻意制造民族矛盾与认同危机, 以实现“分化、西化、空心化”图谋, 遏制中国的崛起与发展。可以说, “近 20 年来大陆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 在本质上与港、台历史虚无主义并没有根本区别, 它们都是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产物”^[51]。

(二) 技术条件: 历史虚无主义数字化转向加剧虚无风险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历史虚无主义获得数智化渗透的技术手段, 能够以更加隐蔽和精准的方式渗入数众的日常生活。在数智化时代, 数智媒体解构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主体结构与权力秩序, 塑造出观点多样与信息快速流变的媒介环境。这种信息把关权限的转移为历史虚无主义扩展深度、精度与广度提供着技术便利。在内容设计上, 智媒时代的历史虚无主义摒弃传统的抽象化、学术化形式, 以泛娱乐化、碎片化等方式对我国党史、国史与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人”与“事”进行针对性涂改与篡改后, 散布于影视剧、公众号、短视频、直播、表情包中, 在制造“看点”与“笑点”的数字景观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虚无论调的渗透与嫁接, 实施“去中心化”“去民族化”“去价值化”引导。在技术运行上, 历史虚无主义内容流通可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生产—传播—监控—反馈”的全过程操控: 在生产上可“深度伪造”以便“以假乱真”, 在对象上可“算法标记”以便“精准投放”, 在流通上可“算法过滤”以便“留西去中”, 在反馈上可“全程跟踪”以便“修正调整”。在这些算法技术加持下, 历史虚无主义呈现出精准化、多元化、隐蔽化特点, 在网络空间披裹言论自由与历史还原的外衣, 虚构诸如“人权问题”“民族问题”“历史归属问题”, 实现实时化与精准化的信息派送与诱导, 从而“在渐进式的思想脱敏中侵蚀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权威属性, 污名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崇高意义”^[52]。

(三) 自身演变: 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阶段性与嬗变性特征

历史虚无主义并非一成不变, 其演进伴随着社会变革而呈现阶段性与嬗变性特征, 在时间轴的纵向行进中衍生不同的样态。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的泛起与蔓延, 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 历史虚无主义首先在中国文化界兴起, 以胡适与陈序经奉行的“全盘西化论”为代表, 由此形成文化虚无主义样态, 这为后期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危机埋下隐患。第二个阶段为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大量涌入, 历史虚无主义既借着“历史反思”之名, 对改革开放前 30 年历史进行诋责与否定; 又利用“崇洋媚外”的社会心理制造“黄色文明”落后于“蓝色文明”的刻板印象, 使得虚无论调在党史与文化领域泛滥。第三阶段为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 随着苏东剧变,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冰冻低谷期”。历史虚无主义论调甚嚣尘上, 国际上出现所谓“历史终结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西方资本主义优越论”等思潮; 国内历史虚无主义则重点向史学领域延伸, 对中国近代史、党史与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否定性解读。第四个阶段为进入 21 世纪后, 受世界多元化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 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 成为美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理论帮凶。此时, 历史虚无主义附着于互联网, 混同泛娱乐化与消费逻辑, 将虚无触角全面向中国“五史”蔓延, 从历史领域向文学、艺术领域翻越, 以更加通俗、大众与隐蔽的方式向大众散播。当前历史虚无主义不再满足于“党史”与“国史”领域, 又“另辟蹊径”对民族历史、民族问题与社会热点等敏感领域进行虚无, 将我们党“泛全能化”

与“泛责任化”，把负面信息与党的治理效能挂钩，意在诱发大众负面情绪，质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进而动摇民族复兴的历史与文化基础。总而言之，当下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虚无，旨在保持虚无能力，其根本意图始终如一。

五、纠治进路：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对策略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虚无，党和国家已采取了许多应对性策略，包括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出版《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推进《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治建设、深化“四史”学习、加强教材审核等多种措施，为遏制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建构了重要屏障。对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性以及其演化特征加强相关治理，还可从以下路径进行优化。

（一）话语体系的建构：掌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叙事的主动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3]³⁷⁻³⁸叙事话语体系的构建，既能防范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解构，也有利于以话语说服人和凝聚人来推进共同体建设。

其一，加强对“中华民族发展史与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话语叙事。历史虚无主义意图解构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整体性，以民族归属与认同问题制造“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和谐”的嫌隙，受到“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反华势力利用。因此，要系统阐释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源”与“流”之由来，以话语呈现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文化脉络，让各地区与各族人民准确习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前世”与“今生”。一方面，加强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历史叙事。锚定中华民族共同体“三交”的关键环节，展现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融合与中国疆域形成的脉络与面貌，回答好中华民族“从何而来”与中国“如何演进”等核心问题，以清晰的历史史实增进各族人民的历史认同与情感归属。另一方面，加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叙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的血脉记忆，要在“两个结合”中强化对民族精神、神话传说、节日仪式、纪念之场等表征中华民族精神品格象征符号的记忆叙事，特别要注重对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保护与呈现，提升各地区和各民族文化在中华现代文明展演中的出场率和关注度，以文化话语吸引人和打动人，增强各民族文化的获得感和共鸣性，让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民族文化无机可寻。

其二，加强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话语叙事。在2021年8月召开的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准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与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36]²⁴³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仅关涉民族工作语境，还延伸到港澳台同胞与海外侨胞工作语境。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创新涉民族宣传的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可靠保障，讲清楚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认同度和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讲清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所具有明显优越性”^[4]。为此，要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覆盖，围绕“四个与共”“四个共同”“两岸同胞的四个坚定与五个共同”等核

心话语范畴, 阐释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文化意识, 破除历史虚无主义的“离间计”, 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

其三, 加强对“中国之治与民族复兴”的国际话语叙事。在信息数字化时代, 中西意识形态博弈形势激烈, 美西方发动媒体舆论攻势来炒作我国政治与民族议题, 试图以历史虚无主义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对复杂的外宣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36] 316}。国际宣传话语不仅关系到我国的国家话语权, 也是增进民族凝聚力, 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与民族事务治理偏见的必要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为中国构建国际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与空间, 应将这些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能量。我们在国际舆论场要主动实施“走出去”战略, 借助现代传媒信息技术和组建高素质宣传人才队伍, 加强与海外媒体、社会组织、专家学者的交流对话, 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两大彰显中国特色的原创性话语, 讲述好中国之治与民族复兴的图景,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道路与经验。这有助于批驳和回应美西方污名化、虚无化中国政治与民族事务的言论, 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正确认知与认同, 也有利于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荣誉感、归属感与认同感。

(二) 思政教育的巩固: 掌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领导权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推动各民族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2] 508}。“五观”教育的提出不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新时代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治本之策。2023年9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改革创新, 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 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53]因此, 各级学校应建构以“五观”为指向的思政教育模式, 引导学生加强对“四个自信”与“五个认同”的正确认识, 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侵害。

其一, 围绕“五观”教育加强教材编写与监管。教材自古以来便是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增进国家认同和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载体和工具^[54]。然而, 随着美西方意识形态入侵, “毒”教材死灰复燃, 一度出现新疆“毒教材”、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配图、“杜鹃花落”试题等事件, 表明历史虚无主义存在隐形泛滥的风险。为此, 要发挥教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作用, 坚持党对教材建设的全面领导, 加强“五观”教育思想的融入。在政治审核标准上, 要严格落实教材建设政策方针, 加强对教材编写人员政治立场与学术素养、教材内容与出版规范性的监管与审核, 防止教材内容出现历史虚无主义错误。在教材内容与版本管理上, 要在保证意识形态安全基础上, 遵循统一性与多元性、政治性与学理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的原则, 既要让教材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 能够传递中华民族历史文化, 彰显民族地区特色, 也要推进教材“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以内容的先进性与学理性满足时代需求, 让教材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保障。

其二, 围绕“五观”教育加强教学设计。2019年3月1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 “这就要求我们把下一代教育好、培养好, 从学校抓起、从娃娃抓起。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 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5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 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教育过程, 须立足青少年“拔节孕穗期”, 遵循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与思想政治教

育规律，对大中小学进行针对性“五观”教育设计，推进教学目标、教材、课程、教师、方法、环境、评价等一体化建设，做到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实现“五观”教育效果最优化。对此，各级学校要通过科学的教育活动和丰富的校园文化，让校园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场域，以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空间。

（三）技术风险的化解：掌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信息的管理权

在数字化媒体时代下，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借助网络媒介进行传播，活跃于微博、知乎、短视频、自媒体等数字平台，衍生出各种复杂的网络化和数智化形态。数智技术的加持，让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隐蔽性、时空聚合性与舆论扩散性等特征。针对网络历史虚无主义的治理，既要着眼于“破”，强化信息监督与责任惩戒，还要紧抓于“立”，加强虚无信息的回应与纠错，及时肃清历史虚无主义空间。恩格斯曾经指出：“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56]彻底清除错误思想的泛滥，要重视净化网络空间。

其一，加强网络监管和惩戒。在人工智能算法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各类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敏感性、煽动性议题与信息潜藏在数字监管盲区进行滋生传播。对此，国家应强化技术监管，建立历史虚无主义信息处理数据库，利用数字智能技术构建防火墙，设定关涉“五史”与民族关系问题的关键词筛选机制，特别关注对民族历史争端、民族身份歧视等议题的治理，精准识别、评估与预测历史虚无主义信息在各媒介平台的生产、分发与渗透的动态情况，以及由此引发的舆情风险状态，从而做到预警、追踪与应对一体化处理，不断压缩历史虚无主义衍生空间，营造良好网络生态。

其二，加强信息引导和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网络传播程度和范围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网络意见人士的影响^[57]。面对网络世界流存的否定和炒作党史、国史与中华民族发展史，以及革命英雄人物与中华民族英雄等内容和议题，国家可打造官方权威的中华民族历史研究数字平台，培养一批具有专业素养、理论深度与责任担当的网络意见人士。这些人士能够在面对网络历史虚无主义议题时，及时有效地进行批驳，用科学正确的党史与国史理论知识进行理论回应，论证虚无信息“何以错”，客观史实“何以在”与“何以对”。这可以实现以史料说服人和凝聚人，提升各族人民的历史素养和民族意识，增强人们对历史虚无主义信息与议题的辨别力与批判力。官方从理论与知识层面构筑历史虚无主义的防火墙，给予民众知识传递和价值引领，可防止因虚无议题回应的延时和缺位而导致虚无舆论的发酵和扩散，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在场，推动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进国家与民族认同。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7.
-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08.
- [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33.
- [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3-10-29（1）.
- [5]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邓观鹏, 顾友仁. 历史虚无主义虚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样态、危害与治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49-164.

- [6] 竟辉.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批判 [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3 (9): 112-119.
- [7] 左路平. 历史虚无主义的资本逻辑批判 [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3 (7): 104-110.
- [8] 罗红杰. 历史虚无主义软性叙事: 内生机制与应对策略 [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4 (2): 85-93.
- [9] 竟辉.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批判的五重论域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 (12): 75-81.
- [10] 于安龙.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西方文明观的批判与超越 [J]. 学术界, 2024 (3): 13-20.
- [11] 洪晓楠, 宗欣怡.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与经验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 (6): 89-99.
- [12] 吴頔, 穆文若. 网络历史虚无主义在高校的传播及其治理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4 (6): 84-86.
- [13] 陈甜. 新时代历史虚无主义“智能化”渗透的风险与应对 [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3 (6): 96-105.
- [14] 孙旭红, 顾琪. 文艺领域历史虚无主义的网络传播: 样态表征、现实危害及其反制策略 [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3 (4): 54-60.
- [15] 董敏, 张士海. 论历史虚无主义的数智化叙事转向及应对路向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3 (8): 63-68.
- [16] 修晓辉, 杜玉华. 解蔽虚无“陷阱”: 智能时代历史虚无主义何以存在及其批判 [J]. 理论导刊, 2023 (2): 52-57.
- [17] 张继焦, 张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走廊研究的新分析框架 [J]. 民族学刊, 2023 (5): 16-25.
- [18] 华锋, 金炳镐, 字秀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3 (4): 41-46.
- [19] 郝国强, 李星莹. 从竞生走向共生: 六堡茶传承中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互嵌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实践系列之四 [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2): 43-55.
- [20] 周平, 郭志凯. 中华民族的当代重塑及其意义 [J]. 探索, 2023 (6): 28-40.
- [21] 刘朝帅, 王立胜. 中华民族—国家双重建构逻辑及对现代国家治理的意义 [J]. 青海民族研究, 2022 (3): 22-28.
- [22] 普丽春, 子华明, 赵伦娜. 边疆民族地区“大中小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系建构与实践反思 [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1): 1-7.
- [23] 吴锋, 郑晓琳. 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意蕴与创新路径——基于西部 12 个省市区的考察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1): 18-27.
- [24] 刘苏荣, 潘小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4): 27-33.
- [25] 郑信哲, 王明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2024 (1): 40-48.
- [26] 宋清员. 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阶逻辑——兼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J]. 广西民族研究, 2022 (1): 130-138.
- [27] 崔欣. 共同记忆塑造与清王朝“中国认同”建构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1): 174-180.
- [28] 邓涛. “四个共同”的历史印证——以各族对清代中国疆域统一的贡献为中心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5): 228-237.
- [29] 苏洁. 习近平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要求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 (3): 47-55.
- [30] 李玉雄, 王封琴. 数字化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挑战和实践路径 [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2): 1-9.

- [31] 王少明, 普布次仁. 历史虚无主义批判与西藏高校“四史”教育路向 [J].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 236-242.
- [32]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84.
- [33] 孙扬. 正确的历史教育不是可有可无的——谈谈香港历史教育改革的前因和方向 [J]. 历史评论, 2021(2): 78-82.
- [34] 张建. 中国国家统一进程中反“独”促统话语叙事的构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1): 79-89.
- [35] 李学保.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中的涉外因素及其应对之策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3): 35-46.
- [3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246.
- [37] 严庆, 平维彬. 超越极端民族主义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3): 22-30.
- [38] 邱硕. 走出汉族中心主义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评《汉民族史记》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11): 194.
- [3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2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36.
- [40] 顾友仁. 文化虚无主义的问题表征及其文化哲学批判 [J]. 江淮论坛, 2023(2): 108-115.
- [41] 张博. 警惕“娱乐包装”下的软性历史虚无主义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1(3): 102-106.
-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55.
- [43] 陈明凡, 刘兰炜. 新时代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向度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3(6): 49-56.
- [44] 洪晓楠, 宗欣怡.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与经验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6): 89-99.
- [45] 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主义: 理论、意识形态、历史 [M]. 叶江,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19-20.
- [46] 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认同 [M]. 王娟,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23.
- [47] 于春洋, 于亚旭. 全球化叙事中的社会个体身份认同——以多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讨论 [J]. 东方论坛, 2020(5): 85-96.
- [48]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8: 148.
- [49] 费孝通. 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37.
- [50] 陈远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筹“两个大局”的世界意蕴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8): 28-36.
- [51] 刘雅君. 新形势下“历史虚无主义”在港台的表现及其全球化根源 [J]. 台湾研究, 2017(3): 38-42.
- [52] 方正. 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变革逻辑、数字梗阻与风险防范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6): 93-107.
- [53]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N]. 人民日报, 2023-5-30(1).
- [54] 王飞, 刘身强.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教材建设的价值意蕴与推进理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1): 94-106.
- [5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29.
- [5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229.
- [57] 周玉. 历史虚无主义网络传播的新特点及对策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0(7): 115-123.

责任编辑: 杨稀琴



“特朗普归来”： 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

周嘉希

（上海社会科学院 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 200020）

摘要：2024年总统大选是美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节点。相较于2020年总统大选，特朗普个人和团队在保持其鲜明风格的同时，为适应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做出了一定的竞选策略变动。首先，特朗普的媒体矩阵中，极右翼小众媒体的作用更加突出，社媒平台的“真相社交”成为特朗普与选民直接沟通的首要社交媒体平台。其次，特朗普在延续直白与口语化演讲风格的同时，减少以往激烈与争议性的言辞。再次，特朗普竞选团队更加精简、高效和结构化，其对执政团队成员的挑选依旧重视忠诚度，并着力发掘党内政治新星。特朗普的核心圈成员与支持者群体是其竞选的主要资本，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风格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愤怒、不满和焦虑情绪。美国国内政治在特朗普与拜登的竞争下面临新的内部分裂。在对内政策主张方面，特朗普将延续其总统任期内“美国优先”的政策风格，即以美国利益优先的方式处理经济、教育、移民等问题。在对外政策主张方面，特朗普坚持孤立主义传统，并强调美国的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具有不可预测性，但总体基调依旧是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保守“鹰派”观点或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风向标。

关键词：特朗普；美国政治；美国大选；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拜登政府；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4) 04-0165-16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4.013

作者简介：周嘉希，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引用格式：周嘉希。“特朗普归来”：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4): 165-180.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范式转变”，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基本共识是对华采取竞争战略。拜登倾向于通过多边合作和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应对中国，而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具有不可预测性，可能采取极限施压。因此，2024 年美国大选不仅事关美国国内政治走向，同时也将影响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当地时间 2024 年 7 月 13 日，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的竞选集会上遭“未遂刺杀”。这起事件表明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美国国内政治走向更加扑朔迷离。

2024 年大选是特朗普 2020 年败选的“复仇之路”，其动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特朗普对 2020 年总统大选的结果心有不甘，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第二，特朗普依旧拥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尤其是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劳工选民。第三，特朗普认为拜登是“最糟糕的总统”，自己有能力带领美国走出困境。另一方面，2020 年大选不仅是两党候选人之间的较量，更是两种政治理念和政策方向的对决。双方的竞争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倾向，中间地带逐渐缩小。同时，美国的政治极化也与全球范围内保守主义和右翼政治力量的回归趋势相呼应。

特朗普和拜登在 2024 年竞选中均面临多方面挑战。首先，虽然特朗普在过去的总统竞选中表现出强大的民意支持率，但白人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可能会对其选情产生负面影响。其次，特朗普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法律诉讼和对其国会骚乱事件的指控。拜登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一些选民对其任内的通胀高企、移民问题处理等存在不满。拜登的另一大挑战在于体力与精力，尤其是在 6 月 27 日第一场电视辩论中的欠佳表现，被广泛质疑“年老体弱”不适宜参选。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支持率差距始终无法扩大。若特朗普再次当选，可能会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导致美国进入一个高度两极分化的政治时期。

国内学界已就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开展了一些研究。有学者指出，美国政治极化、缺乏妥协合作以及竞选优先于治理等因素对新冠疫情治理成效产生了负面影响^[1]。另有学者指出，美国正处于对等极化的政治格局当中，政治极化促进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基础的重组，这虽然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左翼内部的分裂更有利于特朗普代表的右翼势力^[2]。还有的学者认为，美国白人劳工更加趋向于共和党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去工业化”趋势，全球化、移民以及对现有国际秩序导致部分白人劳工感到被边缘化，未来美国政治存在多重分化组合的可能^[3]。亦有学者指出，极化政党与联邦制的结合反而使各州沦为“反民主的实验室”，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民主的衰退趋势^[4]。此外，部分学者对政治极化对美国国内政治及总统选举的影响展开讨论。有学者指出，特朗普在执政期间重塑了共和党，表现在共和党选民更多地支持保守主义，并且党内不断涌现出在理念上支持、在风格上效仿特朗普的政治人物^[5]。另有学者从特朗普司法争议视角出发，认为在政治极化氛围下，对特朗普的审讯有可能演变为政党政治另一块角逐赛场，可能会酿成宪法危机，对美国司法系统的挑战大于机遇^[6]。还有学者总结到，美国政治极化体现在两党的议题和情感两方面，选民的意识形态分布呈现哑铃型，中间派选民的人数显著减少^[7]。

本文拟从特朗普个人及其团队的视角出发，深入分析其 2024 年总统竞选策略的变化、内政外交

周嘉希. “特朗普归来”: 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65-180.

政策的趋向以及对华影响。本文旨在加深对特朗普现象的理解, 为理解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

二、特朗普竞选策略的变化

特朗普宣布参选 2016 年美国大选并成功当选后, 因其鲜明的反建制政客风格, 形成了独特的“特朗普主义”。相较于 2020 年大选, 特朗普 2024 年总统竞选的策略主要发生了三点变化: 第一, 特朗普更加重视小众媒体作为政治营销载体; 第二, 在保持口语化演讲风格的同时逐渐减少争议性言论; 第三, 竞选团队变得更具专业性和组织性, 执政团队的挑选强调忠诚度和政治理念一致, 并深入挖掘党内政治新星。

(一) 以小众媒体取代主流媒体

在社交媒体竞选时代, 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精英通过不同媒体途径形成了两个信息闭环^[8]。而在 2024 年竞选中, 特朗普更加重视与自身关系密切的媒体。特朗普的个人媒体矩阵对其竞选活动来说至关重要, 各类媒体不仅能够绕过传统媒体直接与选民沟通, 还允许特朗普控制有利于自己的信息流, 以确保其观点触达受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宣传手段被认为与传统的宣传策略类似, 甚至有些类似于希特勒的宣传理念^[9]。譬如, 特朗普曾在 2023 年 11 月的演讲中称政治对手和批评者为“害虫”, 引发了历史学家对于其言论呼应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担忧^[10]。此外, 特朗普和福克斯新闻共同对美国电视新闻议程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特朗普的推特账号与福克斯新闻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 约一半的推特内容反映了福克斯新闻的报道、主持人或嘉宾, 与此同时, 超过 40% 的新闻报道提及特朗普, 而特朗普推文在报道中占据至少 10% 的时间^[11]。

特朗普及其背后的商业集团建立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媒体矩阵, 包括类似于“X”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以布莱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 Network)为代表的极右翼小众媒体(far right alternative media)以及直播平台“Rumble”。相较于福克斯新闻、“X”等主流媒体平台, 特朗普建立的媒体矩阵明显更具“亲特朗普”的特点。在其总统任期内, 特朗普将记者视为“人民的敌人”, 将“媒体”归类为对普通美国人的经历怀有敌意的众多既定精英机构之一, 通过社交媒体、政治集会和保守派媒体在传统新闻媒体之外进行交流^[12]。因此, 特朗普抛弃主流媒体、拥抱社交媒体的做法使得极右翼小众媒体进入主流视野。这些极右翼小众媒体除了布莱特巴特新闻网外, 还包括右翼广播网(RSBN)、“就是新闻”(Just the News)。

布莱特巴特新闻网被认为是具有仇恨情绪的右翼媒体, 由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创立, 曾优先获得特朗普团队提供的演讲稿。该网站可被视为激进版的福克斯新闻, 以极端的、有利于形成身份认同的议题吸引极右翼群体^[13]。右翼广播网络是特朗普竞选团队脸书页面的官方直播平台, 其首席执行官乔·西尔斯(Joe Seales)曾表示与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主管丹·斯卡维诺(Dan Scavino)保持密切沟通。“就是新闻”则具有明显右翼主义倾向, 其创始人约翰·所罗门(John Solomon)被其他媒体描述为“阴谋论者”和“亲特朗普”。

另一方面，在被“X”封禁后，特朗普更加重视其公司开发的“真相社交”平台。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表明，27%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听说过“真相社交”，但只有2%的人使用该网站获取新闻，其中87%的人表示“真相社交”的新闻和信息大多准确^[14]。“真相社交”虽然自称是一个无党派的社交平台，但许多账户均右倾或支持特朗普。因此，“真相社交”仅仅是一个政治宣传工具，而非获取新闻和信息的来源，旨在放大和利用特朗普赖以生存的仇恨、无知和偏见^[15]。

（二）演讲风格的延续与妥协

由于基本盘中拥有大量教育程度不高的选民，因此特朗普沿袭了口语化、直接且富于情感色彩的演讲风格。但与此前不同的是，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一直强调2020年选举受到“干预”，大选结果本不应由拜登获胜，以此宣扬自己参加2024年大选的正当性。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竞选中的语言依旧具有攻击性。特朗普在竞选中常常强调自己在白宫期间取得的成就，并批评拜登“摧毁美国民主”，是“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特朗普还声称“民主党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抹黑他们的政治观点，以此吸引对共产主义持反感态度的年长选民^[16]。

特朗普针对“激进左翼民主党”、“深层政府”、环保主义者、全球主义者、媒体的态度没有改变，仍然使用了给竞争对手起新的绰号、煽动人群向媒体发出嘘声的伎俩，其竞选中木讷和经过排练的演讲缺乏色彩和活力^[17]。特朗普还曾呼吁，判处与之意见不合的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死刑，并以世界末日的方式描述美国的政治，称2024年大选是“我们的最后一场战役”，并把自己描述成代表支持者的“报复”。此外，特朗普让其支持者做好2024年大选可能会出现舞弊的准备，敦促他们进行干预“保卫选票”^[18]。这些激进言语被认为是“随机恐怖主义”（stochastic terrorism），即利用其影响力发表辱骂或煽动性言论，激起支持者为政治对手或团体进行攻击^[19-20]。

由于特朗普独具魅力的个人性格和成熟的商业手段，其在竞选过程中能够有效触动美国选民。特朗普的策略表现出其对选民的心态有着独特的理解，并且通过在选民中制造恐慌和混乱，以此来扩大影响力、达成政治目标。有评论指出，特朗普自信乐观、享受权力，具有支配性和不畏惧的个性倾向均有助于营销自身、鼓动支持者^[21]。特朗普不仅在选举关键州投入更多资源，还通过针对特定选民群体的广告和宣传活动来最大化提升竞选效果^[22]。

另一方面，特朗普又变得更加审慎，在2024年大选演讲中减少了争议性言论，旨在吸引中间派和摇摆选民。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当被问及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言论时，特朗普解释说这些言论是“开玩笑”或“讽刺”的^[23]。这种转变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尤为显著，与以往不同，特朗普避免承诺全国性的堕胎禁令，而是建议将这一问题留给各州来决定。在移民问题上，特朗普亦表态允许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外国学生获得绿卡，这与其之前的反移民言论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还减少了对极端立场的公开支持，转而专注于攻击民主党和拜登政府的政策。特朗普不再一味坚持激进的、具有争议性的言论，表明其政治营销更具欺骗性和表演性，也表明特朗普的竞选策略更具针对性。

（三）竞选团队与执政团队人选

特朗普2024年的竞选团队较2020年相比显得更为紧凑和高效。团队的主要特点是规模相对较

周嘉希. “特朗普归来”: 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65-180.

小, 成员更具专业性和组织性。精简的团队配置使特朗普更加依赖竞选顾问和战略分析师, 以制定并实施更为精准和有效的竞选计划^[24]。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的核心成员包括苏西·怀尔斯 (Susie Wiles)、克里斯·拉奇维塔 (Chris LaCivita)、杰森·米勒 (Jason Miller) 和詹姆斯·布莱尔 (James Blair), 四人都鲜少在公众场合公开露面。克里斯·拉奇维塔和杰森·米勒目前均担任公共事务和竞选公司“FP1 战略”的合伙人。“FP1 战略”曾为多位共和党候选人和委员会工作, 同时米勒还担任右翼社交媒体网站 GETTR 的首席执行官。与之前的竞选周期相比, 该团队因其成熟的经验以及高度的保密性与纪律性而受到特朗普本人认可, 反映出特朗普核心圈针对 2024 年大选采取了更结构化和有组织的团队形式。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策略上明确调整了重点, 更加注重与基层选民的接触和互动。过去,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善于与基层建立联系, 并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吸引选民的支持。例如, 在 2024 年艾奥瓦州党团竞争中, 特朗普团队已在全州范围内建立了广泛的草根关系网络^[25]。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对待争议性群体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竞选团队曾表示, 来自共和党或其团队以外的任何人关于特朗普胜选后执政团队的信息不应被视为官方信息^[26]。此外, 竞选团队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尝试将特朗普与极端主义者之间的联系最小化。

特朗普挑选执政团队的原则是强调忠诚度以及与其政治理念的一致性。前执政团队成员人选包括蓬佩奥 (Mike Pompeo)、本·卡森 (Ben Carson), 国家安全顾问或国务卿的人选包括前驻日大使哈格蒂 (Bill Hagerty)、前驻德大使格林纳尔 (Richard Grenell)、前国防部副部长助理科尔比 (Elbridge Colby)、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Robert O'Brien)、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Michael Flynn) 等, 忠实支持者则包括米勒、斯蒂芬尼克 (Elise Stefanik)、莱克 (Kari Lake)、扬金 (Glenn Youngkin)、阿博特 (Greg Abbott)、格林 (Marjorie Taylor Greene)、加巴德 (Tulsi Gabbard)。其中, 斯蒂芬尼克、加巴德与特朗普的关系更为密切, 特朗普曾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一次会议中向来访者高度评价二人。

特朗普还有意培养党内支持自己的政治新星, 包括斯科特 (Tim Scott)、拉马斯瓦米 (Vivek Ramaswamy)、诺姆 (Kristi Noem)、万斯 (J.D. Vance)、卢比奥 (Marco Rubio)、科顿 (Tom Cotton)。其他高级职位的人选还包括: 共和党籍富豪保尔森 (John Paulson)、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Robert Lighthizer)、前国会众议员和前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 (John Ratcliffe), 退役中将、前国家安全顾问凯洛格 (Keith Kellogg), 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弗莱茨 (Fred Fleitz)。凯洛格和弗莱茨目前是亲特朗普智库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的顾问。博明 (Matthew Pottinger)、叶望辉 (Steve Yates)、余茂春等对华强硬派人士也可能进入其决策圈。

三、特朗普的圈层及国内政治分裂

目前, 特朗普围绕着一个强大的核心圈, 包括家庭成员、顾问和政治分析师, 核心圈成员与团队帮助其运筹帷幄, 制定竞选策略并处理各种公共关系危机。在 2024 年大选中, 特朗普的支持者群

体虽有一定变化，但总体上依旧致力于稳住基本盘。特朗普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体现于能够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群提供合适的表达和政策，如右翼福音派、民粹主义者、反平权主义者等^[27]。

（一）特朗普核心圈的构成

特朗普的核心圈广义上指的是那些在特朗普政治生涯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在决策过程中产生重大影响的一群人。核心圈成员在塑造特朗普国内政策、对外关系、应对危机策略、公关活动以及其他主要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共同塑造了特朗普的行政与竞选风格以及其对美国相关政策的实施指导。特朗普核心圈的主要特点是对特朗普及其政策主张坚定的忠诚与信仰。

特朗普的核心圈成员不仅包括其家庭成员，如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劳拉·特朗普（Lara Trump），还包括其他高级顾问、竞选策略师和长期的政治盟友，如史蒂芬·班农、罗杰·斯通（Roger Stone）等。此外，特朗普的个人律师，如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也是其核心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幕僚团队多人已经离职，但多位重要幕僚仍对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具有重要影响力。例如，前幕僚长马克·梅多斯（Mark Meadows）在政治问题上与特朗普核心圈子成员保持联系，并参与了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筹款活动。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中互动频繁的账号同样可视为其核心圈成员（图 1）。前白宫社交媒体负责人丹·斯卡维诺（Dan Scavino）在制定特朗普的社交媒体策略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富兰克林·格雷厄姆（Franklin Graham）为著名基督教牧师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的儿子，其支持可以帮助特朗普在福音派选民中赢得更多选票；纽约州众议员斯蒂芬尼克则是共和党内四号人物。独立调查记者马特·泰比（Matt Taibbi）则公开了“X”干涉“言论自由”、压制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的负面报道，以此为特朗普被“X”封杀博得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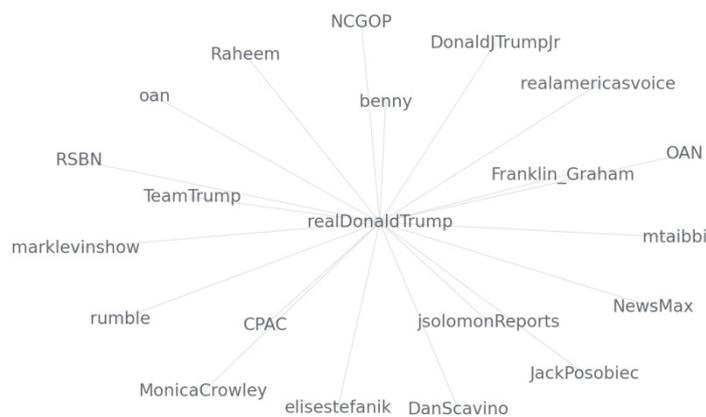


图 1 特朗普“真相社交”中的前 20 位社交网络

（数据来源：作者通过抓取特朗普“真相社交”账号推文分析获得）

周嘉希. “特朗普归来”: 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65-180.

除个人以外, 特朗普的周围还存在与之关系紧密的诸多保守派政治团体, 包括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PAC)、保守伙伴研究所、美国第一工作 (America First Work)、特朗普集团 (MAGA Inc.) 等。与特朗普相关的组织和团体开展的捐款为特朗普带来了可观的收益。由前特朗普政府官员组成的非营利智库美国第一政策研究所 (AFPI) 在 2022 年共筹集到 2 300 万美元, 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一位匿名捐助者, 旨在为潜在的特朗普第二任期做准备^[28]。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加大力度推动其“2025 计划” (Project 2025), 增加对旨在为下一届共和党政府创建“候任政府”的合资企业的拨款。税务记录还显示, 该基金会在 2022 年分发了超过 167 万美元的赠款, 其中包括向“2025 计划”咨询委员会提供的 96.5 万美元。这些捐款占该基金会 2022 年拨款总额的 58%。传统基金会还向其游说团体“传统行动护美国” (Heritage Action for America) 捐赠了 40 万美元^[29]。根据 2022 年从华盛顿公民责任与道德组织 (CREW) 获得的税务文件, 另一家亲特朗普智库保守党伙伴关系研究所 62% 以上的收入仅来自 4 位匿名捐助者, 其中一位捐赠了 1 550 万美元^[30]。

(二) 特朗普的支持者群体

特朗普的支持者大体分为五类。第一类, 对美国经济有所焦虑的民众。许多支持者认为特朗普会为制造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并通过减税来提振经济。第二类, 反移民情绪强烈的民众。近年来, 美国反移民情绪的根源来自非法移民, 特朗普恰恰坚持驱逐非法移民。第三类, 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 应该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 特朗普将采取措施保护美国利益和文化。第四类, 反建制情绪民众。特朗普的“反建制”特点能够撼动现状并为体制带来变革。第五类, 福音派基督徒相信特朗普将保护宗教价值观, 包括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等问题。

特朗普以其独特的政治策略和吸引力, 在特定目标群体中获得了相对稳定的支持。《国会山报》分析认为, 大多数共和党选民相信任何针对特朗普的外部指控都是无效的^[31]。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 (PRRI) 的一项调查显示, 大约 70% 的共和党人对特朗普持好感^[32]。此外, 特朗普的一些煽动性言论对那些原本对某些少数群体持有敌意的群体产生了影响, 使他们更倾向于支持特朗普, 并形成跨党派效应^[33]。还有的研究表明, 特朗普支持者中对一系列社会、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偏见的显著增加, 普遍反对特朗普的个人 (包括自由派和保守派) 的偏见趋于下降^[34]。有实证研究表明, 企图通过讽刺、嘲讽和讥讽来消除特朗普政治形象的努力对其支持者几乎没有影响^[35]。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的历史与宗教密不可分, 特朗普支持者中的一大来源即基督教福音派。根据一项调查, 特朗普在 2020 年赢得了 84% 的白人福音派选票^[36]。皮尤研究中心 2021 年的一项调查也发现, 对特朗普表达“热情”的美国白人比那些没有表达“热情”的美国白人更有可能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开始认定自己是福音派人士^[37]。2024 年 2 月, 福克斯新闻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28% 的白人福音派选民表示将投票给拜登, 相比 2023 年 10 月的调查增加了 5%。尽管 68% 的白人福音派选民在 2024 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 但民意调查显示对拜登的支持正在增加^[38]。2024 年初的共和党党内初选中, 艾奥瓦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大多数特朗普支持者为福音派白人。

有研究认为, 美国宗教文化为反智主义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白人福音派构成了右翼保守主义政治的核心支持力量^[39]。福音派人士之所以支持特朗普, 主要原因在于: 对特朗普“铁人”形

象的策略性拥护；认为特朗普主义是对文化边缘化和“精英”的愤怒的表达；对强势人物的吸引力超越了美国白人对“强硬”领导者的一般渴望；特朗普能够在不明显提到宗教的情况下调动他的追随者的“宗教主观主义”^[40]。

（三）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以及共和党内部的分裂

如今美国两党之争演变为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方位斗争，选民也随之按照党派逐渐分化，情感及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日益加剧^[41]，美国的政党政治已从“论争式民主”演变为“敌对式民主”^[42]。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和拜登竞选团队已经陷入一场相互“拆台”和“揭短”的竞赛，争取在分裂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占据上风。

双方“互怼”凸显出美国政治舞台的激烈竞争，其中社交媒体已成为塑造选民意见和观念的关键战场。双方团队的竞赛逐渐体现出民意的民粹化趋势。双方的观点不再是传统政治辩论中的冷静理性，而是变得越来越鲜明、直白，甚至更加口语化。不论是竞选演讲还是总统辩论中，双方都充满了强烈的情感表达，用词更加贴近普通民众的语境，使政治话语更具亲和力。口水战的升级反映了数字时代政治沟通的变革，民众更倾向于接受直接、具有情感共鸣的表达方式。6月27日的第一场电视辩论即成为拜登与特朗普相互指责和攻击的场域，两人从政见讨论转移到谁的高尔夫球技更好。

与此同时，特朗普特立独行的风格也造成了共和党内部派系分裂。共和党内部的分裂不仅仅体现在政策分歧上，还反映在对特朗普个人的态度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尽管许多共和党人认为里根是过去40年中“最好的总统”，但特朗普的支持者也占了很大的比例^[43]。此外，共和党的分裂在国会中尤为明显，形成了“永不特朗普主义者”（Never Trumpers）与“特朗普主义者”（Trumpists）两大派别。“永不特朗普主义者”的代表包括参议员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前众议员莉兹·切尼（Liz Cheney）等，该派别不惜与共和党站在对立面。例如，在对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Alejandro Mayorkas）的弹劾案中，3名共和党议员与民主党人站在一起，认为宪法规定的弹劾应作为最后手段，而不应用于政治争斗^[44]。

特朗普还面临党内里根派与特朗普派之间的矛盾。在援助乌克兰法案的审议中，里根派站在了民主党人一边，反映出里根派已经从特朗普派中脱离出来，双方不断扩大的裂痕有可能削弱特朗普的基础，传统保守派选民可能会寻求更符合其价值观的替代方案。因此，传统保守派选民在面对党内的分歧时，可能会寻求更符合其价值观的替代方案，考虑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以表达他们对当前政治环境的不满。

此外，独立候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 Jr.）的参选，无疑加剧了选票的分化局面。虽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小罗伯特·肯尼迪为“激进左派”和“环境问题专家”，但小罗伯特·肯尼迪被认为是站在主流媒体对立面“讲真话的人”，其参选无疑会分流一部分双方的支持者。小罗伯特·肯尼迪以其家族背景和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声誉，吸引了一批关注环保和社会公正的选民，这些选民中包括一些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群体。小罗伯特·肯尼迪的独立身份也吸引了那些对两党政治感到失望的选民，这些选民希望在政治舞台上看到新的声音和选择。

四、特朗普竞选的政策主张

在 2024 年美国大选中, 特朗普的政策主张主要反映在其总统任期内的各项对内对外政策, 以及社交媒体推文、竞选演讲等载体中。特朗普的政策趋向反映出实用主义, 彰显了其个人以及未来的执政团队对于“美国利益”的执着追求, 并且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特征。

(一) 国内政策

特朗普的施政政策可能具有延续性, 包括促进制造业回流、限制移民等。其中, “议程 47”(Agenda 47) 是特朗普面向第二任期所提出的政府计划。虽然特朗普本人从未公开讨论过“议程 47”, 但一些前政府官员, 如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John Bolton) 表示听说过“议程 47”但不知道其具体细节。该议程包括以前所未有方式行使行政权力, 例如利用联邦执法机构打击“政治敌人”, 并将目标瞄准政府内部的“深层政府”。该议程被描述为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政策的延续^[45-46]。“深层政府”一词经常在阴谋论中用于指代联邦政府内部一个秘密网络, 特朗普指责“深层政府”成员间的协同工作旨在破坏美国人民的意愿。

在经济方面, 特朗普依旧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 主张以“美国利益优先”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其核心主张是通过减少政府干预, 使企业能自由发展, 为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为刺激经济增长, 特朗普将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所谓保护美国制造业及减税。随着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价格竞争, 美国制造业外流成为经济增长障碍。特朗普坚持强调“美国制造”, 尤其是汽车产业, 其本质是保护本国工人就业, 抵制全球化进程中国内制造业流向海外的趋势。税收减免是刺激经济的关键因素, 特朗普认为通过减税可以激励企业增加投资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因此, 特朗普主张通过税改刺激整体经济, 希望藉此推动疲弱的经济进一步增长。特朗普曾经承诺为新罕布什尔州提供更多税收减免措施。

在教育方面, 特朗普提出将所有教育工作和需求交由州政府处理的计划, 理由是州政府能更好地满足孩子们的教育需求。此外, 特朗普还表示要让家长重新担任教育负责人, 并会给予家长选举校长的权利、废除 K-12 教师终身职位制度、以绩效工资激励优质教学, 以及削减校长等教育行政人员的学校资助优惠和其他福利。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则主张利用美国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开采国内能源, 通过能源供给降低物价, 减少对外资源依赖。

在移民问题方面, 特朗普将其作为攻击拜登政府的主要抓手, 可能延续大部分移民政策。特朗普关于移民的主张是严格的边境管控以减少非法移民流入。特朗普曾拒绝两党达成的边境协议, 同时承诺利用所谓“外国敌人法”将已知或疑似帮派成员、毒贩或毒品卡特尔成员驱逐出境。其次, 大部分联邦执法机构, 包括缉毒局、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的部分力量, 将被转至移民执法。再次, 特朗普承诺在联邦土地上兴建新城市, 并为无家可归者建设帐篷城。对于毒品问题, 特朗普曾表示不仅将立法对毒品走私实行死刑, 并寻求国会认可惩处这种“罪行”, 还将对毒品走私集团实施海上封锁, 切断其与全球金融系统的联系, 并动用国防部特种部队破坏“毒品卡特尔”的领导层。

（二）对外政策

在对外关系方面，特朗普依旧坚持孤立主义传统，并强调美国的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将表现得反复无常、粗鲁且具有对抗性，可能沿续其总统任期内的立场^[47]。针对欧洲盟友，特朗普希望重新思考并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特朗普曾于 2018 年对欧盟持强硬立场，称其为美国的商业敌人。若再次当选，特朗普仍将给欧洲盟友施加巨大压力。他强调欧洲盟友需要为自身防御负更多责任，诸如增加北约防务预算等。对于贸易逆差，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不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由此可见，特朗普的当选可能使得美欧之间重新产生贸易摩擦。对于乌克兰问题，特朗普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主要方式包括寻求俄乌双方的共同点，同时认为美国应在乌克兰问题上和俄罗斯达成和解。

在中东问题方面，特朗普一直强调亚伯拉罕协议对中东和解的正面效应，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立场依旧倾向于强调以色列的安全保障。其政策主张在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中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倡导以公正性原则对待双方。2023 年 10 月 7 日，以色列公民遭受哈马斯的袭击事件后，特朗普政府首次对以色列领导层的应对策略提出了批评。此后，特朗普强调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镇压”哈马斯的激进行为。在 2024 年 1 月 15 日艾奥瓦州的演讲中，特朗普政府宣称如果他再次当选，以色列将不会遭到任何外部势力的攻击。尽管其言论中透露出一定程度的好战性，但在政策层面，除了表明将对伊朗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之外，特朗普政府并未提出具体的政策解决方案。在伊朗问题上，考虑到特朗普曾终止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若其获得第二任期将可能继续执行对伊朗的强硬政策。

特朗普政府对拉美的政策主要集中在打击非法移民和毒品贩运行为。在边界安全和移民政策问题上，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并在竞选演讲中提出部署美国海军对墨西哥贩毒集团实施封锁的计划。在环境保护领域，特朗普主张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以确保美国的经济利益和环境的可持续性。若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将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此外，特朗普还致力于建立基于基督教价值观的国际同盟，其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关系紧密^[48]。美国右翼团体和政治领袖在中东欧国家的立场非常相似，都试图强调民族和宗教与国家的紧密联系，以对抗自由主义和全球化^[49]。有评论称，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削弱了对其权力的机构制约，同时寻找替罪羊并剥夺罗姆人、移民和同性恋群体等历史上被排除在外的群体的权利^[50]。特朗普还强调犹太教-基督教话语在以色列-美国特殊关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表达了对这些价值观的重视^[51]。

（三）对华政策

在对华关系方面，由于美国国内政治表现出高度不稳定，保守和极右翼精英通过鼓噪“中国威胁”来稳定国内局势，特朗普的主张加剧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减弱的印象^[52]。可以说，在对华关系方面，无论拜登和特朗普谁获得第二任期，都将延续对华强硬基调^[47]。

特朗普在演讲中多次提及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军事力量增长。特朗普主张通过改革国际贸易规则和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来维护美国的经济安全。在处理国内经济问题时，特朗普同样将中国视为关键因素。特朗普关注并支持密歇根州汽车工人工会的罢工行动，并批评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政策可能导致美国汽车工业及其就业岗位的减少。在特朗普眼中，拜登的政策选择并非基于美国的国家利

益, 而是受到了中国等国家的影响。

特朗普任内对华采取了强硬的贸易规制措施。在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背景下, 特朗普仍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 并寻求在关键技术和产业领域保持美国的领先地位。因此, 在 2024 年的竞选中, 特朗普声称将采取更为强硬的经济政策, 包括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 60% 的额外关税, 以及采取更为激烈的贸易对抗措施。这些政策主张体现了“美国优先”的理念, 并试图通过这些分歧来团结和动员其选民基础。尽管这种策略可能在短期内有助于迎合部分选民的呼声, 但也必然加剧中美关系紧张, 并对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产生负面影响。

在台湾问题上, 特朗普的立场部分源自其对华强硬政策。在其总统任期内, 美国向台湾出售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并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因此, 可以预见若特朗普当选, 美国可能会进一步“支持”台湾当局, 包括武器销售、贸易和其他形式的合作。在特朗普的政策工具箱中, 扩大对台湾的“支持”可以作为对华施压的一种手段。然而, 台湾问题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议题, 特朗普曾表示有能力在 24 小时内结束乌俄战争, 但在是否派遣美军“支援台湾”的问题上则持谨慎态度。

特朗普核心圈同样为其未来对华政策走向提供了参考意见。最为典型的就是对华“鹰派”博明 (Matt Pottinger) 以及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二人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阐述了对华政策立场, 其观点基本可被视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风向标。两人的文章表明其强硬立场与“反共”特征, 除了在对华政策方面的一些强硬外交手段, 更是鼓吹以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来区别对待“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 试图以“颜色革命”的方式寻求“更迭中国政权”, 实现所谓的“自由世界”。在“反共”叙事外, 美国反华“鹰派”鼓吹“民主-非民主”的叙事, 把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国与中国一道视为所谓“独裁、极权或威权政府”, 以及美国需要面对的所谓“轴心”^[53]。此外, 在“2025 计划”中, 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保守派智库专家强调了针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和析, 同时声称非政府机构和盟友提供协助并采取统一行动来应对中国的科技与经济活动。总体而言, 特朗普可能会延续在对华政策上的强硬立场。

五、结语

特朗普利用美国公众对建制派精英的厌恶情绪塑造自身反建制“英雄”的角色。就美国国内而言, 特朗普利用经济衰退和民粹主义修辞吸引感到被忽视的选民, 并促使被边缘化的右翼保守主义思想合法化^[54]。在对外关系方面, 极右翼抓住机会煽动公众对外部威胁展开冷战, 特朗普政府加剧了公众的仇外情绪, 即所谓“随着中国变得更加自信, 美国正在被削弱”^[52]。在其民粹主义安全叙事中, 特朗普自然而然地成为故事中的“英雄”, 他的出现意味着“拯救和保护真正的人民”。因此, 特朗普个人风格的核心就是确立“人民”与“精英”对立的意识形态。特朗普现象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民众的多层次不满、愤怒和恐惧, 从而表现出“反智主义”和“偏执风格”的“本土主义”倾向, 这既是对激进后现代主义的抵制, 也代表了民粹化趋势的力量^[55-56]。特朗普的出现也

使得共和党成为“特朗普的共和党”，从而对美国政党政治造成了侵蚀。在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反智主义的浪潮中，民主党在民调上始终难以显著拉开与特朗普的距离。因此，对特朗普本人、其团队以及其支持者进行深入分析，对于理解当前多国政治倾向整体向右偏移的趋势至关重要。

虽然涉华议题在 2024 年美国总统竞选中鲜少提及，但这也恰恰反映出两党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基本共识，根据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对华强硬态度及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可以预见美国对华政策已难做较大调整。具体表现在：第一，制衡中国的关键在于主权问题，包括台湾、涉港及南海问题。第二，蔑称所谓的经济“胁迫”问题，美国诬称“产能过剩”导致中国产品“倾销”国外市场，对美国制造业造成打击，包括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半导体、太阳能电池板、医疗产品、铝和钢铁等领域。第三，国家安全问题，包括作为新兴领域的网络安全威胁。第四，全球治理体系与全球软实力问题。美国声称，中国以自身文化、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作为西方模式的可行替代方案。第五，美国认为中国在俄乌冲突、以哈冲突等事件中均与美国持不同立场。

随着美国两党、国会、智库圈内的“友华派”声音逐渐式微，民主党试图坚持对华战略竞争，同时确保中美竞争不失控；共和党则倾向于对华更激烈的竞争，对华政策具有较强的对抗色彩^[57]。两党都声称，中国正在寻求国际地位的提升，打破美国的霸权体系。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总基调不变的前提下，若拜登成功连任，其对华政策将获得延续，一方面拜登可能会给双边关系带来更多稳定性，另一方面拜登的管理型策略也将使两国在关键领域的竞争加剧。若特朗普当选，其对华政策将更为强硬，不可预测性和极限施压将会使双边关系更加紧张和不确定。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加剧，我国需要具备更强的战略定力和耐心，充分做好超强施压的预期，同时针对美国政府、政党、国会以及政治人物开展更加深入的研判，掌握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对华强硬的根源，尽可能保持或扩大中美双方交流渠道。

参考文献：

- [1] 邢悦, 刘晓欣. 政党极化、民主危机与美国政府新冠疫情治理的失败 [J]. 国际论坛, 2022 (3): 132-154.
- [2] 蒋锐. 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力量消长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 (6): 26-33.
- [3] 黄琪轩. 去工业化中的失落者: 美国保守主义兴起的选民基础 [J]. 文化纵横, 2022 (6): 53-63.
- [4] 倪春纳. 反民主的实验室: 联邦制、政治极化与美国民主 [J]. 政治学研究, 2023 (6): 175-186.
- [5] 刁大明. 美国共和党“特朗普化”的新发展 [J]. 现代国际关系, 2024 (2): 5-22.
- [6] 陈长宁. 特朗普面临的刑事诉讼: 美国司法政治视域下的分析 [J]. 美国研究, 2023 (6): 83-99.
- [7] 朱杰进. “选举大年”全球政治局势前瞻 [J]. 人民论坛, 2024 (5): 78-81.
- [8] 易妍, 叶淑兰. 社交媒体竞选如何强化美国政治极化: 基于美国新冠议题的框架化考察 [J]. 社会科学, 2023 (2): 114-127.
- [9] Concha Pérez-Curiel and Pilar Limón-Naharro. Political Influencers. A Study of Donald Trump's Personal Brand on Twitter and Its Impact on the Media and Users [J].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9 (1): 57-75.
- [10] Marianne LeVine. Trump Calls Political Enemies 'Vermin,' Echoing Dictators Hitler, Mussolini

周嘉希. “特朗普归来”: 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65-180.

- [EB/OL]. (2023-11-13) [2024-01-1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3/11/12/trump-rally-vermin-political-opponents/>.
- [11] Erendira Abigail Morales, Cindy J. Price Schultz and Kristen D. Landreville. The Impact of 280 Characters: An Analysis of Trump's Tweets and Television News Through the Lens of Agenda Building [J]. *Electronic News*, 2021 (1-2): 21-37.
- [12] Matt Carlson, Sue Robinson and Seth C. Lewis. The Trump Presidency: Four Years of Battling and Belittling the Press [M]. Matt Carlson, Sue Robinson and Seth C. Lewis, eds. // *News After Trump: Journalism's Crisis of Relevance in a Changed Media Culture*. New York,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85-120.
- [13] Jonas Kaiser, Adrian Rauchfleisch and Nikki Bourassa. Connecting the (Far-)Right Dots: A Topic Modeling and Hyperlink Analysis of (Far-)Right Media Coverage During the US Elections 2016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0 (3): 422-441.
- [14] Naomi Forman-Katz and Galen Stocking. Key Facts About Truth Social [EB/OL]. (2022-11-18) [2023-11-29].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2/11/18/key-facts-about-truth-social-as-donald-trump-runs-for-u-s-president-again/>.
- [15] The Guardian. The Observer View on Donald Trump's Truth Social [EB/OL]. (2021-10-24) [2023-11-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21/oct/24/the-observer-view-on-donald-trump-truth-social>.
- [16] Austin Sarat. Opinion | Why Donald Trump Says His Enemies Are 'Communists' [EB/OL]. (2023-06-22) [2024-02-07].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3/06/22/donald-trump-red-scare-communism-00102990>.
- [17] Ian Ward. The Tired Monotony of a Trump Rally in 2024 [EB/OL]. (2024-01-24) [2024-02-02].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4/01/24/trump-rally-speeches-maga-vibes-00137364>.
- [18] Ali Swenson and Christine Fernando. As Social Media Guardrails Fade and AI Deepfakes Go Mainstream, Experts Warn of Impact on Elections [EB/OL]. (2023-12-26) [2023-12-30]. <https://apnews.com/article/election-2024-misinformation-ai-social-media-trump-6119ee6f498db10603b3664e9ad3e87e>.
- [19] Brian Klaas. Trump Floats the Idea of Executing Joint Chiefs Chairman Milley [EB/OL]. (2023-09-25) [2023-12-07].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3/09/trump-milley-execution-incident-violence/675435/>.
- [20] EJ Montini. Donald Trump, Kari Lake and Others Invent a Whole New Kind of Terrorism [EB/OL]. (2024-01-10) [2024-02-10]. <https://www.azcentral.com/story/opinion/op-ed/ej-montini/2024/01/10/donald-trump-kari-lake-invent-stochastic-terrorism/72173861007/>.
- [21] Aubrey Immelman. The Leadership Style of U. 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J]. Working Paper No. 1.2, Collegeville and St. Joseph, MN: St. John's University and the College of St. Benedict, Unit for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in Politics, 2017: 1-16.
- [22] Eugene Daniels, Ryan Lizza and Rachael Bade. *Playbook: Trump's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 Strategy [EB/OL]. (2024-06-27) [2024-06-03]. <https://www.politico.com/newsletters/playbook/2024/05/26/trumps-everything-everywhere-all-at-once-strategy-00160029>.
- [23] Eric Cortellessa and Palm Beach. How Far Trump Would Go [EB/OL]. (2024-04-30) [2024-05-02]. <https://time.com/6972021/donald-trump-2024-election-interview/>.
- [24] US News & World Report. Inside Trump's Election a-Team: Lean, Mean and Largely Unseen [EB/OL]. (2024-02-01) [2024-02-07]. <https://www.usnews.com/news/top-news/articles/2024-02-01/inside-trumps-election-a-team-lean-mean-and-largely-unseen>.
- [25] Galen Bacharier. How Donald Trump's 2024 Campaign Quietly Built a Grassroots Juggernaut for the Iowa Caucuses [EB/OL]. (2023-12-26) [2023-12-31].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politics/elections/2023/12/26/donald-trump-2024-campaign-iowa-caucuses/72030200007/>.
- [26] Jill Colvin and Michelle L. Price. Trump's Campaign Is Distancing Him from Allies Who Have Sketched Out Plans for a Second Term [EB/OL]. (2023-12-08) [2024-01-01]. <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2024-presidential-campaign-plans-ea397dc77aa29c63d37e0a56ab03ef38>.
- [27] David Norman Smith. The Agitator Supplies What the Base Demands: Trumpism Before and After Donald Trump [J]. *Critical Sociology*, 2023: 08969205231208921.
- [28] Casey Tolan and Kristen Holmes. Conservative Think Tank Laying Groundwork for a Second Trump Term Raised Millions from a Single Anonymous Donor [EB/OL]. (2023-12-06) [2024-01-04]. <https://www.cnn.com/2023/12/06/politics/trump-donor-america-first-policy-institute-invs/index.html>.
- [29] Katherine Doyle. Donations Have Surged to Groups Linked to Conservative Project 2025 [EB/OL]. (2023-11-17) [2023-12-12].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2024-election/donations-surged-groups-linked-conservative-project-2025-rcna125638>.
- [30] Robert Maguire. Anonymous Donations Provide Big Payday for Trump-Allied Election Deniers' Group [EB/OL]. (2023-11-17) [2023-12-01]. <https://www.citizensforethics.org/reports-investigations/crew-investigations/anonymous-donations-provide-big-payday-for-trump-allied-election-deniers-group/>.
- [31] Caroline Vakil. Why GOP Voters Are so Loyal to Trump [EB/OL]. (2023-04-30) [2023-12-31]. <https://thehill.com/homenews/campaign/3978590-why-gop-voters-are-so-loyal-to-trump/>.
- [32] PRRI. Threats to American Democracy Ahead of an Unprecedented Presidential Election [EB/OL]. (2023-10-25) [2023-12-31]. <https://www.prrri.org/research/threats-to-american-democracy-ahead-of-an-unprecedented-presidential-election/>.
- [33] Lilliana Mason, Julie Wronski and John V. Kane. Activating Animus: The Uniquely Social Roots of Trump Support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21 (4): 1508-1516.
- [34] Benjamin C. Ruisch and Melissa J. Ferguson. Changes in Americans' Prejudices During the Presidency of Donald Trump: 5 [J].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22 (5): 656-665.
- [35] Dermot Hodson. The Visual Politics and Policy of Donald Trump [J]. *Policy Studies*, 2021 (5-6): 509-527.

- 周嘉希. “特朗普归来”: 竞选策略、政党政治动向与对华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4): 165-180.
- [36] Kelefa Sanneh. How Christian Is Christian Nationalism? [EB/OL]. (2023-03-27) [2023-04-11].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3/04/03/how-christian-is-christian-nationalism>.
- [37] Ruth Graham and Charles Homans. Trump Is Connecting with a Different Type of Evangelical Voter [EB/OL]. (2024-01-08) [2024-01-10]. <https://www.nytimes.com/2024/01/08/us/politics/donald-trump-evangelicals-iowa.html>.
- [38] Matthew Impelli. Donald Trump's Losing White Evangelicals to Joe Biden [EB/OL]. (2024-03-05) [2024-03-06]. <https://www.newsweek.com/donald-trumps-losing-white-evangelicals-joe-biden-1876228>.
- [39] 张永红. 美国反智主义成因探析 [J]. 湖北社会科学, 2023 (8): 35-42.
- [40] Christopher Craig Brittain. Racketeering in Religion: Adorno and Evangelical Support for Donald Trump [J]. *Critical Research on Religion*, 2018 (3): 269-288.
- [41] 穆若曦. 极端对立的政党与日趋分裂的社会——论政治极化下美国选民的政党认同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2 (3): 141-149.
- [42] 周淑真, 穆若曦. 试论美国现实的宪政危机及困境——基于 2016 年以来政党政治演变的考察 [J]. 政治学研究, 2022 (5): 73-84.
- [43] Andrew Daniller. Republicans View Reagan, Trump as Best Recent Presidents [EB/OL]. (2023-08-22) [2024-05-28].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08/22/republicans-view-reagan-trump-as-best-recent-presidents/>.
- [44] Macarena Vidal Liy. Donald Trump's Long Shadow Exposes Republicans' Internal Division on Capitol Hill [EB/OL]. (2024-02-08) [2024-06-18]. <https://english.elpais.com/usa/2024-02-07/donald-trumps-long-shadow-exposes-republicans-internal-division-on-capitol-hill.html>.
- [45] Allan Smith and Jonathan Allen. Trump Blends New Policies with Old Grievances in His 2024 Campaign [EB/OL]. (2023-03-16) [2023-10-25].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donald-trump/trumps-2024-campaign-blends-new-policies-old-grievances-rcna75095>.
- [46] Frankie Taggart. “Agenda 47”: What Trump Has Promised If He Wins In 2024 [EB/OL]. (2023-06-30) [2023-08-01]. <https://www.barrons.com/news/agenda-47-what-trump-has-promised-if-he-wins-in-2024-79bb3dd9>.
- [47] Stephen M. Walt. Another Trump Presidency Won't Much Change U. S. Foreign Policy [EB/OL]. (2024-01-22) [2024-03-0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1/22/another-trump-presidency-wont-much-change-u-s-foreign-policy/>.
- [48] Jeffrey Haynes. Trump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J]. *Religions*, 2020 (8): 385.
- [49] Rita Abrahamsen, Jean-François Drolet, Alexandra Gheciu, et al. Confronting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New Right [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2020 (1): 94-107.
- [50] Maria J. Stephan. How to Fight the Global Far-Right Alliance Threatening Democracy [EB/OL]. (2023-06-29) [2023-12-13]. <https://www.justsecurity.org/87086/the-global-far-right->

authoritarian-alliance-threatening-us-democracy-and-how-to-weaken-it/.

- [51] David Tal. The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 and the US-Israel Special Relationship [J]. *Diplomacy & Statecraft*, 2023 (4): 755-776.
- [52] Inderjeet Parmar and Thomas Furs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Far-Right and World Politics [J]. *Globalizations*, 2023 (5): 799-813.
- [53] Matt Pottinger and Mike Gallagher. 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 America'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Must Be Won, Not Managed [J]. *Foreign Affairs*, 2024 (3): 25-39.
- [54] Simon Mollan and Beverly Geesin. Donald Trump and Trumpism: Leadership, Ideology and Narrative of the Business Executive Turned Politician [J]. *Organization*, 2020 (3): 405-418.
- [55] 刁大明. “特朗普现象”探析 [J]. *现代国际关系*, 2016 (4): 31-39.
- [56] 丛日云. 民粹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论西方知识界解释特朗普现象的误区 [J]. *探索与争鸣*, 2020 (1): 118-137.
- [57] 苏刘强. 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基本共识与关键分歧 [J]. *国际展望*, 2024 (1): 37-53.

责任编辑：林华山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二、著录格式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 [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期): 起止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6): 6-12 [20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l>.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 [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 [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bz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64/138-161e.htm>.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统一战线学研究[®]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4年第4期 总第46期 第8卷

双月刊 2024年7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王 鸿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 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局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微信公众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定价：20.00 元